錢賓四先生全集

◆總目（總序目、總目次、索引）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54



◆總目（總序目、總目次、索引）

聯經

A89015

錢賓四先生全集㊹

總目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錢賓四先生全集

1998年5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精裝全套35000元

著　者　錢　穆
整　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委會
執行編輯　鄭　秀　蓮
發 行 人　劉　國　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 版 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　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 刷 者　永 裕 印 刷 廠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409-8(一套；精裝)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錢賓四先生全集 / 錢穆著．--初版．
--臺北市：聯經，1998年
面；　公分．
ISBN　957-08-1409-8(一套：精裝)

089.86　　84006849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後語

無錫錢穆先生，字賓四，生於前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即民國前十七年（西元一八九五），卒於民國七十九年庚午（一九九〇），春秋九十有六。先生自民元為鄉里小學師，而中學，而大學，轍轘天下，敷教於南北者垂八十年。生平著作不輟，其生前梓行傳世者無慮五十餘種。衡諸古今學者，固為罕倫；而其畢生志事，惟在維護發揚我國傳統固有之優良文化，以期矯抑一世蔑古崇外之頹風，所以扶立吾國人之自尊自信，以為民族復興契機之啓迪者，尤可謂深切著明；見推為名世大儒，洵不誣也。

先生之著作，論其時，則先後逾七十年；論其地，則分別刊行於大江南北。其中或始終一版，或易版再行；版式參差，未歸一律。而先生治學謹嚴，老而彌篤，居常無事，每以修訂舊稿自遣；故其早年著述，亦多屢經改訂。苟值舊版新鐫，即以新訂之文易之。然亦有其書久行，未獲新排，雖有改訂之文，而未及面世者。復有雜誌期刊索稿，修訂舊文而易題予之者。更有坊間書肆未經同意，擅將舊稿重刊，或依原文照印，或截取部分，逕標別題。紛然淆雜，不一而足。至於反覆鋟梓，沿譌承誤，尤需折衷以歸一是。此皆有待於全面蒐輯整理，以求彙為一較理想之編集，庶可以傳世而行遠也。

民國七十九年八月杪，先生遽歸道山，治喪期間，門人有唱議為遺書之編集者。夫人胡美琦女士曰：「先生生前對其著作，嚮所重視，故於舊稿常加修訂，

惟從未有慮及其遺集之全編者。蓋以謂著述既夥，其中不乏針對此一時代之需求，就其一時之學風，而為之補偏救弊而發者。苟時移世易，則茲所論述，未必盡為後人所關注。而其書之傳否，亦當由後人之審擇，決非作者一人生前所可私定。」門人聞之，咸歎先生胸懷之磊落與夫治學之大公，而編集之議遂寢。已而傳聞大陸有謀印先生文集之事。實則遠在先生生前，彼岸已屢有其議。此次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鄭重將事，更有不成不止之概。時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推廣文化事業，亦有意彙次先生遺書，以壽諸梓。夫人欲了解對方進行之情況，乃親渡海，求觀所集資料。承見示，或為早年原書，或為原書之影本，皆非善本。蓋先生著作，此四十年來，在大陸未能通行，故即求其成書之麋集，亦非易易也。夫人因謂華東師大諸君子曰：「倘必於今時編印先生遺集，宜不悖兩大原則：一以

先生既於舊稿屢有改訂，若重排新版，自當據後出改訂者為正，不宜悉沿舊版。一以先生所謂以俟後世之論定者，今非其時；而先生所以挽一世之所為作者，居今視之，其風猶熾未已；是以仍當有其時代之意義與價值。方今去先生之卒未久，若彙編其遺著，自應求為完編，毋加刪削，庶幾後學得窺全豹。就此兩點觀之，先生後半生之遺稿，悉存臺灣；其早年成書，在臺亦多已先後修訂重刊。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既願大力促成其事，考慮各種條件之配合，在臺進行編務均較相宜。」華東師大諸君子聞而領之，遂慨允中輟其編纂計畫。乃數年搜羅之勞，不稍顧藉，其崇重學術之公心，殊可感佩。然自非種種外緣之催趲，全集之編綴亦不可能於短時期內實現也。

全集之出版既決定交由聯經印行，夫人乃約集若干門人，組成編輯委員會。

其成員為辛意雲、何澤恆、邵世光、張蓓蓓、戴景賢、王仁祥、李訓詳、陳仁華、閻鴻中、蕭公彥等十人。前五人又擔任常務委員，總理編務。其後陸續加入整編工作者，復有先生之二公子錢行先生，以及吳展良、王璦玲、賀廣如、江敏華、洪素年等人。編印期中以進度落後，編委會又特商請錢夫人胡美琦女士參與編整。自民國八十年（一九九一）九月開始分工任事，先集其成書，繼搜討其佚篇，務期鉅細靡遺，詳略罔漏。數載之間，夫人數親赴大陸南北各大圖書館，或影印，或謄抄，先生早期發表之論文，蒐集不少。而在臺北中央圖書館等公私館藏報刊雜誌，亦不憚煩逐頁翻檢求索。其間有因陳篇漫漶，或因原刊文字誤植可疑處，則亦屢託大陸之親朋故舊覆查，兩地郵傳，未嘗間斷。故全集得補入成書以外之許多篇章，夫人盡瘁之力也。

是書之編纂，由編委會同仁多次會議討論商定，將先生歷年著作，類分為甲、乙、丙三編。甲編以有關學術思想者為主，凡二十三種二十五冊；乙編偏重史學，凡十三種十一冊；丙編則多關文化人生及其他雜著，最末為總目，凡二十一種十八冊；總為五十七種五十四冊。先生治學尚兼通，其著作亦旁涉四部，故以近人專科分類繩之，不免枘鑿。今約分為三編，取便編排，不立類目，讀者庶可不為名色所囿，而知先生治學宗旨異於時人一般著述之所在矣。

凡先生既出版之成書，全數收入。其有後來改題，或擴編納入他書，本集概從後定。如王守仁一書，後易名陽明學述要；老子辨一書，後歸入莊老通辨之類。各書原版參差不一，因統為較一致之版式。原本版式之特有設計用意者，儘量予以保留不變。其書屢經版行者，採錄最後改訂之版本；文字經先生修訂而未

經新印者，以修訂文字為據。論文集錄成書，有同一文而重複收編者，除有特殊考慮者外，原則上擇一保留；其有先生生前即已決定歸屬者，則恭承遺命添入。若乃先生身後所搜得之佚篇，則以類相從，歸入相關著作中。如甲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原收文一一九篇，今增入亦逾百篇，總為二三一篇；又如丙編文化與教育，原凡二十篇，今則增編為四十二篇之類；篇幅並頗有擴充。至於未便納入成書之文稿，則另成新書，乙編中有讀史隨劄一種；丙編則有經學大要講稿之屬，彙編為講堂遺錄一種，其他遺文復編為素書樓餘瀋一種，共二種。各書皆分案處理，委專人確定文稿，主要為校改誤字，並覈正引文，以求精確。原版有未經斷句者，如史記地名考；或但有舊式句讀者，如莊子纂箋，並皆重新點校。凡無私名號、書名號者，悉予增入；而段落版式，亦皆重加董理，務求眉目清楚，

以便閱讀。其詳分具各書之出版說明。丙編之末臚列全集各冊篇目，俾見全集之梗概。又附篇目及章節索引，計有筆畫、四角號碼、注音符號、漢語拼音等數種。海內外讀者研讀先生著述，手此一編，堪稱完備；而省覽檢索，亦極得其便。

至於坊間刊行題名先生之著作，亦有黃帝與中國通史參考材料兩種未予收入。黃帝一書，為先生抗戰期間在成都賴家園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經某出版社催促撰寫；時方別有撰造，遂口述大耑，由門人姚漢源筆達之。及先生來港、臺，以情勢有所不宜，再版時乃逕題先生之名刊行。先生遺言，是書將來當還歸姚君。通史材料則原為先生在北大通史課堂編發學生之輔助讀物，先生以原編材料未完，且其後屢有增改，而其要義亦已寫入國史大綱之中，故不主再予重印。

然書肆尋獲流傳海外初編講義，乃以付梓，非先生意也。此外尚有未徵先生同意，竄取先生已發表之論文，雜湊成册以出書者，凡今全集所未收錄，皆是之類也。此等篇章實已分載各成書之中，非有所闕漏，讀者詳之。

昔昌黎韓氏之言曰：「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先生畢生都授，垂八十年，所傳者斯道，而所以授業解惑之詳以明斯道者，則具見於其著述。雖然，先生自有諸己而充實之光輝，亦豈有待於外而後粲然耶？然先生既逝，後之欲明斯道以解其惑者，舍先生傳世之著述，將焉取之？其辨章學術，窮幽探賾，廣前賢所未發者，固可無論矣；即所謂為時而作之類，亦無弗精思妙契，講明斯道以解一世之惑者。則後之覽者，其欲考鏡近世文化學風，以為知人論世之資者，亦當知所依歸矣。是則全集之編纂，又有不可以已者也。

是書得以順利出版，賴臺灣聯合報系故董事長王惕吾先生及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劉國瑞先生鼎力支持。編務之進行，則聯經總編輯林載爵先生、編輯鄭秀蓮小姐襄贊者為尤多。始業以還，凡六閱歲，玆值全集排版垂竟，爰粗陳其緣起暨整編崖略，用告讀者諸君。夫世降俗澆，先生所深慨。天之既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後世必有作者焉。是書各篇中一言一語，胥寓先生之德與學，異日吾民族憬然欲復興中華文化，學者蓋必將藉是以為津筏。然則其將垂世而行遠，固無疑也；編委會同仁恭承斯役者，僉以為榮，不亦宜乎！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謹識

目　次

錢賓四先生全集總目次

【第1册】　國學概論

【第2册】　四書釋義

論語要略

論語文解

【第3册】　論語新解

【第4册】　孔子與論語

孔子傳

【第5冊】　先秦諸子繫年

卷一

【第6冊】　墨子

惠施公孫龍

莊子纂箋

【第7册】　莊老通辨

【第8冊】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第9册】　宋明理學概述

【第10冊】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陽明學述要

【第11冊】　朱子新學案　第一冊

【第12冊】　朱子新學案　第二冊

【第13冊】 朱子新學案 第三冊

【第14册】 朱子新學案 第四册

【第15册】 朱子新學案 第五册

【第16冊】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

【第17册】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二）

【第18冊】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二)

【第19冊】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三)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四）

【第20冊】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六)

【第21册】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七)

【第22冊】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八)

【第23冊】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九)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〇）

【第24册】 中國思想史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學籥

【第25冊】 中國學術通義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第26册】　周公

秦漢史

【第27册】　國史大綱(上)

【第28冊】 國史大綱(下)

【第29册】 中國文化史導論

中國歷史精神

【第30册】 國史新論

【第31冊】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中國歷史研究法

【第32冊】　中國史學發微

讀史隨箚

【第33冊】 中國史學名著

【第34册】　史記地名考（上）

【第35册】　史記地名考（下）

【第36册】 古史地理論叢

【第37冊】 文化學大義

民族與文化

【第38册】 中華文化十二講

中國文化精神

【第39册】　湖上閒思錄

人生十論

【第40册】 政學私言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第41册】　文化與教育

【第42册】　歷史與文化論叢

第二編

第三編

【第43册】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第44册】 中國文化叢談

【第45冊】　中國文學論叢

【第46冊】 理學六家詩鈔

靈魂與心

【第47冊】 雙溪獨語

【第48冊】 晚學盲言(上)

【第49册】　晚學盲言(下)

下篇　德性行爲修養之部

【第50冊】 新亞遺鐸

【第51册】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八十憶雙親

師友雜憶

【第52冊】 講堂遺錄

【第53册】 素書樓餘瀋

序跋

篇目及章節索引　目次

篇目及章節筆畫索引

何澤恆　編

例　言

一、本索引以全集各册全部篇目及章節爲條目，計分首字之筆畫、四角號碼、注音、拼音四種索引，俾海內外讀者各就習用方式查閱檢索。

二、筆畫索引按條目首字之筆畫數，由少至多順序排列。筆畫數相同者，再按起筆筆形排列。筆形次序以橫（一）、豎（丨）、撇（丿）、點（、）、折（㇇）爲先後。

三、四角號碼索引依四角檢字碼編排。其因書寫或字模形體略有差異而一字兩碼者，選用一種，概不重出。

四、注音及拼音索引分別依照注音符號及漢語拼音字母順序排列。其同義多音者，選取一音，不注又讀。

五、條目文字悉據全集各册之原目次篇題編列。部分條目以括弧加入補充說明，俾便理解，但條目排列次序仍依原目文字。例如：

人閒世（莊子纂箋）

大學（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劄）

（孔子）應事之態度

分起單承（論語文解）

張之洞（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

序（中國文化精神）

六、全集各册有獨爲一書，不與他書相雜者，索引中但列册次及頁次，册次採用粗體數字排印，以便分別。例如：

魯仲連考	**5**	545
戴東原思想之淵源	**16**	450

若一册收錄兩書以上者，則於頁次前加注其在該册中之書次，再列頁次。例如：

大學與禮運	**24**	1-101
德行	**24**	2-53
朱子讀書法	**24**	3-5

第二十四册所收書共三種，依序爲中國思想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學籥。

此三篇頁次前之書次，即指此三書在該册中之順序。

篇目及章節筆畫索引

三畫

四畫

〔一〕

六畫

〔一〕

七畫

〔乛〕

八畫

〔一〕

九畫

〔一〕

十二畫

〔一〕

十三畫

〔一〕

十四畫

〔一〕

十五畫

〔一〕

十六畫

十八畫

十九畫

二十畫

二十一畫

二十二畫

四角號碼檢字法

第一條　筆畫分為十種，用０到９十個號碼來代表：

號碼	筆名	筆形	舉例	說明	注意
0	頭	亠	言主广疒	獨立的點和橫相結合	１２３都是單筆，０４５６７８９都由二以上的單筆合為一複筆。凡能成為複筆的，切勿誤作單筆：如亠應作０不作３，寸應作４不作２，厂應作７不作２，乂應作８不作３、２，小應作９不作３、３。
1	橫	一㇀乚㇏	天土地江元風	包括橫、挑（趯）和右鉤	
2	垂	丨丿亅	山月千則	包括直、撇和左鉤	
3	點	丶㇏	宀礻冖厶之衣	包括點和捺	
4	叉	十乂	草杏皮刈大對	兩筆相交	
5	插	扌	扌戈中史	一筆通過兩筆以上	
6	方	口	國鳴目四甲由	四邊齊整的方形	
7	角	7厂亅L厂乛	羽門灰陰雷衣學罕	橫和垂的鋒頭相接處	
8	八	八丷人𠂉	分頁羊余災氽足午	八字形和它的變形	
9	小	小⺌⺍个忄	尖糸粦呆惟	小字形和它的變形	

第二條　每字只取四角的筆形，順序如下：

（一）左上角　（二）右上角　（三）左下角　（四）右下角

（例）（一）左上角……端……（二）右上角
　　　（三）左下角……端……（四）右下角

檢查時照四角的筆形和順序，每字得四碼：

（例）顏＝0128　截＝4325　烙＝9786

第三條　字的上部或下部，只有一筆或一複筆時，無論在何地位，都作左角，它的右角作０。

（例）^{3}宣^{0}　^{4}直^{0}　^{8}首^{0}　$_{3}$冬$_{0}$　$_{5}$軍$_{0}$　$_{9}$宗$_{0}$　$_{5}$母$_{0}$

每筆用過後，如再充他角，也作０。

（例）^{5}成$_{0}$　^{5}持$_{0}$　掛$^{3}_{0}$　^{4}大^{0}$_{0}$　$^{4}_{0}$十$^{0}_{0}$　$^{5}_{0}$車$^{0}_{0}$　$^{6}_{0}$時

第四條　由整個口門鬥行所成的字，它們的下角改取內部的筆形，但上下左右有其他的筆形時，不在此例。

（例）因＝6043　閉＝7724　鬭＝7712　衡＝2143
　　　菌＝4460　瀾＝3712　荇＝4422

附　　則

I.字體寫法都照楷書如下表：

正	^{3}冖	隹^{0}	匕^{1}	反^{1}	^{3}礻	^{3}户	^{3}安	心$^{3}_{0}$	卜^{3}	斥$_{3}$	$_{3}$刃	^{3}业^{2}	$_{3}$亦$_{3}$	^{4}革^{4}	执^{4}	$_{4}$禺	衣$_{3}$
誤	^{7}冖	隹^{5}	匕^{2}	反^{2}	^{1}礻	^{1}户	^{5}安	心$_{1}$	^{4}卜	斥$_{4}$	刄$_{5}$	^{2}业^{3}	$_{2}$亦$_{3}$	^{1}革^{1}	执^{5}	$_{2}$禺	衣$_{4}$

II.取筆形時應注意的幾點：

1.宀户等字，凡點下的横，右方和他筆相連的，都作3，不作0

2.尸皿門等字，方形的筆頭延長在外的，都作7，不作6。

3.角筆起落的兩頭，不作7，如^{1}7$^{7}_{2}$。

4.筆形"八"和他筆交叉時不作8，如美。

5.业小中有二筆，水小旁有二筆，都不作小形。

III.取角時應注意的幾點：

1.獨立或平行的筆，不問高低，一律以最左或最右的筆形作角。

(例) 非　肯^{1}　疾　浦^{3}　$_{2}$帝$_{2}$

2.最左或最右的筆形，有他筆蓋在上面或托在下面時，取蓋在上面的一筆作上角，托在下面一筆作下角。

(例) 宗　幸　寧　共

3.有兩複筆可取時，在上角應取較高的複筆，在下角應取較低的複筆。

(例) 功　盛　頗　鴨　奄

4.撇為下面他筆所托時，取他筆作下角。

(例) 春　奎　碎　衣　辟　石

5.左上的撇作左角，它的右角取作右筆。

(例) 勾　鈞　侔　鳴

IV.四角同碼字較多時，以右下角上方最貼近而露鋒芒的一筆作附角，如該筆已經用過，便將附角作0。

(例) 芒＝4471$_{0}$ 元^{1} 拼^{1} 是$_{1}$ 疝$_{2}$ 歆^{2} 畜^{2} 殘$_{3}$ 儀$_{3}$ 難$_{4}$ 達$_{4}$ 越$_{5}$

繕$_{5}$ 蠻$_{6}$ 軍^{6} 覽$_{6}$ 功^{7} 郭^{7} 疫$_{7}$ 癥^{8} 愁^{8} 金$_{9}$ 速^{9} 仁^{0} 見^{0}

附角仍有同碼字時，再照各該字所含横筆（一ノ乚㇏）的數目順序排列。例如"市"、"帝"二字的四角和附角都相同，但市字含有二横，帝字含有三横，所以市字在前，帝字在後。

篇目及章節四角號碼索引

0022$_3$

0091_4

0128_6

0164_9

0180_1

0220_0

0292_1

0460_0

0464_1

0466_0

1043₀

1044₇

1052₇

1060₀

1060₁

1060₃

1111₀

1249_3

1314_0

1540_0

1611_0

1611_4

1710_7

1712_7

2122_0

2122_7

2123_4

2128_6

2143_0

2171_0

2180_6

2191_1

2220_0

2590_0

2598₆

2600₀

30901

30904

3414_7

3418_1

3421_0

3430_4

6015_3

6021_0

6022_7

6033_0

6033_1

6040_0

67016

67020

67062

67064

8844_6

8860_1

8879_4

8890_3

9000_0

9003_2

注音符號索引便檢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ㄞ

ㄡ

ㄢ

ㄦ

ㄧ

篇目及章節注音符號索引

ㄇ

ㄈ

ㄉ

ㄎ

ㄎㄜ

篇目及章節漢語拼音索引

C

N

O

P

Y

錢賓四先生全集總序目目次

《錢賓四先生全集》丙編書目

國學概論　出版說明

民國十二年秋至十六年秋，錢賓四先生任教於無錫省立第三師範，擔任國文教席。時學校規定，國文教師隨班遞升，除國文正課外，每年尚須兼開一課。第一年爲文字學，第二年爲論語，第三年爲孟子，第四年爲國學概論。先生於此四課皆自編講義，其第四年所編著者，即此書也。其書自十五年夏著手編撰，隨講隨錄，成七章，以兵亂輟講，遂僅完成全書之半。十六年秋，先生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續講後三章，乃得於十七年春續成爲完編。二十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共分十章，其述國學，不循一般四部分述之成規，而別出手眼，將我國古來學術，分期特立章目，以突顯每一時期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使讀者易於把握歷代學術流變之大趨。並採綱目方式敍述，以正文爲綱要，其所稱引與夫相關辨證，則寫入爲小注。讀其正文，得其扼要；讀其注文，可進窺其委曲之詳；兼觀並覽，然後可以盡其意趣。

四十五年六月，臺灣商務印書館重印是書於臺北，後又收入該館所編人人文庫中，屢經印

行，皆據原版影印。今據原版重排，除改正若干原版誤植文字及調整若干標點符號外，內容不作改動。惟正文改用大字，以期綱舉目張，層次分明，以便讀者誦讀。整理排校雖力求愼重，仍恐不免疏漏，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係由辛意雲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弁　言

學術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旣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爲一時代的名詞。其範圍所及，何者應列國學，何者則否，實難判別。本書特應學校教科講義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學術概論大意，分期敍述。於每一時代學術思想主要潮流所在，略加闡發。其用意在使學者得識二千年來本國學術思想界流轉變遷之大勢，以培養其適應啟新的機運之能力。時賢或主以經、史、子、集編論國學，如章氏國學概論講演之例。亦難賅備，並與本書旨趣不合。竊所不取。

本書爲便學課誦覽，凡稱引所及，以及辨證論難，均散入小注，而正文僅爲綱要。讀者須兼

觀並覽，始得盡其意趣。

本書於民國十五年夏開始編著，隨講隨錄，成七章；以兵亂輟講而止。後三章於十七年春續成。前七章講於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後三章講於蘇州江蘇省立蘇州中學。以後迄未增改。疏漏錯失，爲病實多。若蒙海內學人，賜以商訂，極所樂聞。

本書於第十章論最近期，特爲中學生指示大體。於並世賢達，敍述恐多失誤，疏漏尤甚，敬表歉仄。

本書於編纂第三、第四章秦廷焚書及兩漢經學時，友人施君之勉，通函討論，前後往返十餘通。開悟良多。講學之樂，積久不忘。至今回憶，猶有餘甘。特此附書，誌永好焉。

新版附識

此稿成於三十年前，迄今回視，殆所謂粗識大體，未盡精微者也。其時中學校率有「國學概論」一課，此稿特爲講堂授課之用。聽者尚能接受，並多興發。此三十年來，中學程度，普遍低落。即上庠講學，亦少總攬通觀之功。則此書過而存之，亦未嘗不可使治國學者知古今學術流變

之大趨。商務印書館趙君叔誠來書，欲將此稿重付流傳，因將手邊僅存之一部瀏覽一過，略校錯字，郵以與之。

本書第十章，涉及當代。當時以中學青年，皆好縱讀新出雜誌報章，於並世學派思潮，尤喜分曹辯論，各抒己見；不得不略述大端，開示塗轍。而本稿屬筆，在民國十五年夏，脫稿在十七年之春，所述則止於十三四年間。自此以來三十年，天翻地覆，赤禍橫流，神州陸沉，固非作者當時所敢逆料。即篇中所敍學人，至今尚存者，其在當時，於此思潮流變，學術墮地之情，亦豈能逆料其一遂至此乎？

此次再版，於本章原文，亦一仍其舊，絕不再加增刪。此非謂當時敍述，便成定論。蓋使讀者獲知三十年前人對其當時學術思潮之一種看法。此亦可作一種史料視耳。

民國四十五年丙申春錢穆識於香港九龍新亞書院

四書釋義　出版說明

論、孟、學、庸四書，自南宋朱子特加表彰，爲作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元、明兩代懸爲功令，遂若成爲儒門之新寶典；家弦戶誦，迄於清末，已歷六百年以上。雖然，自今而言，宋明理學家之所用心，已有不易驟爲現代人所領喻者。學者或上溯四書古義，或另主新解，或別求於名物、訓詁、校勘、考據之詳。錢賓四先生此書，雖以四書爲目，而其作意、作法則已非先儒之舊。論、孟兩書，裁爲要略，分門別類，提綱挈領，其類目如「孔子人格之概觀」、「孟子自道爲學要領」等，實有助學者把握兩書綱領，以爲進窺孔、孟要義精旨之張本。學、庸兩篇，則爲之釋義，備列全文，兼羅漢、宋、明代異義，可使學者由比觀之中體悟兩篇所以得爲中華文化鴻寶之意義所在。其解讀四書不爲程朱所限，而其推重四書之宗趣則固與程朱不異也。

論語要略成書於民國十三年，孟子要略成書於翌年，曾分別在滬上單獨出版。（論語要略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刊行，孟子要略則由另一書肆刊行。）二書原爲先生在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任教之講義，與論語文解、國學概論同爲先生生平著述之始業。大學中庸釋義則撰於民國四十二

年，乃應張曉峯先生之邀而作，取與論、孟兩要略合為四書釋義，作為「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之一種；是年六月在臺北由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六十七年六月，復由臺灣學生書局改版發行。此版曾經先生親自刪訂一過，其中論語要略部分改易稍多。

今全集新版之整理，即以學生書局六十七年修訂初版為底本，另加入書名號、私名號以利誦讀。歷次排版偶有誤字，引文亦偶有漏略，皆查對原典，隨文改定。又原書正文、引文、注解、按語層層分立，易生混淆，今則改以較清晰之版式處理，以清眉目。

本書之整理工作，由張蓓蓓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再版序

民國十二年，余初任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之國文教席，該校規定每一國文教師隨班提升，經四年，原班畢業後，再週而復始。又規定除國文正課外，分年兼授文字學、論、孟及國學概論，皆撰有講義。惟文字學講義當年未付印，今已散失。或當年受課同學中尚有保留者，當俟

他年得歸大陸，再加尋求。論語要略、國學概論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付印，孟子要略則在上海另一書肆印行。政府遷臺後，張曉峯先生任教育部長，約人彙編國民基本知識叢書，邀余撰四書之部。余養病臺中，遂增學、庸兩編，併語、孟兩要略合成一書，取名四書釋義。去春重閱舊稿，略有刪訂，較以論語要略一編爲多。交付學生書局重排印行。特誌其緣起於此。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素書樓，時年八十有四。

論語文解　出版說明

民國二年至八年間，錢賓四先生往來於無錫蕩口、梅村兩鎭，任教於私立鴻模學校與無錫縣立第四高等小學，論語文解即撰成於此一時期。其時先生教授論語課程，適讀馬建忠馬氏文通，逐字逐句按條讀之，不稍疏略，因念馬氏文通所詳論者字法，可仿其例論句法，遂即以論語爲例。積年乃成此書，爲先生生平正式著書之第一部。以稿郵送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出版。數十年以來，是書僅此一版；商務未再重印，故未久即告絕版。其後國事蜩螗，先生奔走南北，以致亦未能保有此書。逮先生晚年定居臺北，海外有藏其書者，持以相贈，然後復得之。而先生以不斷從事新撰著，一時無暇對之重行修訂，因亦未再梓行。此書既爲先生之第一部著作，今編爲全集，自應收入。惟以原書未再有所改訂，故此次重排，乃以原版爲底本進行整理。此書主要以「起、承、轉、合」標明論語句法，然以當時排印所採字體以及各種標識符號，嫌於簡陋，不盡理想，今改用不同之字體與符號，務求層次分明，顯豁文意。其內容則除改正原版若干明顯誤植文字外，不作任何更動。

本書之整理工作，由辛意雲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例

往余讀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依天理，批間卻，恢恢乎游刃餘地。」心好其說。以爲宇宙事物之會成，莫非有理，斯莫不有間。得其理，入其間，凡事物之會成，皆有以解其所以然，而後乃不爲事物跡象所困，而有以深識其中，而離合運用之。蓋今西人質力製造之事，民羣平治之局，駸駸皆遠出我。而一探其底，盡若有庖丁之意行其間者。而其教授童蒙之法，尤爲循自然之理，使學者可以不竭神智而深入其間，因以得其運用之方，爲益有似於莊生之旨也。我國文字之學，自來號爲難究。自學校師襲西法，而文字之教授，獨仍舊貫，無所變進。而歲割月折之病益見，學者徒靡心力而收寡效。夫不得其所以組織會成之理，而摩撫於外之跡似，而求以能其事，其徒勞而無功，固其宜也。吾國之論文法者，首推丹徒馬氏之書。然繼而究

之者甚少，故其言猶多失正。又專主句讀，於篇章之理，有所未及。間嘗有意匡其失而補其闕，而卒卒亦無所就。私獨以莊生之言，觀於文字，所謂「未嘗見全牛」者，而稍稍告諸學者，學者喜之。退而編爲此書，以發其趣。其於大郤大窾之處，可謂盡之。學者循之以進，庶乎其可望其無遇全牛，而善葆其刀也。蓋馬氏之書，自詡特創，故亦不能無疵。今茲所稱，意主蒙求，然亦多前人所未及者。匡捄繩切，以完其說，而益以進明夫斯文之大理，是深有賴於當世之君子也。

文章義、法兼重，詩曰：「有物有則。」義有物也，法有則也。然自來多訓詁義物之言，而典章法則者少。或遂譏輕西人文典之書，以爲無用。此猶俗人妄論名家，謂：我亦能思，我亦能言，何必講邏輯，乃能言思也。如我古者公孫龍子之徒，無深志義，而務爲辯說反人取勝爲名，則誠無用耳。若今西人之所爲，則名學固不可少也。爲文徒講典法，則虛車無所載，然載重者，豈可捨堅車乎？則自「文從字順各識職」，以至於「周中規，折中矩」者，莫不有當然之道，誠學文者不可不講而知也。昔之求文法者，神而明之，故難；今之求文法者，器而習之，故易。此亦後來者勝，未可以不貫見棄之也。

小學生讀書國民學校，綴字造句，爲師者可以運用句讀字詞之義法以爲教，未可直以句讀字詞之義法教之也，逮入高等小學，無不能造句者矣。進而學爲短篇之文字，則惟句與句之相續，

所謂起、承、轉、結之四法者最要。若復授以句讀字詞之義法，太淺則爲已能，較深又非急用。不若俟其粗能屬文，然後爲具體而稍精密之講解，則可於中學校以上行之。此編本此意以成書，重在句與句之相續，而字詞句讀之義法，亦可於此窺其大要。既以免枯寂無味之病，亦以求應時實用之效。此吾國小學校教授文法，區區之意，謂當視西人略爲變通之處也。

論語文簡淡切實，於古籍中較易指講，又爲學者不可不讀之書。今學校既無讀經一科，故本編專引論語，俾學者非惟明斯文理致之大要，亦以稍窺經籍，以資修養之準。

本編重解文理，所引次序，別具經營。論旨既明，則原書亦不盡詳，然亦十之七八矣。間有便一時論說而重出者，然亦甚少。大抵既見於前，則後不復及。而前後所論，每可互相參證，則在學者自究之。

文章之道，未可盡以形跡言說拘。本書雖亦條分縷析，而精意所在，只是一貫。章節以便論說，而所定名詞，亦多創造。然自來綴文義法，亦大略盡此中矣。

本書可供高小暨中學一二年級教授文法或自修之用。所論取明大意，是係臨時編發講義，草促所成，與臨作傳世不同。所望海內鴻碩，不吝賜教，以臻完正爲幸。

中華民國七年端午於縣立第四高等小學校之西廡無錫錢穆識

論語新解　出版說明

論語一書，自西漢以還，二千年來，爲中國一部人人必讀書。宋以前，讀其書者多重何晏集解。自南宋朱子論語集註出，明、清兩代據以取士，故八百年來，朱註乃最爲學者所重。清儒考據訓詁之功深，於朱註之誤，多所糾正；然亦往往拘於門戶之見，刻意樹異於朱註而轉有失之者。錢賓四先生論語新解之作，即就歷來各家解說，條貫整理，摭取諸家之長，深思熟慮，求歸一是。所謂「新解」云者，乃朱子以下之新，非欲破棄朱註以爲新。蓋對論語原文，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闡釋申述，每章之後，復附之以白話試譯，求其通俗易於誦覽，以適合今日之時代需求，成爲一部人人可讀之論語註解。讀者可先讀此書，再讀朱註，亦可讀朱註後，再讀此書，庶乎更得論語之眞義。

是書始作於民國四十一年春，以白話撰稿未及四分之一。已而悔之，以謂用純粹白話解論語，極難表達其深義，遂決心改寫。惟因香港新亞書院校務紛煩，其事遂寢。逮四十九年春，先生講學美國耶魯大學，授課之餘，窮半年之力以平易之文言改撰，獲成全書之初稿。返港後又絡

續修訂，越三年，於五十二年十二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發行初版。五十四年四月復在臺北影印刊行。及先生晚歲，雙目失明，仍於七十六年囑夫人胡美琦女士讀此注，對原版文字略有修改。翌年四月交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重印再版，重印時並增入孔子年表。

此次重排，以東大版爲底本，除校正若干原書誤植文字外，並增入私名號、書名號及引號，以期文意較顯豁，方便一般讀者閱讀。整理排校，雖愼重從事，然缺點錯誤，恐將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教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論語自西漢以來，爲中國識字人一部人人必讀書。讀論語必兼讀注。歷代諸儒注釋不絕，最著有三書。一、何晏集解，網羅漢儒舊義。又有皇侃義疏，廣輯自魏迄梁諸家。兩書相配，可謂論語古注之淵藪。二、朱熹集注，宋儒理學家言，大體具是。三、劉寶楠論語正義，爲淸代考據

家言一結集。

何氏集解收入十三經注疏中，宋以前人讀論語，大率必讀此書。明、清兩代以朱注取士，於是讀論語必兼讀朱注，已八百年於茲。朱注不能無誤，清儒考據訓詁之學度越前人，朱注誤處均經發正。而清儒持漢、宋門戶之見過嚴，有朱注是而清儒刻意立異，轉復失之者。其所駁正，亦復眾說多歧，未歸一是。又考據家言，辭煩不殺，讀者視爲畏途。故今社會流行，仍以朱注爲主。

民國以來，閩縣程樹德爲論語集釋，徵引書目，凡十類六百八十種。異說紛陳，使讀者如入大海，汗漫不知所歸趨。搜羅廣而別擇未精，轉爲其失。故論語雖爲一部中國人人必讀書，注論語者雖代不乏人，而就今言之，則仍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此余之新解所由作也。

爲論語作新解，事有兩難。異說既多，貴能折衷，一也。論語距今兩千載以上，何晏集解距今一千七百年，朱注距今八百年，劉氏正義距今亦一百六十年。時代變，人之觀念言語亦多隨而變。如何用今代之語言觀念闡釋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遺訓而能得其近是，使古今人相悅而解，二也。

本書取名新解，非謂能自創新義，掩蓋前儒。實亦備采眾說，折衷求是，而特以時代之語言觀念加以申述而已。然眾說勢難備列。程氏集釋篇幅凡百四十萬字，而猶多遺漏。本書所采，亦

多越出程書之外者。然若專舉一說，存以爲是，又使讀者不知有古今眾說之異，亦無以開其聰明，廣其思路，而見義理之無窮。且一說之是，初不限於一人之說。或某得其十之一二，某得其十之八九。或某得其三四而某得其六七。亦有當兼采三家四家之說斟酌和會而始得一是者。今既集眾說，凡所采摭，理當記其姓名，詳其出處；一則語見本原，一則示不掠美。然就讀者言之，則貴能直就注文而上通論語之本義。大義既得，乃加沉潛反復之功。若注文一一稱姓名，列篇題，又勢必照錄原文。原文義旨未盡，復須重加闡發。遇折衷諸家，則必條列諸家之說於前，續加融貫之文於後。此可以顯作者之勤搜而博辨，而實無益於讀者之精契與密悟。新解旨取通俗，求其爲一部人人可讀之注，體求簡要，辭取明淨，乃不得不擺脫舊注格套，務以直明論語本義爲主。雖違前軌，亦具微衷。抑如朱注，義詁事據，多本漢儒，亦不逐一標明。惟引宋儒之說，始必著其姓氏，以見其爲一家之解。余書非欲成一家言，僅求通俗易誦覽，自不必一一徵引出處。儻讀者必欲追尋本原，則上舉三書與程氏之集釋具在，循此蹤跡，宜可十得七八。縱欲掠美，實亦無從爾。

抑余之爲新解，亦非無一二獨得之愚，越出於先儒眾說之外者。然苟非通觀羣言，亦無以啓發新知。眾說已見，既如水乳之交融，何煩涇渭之再辨。且作注如筌蹄，意在得魚兔。魚兔既

獲，筌蹄可棄，故亦不一一標出也。

本書最先屬稿在民國四十一年春，當時力求通俗，專用白話。成稿未及四分一，乃復悔之。意謂解論語，難在義蘊，不在文字。欲以通俗之白話，闡釋宏深之義理，費辭雖多，而情味不洽。又務為淺顯，驟若易明，譬如嚼飯哺人，滋味既失，營養亦減。意不如改用文言，惟求平易，較可確切。雖讀者或多費玩索之功，然亦可以凝其神智，而濬其深慧。惟苦冗雜少閒，乃遂擱置。

嗣於民國四十九年赴美講學耶魯。課務不迫，乃決意改撰，獲成初稿。自美歸後，又絡續修訂，前後三年，粗潰於定。惟體例則一仍最先之舊。先原文，次逐字逐句之解釋，又次綜述一章大旨，最後為論語之白話試譯。全書篇幅，當不出三十萬字。其果可以為一部人人可讀之注矣乎？其果能折衷羣言而歸於一是矣乎？作者才力所限，謹以待讀者之審正。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十月錢穆識於沙田和風臺寓廬

再版序

論語二十篇開始即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孔子一生爲人，即在悅於學而樂於教。人之不知，亦當指不知此上兩端言。故又曰：「若聖與仁，則我豈敢。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則孔子之自居，在學在教，不在求爲一聖人。論語書中豈不已明言之。

此猶言：「但問耕耘，莫問收穫。」抑且秋收冬藏之後，豈能不復有春耕夏耘。而且耕耘仗己力，而收穫則不盡在己力。固亦有既盡耕耘之力，而復遇荒歉之來臨者。孔子生前其道不行，又豈孔子之過。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即天命之所在矣。人之爲學，又豈能超乎其天之所命。此惟西方人戰勝自然、克服自然，有此想。中國人則不作此想法。知天法天之道，其要乃在此。

顏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孔門七十二弟子，師弟子間，莫不尊顏子爲好學。後世有孟子，其時羣言並興，而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則曰：「乃我所願，則學孔子。」又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又曰：「人皆可以

爲堯舜。」孟子特以爲聖人勉當時之學者。後世以孔、孟並稱，而每引孟子語以堯舜自勉。則其爲學趨嚮，有時與孔子有相異。

宋代朱子定語、孟、學、庸爲四書，朱子又曾有「顏子細，孟子則較粗」之辨。而學者每喜讀孟子書，時若有踰於論語。卽如朱子同時陸象山已然。而明代王陽明則益見其爲然。陽明求爲聖人，及其龍場驛自悟乃曰：「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則豈不先世之孔子，亦當學後代之陽明。此乃禪宗一悟成佛，己身成佛，立地成佛之餘意。此語實易引人入歧途，而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

朱子爲學，則學其前賢如周、張、二程。濂溪教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則所學卽學其樂，所樂亦樂其學，此與孔子教學尙無大相異。惟橫渠則學之所長，乃在其苦學處。故伊川與橫渠書有云：「觀吾叔之見，志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嘗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可見橫渠爲學，實有似西方哲學家，所學對象多在外，少在己。如其論易卽然。易象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亦與孔子意相近。而橫渠之努力，則有引人入歧途處。

余年六十五，赴美任教於耶魯大學。余不能英語，課務輕簡，乃草爲此注，自遣時日。余非敢於朱注爭異同，乃朱子以下八百年，解說論語者䕶有其人，故求爲之折衷。及近年來，兩目成疾，不能見字。偶囑內人讀此舊注，於文字上略有修改，惟義理則一任舊注。事隔一月，忽悟此序以上所陳之大義，乃作爲此書之後序。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雙十節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孔子與論語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畢生崇揚孔學，其最先出版第一種著作，即爲論語文解，時維民國七年。民國十三年任教於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編撰論語要略；其書於四十二年收併入四書釋義中。二十四年出版先秦諸子繫年，於孔子生平歷年行事，多所考訂。五十二年出版論語新解，通釋論語全書。六十三年，又撰有孔子傳，詳述孔子生平，考論復有超出於舊著之上者。本書則係先生將歷年治孔之單篇論文，而未收入上述專書者，彙輯而成。初版於民國六十三年九月，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印行。原收文十八篇；此次重刊，增入相關論文十一篇，合爲二十九篇。原文已經先生修訂者，依改稿；其未經改訂者，則仍舊。新排通加入私名號、書名號，以便閱讀。凡新增各篇，目次中悉標注*號。

孔子爲中國集大成之聖人，論語爲中國二千年來一部人人必讀書，故欲知中國傳統文化，對孔子與論語必不能無所知。欲知孔子與論語，則除上述先生之相關專著外，本書尤應加注意。各篇立義雖殊，要皆以闡明孔學爲宗。其內容有較專門者，亦有深入淺出者，讀者合而觀之，庶可

於中國文化得一入門。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言

余少失庭訓，賴母兄撫養誘掖，弱冠爲鄉里小學師，即知讀孔孟書。爲諸生講句法文體，草爲論語文解，投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獲贈書券百元，得購掃葉山房等石印古籍逾二十種。所窺漸廣，所識漸進。時爲民國七年，新文化運動，方甚囂塵上。竊就日常所潛研默體者繩之，每怪其持論之偏激，立言之輕狂。益自奮勵，不爲所動。民十一轉教中學，先在廈門集美學校一年，轉無錫第三師範。校規，每一國文教師分班負責，隨年級自一年遞升至四年；一班畢業，周而復始。每年有特定課程一門，曰「文字學」、「論語」、「孟子」、「國學概論」。余按年編爲講義，自文字學大義、論語、孟子要略、國學概論，四年得書四種。惟文字學大義以篇幅單薄，留待增廣，今已失去。其他三種，絡續出版。時有中學同學郭君，遊學東瀛，與余同事；其案頭多

日文書，余借讀得蟹江義丸孔子研究一書，始知史記孔子世家所載孔子生平歷年行事多疏誤；自宋迄清，迭有糾彈。余在論語要略中先撰有孔子傳略一章，孟子要略中續草孟子傳略。時國人治先秦諸子之風方熾，余益廣搜羣籍，詳加考訂，擴大為先秦諸子繫年。民十九赴北平，在燕京、北大、清華、師大諸大學授課。默念衛揚孔道，牽涉至廣，茲事體大，不能專限於先秦孔孟之當時。抑且讀書愈多，乃知所瞭解於孔孟之遺訓者乃益淺。因遂不敢妄有論著。數年中，草成近三百年學術史。避日寇，至滇南，獨居宜良山中，草成國史大綱。轉成都，病中讀朱子語類全部，益窺由宋明理學上探孔孟之門徑曲折。避赤氛，至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乃又時時為諸生講論語。赴美講學，以羈旅餘閒，草為論語新解。辭去新亞職務，移居來臺，草為朱子新學案。又值大陸批孔之聲驟起，新近又草為孔子傳。並彙集港臺兩地二十年來所為散文，凡以孔子與論語為題者，得十六篇，成為此編。回念自民初始知讀孔孟書，迄今已逾六十年，而余年亦已八十矣。先則遭遇「打倒孔家店」之狂潮，今又嗅及「批孔揚秦」之惡氛。國事日非，學風日竄。即言反孔一端，論其意義境界，亦復墮退不可以道里計。然而知讀孔孟書者，亦已日益凋零。仰瞻孔孟遺訓，邈如浮雲天半，可望而不可即，抑且去我而日遠。念茲身世，眞不知感慨之何從也。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七日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孔子傳　出版說明

本書原爲錢賓四先生應臺灣孔孟學會之約而撰。初，該會主持人親造素書樓，懇請先生撰寫孔子、孟子兩傳，先生以舊作中已有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先秦諸子繫年以及論語新解多種，述孔孟已詳，故加婉卻。然終以堅邀，不獲已，遂先撰本書。乃先窮四月之力，搜集相關資料，然後下筆。自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始撰，迄翌年二月，凡半載而書成。先生本謂前論孔子已悉，不意撰著此書，時有新得，所述復有舊作所未及者。夫自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以還，迄今已歷兩千年，討論孔子生平言論行事者，實繁有徒。此書提要鉤玄，折衷羣言，而以論語爲中心大本。其間取捨從違，實不專爲討論孔子之一生，乃爲研究中國五千年文化傳統一部人人必讀書。

先生撰述既竟，書稿送交孔孟學會，該會評議會審查，謂是書對孔子生平疑辨過多，尤如所主易傳非孔子作之類，逐舉各項令加改定。先生以撰著此書，字字斟酌，語語謹審，其所疑辨，無不有據有證；且如易傳作者之類，乃嚮所持論，畢生主張，不得以評議桌上一二人語，遽毀生平；遂拒不能改。而此稿亦以擱置不付印。先生乃索回原稿。適當時報端披載其事，坊間出版社

登門求印者麇集，先生仍付最先提出要求之綜合月刊社印行，時爲六十四年八月。後該社改變出版計畫，不再出版學術專著，因取回改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於七十六年七月再版。

初版附錄讀胡仔孔子編年、讀崔述洙泗考信錄、讀江永鄉黨圖考三篇，再版時補入舊作孔子傳略爲第四篇。是篇原與先生另一舊作論語新編合刊，於六十四年十月由臺北廣學社印書館出版。今重排本書，乃據東大版爲底本，校正若干誤植文字，並增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酌加引號，以便讀者閱讀。又廣學社所印論語新編一小册，今已不再版行，因亦增編爲本書之附錄，合原所附者共爲五篇。論語新編中每章原文下但注篇次，今添注出各篇篇名及章次，以便檢索；其章次則悉準先生所著論語新解。又於每章前加上◎符號，以醒眉目。整理排校雖愼重從事，惟恐漏誤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張蓓蓓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言

孔子爲中國歷史上第一大聖人。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後，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

孔子生平言行，具載於其門人弟子之所記，復經其再傳、三傳門人弟子之結集而成之論語一書中。其有關於政治活動上之大節，則備詳於春秋左氏傳。其他有關孔子言行及其家世先後，又散見於先秦古籍如孟子、春秋公羊、穀梁傳、小戴禮記檀弓諸篇，以及世本、孔子家語等書者，當尚有三十種之多。最後，西漢司馬遷史記采集以前各書材料成孔子世家，是爲記載孔子生平首尾條貫之第一篇傳記。

然司馬遷之孔子世家，一則選擇材料不謹嚴，眞僞雜糅。一則編排材料多重複，次序顚倒。後人不斷加以考訂，又不斷有人續爲孔子作新傳，或則失之貪多無厭，或則失之審覈不精，終不能於孔子世家以外別成一愜當人心之新傳。

本書綜合司馬遷以下各家考訂所得，重爲孔子作傳。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爲人，卽其所自述所謂「學不厭、教不倦」者，而尋求孔子畢生爲學之日進無疆，與其教育事業之博大深微，爲主要中心，而政治事業次之。因孔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之主要貢獻，厥在其自爲學與其教育事業之兩項。後代尊孔子爲至聖先師，其意義卽在此。故本書所采材料亦以論語爲主。凡屬孔子之學術思想，悉從其所以自爲學與其教育事業之所至爲主要中心。孔子畢生志業，可以由此推見。而孔子之政治事業，則爲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部分。雖事隔兩千五百年，孔子之政治事業已不足全爲現代人所承襲，然在其政治事業之背後，實有其以學以教之當境實踐之一番精神，爲孔子學術思想以學以教、有體有用之一種具體表現。欲求孔子學術思想之篤實深厚處，此一部分亦爲不可忽。

孔子生平除其自學與教人與其政治事業外，尚有著述事業一項，實當爲孔子生平事業表現中較更居次之第三項。在此一項中，其明白可徵信者，厥惟晚年作春秋一事。其所謂訂禮樂，事過境遷，已難詳說，並已逐漸失卻其重要性。至於刪詩書，事並無據。贊周易則更不足信。

以上關於孔子之學與教，與其政治事業、著述事業三項層次遞演之重要性，及其關於著述方面之眞僞問題，皆據論語一書之記載而爲之判定。漢儒尊孔，則不免將此三項事業之重要性首尾

倒置。漢儒以論語列於小學，與孝經、爾雅並視，已爲不倫。而重視五經，特立博士，爲國家教育之最高課程，因此以求通經致用，則乃自著述事業遞次及於政治事業，而在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則不免轉居其後。故在漢代博士發揚孔學方面，其主要工作乃轉成爲對古代經典之訓詁章句，此豈得與孔子之「述而不作」同等相擬。則無怪乎至於東漢，博士皆倚席不講，而太學生淸議遂招致黨錮之禍，而直迄於炎漢之亡。此下莊老、釋氏迭興並盛，雖唐代崛起，終亦無以挽此頹趨。此非謂詩、書、禮、易可視爲與儒學無關，乃謂孔子畢生精神，其所謂學不厭、教不倦之眞實內容，終不免於忽視耳。

宋代儒學復興，乃始於孔子生平志業之重要性獲得正確之衡定。學與教爲先，而政治次之，著述乃其餘事。故於五經之上，更重四書，以孟子繼孔子而並稱，代替了漢唐時代以孔子繼周公而齊稱之舊規。此不得不謂乃宋儒闡揚孔子精神之一大貢獻。宋儒理學傳統迄於明代之亡而亦衰。淸儒反宋尊漢，自標其學爲漢學，乃從專治古經籍之訓詁考據而墮入故紙堆中，實並不能如漢唐儒之有意於通經致用，尙能在政治上有建樹。而孔子生平最重要之自學與教人之精神，淸儒更所不瞭。下及晚淸末運，今文公羊學驟起，又與乾嘉治經不同。推其極，亦不過欲重返之於如漢唐儒之通經而致用，其意似乎欲憑治古經籍之所得爲根據，而以興起新政治。此距孔子生平所

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隔離仍遠。人才不作，則一切無可言。學術錯誤，其遺禍直迄於民國創興以來之六十年，中共邪說獲得乘虛而起。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復興中國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家傳統，而闡揚孔子生平所最重視之自學與教人精神，實尤爲目前當務之急。本書編撰，著眼在此。爰特揭發於序言中，以期讀者之注意。

本書爲求能獲國人之廣泛誦讀，故篇幅力求精簡。凡屬孔子生平事蹟，經歷後人遞述，其間不少增益失眞處，皆一律刪削。本書寫作之經過，其用心於刊落不著筆處，實尤勝過於下筆寫入處。凡經前人辯論，審定其爲可疑與不可信者，本書皆更不提及，以求簡淨。亦有不得盡略者，則於正文外別附「疑辨」二十五條，措辭亦力求簡淨，只略指其有可疑與不可信而止，更不多及於考證辨訂之詳。作者舊著先秦諸子繫年之第一卷，多於孔子事蹟有所疑辨考訂，本書只於「疑辨」諸條中提及繫年篇名，以便讀者之參閱，更不再事摘錄。

自宋以來，關於孔子生平事蹟之考訂辨證，幾於代有其人，而尤以清代爲多。綜計宋、元、明、清四代，何止數十百家。本書之寫定，皆博稽成說，或則取其一是，捨其諸非。或則酌采數說，會成一是。若一一詳其依據人名、書名、篇名及其所以爲說之大概，則篇幅之增，當較今在十倍之上。今亦盡量略去，只寫出一結論。雖若有掠美前人之嫌，亦可免炫博誇多之譏。

清儒崔述有洙泗考信錄及續錄兩編，爲考訂辨論孔子生平行事諸家中之尤詳備者。其書亦多經後人引用。惟崔書疑及論語，實其一大失。若考孔子行事，並論語而疑之，則先秦古籍中將無一書可奉爲可信之基本，如此將終不免於專憑一己意見以上下進退兩千年前之古籍，實非考據之正規。本書一依論語爲張本，遇論語中有可疑處，若崔氏所舉，必博徵當時情實，善爲解釋，使歸可信，不敢輕肆疑辨。其他立說亦有超出前人之外者，然亦不敢自標爲作者個人之創見。立說必求有本，羣說必求相通，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竊願以此自附於孔子之垂諭。

作者在民國十四年曾著論語要略一書，實爲作者根據論語爲孔子試作新傳之第一書。民國二十四年有先秦諸子繫年一書，凡四卷，其第一卷乃爲孔子生平行事，博引諸家，詳加考辨，所得近三十篇。民國五十二年又成論語新解，備采前人成說，薈粹爲書，惟全不引前人人名、書名、篇名及其爲說之詳，惟求提要鉤玄，融鑄爲作者一家之言，其體例與今書相似。惟新解乃就論語全書逐條逐字解釋，重在義理思想方面，而於事蹟之考訂則缺。本書繼三書而作，限於體裁有別，於孔子學術思想方面僅能擇要涉及，遠不能與新解相比。但本書見解亦有越出於以上三書之外者。他日重有所獲不可知，在此四書中見解儻有相異，暫當以本書爲定。讀者儻能由此書進而涉及上述三書，則尤爲作者所私幸。

本書作意，旨在能獲廣泛之讀者，故措辭力求簡淨平易，務求免於艱深繁博之弊。惟恨行文不能盡求通俗化。如論語、左傳、史記以及其他先秦古籍，本書皆引錄各書原文，未能譯爲白話。一則此等原文皆遠在兩千年以上，乃爲孔子作傳之第一手珍貴材料，作者學力不足，若一一將之譯成近代通行之白話，恐未必能盡符原文之眞。若讀者愛其易讀，而不再進窺古籍，則所失將遠勝於所得，此其一。又孔子言行，義理深邃，讀者苟非自具學問基礎，縱使親身經歷孔子之耳提面命，亦難得眞實之瞭解，此其二。又孔子遠在兩千五百年之前，當時之列國形勢、政治實況、社會詳情，皆與兩千五百年後吾儕所處今日大相懸隔。吾儕苟非略知孔子當年春秋時代之情形，自於孔子當時言行不能有親切之體悟，此其三。故貴讀此書者能繼此進讀論語以及其他先秦古籍，庶於孔子言行與其所以成爲中國歷史上之第一大聖人者，能不斷有更深之認識。且莫謂一讀本書，即可對瞭解孔子盡其能事。亦莫怪本書之未能更致力於通俗化，未能使人人一讀本書而盡獲其所欲知，則幸甚幸甚。

本書開始撰寫於民國六十二年之九月，稿畢於六十三年之二月。三月入醫院，爲右眼割除白內障，四月補此序。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先秦諸子繫年　出版說明

本書最初係於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交上海商務印書館刊印，其後曾於四十五年六月增定再版，由香港大學發行。當時出版經費係得美國哈佛燕京社之資助。錢先生來臺定居後，曾於六十四年據港版在臺重印，惟未再修訂。

本次重印，即據民國四十五年香港發行之增定本重新鑄版。凡舊本偶有誤字及錯排處，皆隨文改正。

本書標點及樣式，大體皆依原版，未作更動。

新版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跋

此書草創，在民國十二年之秋。時余始就江蘇省立無錫師範學校講席，助諸生治論語，編要略一書。後出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萬有文庫第一集。先及孔子生卒行事，爲傳略，而別撰其考訂，自藏篋衍，未以示諸生也。明年秋，論語終，又講孟子，亦如前例，編要略。後出大華書店出版。先爲孟子傳，考訂益富。

時余治諸子，謂其淵源起於儒，始於孔子，而孔子之學見於論語春秋。易繫非孔子書，老子不得在孔子前。既粗發孔子學術大體於要略，又先成易傳辨僞老子辨僞兩篇。兩文均成於民國十二年夏前。易傳辨僞未發表，老子辨僞於民國十九年刊布於燕京學報第八期，易名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及十三年秋，論孟要略既成，始專意治易，擬爲書三卷，發明易意。謂易與老子之思想不明，則諸子學之體統不可說也。

十四年一月，奉軍南下，閭里大受其擾。學校既輟業，余家又遭散軍刼略，窘困無以爲活，乃始售論語要略稿於商務。而是年十月，奉浙之戰又啟，滬寧人心大震。余慮戰事非一日可了，欲移情新業，藉忘外氛，乃作意爲公孫龍子作新注。初余於十二年春，在福建私立集美師範，曾草墨辯探源及公孫龍白馬論注，均未成。及十三年四月，墨辯一題，賡續成篇，投刊商務印書館東方雜誌二十一卷八號。而公孫龍注迄未再理。至是始竟體改作。又附舊稿說惠施歷物及辨者二十一事，稿成於民國七年。幷彙繫年

考惠施公孫龍事跡諸篇爲惠公孫小傳，合訂一本。余意治先秦學術，孔墨孟莊荀韓諸家，皆有書可按，惟名家陰陽家，其思想議論，關係先秦學術系統者甚大，而記載散佚，特爲難治。竊欲於治老易外，先爲先秦名學鈎沉，及先秦陰陽學發微兩書，攻木先堅，而後其易，自此乃爲先秦諸子學通論。而考求諸子生卒行事先後，亦當先通論成書。否則諸子之年世不明，其學術思想之淵源遞變，亦自無可確說也。余既埋首爲公孫龍子作新注，未逾旬，而浙軍已越境，社會人心亦稍稍寧。然余事已發軔，因遂勿輟。及冬，可百日，而稿首尾粗具。束裝歸鄉舍，度殘臘，私意甚欣欣，非始料也。是年歲底，易書三卷，亦增訂有完帙。

十五年夏，始爲諸生講國學概論，其第二章爲先秦諸子。雖限於聽受者之學力，未能罄其所見，著語不多，而余數年來治諸子，大體意見，略如所論，實至今未變也。（後此書成，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十六年春，國民軍北伐，學校歇業，復避囂居鄉，得間可兩月，乃始從容整理繫年積稿，居然成卷帙矣。是年秋，改就蘇州中學教職。及明年十七年之春，而國學概論亦完書。（時友人某君爲史學與地學雜誌徵稿，以考辨第四卷王氏古本竹書紀年輯校補正一文應之，爲余繫年最先刊布之第一篇也。）然秋後家禍大作，兒殤妻歿，兄亦繼亡，百日之內，哭骨肉之痛者三焉。椎心碎骨，幾無人趣。

又明年秋後，得友人介，爲商務草萬有文庫墨子一小冊，（商務編印萬有文庫，書目中有墨子王陽明未有撰人，友某君介余承之，余憂痛未銷，先作墨

子一小册，七日而成。王陽明一册，於明年開學前旬日爲之。又本擬爲先秦名家鈎沉，而久未有好懷，姑售惠施公孫龍舊稿於商務，以濟家困。

又明年，十九年之春，余始續姻。枯槁之餘，重得生理，頗有意刊繫年，先爲自序一篇，今列書首，即余新婚後十日內所草也。春間繫年稿爲友人携之南京，以無副，不久即索還，而頗有傳鈔，曾載史學雜誌，後又轉錄入古史辨第四册，是爲繫年再度刊布之稿。大抵余草繫年，始壬戌，迄庚午，先後九年。其先有齊盧之戰，其後有浙奉之爭，又後而國軍北伐，蘇錫之間，兵車絡繹，一夕數驚。余之著書，自譬如草間之孱兔，獵人與犬，方馳騁其左右前後，彼無可爲計，則藏首草際自慰。余書，亦余藏頭之茂草也。如此爲書，固宜勿精。

又余家貧無書，非能博覽，本不樂專爲考據，草創繫年，乃爲通論之地。初不自意成巨帙。先惟以諸子書與史記國策對勘，又於史記索隱中得古本紀年鱗爪，冥行擿埴，尋索漸遠。所至學校，藏書無多，又不能恣意討究。課務雜碎，敗其深思。每一擾擱，如泥牛之入海，追探便無蹤跡。偶得一日或數刻之清暇，燈前人靜，精力未灰，展紙疾書，獲成一篇。累積既多，稍得系統。乃逐逐繙書參考，遇及異同，過寫眉端，積久之後，更復改爲。然初繙甲籍，繼閲乙册，目光所及，時有轉移。精思貫注，未能盡晐。而乙書在手，甲書已去。乙書既去，丙書方來。記誦難周，摘錄不盡。又隔之以時日，雜之以冗擾，乘之以疲怠，遇之以疏闊，雖用力之多，

而所得實寡，職以此也。況自己巳以來，饑寒之懼稍紓，骨肉之痛方切。聰明與血淚同盡，記誦隨哭泣並衰。懵然木然，盡喪其所有。所以余書雖成，終自知其疏陋，恐多謬誤，未敢輕以問世也。

及十九年秋，始來北平，任教於燕京大學，七日則得三日暇，爲余有生以來所未有。又所居靜悅，獨處一室，重繙陳稿，改寫通表四卷，因得稍訂其罅漏。凡三閱月而迄。二十年夏後，改任北京大學史學講席，而九一八之警訊已傳。自念此書，雖耗我精力，而無當覆瓿之用，目擊艱危，徒增慚恨。二十一年春，又成再論老子成書年代一文，（刊載北大哲學系哲學論叢。又輯前稿爲老子辨，由大華書店出版。）而所欲作通論者，迄未暇爲。及二十二年，長城戰事起，日軍飛機盤旋北平城上，仰首如睹蜻蜓之繞簷際也。余恐此書卽爾散失，始覓人寫副本，因亟亟謀刊布焉。

去年夏，始定議由商務刊行，余自任校對，又得從頭逐字細讀，因改定其疏謬者十餘處。然以所涉既廣，亦不獲一一覆勘也。回顧夙志，十不一酬，此區區一冊書者，特足供余身世悵觸之感而已。校既竟，因識涯略如此。

其生平師友相識，愛重此書，或謀助刊傳，或曲予獎借，或代之謄錄，凡於此書有益，心感無既，並此誌謝。

墨子 出版說明

本書成於民國十八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出版，收入商務百科小叢書中。本次重印即據商務版，重加整理。

原書引文標示出處，有詳列篇名者，亦有但載書名者，本次校印皆予查明補齊。惟引文方式仍如原書之舊，未加更動。

本書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近代墨子的研究，自從盧文弨、孫星衍、畢沅的校勘，下至孫詒讓的閒詁，積聚了一百年來十數大儒的心力，闢莽開榛，其說日備。最近研治墨學的，有章炳麟、梁啟超、胡適、章行嚴，

其他不可勝數。纂集諸家講墨之書，當不在千萬言以下。要在一本兩三萬字的通俗小書裏講一點墨學，實是一件至難的事。儻要是毋剿說，毋雷同，異軍特起，別備諸家未備之一格，這更不是輕易做得的。我這本區區的小册，總算還有些自己的創見，極想努力地給同時或以往的學者解決一些墨學裏糾紛的問題。像「墨家得名的由來」、「墨子的生卒年代」、「墨學的全部系統」、「別墨和墨經」等幾處，下至許、宋、尹、惠、公孫諸家和墨學的關係，在本書裏均是想獨闢蹊徑，自造一貫的見解。並不敢徒拾陳言，譁世取寵。至於其間得失，自在讀者的公評。惟以限於篇幅，往往多所刪略；即說到的幾點，也復語焉不詳。遇考訂處，以牽涉過廣，尤未能羅列證據，糾非顯是。這是本書的缺憾，要向讀者告罪的。

中華民國十八年中秋錢穆識。

惠施公孫龍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此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印行，收入商務國學小叢書中。惟其中惠施歷物、惠學鈎沉、公孫龍子新解、公孫龍七說、辯者言、名墨訾應辨六篇，曾經先生修訂，輯入民國六十六年出版之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冊。今重刊本書，此六篇內容悉據論叢所已修訂者，其餘仍依商務版原本。而論叢則但存此諸篇篇目，不復收錄，以免重複。

此次整理，標點視需要略有增添。引文及出處，皆逐一查對，除少數明顯應係脫誤者隨文補正外，餘皆保留原書節引方式，不作更動。公孫龍子新解一文，凡作者所校原本之錯字、衍文，例用小字排印，外加（）號；改正、增補之字，則外加〔〕號，用便區分。

本書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莊子纂箋 出版説明

莊子書爲中國古籍中一部人人必讀之書，但義理、辭章、考據三方面，皆須學有根柢，乃能通讀其書。晉郭象注莊，闡發義理，文字訓詁非所重，而其所陳義，則亦多攙魏晉玄學，未必盡符莊書本意。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兼採其前解莊諸家，辨音義、考訓釋，而鮮涉義理；然唐以前莊書舊詁，惟賴以存。又自晉支遁以還，歷代亦有會通釋氏義以言莊子者，要爲治莊一大宗。清儒汲古明季焦竑莊子翼薈萃宋明諸家舊義，採擷極富，諸家原書之失傳者，亦賴是以考見焉。清儒汲古功深，於文字、聲韻、訓詁、校勘等各方面，所得有超軼於前代者。乾、嘉之世，所重在治經；道、咸以降，復以治經之法注諸子書。同、光時期，有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先謙莊子集解二書最爲通行。集釋備錄郭注、成疏、陸氏音義，尤多採摭清代考據諸儒。其書雖便於翻閱，然於郭注與莊子之異同，實未能分辨。王氏治桐城古文，知尚簡要，不盡取郭注與陸氏音義，而多採清初宣穎南華經解，遂亦得宣書活趣之長，而無一般注解書拘滯之病，故頗便初學；然於莊書義解，仍缺深趣。晚近注莊，後出轉精，而錢賓四先生莊子纂箋一書，自當爲其冠冕。

先生治莊，遠始於辛亥。及抗戰勝利，還都南京，先生知天下仍將大亂，乃於民國三十七年避地本鄉無錫，執教於新辦之江南大學。此書即草創於是年，自謂「身居亂世，乃注此書以自消遣」。其注是書，據自序，始是年十二月九日，迄於翌年二月九日，凡兩越月而書成。其書以馬其昶莊子故爲藍本，遍誦莊子各家注，以五色筆添注其上，眉端行間皆滿。三十八年春假，攜其稿至香港。翌年多，往臺北，假中央研究院未見書七、八種，轉赴臺南，借宿臺南工業專門學校（即後之成功大學）之賓館，日夜展讀選錄，旬日而此書遂得成稿。四十年冬，是書初版於香港。付梓以後，又陸續得見他書，乃復逐條改訂。四十四年二版，改訂四十七條；四十六年三版，改訂六十九條；五十一年四版，又改訂四十三條；七年之間，計共改訂一百五十九條。是則其書之寫成，先後亦逾十年以上。

夫「纂箋」云者，亦猶集解也。是書除郭象注外，詳採古今各家注，凡逾一百五十家，斟酌選擇，調和決奪，得一妥適之正解。全部莊子一字一句，無不操心，並可融通，實爲莊子一家思想之正確解釋，宜爲從古注書之上品。前人注莊，或患得於此者失於彼，明於前而昧於後。先生之注是書，則先已將一部莊子爛熟胸中，而後循上而下，此句從此家之解，彼句則採彼家之說，然後整部莊子上下接續，皆可通釋。惟其注釋兼顧義理、辭章、考據，而體尚簡要，辭貴清通，

以求通體朗暢，豁人心境，此則讀者須逐字逐句細讀之始得。

是書臺灣初版於民國五十八年六月，由三民書局經銷。七十四年十一月改由東大圖書公司重印初版，同港四版。今全集重版，即以東大重印初版爲底本。原版正文、注文但有舊式斷句，今悉加入新式標點。注文部分，仍保持原來夾行版式，以期讀者就注與本文一貫讀之，朗暢無礙而不致隔斷文義。而雙行夾注受排印條件之限，其書名號、私名號未能排入，故從略。至所用引號，或標明引文起訖，或鉤注特定詞語，皆所以助文意之顯豁，以便讀者閱讀。凡所徵引，多經覆核，其所校正原版誤植文字，不另出校記。注文有沿用馬氏故、王氏集解等所節引以及改易原文以就文意者，悉仍其舊；其明爲先生所節錄之引文，亦不改動。本書之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工作，係由何澤恆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莊子，衰世之書也。故治莊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魏、晉之阮籍、向、郭，晚明之焦弱侯、方藥地，乃及船山父子皆是。莊子之學，蓋承楊朱而主爲我。近人疑其爲一人，以「莊」、「楊」疊韻，「朱」、「周」雙聲說之。嚴幾道批莊，亦持此說。然決非是。齊物夢蝶、山木烹雁，皆明著曰「莊周」，而莊書復有「楊朱」、「陽子居」，非一人明矣。然莊氏要爲爲我之學。昔王荆公嘗論之，曰：「爲己，學者之本；爲人，學者之末。爲己有餘，而天下之勢可以爲人矣，則不可以不爲人。今始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而其志已在於爲人，則可謂謬用其心矣。楊子知爲己之爲務，而不能達於大禹之道，則可謂惑矣。墨子者，廢人物親疏之別，而方以天下爲己任，是以所欲以利人者，適所以爲天下害患也。故楊子近於儒，而墨子遠於道。」呂吉甫、王元澤皆致力莊子，蓋師介甫緒論，欲以羽翼夫三經新義。然而北宋諸儒，終亦不免有衰氣。余之生，值世又衰；而並世學人，顧少治莊而貴墨。震於西方之隆強，意切追隨，摩頂放踵，若懼弗及。孫仲容、梁卓如皆盛尊墨子，謂可擬之聊氏。獨章枚叔慭焉異趣，謂急切覬晉、宋，已屬踰望，遑論漢、唐！故枚叔頗能窺尋莊旨。嚴幾道晚年，與熊純如諸札，亦頗瞭此；而

幾道亦晚年治莊。然則處衰世而具深識，必將有會於蒙叟之言，寧不然耶！此非沮、溺避世，曾滌生曾欲體莊用墨，亦孟子「禹、稷、顏回同道」之義耳。余少知好此書。猶憶辛亥，年十七，負笈金陵，常深夜倚枕，繼燭私誦。有同學某君，已忘其姓字，見余好此，告曰：「嘗宿山寺，得異僧授讀。」余問其說，爲講逍遙遊「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兩語，大奇賞。自是徧接古今注莊諸家。每獲一帙，必首尾循誦，往復不厭。然得於此者失於彼，明於前而昧於後，欲求一通體朗暢、豁人心意者而難之。自是以來，垂四十年矣。世益衰益亂，私所會於漆園之微旨者益深。戊子冬，赤氛披猖，由遼瀋，而平津，而徐蚌，血戰方殷。時居無錫江南大學，濱太湖，有風濤滌蕩之勝。回念昔遭浙、奉興鬨，時亦居無錫。京滬線上，一夕數驚。杜門注公孫龍，日卒一篇，越七日成書，而風濟喉息矣。今戰氛殆不可速了，遂發意注莊子。先就馬通伯莊子故，愜者存之，濫者抹之。然後廣集諸家，蟻行蠅楷，列於書眉；鈎勒標幟，施以五色。昕旭握管，時達丙夜；寒雨雪霰，呵凍不輟。始十二月九日，迄於翌歲己丑二月九日，前後適兩越月而書成。四月遂來香港。庚寅冬，去臺灣。假中央研究院未見書七、八種，攜赴臺南，得靜院，晨昏覓隙，再事添列；又越月而竣。今年秋，獲交南通沈君燕謀。見余書，曰：「來日何可保？」斥貲促余付梓工。余親任校字。版垂竟，報載平、津大學教授，方集中思想改造，競坦白

者踰六千人，不禁爲之廢書擲筆而歌。念蒙叟復生，亦將何以自處？作逍遙之遊乎，則何逃於隨羣蝨而處褌？齊物論之芒乎，則何逃於必一馬之是期？將養其生主乎，則游刃而無地。將處於人間乎，則散木而且翦。儵忽無情，混沌必鑿。德符雖充，桎梏難解。計惟鼠肝蟲臂，唯命之從。曾是以爲人之宗師乎！又烏得求曳尾於塗中？又烏得觀魚樂於濠上？天地雖大，將不容此一人，而何有乎所謂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然而古人有言：「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處下坐。」此六千教授之坦白，一言蔽之，無亦曰墨翟是而楊朱非則已。若苟四十年來，漆園之書尚能索解於人間，將不致有若是。天不喪斯文，後有讀者，當知其用心之苦，實甚於考亭之釋離騷也。

中華民國四十年辛卯十二月一日錢穆識於九龍新亞書院

本書四版增訂本自識語

本書於四十四年二月再版，凡增刪改定者四十七條。四十六年三月三版，增刪改定者又六十九條。此次四版，增刪改定者又四十三條。距本書初版已七年，凡增刪改定者共一百五十九條。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錢穆自識

莊老通辨　出版說明

本書以今名刊印成册，始於民國四十六年十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計收文十五篇。民國七十九年復補入三篇，共十八篇，翌年十二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第三次印行，俱詳本書篇目後作者識語。

本次重印，係據東大八十年增訂初版爲底本，參校以錢先生晚年改稿，並依全集編輯原則，增入性質相近之兩文，即發表於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之道家與黃帝一文與發表於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之莊子薪盡火傳釋義一文。全書新版共收文二十篇。其新增之篇，於目錄中加*號註明。

本書因係兼涉思想辨析與考論成書年代之作，故文中論及古人、古事、古書，乃至典籍中特有之觀念極複雜。先生久欲將書重新標點，並加注引文出處，俾便觀覽，生前曾以其事委之校者，惟其事未竟。今仍遵先生原意，將各文重新整理。

先生全書考論莊、老，既論其人，亦論其書，故文中「老」、「莊」字，有指人言，有指書言。指人言者，「老子」一名或以稱著五千言之老子，或以稱傳言中難於確認之所謂「老聃」。

而指書言者，則於莊子一書必詳別其內、外、雜篇。然亦每有行文之中，指人、指書可以兩通者，不一而定。蓋必時時牢記其主張莊子一書惟內七篇爲莊周親著，其成書較今傳老子五千言爲先出，外、雜篇則多出老書之後之說，然後可以不紊。今新版增入私名號與書名號，其標示皆以此爲準。惟部分文章因先生已先明言其所舉莊書，僅限內篇，故早年單獨刊登時，曾即以莊書之名指稱莊子本人之著作，而未特別標明屬於內篇。此次整理爲求避免混淆，僅莊書之可以無分內、外、雜篇者標爲書名，其他須指明爲莊周所作者，則於「莊書」一辭之「莊」字標爲人名。凡書中間有循讀文句若當爲書名，而實際標作人名者，俱以此故。

凡篇中引文別出條列者，俱依各書原本細校，並以楷體活字編排，如全集例。而正文中夾入引文者，則儘量保持原文節引方式，以維持原書文氣。

凡原引文之未標示原著篇名者，悉予補入，各文之後則增列初次發表之時間及登載之刊物名稱。

本書之整理，由戴景賢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近人論學，好爭漢、宋。謂宋儒尙義理，淸儒重考據，各有所偏，可也；若立門戶，樹壁壘，欲尊於此而絕於彼，則未見其可也。淸儒以訓詁考據治古籍，厥功偉矣。其謂「訓詁明而後義理明」，說非不是。惟求通古書訓詁，其事不盡於字書小學，爾雅、說文，音韻形體，轉注叚借之範圍。此屬文字通訓，非關作家特詁。如孔孟言仁，豈得專據字書爲說？卽遵古注，亦難愜當。阮元有論語論仁篇、孟子論仁篇，遍集論、孟「仁」字，章句縷析，加以總說，用意可謂微至。然所窺見，仍無當於孔孟論仁之精義。昔朱子告張南軒，已指陳其癥結所在。此必於孔孟思想大體，求其會通，始可得當，而豈尋章摘句，專拈論、孟有「仁」字處用心，謂能勝任愉快乎？又況抱古注舊訓拘墟之見，挾漢、宋門戶之私，則宜其所失之益遠矣。

淸儒於考據，用力勤，涉獵廣，而創獲多。然其大體，乃頗似於校勘、輯逸之所爲。蹠實有餘，蹈虛不足。施於每一書之整理，洵爲有功。其於古人學術大體、古今史迹演變，提挈綱宗，闡抉幽微，則猶有憾。此必具綜合之慧眼，有博通之深識，連類而引伸之，殊途而同歸焉；此亦

一種考據，豈僅比對異同，網羅散失之謂乎？清儒於小學音韻，造詣深者，差已睎此境界，其他猶懸然也。

清儒亦有言，非通羣經，不足以通一經。推此說之，非通諸史，亦不足以通一史；非通百家，亦不足以通一家。清儒考據，其失在於各別求之，而不務於會通。章實齋號爲長於平章學術，其分別清儒爲學途轍，謂浙西尚博雅，浙東貴專家。其實博涉必尚會通，否則所涉雖博，而仍陷於各別之專。清儒往往專精一史，專治一子。一史一子已畢，乃又顧而之他。故所繁稱博引，貌爲博而情則專，實未能兼綜諸端，體大思精，作深入會通之想也。

衡量清學一代所得，小學最淵微。整理經籍，瑕瑜已不相掩。至於子、史兩部，所觸皆其膚外，而子部爲尤甚。此正其輕忽於義理探求之病。然求明古書義理，亦豈能遂捨訓詁考據而不務？後有作者，正貴擴其意境，廣其途轍，就於清儒訓詁考據已有業績，而益深益邃，庶有以通漢、宋之囿，而義理考據一以貫之，此則非爭門戶、修壁壘者之所能知也。

老子爲晚出書，汪容甫已啟其疑。然汪氏所疑，特在史記所載老子其人其事，固未能深探本書之內容。梁任公推汪氏意，始疑及老子本書；所舉例證，亦殊堅明。然梁氏亦復限於清儒舊有途轍，未能豁戶牖而開新境。且老子書晚出於論語，其說易定。而其書之著作年代，究屬何世？

莊老孰先孰後？則其讞難立。余之此書，繼踵汪、梁，惟主老子書猶當出莊子、惠施、公孫龍之後，則昔人頗未論及。持論是非，當待讀者之自辨。而本書所用訓詁考據方法，亦頗有軼出清儒舊有軌範之外者。此當列諸簡耑，以告讀吾書者也。

老子書開宗明義，即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以清儒訓詁小學家恆見遇之，若不煩有訓釋。而實不然。先秦諸子著書，必各有其書所特創專用之新字與新語，此正為一家思想獨特精神所寄。以近代語說之，此即某一家思想所特用之專門術語也。惟為中國文字體制所限，故其所用字語，亦若慣常習見。然此一家之使用此字此語，則實別有其特殊之涵義，不得以慣常字義說之。

韓昌黎有言：「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老子書開宗明義，「道」「名」兼舉並重。即此一「名」字，其涵義，亦非孔子論語「必也正名乎」之「名」字涵義，所可一例而視。若深而求之，老子書中所用「道」「名」二字，不惟其涵義與論孟有別，並亦與莊子內篇七篇所用「道」「名」二字涵義有不同。此正莊老兩家之所以各成其為一家言也。此非熟參深通於莊、老兩書之全部義理，將無法為此二字作訓釋。清儒惟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為能脫出訓詁舊軌。焦里堂、阮芸臺繼踵，亦多新見。然清代學術大趨，則終在彼不在此。抽其耑，未暢其緒，故其所謂「訓

詁明而義理明」者，亦虛有其語耳。

今試就此「名」字，比觀莊、老兩書，分析其涵義內容，較量二氏對此「名」字一觀念之價值評判，則有一事甚顯然者。莊子內篇七篇，每兼言「名」「實」，此與孟子略相似。兼言「名」「實」，則每重實不重名。故莊子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此莊子之無重於名也。而老子書則「道」「名」兼重，有「常道」，復有「常名」。又曰：「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狀哉？以此。」「其名不去」，卽「常名」也。正因有此等常名，乃可使吾知「衆甫之狀」。然則「常名」者何指？是卽吾所謂此乃一家思想所特用之一種新語也。卽「常」字，古經籍亦不多見。後世重視此「常」字，實承老子。讀古書者，貴能游情於古作者之年代，其心若不知有後世，然後始可以瞭解此古書中所新創之字語，及其所影響於後世者何在。否則亦視爲老生常談，而不知我之沉浸染被於此老生常談中者之深且厚也。俞曲園諸子平議，破此「常」字爲「尙」字，此正其錮蔽於清儒小學訓詁家之恆習常見，乃不知此「常」字乃老子所創用。故老子又鄭重申言之，曰：「不知常，妄作凶。」亦豈可以「尙」字說之乎？

必欲求老子書中此「常名」一語涵義所指，則仍須一種訓詁，而此種訓詁，則仍必憑於考據。清儒解經訓字，或憑字書，或憑古注。因其重古注，遂重家法。而諸子書固無家法可循。爲諸子

作注，其事較晚起。注老子者莫著於王弼。弼之注「自古及今，其名不去」曰：「無名則是其名也。」既曰無名，則並名而不立，烏得謂「其名不去」乎？是王注之未諦也。今以老子本書注老子，則所謂「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者，此必爲老子書開端所謂之「常名」可知矣。

然則何者乃始爲常名？當知「名」「實」兼言，此爲孟、莊時代之恆語。一名指一實，此一實卽一物也。惟由莊子意言之，萬物在天地間，若馳若驟，如莊周之與胡蝶，鼠肝之與蟲臂，化機所驅，將漫不得其究竟，故名無常而不足重。老子則不然。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此所謂「先天地生」，卽首章「無名天地之始」也；「可以爲天下母」，卽首章「有名萬物之母」也。謂之「混成」，則無可分別，故曰「不可名」；謂之「不改」，則常在不去，乃終不可以無名，故又強而爲之名。而道則終是不可名者。故既曰「大道無名」，又曰「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則道者乃無可名而強爲之字。「字」與「名」之在老子書，涵義亦有別。今若進而問：何者始爲可名？在老子意，似謂有狀者乃始可名。「狀」卽一種形容也。今若強爲道作形容，則曰「大」，曰「逝」，曰「遠」，曰「反」；此皆道之狀也。道既有狀，故得強爲之名。

然則「名」字之在老子書，其重要涵義，乃指一種物狀之形容，因於有狀而始立。「狀」字在老子書，又特稱曰「象」。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然則就老子書釋老子，名當有兩種：一爲物體之名，一爲象狀之名。物之爲物，若馳若驟，終不可久，故「其名不去」者，實是一種象狀之名，而非「名」「實」之名也。故曰老子書中「名」字，乃與莊子書中「名」字涵義所指有大別也。

老子言道演化而生萬物，其間有「象」之一境，此亦老子所特創之新說，爲莊子書所未及；故「象」之一字，亦老子書所特用之新名也。若循此求之，老子書中所舉「有無」「曲全」，「大小」「高下」，「動靜」「強弱」，「雌雄」「黑白」，「榮辱」「成敗」，種種對稱並舉之名，實皆屬象名，非物名也。以近代語釋之，此等皆爲一種抽象名辭。然則老子之意，乃主天地萬物生成，先有抽象之表現，乃始有具體之演化者。易繫傳承之，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謂「易」，即道體也。所謂「儀」，亦象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必先於地，故知「象」亦先於「形」。今試再淺釋之。天下凡黑之物，皆在演化中，皆不可久，皆可不存在而可去，獨「黑」之名則較可常在而不去。故黑物非可常，而黑名較

可常。老子之意，似主天地間，實先有此較可常者，乃演化出一切不可常者。而王弼之說老子，乃主天地萬物以「無」爲體，以「無」爲始，又必重歸於「無」；此實失老子書之眞意。郭象注莊，則已知王弼「體無」之論之不可安而力辨之矣。然余之此辨，則非自持一義理，謂老子是而王弼非。余實僅爲一種考據，一種訓詁，僅指王弼之說之無當於老子書之本意耳。然試問若果捨卻訓詁考據，又何從而求老子、王弼所持義理之眞乎？

老子謂天地間惟有此較可常者，故人之知識乃有所憑以爲知。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莊子認爲天道不可知，而老子則轉認爲可知。試問其何由知？老子亦已明言之，曰：「執大象，天下往。」以天地萬物一切演化之胥無逃於此「大象」也。故曰：「吾何以知眾甫之狀哉？以此。」此乃老子書中所特別提出之一種甚深新義，所由異於莊周。居今而知此兩家持論之異，則亦惟有憑於考據訓詁以爲知耳。

上之所述，特舉老子書開宗明義兩語爲說，以見欲明古書義理，仍必從事於對古書本身作一番訓詁考據工夫。此卽在宋儒持論，亦何莫不然？如程朱改定大學，陽明主遵古本，此卽一種有關考據之爭辨也。又如朱、王兩家訓釋「格物致知」互異，此卽一種有關訓詁之爭辨也。居今而欲研治宋儒之義理，亦何嘗不當於宋儒書先下一番訓釋考覈之工夫？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

所同然。」欲知聖人之心，必讀聖人之書，欲讀聖人之書，斯必於聖人書有所訓釋考據。否則又何從由書以得其心？象山有言曰：「六經皆我註腳。」試問何以知六經之皆爲我註腳乎？豈不仍須於六經有所訓釋考據？象山又曰：「不識一字，我亦將堂堂地做一個人。」然固不謂不識一字亦能讀古人書，可以從書得心，用以知古人義理之所在也。

然治老子書，欲知老子書中所持之義理，其事猶不盡於上述。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所以論其世也。」讀老子書，考覈老子書中所持之義理，而不知老子其人，則於事終有憾。不幸老子其人終於不可知，則貴於論老子之世。以今語說之，即考論老子書之著作年代也。雖不知其書之作者，而得其書之著作年代，亦可於此書中所持之義理，更有所瞭然矣。

考論一書之著作年代，方法不外兩途：一曰求其書之時代背景，一曰論其書之思想線索。前者爲事較易，如見管子書有西施，即知其語之晚出；見中庸有「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之語，即知其語當出於秦人一統之後。梁任公辨老子書晚出，亦多從時代背景著眼。余定老子書出莊周後，其根據於老子書之時代背景以爲斷者，所舉例證，較梁氏爲詳密；然就方法言，則仍是昔人所用之方法也。惟余論老子書之思想線索，則事若新創，昔人之運用此方法者尚尠，爰再約略申說之。

人類之思想演進，固有一定必然之條貫可言乎？此非余所欲論。余特就思想史之已往陳迹言，而知當時之思想條貫，則確然有如此而已。以言先秦，其人其世其書，有確可考而無疑者，如孔子、墨子、孟子、莊周、惠施、公孫龍、荀子、韓非、呂不韋，皆是。就於其人其世先後之序列，而知其書中彼此先後思想之條貫，此亦一種考據也。然先秦諸家著書，亦有不能確知其書之作者與其著作之年代者，如易傳、中庸，如老子，如莊子外雜篇皆是。然其人雖不可知，而其世則約略尚可推。此於考求其書時代背景之外，復有一法焉，即探尋其書中之思想線索是也。何謂「思想線索」？每一家之思想，則必前有承而後有繼；其所承所繼，即其思想線索也。若使此一思想在當時，乃為前無承而後無繼，則是前無來歷，後無影響。此則決不能巋然顯於世而共尊之為一家言。故知凡成一家言者，則必有其思想線索可尋。

探求一書之思想線索，必先有一已知之線索存在，然後可據以為推。前論思想條貫，即此各家思想前承後繼之一條線索也。就其確然已知者，曰孔、墨、孟、莊、惠、公孫、荀、韓、呂，綜此諸家，會通而觀，思想線索，亦既秩然不可亂。今更就此諸家為基準，而比定老子思想之出世年代，細辨其必在某家之後，必在某家之前。此一方法，即是一種新的考據方法也。

思想線索之比定，亦有甚顯見而易決者。如論語重言「仁」，而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

德而後仁。」又曰：「天地不仁。」此即老子思想當晚出於論語之證也。墨子書有尚賢篇，而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此又老子思想當晚出於墨子之證也。世必先有「黑」之一語與「黑」之一觀念之存在，乃始有「非黑」之語與「非黑」之觀念之出現，故曰此顯見而易定也。

循此推之，莊、惠兩家，皆言萬物一體，莊子本於「道」以爲說，惠施本於「名」以立論。今老子書開宗明義，「道」「名」兼舉並重，故知老子思想又當晚出於莊、惠兩家也。然則先秦道家，當始於莊周，名家當始於惠施，不得謂老子乃道、名兩家共同之始祖。老子特綜匯此兩家，而別創一新義耳。此種思想線索之比定，則較爲深隱而難知。

然更有其深隱難知者。試再舉例。如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此一條立論甚新奇，遍求之先秦諸家思想，乃甚少同持此意見者。有之，惟公孫龍之堅白論。公孫龍主「堅」「白」可以外於「石」而相離，故曰：「拊石得堅而不得白，視石得白而不得堅，故「堅」「白」「石」可二不可三。」就常識論，「石」是物體之名，「堅」「白」乃象狀之辭；物體是實，象狀則虛。「石」爲一實體，而兼包「堅」「白」二象狀。故堅白相盈，不相離也。公孫龍顧反其說。循公孫龍之意，豈不象狀之名，可以脫離於物之實體而獨立自在乎？老子書正持此義。常識謂所視、所聽、所拊，

皆必附隨某一物之實體。老子似不認此說，乃謂所視、所聽、所拊，本皆相離，各別存在，乃由於「不可致詰，故遂混而爲一」焉。此非其立論之有與公孫龍相似乎？

詳老子之意，天地最先，惟有一物混成，是卽其所謂「道」也。「道」之衍變，先有象狀，再成具體。如此言之，則抽象之通名當在先，個別之物名當在後。淺說之，老子若謂：天地間當先有「黑」「白」之分，乃始有白馬、白石、白玉、白雪、白羽之分。「黑」「白」之分較先、較可常，而馬、石、玉、雪之分，則較後而較爲不可常。故莊子書屢言「物」，而老子書屢言「名」，屢言「象」，更不言「物」。此兩書之顯然異致也。蓋莊子雖屢言於物，然莊子實主未始有物。旣謂「未始有物」，故老子承之，乃改就一切象狀之可名者以爲說。此莊老思想大體之不同，亦可以由此而推也。

蓋名之爲用，愈具體，則可析之而愈小；愈抽象，則可綜之而愈大。惠施分言「大一」「小一」，卽所以推論萬物之一體。而公孫龍變其說，謂「堅」「白」「石」相離不相盈，則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天地間萬名，各離而自止於其所指。而老子又變其說，乃成象名在先，物名在後，以證其天地之原始於不可名狀之「道」。然則老子之思想，豈不與公孫龍有一線索可尋乎？

公孫龍又曰：「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以公孫龍書與老子書互參，則公孫龍之用此「指」字，亦猶老子書之創用一「象」字也。就人言之曰「指」，就物言之曰「象」。凡天地間一切物之抽象之名，此兩家皆認其可以離物而自在；此皆人之所由以知於物而就以指名於物、象狀於物者也。如曰「此物白」，「白」卽此物之可指目之一端，亦卽此物之可形容、可名狀之一象也。故知老子之說，實與公孫龍相近。而公孫龍之說，則顯爲承於惠施而變者。而莊子則譏惠施，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然則，堅白之說，惠施唱之，公孫龍承之，所以成爲當時之名家。莊子不喜其說，主於觀化而言道，所以自成爲當時之道家。今老子乃承於莊、惠、公孫之說而又變，遂兼攬「道」「名」兩觀念，而融會爲說。又不言堅白，而更稱「夷」「希」「微」，則益見爲抽象；此卽老子之所謂「玄之又玄」也。卽此一端，豈非思想線索之猶可微辨而深探之一例乎？凡此云云，則必博綜會通於先秦諸子思想先後之條貫而後始見其必如是，故曰：非通諸子，則不足以通一子也。

言淸儒考據者，率盛推閻百詩之尚書古文疏證。然古文尚書乃有意作僞，故有僞迹可尋。老子書則自抒己意，彼非有意作僞，又何從抉發其僞迹？故余書之辨老子，與閻氏之辨尚書古文亦復不同。蓋余之所辨，特亦孟子之所謂求知其人，而追論其世。作意不同，斯方法亦不得不隨而

變也。昔宋儒歐陽修，疑易傳，疑河圖洛書，其語人曰：「余嘗哀夫學者，知守經以篤信，而不知僞說之亂經也。自孔子沒，至今二千歲，有一歐陽修者爲是說；又二千歲，焉知無一人焉與修同其說也。又二千歲，將復有一人焉。然則同者至於三，則後之人不待千歲而有也。六經，非一世之書；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以無終極視數千歲，頃刻耳。」是則余之有待於後者遠矣。老子亦非一世之書；其書固不僞，而說之者多僞。以有僞說，遂成僞書。老子書至今亦逾二千歲矣，至於余而始爲此辨，竊亦有意自比於歐陽。則余說之成爲定論，豈能不遠有待於後人乎？至於漢宋門戶之辨，則固不以厝余懷也。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八月錢穆自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出版說明

淸代乾、嘉諸儒，窮研古經籍，自稱「漢學」，以示別於宋、明理學家言，而稱之曰「宋學」。及道、咸、同、光，下逮民初，乃重興「今古文」之爭：康有爲主今文學，定劉歆爲僞造古文經之罪魁；章炳麟主古文學，乃以劉歆上媲孔子。本書首劉向歆父子年譜，兼闢兩家之謬。次兩漢博士家法考，發明兩漢博士治經分今古文之眞相。三孔子與春秋，闡述公羊家言，亦有符於孔子作春秋之餘緒。最後周官著作時代考，證明周官之確爲僞書，惟其事乃遠始於戰國。自錢先生此書出，而晚淸以來一百年之經學今古文爭論，乃得定讞。而乾、嘉「漢、宋之爭」，亦可由此推斷其無當。故凡治中國經學史，本書乃首當誦習也。

先生是書初編於民國四十七年八月，由香港新亞研究所印行。臺灣初版則發行於六十年八月，由三民書局總經銷。至六十七年七月復由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據原版影印刊行。此次重排，乃據七十八年十一月東大臺三版爲底本，改正原版若干誤植之文字，並對原書之標點符號進行整理，主要爲標出私名號、書名號及增入引號，又兩漢博士家法考、周官著作時代考兩文增列

分節目錄，以便讀者閱讀。其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工作，係由何澤恆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本書共收文四篇：

一、劉向歆父子年譜

二、兩漢博士家法考

三、孔子與春秋

四、周官著作時代考

此四文皆爲兩漢經學之今、古文問題而發。其實此問題僅起於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脅學

術界，幾乎不主楊，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在，而夷求之於兩漢經學之實況，則並無如此所云云也。

蓋清儒治學，始終未脫一門戶之見。其先則爭朱、王，其後則爭漢、宋。其於漢人，先則爭鄭玄、王肅，次復爭西漢、東漢，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而起。其治今文經學者，其先則爭左氏與公羊，其次復爭三家與毛、鄭。其於推尋家法，紬繹墜緒，未爲無功。而縋之愈幽，鑿之益深，流遁而忘反，遂謂前漢古文諸經，盡出劉歆僞造，此則斷斷必無之事也。本書第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卽對此而發。

清季今文學大師凡兩人，曰廖季平與康有爲。康著新學僞經考，專主劉歆僞造古文經之說，而廖季平之今古學考，剔抉益細，謂前漢今文經學十四博士，家法相傳，道一風同，其與古文對立，則一一追溯之於戰國先秦，遂若漢代經學之今古文分野，已遠起於先秦戰國間，而夷考漢博士家法，事實後起，遲在宣帝之世。及其枝分脈散，漫失統紀，歧途亡羊，無所歸宿。不僅無當於先秦之家言，抑且復異於景、武之先師。兩漢書儒林傳，可資證明。本書第二篇兩漢博士家法考，則爲此而作也。夫治經學者，則豈有不讀儒林傳？而終至於昧失本眞而不知，此卽是門戶之見之爲害也。

然一時代之學術，則必其有一時代之共同潮流與其共同精神，此皆出於時代之需要，而莫能自外。逮於時代變，需要衰，乃有新學術繼之代興。若就此尋之，漢儒治經學，不僅今文諸師，同隨此潮流，同抱此精神，卽古文諸師，亦莫不與此潮流精神相應相和，乃始共同形成其爲一時代之學術焉。清儒晚出於兩千載之後，其所處時代，已與漢大異，清儒雖自號其學爲「漢學」，此亦一門戶之號召而已，其於漢學精神，實少發見。本書第三篇孔子與春秋，特於古今經學流變之大體，以及經學與儒家言之離合異同，提絜綱領，窮竟源委，於學術與時代相配合相呼應之處，獨加注意，而漢儒與清學之辨，亦朗若列眉，更無遁形。讀者必於此有悟，乃可以見清學之所建立，乃所以獨自成其爲清學，而未必卽有當於漢儒之眞相也。

清儒主張今文經學者，羣斥古文諸經爲僞書，尤要者則爲周官與左傳。左傳遠有淵源，其書大部分應屬春秋時代之眞實史料，此無可疑者。惟周官之爲晚出僞書，則遠自漢、宋，已多疑辨。然其書果起何代，果與所謂古文經學者具何關係，此終不可以不論。本書第四篇周官著作時代考，卽爲此而發。然貌若辨僞，而旨切存眞，而於後代經師，考禮紛綸，種種誤失，其癥結所在，亦藉此可見。此如大禹治水，先疏源而後可以治委，而門戶之見之無當於治學，亦由此而益顯。蓋不僅於經學中有門戶，卽經學本身，亦一門戶也。苟錮蔽於此門戶之內，則不僅將無由見

此門戶之外，並亦將不知其門戶之所在，與夫其門戶之所由立矣。故知雖爲徵實之學，仍貴乎學者之能脫樊籠而翔寥廓也。

晚清經師，有主今文者，亦有主古文者。主張今文經師之所說，既多不可信。而主張古文諸經師，其說亦同樣不可信，且更見其爲疲軟而無力。此何故？蓋今文古今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學者門戶之偏見，彼輩主張今文，遂爲今文諸經建立門戶，而排斥古文諸經於此門戶之外。而主張古文諸經者，亦卽以今文學家之門戶爲門戶，而不過入主出奴之意見之相異而已。此如盜憎主人，入室操戈，又如隨樂起舞，俯仰由人，則宜乎其所主張之終無以大勝乎今文諸師矣。

本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爲一家。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卽爲史學上之問題，自春秋以下，歷戰國，經秦迄漢，全據歷史記載，就於史學立場，而爲經學顯眞是。遂若有以超出於從來經學專家藩籬壁壘之外，而另闢途徑，別開戶牖，此則本書之所由異夫前人也。

夫治經終不能不通史，卽清儒主張今文經學，龔定菴、魏默深爲先起大師，此兩人亦既就史以論經矣。而康長素、廖季平，其所持論，益侵入歷史範圍。故旁通於史以治經，篳路藍縷啓山林者，其功績正當歸之晚清今文諸師。惟其先以經學上門戶之見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於顚

倒史實而不顧。凡所不合於其所欲建立之門戶者，則胥以僞書僞說斥之。於是不僅羣經有僞，而諸史亦有僞。晚近世疑古辨僞之風，則胥自此啓之。夫史書亦何嘗無僞？然苟非通識達見，先有以廣其心、沉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爲志，而輕追時尚，肆於疑古辨僞，專以蹈隙發覆、標新立異爲自表襮之資，而又雜以門戶意氣之私，則又烏往而能定古書眞僞之眞乎？

本書之所用心，則不在乎排擊清儒說經之非，而重在乎發見古人學術之眞相。亦惟眞相顯，而後僞說可以息，浮辨可以止。誠使此書能於學術界有貢獻，則實不盡於爲經學上之今古文問題持平論、作調人，而更要在其於古人之學術思想有其探原抉微、鈎沉闡晦之一得。讀吾書者，亦必先自破棄學術上一切門戶之成見，乃始有以體會於本書之所欲闡述也。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八月二十日錢穆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宋明理學概述　出版說明

中國思想史上，兩漢以後，儒學漸微，莊、老代興，而佛學東來，遞興日盛。南北朝、隋、唐，遂爲佛學之全盛時期。隋唐時有天臺、華嚴、禪三宗之佛學中國化，而唐末、五代，佛學則幾全歸入禪宗。然盛極轉衰，繼之則宋學之崛起，而爲新儒學之復興，另闢新局。宋初諸儒，其議論識見、精神意氣，有跨漢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轉趨精微，遂爲宋明理學開山。本書自宋學之興起，下迄晚明遺老，分五十六目，將此六百年間理學發展衍變之跡，溯源窮流，作簡明扼要之敍述。錢先生別有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其第（五）、（六）、（七）三單元，並涉此一時期學術，可與本書互相發明。又先生撰著本書前，先撰中國思想史一書，對宋明理學亦有提綱挈領之論述，而其書通全部思想史著眼，與本書專述宋明者立旨各有所重。又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適與本書年代相啣接。讀本書者，宜與上述諸書並觀互參。

先生之撰是書，乃緣於民國三十九年冬，自香港赴臺北，應張曉峯先生之約，允寫中國思想史及本書。返港後，先撰就思想史，繼撰本書。自四十一年十月屬稿，越年而成。於四十二年六

月由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初版，收入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第一輯中。六十五年八月，先生重加校閱，特於明代王學部分，案語闡釋略有改定，交由臺灣學生書局重排印行。學生書局版初刊於六十六年四月；七十三年二月再版，對初版誤字重加校正。此次重排，即以學生再版爲底本，除再改正若干誤植文字外，並增入私名號、書名號等，以便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陳仁華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猶憶幼年入小學，無錫顧子重先生授國文。一日薄暮，先生舉酒微酌，諸學童環集案頭。余最稚，方十二歲。先生忽撫余頂，告諸童曰：「此兒文氣浩暢，將來可學韓文公，汝輩弗及也。」諸童競問：「韓文公何如人？」顧先生曰：「韓文公，唐代人，文起八代之衰，爲唐宋八大家鼻

祖。」」余懵無知，然自是時憶韓文公其人。越兩載，入中學，遂窺韓文，旁及柳、歐諸家，因是而得見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及曾滌生經史百家雜鈔。民國元年，余十八歲，以家貧輟學，亦爲鄉里小學師。既失師友，孤陋自負，以爲天下學術，無踰乎姚、曾二氏也。同校秦君仲立，年近五十，亦嗜姚、曾書，與余爲忘年交。一日，忽問余：「吾鄉浦二田先生，有古文眉詮，亦亘著，顧治古文者獨稱姚、曾，不及浦。同是選鈔古文，其高下得失何在？」余請問，秦君曰：「我固不知，故舉以問君耳。」嗣是遂知留心於文章分類選纂之義法。因念非讀諸家全集，終不足以窺姚、曾取捨之標的，遂決意先讀唐宋八家。韓、柳方畢，繼及歐、王。讀臨川集論議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選錄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韓文公所謂「因文見道」者，其道別有在。於是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遂看傳習錄、近思錄及黃、全兩學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經，治先秦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訂訓詁。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爲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顧余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矱，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

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眞，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顧三十以後，雖亦粗有撰述，終於宋明理學，未敢輕有所論著。偶及者，惟民國十七年寫國學概論，十九年寫王守仁一小册，兩書而已。平居於兩學案最所潛心，而常念所見未切，所悟未深，輕率妄談，不僅獲罪於前儒，亦且貽害於當代。故雖私奉以爲潛修之準繩，而未敢形之筆墨，爲著作之題材也。民國三十三年春，在成都華西壩，患胃潰瘍甚劇，樓居數月，足不履平地，時時偃臥樓廊，讀朱子語類一百三十卷，未敢遺忽一字，歷春至夏始竟。自覺於宋明理學，又薄有長進。是年夏，避暑灌縣靈巖山，向寺僧借指月錄，山居兩月，竟體細翫，於是遂通禪學；因之於宋明儒所論，續有窺悟。病中半歲，盡屏人事，心氣平澹，聰明凝聚，自幸晚年，重獲新知。民國三十七年冬，在江南大學，赤氛方熾，濱居太湖，注莊子，感觸時變，益多會心。三十八年再度流亡，去歲寫中國思想史，今年續成此書。此皆十年來大病大亂中所得。雖自問智慮短淺，修養工疏，而寢饋宋明理學，前後已逾三十載。聊示學者以門徑，雖或詮釋未當，衡評失理，當可見諒於古人，見諒於來者。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創始屬草，越年，書既竟，因拉雜述其所感以爲序。

中華民國四十二年二月十日錢穆識於九龍新亞書院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七年春，錢賓四先生罹眼疾，嗣後雙目模糊，不能康復，然仍講學著述不輟。七十年秋至翌年之夏，爲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研究生講授周子通書及近思錄，隨講隨作劄記。又其時臺北故宮博物院影印元劉因所編朱子四書集義精要，有線裝本，字體甚大，先生勉能閱讀，讀而有得，亦作爲劄記。因合編爲本書，七十二年十月交由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又有同時期所撰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共四文，亦以附錄於本書之後。至七十七年重編國史新論，乃將論士兩篇改隸該書，故東大圖書公司七十八年三月增訂新版之國史新論，亦有此二文。今編爲全集，仍遵先生重編之意，刪去此兩篇。其餘兩篇，亦以類相從，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移入本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五）；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則移入丙編文化學大義。

此次重排，據原版爲底本，改正若干誤植文字，並對標點符號進行整理。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以方便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恐不免仍有錯誤疏漏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指

正。

本書之整理，係由陳仁華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余自八十後，雙目模糊，已不能再讀書，但亦不忘時有所撰述。民國七十年之秋，迄於七十一年之夏，爲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諸生開講周濂溪易通書及朱子、呂東萊所合編之近思錄。隨講隨作劄記。又元代劉因所編朱子四書集義精要一書，字體大，略能誦讀，亦寫爲劄記。合編爲理學三書隨劄。於余舊撰宋明理學概述，及所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自宋以下有關理學諸篇，以及朱子新學案一書，或有重複義，或有新出義，讀者合而觀之，亦可見余對理學見解之一斑。

余又同時有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上下兩篇，亦附編於本書之後。竊謂自戰國以來，中國社會特有士，乃中國傳統文化一大特徵。兩漢以來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學，皆士也。即道、釋

兩家中亦多士。明於其所以爲士，乃知其所以爲學矣。亦合而觀之，乃庶知中國學術之大統。再以會合之於中國歷代之史實，則知凡學之成體，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爲學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則必憑史實而衡定之。又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一文，爲余應美國在夏威夷召開世界朱子哲學會議之邀，未克出席而作。時爲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又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一文，爲余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學術講演之邀而作。時爲民國七十二年四月。此兩文亦並附於後。是爲序。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夏錢穆識於臺北士林之外雙溪時爲八十九年之誕辰

陽明學述要　出版說明

本書原名王守仁，乃錢賓四先生民國十七年春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邀而作，收入該館所編萬有文庫中，初版於十九年十月。是書雖篇幅不大，然述王學則溯自宋學以來，至王學本身，乃至王學之流傳，其大綱大節，實已提揭無遺。先生講明王學，尤特提醒讀者「脫棄訓詁和條理的眼光，直透大義，反向自心」，洵可謂能得王學「事上磨鍊」之著精神處者。

逮民國四十三年十月，先生將原書略加改定，易名陽明學述要，交由臺北正中書局於四十四年三月再版。此次重排，即據正中版爲底本，除改正原版若干誤植文字及調整若干標點符號外，內容不作更動。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而錯誤疏漏，料將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陳仁華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講理學最忌的是搬弄幾個性理上的字面，作訓詁條理的工夫，卻全不得其人精神之所在。次之則爭道統，立門戶。尤其是講王學，上述的伎倆，更是使不得。王學雖說是簡易直捷，他的簡易直捷，還從深細曲折處來。這是一本四五萬字的小册子，若要把王學的深細曲折處一一剖示，自所不能；但王學之眞著精神處，亦已扼要地顯露。讀者須脫棄訓詁和條理的眼光，直透大義，反向自心，則自無不豁然解悟。爲要指點爭道統、鬧門戶的無聊，在起首增了兩章，在結袇又添了一章，講及北宋以下理學諸儒的努力和見地，直到陽明末後，以及淸儒。雖則粗略已極，對於王學眞切的認識上，決非無補。至於陽明一生事業，因本書體裁所限，不得不格外地從略。在第三、第四和第八章裏，雖也敍到個大概，到底有不完不備之嫌。陽明講學，偏重實行，事上磨練，是其著精神處。講王學的人，自然不可不深切注意於陽明一生的事業。讀者能把陽明全書裏詳細的年譜和近人余重燿的陽明先生傳纂仔細一讀，庶無缺憾。本書所引各家原文，均據黃氏父子兩學案；別有稱舉，則隨條附注，此不備列。著者在人事紛拏之際，草促成書，未能精心結

撰。本所欲言，十不得一，而氣脈文理亦先後有殊。此則深所自疚。其紕繆處，以待大雅之教正。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無錫錢穆識。

朱子新學案　出版說明

朱子爲繼孔子以後，近古儒學之集大成者，亦爲八百年來中國學術之重心人物。然其著作卷帙浩繁，承學之士每苦於不易遍讀；而文集、語類之書，亦往往難於通體貫串以觀，得其旨要。全謝山宋元學案，以晦翁一案爲最要，然亦以此一案爲最嫌疏略，蓋即緣朱子原書之難理故也。錢賓四先生朱子新學案之作，即爲彌補此一學術史之闕憾而作。自其書出，而後研朱者得津逮其委曲之細；而初學之士，亦可假其朱子學提綱以略窺朱學之梗概。故此書可謂是研究宋明理學，以至研究中國學術史必讀之經典著作。至其本朱以述朱，上承固有學案體例之精神，而復將朱子之學置諸中國文化之全體系與學術思想之發展史中闡發，亦確乎爲學案著作啟一新頁。

先生之著作是書，發軔於民國五十三夏。時先生初辭卸香港新亞書院院長職務，即著手閱讀朱子大全集。其自述撰作之過程，云：「余之撰述朱子新學案，自五十五年二月，迄於五十八年之十一月，先後撰寫歷四年。又翌年續寫朱子學提綱一小册，冠其首。共五年。其先讀大全集，讀語類，鈔撮筆記，作準備工夫，亦歷兩年。」是其書之撰寫先後歷五年，合其前之準備作業計

之，則凡七年。然先生猶謂「苟非辭去新亞職務，此書亦終難寫出」，蓋近一百五十萬言之鉅製，體大思精，非長時間之專力駕馭，殆難底於成也。

是書初版於民國六十年九月，先生在臺北自印，交由三民書局總經銷。全書分五册，其首册之前半，即爲朱子學提綱。七十一年四月再版發行，曾改正若干初版時排印之錯誤。此次整理重印，即根據再版本，主要增入引號、私名號、書名號等，以方便讀者閱讀。全書約四、五千條引文，大部分皆重加核對覆校。

先生此書，在徵引朱子原著時多已詳細注明出處；獨立引文尤不輕易改動字句；意引之處極少。今經核校，於若干引文，先生所爲刪節，以及在節引時所添加主詞或補足語氣之處，悉仍其舊；至徵引時所改正原書之誤字，亦仍依所改。在語類之引文中，約有十餘處將論旨相關之兩條記錄剪裁合併成一條者，今以「*」記號標識。其他手民誤植者，則逕行更正。如非必要，一般不另出校說明。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係由閻鴻中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例言

此書撰述發意，在民國五十三年夏新亞謝事之後。是年七月始，迄翌年五月，先讀朱子文集百二十一卷。七月赴吉隆坡，講學於馬來亞大學，迄翌年二月返香港，續讀語類百四十卷。皆隨讀隨摘其要旨，粗加類別，凡得三千餘條。是年三月，乃就所摘類別要旨分題屬草，再絡續參讀其他各籍。嗣於五十六年十月遷居臺北，賃屋市區。越年七月，始遷外雙溪新屋。至五十八年十一月，全稿完。五十九年又重撰提綱一篇冠之書端。翌年六十年四月，排印畢事。

此書初擬分「思想」、「學術」及「行事」三大部分。嗣因「思想」、「學術」兩部篇幅已多；「行事」部分，有王白田年譜，復得夏炘景紫堂集爲之補闕拾遺，余所能越出兩氏者不多，因不復筆。

「思想」之部，又分理氣與心性爲兩部分。

「學術」之部，分經、史、文學爲三部分。經學中並分易、詩、書、春秋、禮、四書諸題。又於三部外添附校勘、考據、辨僞諸篇，並游藝格物之學一篇。

介乎「思想」、「學術」兩部之間者，又分朱子評述濂溪、橫渠、二程諸篇，下逮評程門、評五峯、評浙學，又別著朱陸異同三篇、闢禪學兩篇等，專以發明朱子在當時理學界中之地位。

本書專就朱子原書敍述朱子，而於文集、語類稱引最詳。期於讀者誦此書後，苟非專意研治朱學，即可不再繙閱文集、語類之全部。

其他朱子自著書，如論孟集注、學庸章句，如易本義、詩集傳之類，學者貴能尋讀原書，本書特少稱引。

又如四書或問等，雖是朱子書，而非其定著，又流傳較少，故本書稱引，轉較集注、章句稍詳。

本書敍述朱子，尤重在指出其思想學術之與年轉進處。在每一分題下，並不專重其最後所歸之結論，而必追溯其前後首尾往復之演變。

前人治朱子，每過分重視其與象山之異同。但鵝湖之會，已在朱子成學之後。朱陸相爭，更是後事。固是兩家顯有異同，但若專就此方而研治朱子，則範圍已狹，又漫失淵源，決不足以見朱子之精神。

學者困於門戶之見，治理學則必言程朱、陸王。朱子於二程，固所崇重，亦非株守。程朱之

間亦有相異。本書隨處指出，不一而足。

朱子與二程有異，不僅在明道，亦復在伊川。更在程門，朱子多有糾彈。道南一脈四代相傳之說，決不足以見朱學之眞相。然朱子於延平，則實有薪火之傳。本書皆本朱子自己言說加以剖辨闡述，與徒引後人說者大不相同。

學者又有經學、理學乃及漢學、宋學之辨，此等皆不免陷入門戶。朱子學，廣大精深，無所不包，亦無所不透，斷非陷入門戶者所能窺究。本書意在破門戶，讀者幸勿以護門戶視之。

治理學者，必治黃、全兩學案。梨洲明儒學案，雖主王學門戶，然不爲病。因述明儒，固當奉王學爲宗主也。謝山宋元學案，考覈有功，而識斷多差。上承梨洲父子，見解已多爲門戶所蔽。又謝山與李穆堂相交，受其濡染，門戶意氣，未能盡脫。本書隨宜駁正謝山學案處甚多。因宋元學案，學者必多窺涉，加以指駁，亦不得已。

王白田朱子年譜，近世學人多稱之，然亦勤於考覈而拙於體會。並亦爲門戶所蔽，必欲申朱抑陸，遇朱子近似象山處，即諱避不迭，遂失朱子精神。學思未透深處，考事乃亦多誤。本書甚多援用王譜，而加駁正者亦不少。因讀本書必讀王譜，凡有駁正亦不得已。

本書主要在一本朱子原書稱述朱子。朱子歿世迄今踰七百年，著作議論涉及朱子者何限。本

書雖間有稱引，要是方便所及，既不願於述朱諸人中別標宗主，更不願於諍朱者故加排斥。其間如陽明朱子晚年定論，此乃討論朱子思想一重要節目，本書屢有提及，亦非意存抑揚。要之在明眞相，不在爭門戶。

朱子學範圍廣大，涵義精深，後人尠能兼涉而都通。本書作者自問所知淺狹，不敢強不知以爲知。然而百官之美，宮室之富，意存指述，非爲誇大。讀者固不當拈小節，於前世大賢輕肆譏呵；亦勿謂本書有崇揚，無抨彈，遂疑其亦落在門戶中，知進不知出也。

本書分題命篇，亦爲便宜之計。讀者固當分篇研讀，亦當會通全書，綜合以覩。庶可窺見朱子之一家言，而不滯於枝節，或流於徒資貪多靡之病。

本書因篇幅已鉅，恐讀者驟窺難入；又本書惟主就朱子述朱子，實事求是，力避枝蔓，而朱子乃吾國學術史上中古唯一偉人，若不稍爲發明，恐讀者驟不得其承先啟後之所在。因於本書前重加提綱一篇。讀者當先讀提綱，然後再進讀全書。又當於通讀全書後再重讀提綱，庶於朱子學術思想在中國全部學術思想史上之地位更易認識。

本書屬稿之最先三年，曾獲美國哈佛燕京社研究補助金。在付印前，又得其印刷補助費。例當書此誌謝。

本書最後一次校字，由及門何君佑森任之。又代爲索引一編附刊書末，藉便讀者之繙檢。亦當附此誌謝。

本書自創始以潰於成，前後凡六年。中間自開始落筆迄於完稿亦達四年。然六年間往返港臺者共四次，遠遊馬來亞一次。遷宅移居又兩次。來臺後各方邀演講，講稿整理出版者三種。又於赴馬來亞前攖眼疾，動手術，閉目廢視者逾月。人事紛乘，兼以疾病，此稿作輟靡常。最後付排，自任校字，始獲通體循誦一過。遇重複處稍加删薙，其他斟酌改動，未能盡臻自愜。以日校萬字爲度，體力不任，血壓屢升。校稿垂畢，十二指腸潰瘍舊病復發。既以學殖之荒劣，重增衰邁之遽至，所能發明前人精意偉業，實恐有限。惟既竭吾心，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私所嚮慕，時加讚嘆，則情見乎辭，未敢掩匿。讀吾書者，幸其諒之。

中華民國六十年三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出版說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往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課時所編撰之講義。民國二十年秋，先生初任教於北大，除校方所規定擔任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兩課外，先生自選定兼任此課。此一課程，其前梁任公曾在清華研究所開授，編有講義。任公既卒，北平書肆遂印其書。先生嘗購得之，以意見相異，因在北大亦特開此課，並亦自編講義。時北大講義室分講印發，隨編隨印，外界有知其事者，往往向北大預定，先睹而羣相討論。蓋其時任公卒後未久，先生續開此課，而取徑與任公迥殊，故特受注意也。翌年，先生改開他課；至第三年，仍開此課，以續完其編。前後五載，遂成此書。二十六年五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是書述有清一代學術，遠追溯於兩宋，近討源於晚明東林，分十四章，以人爲綱，自黃梨洲以迄康長素，跡其師承，踵其衍變，然後三百年間學術發展遞嬗之詳，如網在綱，粲然畢具。書末復有附表一通，於諸學者生卒年月、仕宦出處、師友交遊、著作先後，爬羅抉剔，一一備載。觀此一表，必可得知人論世之助，對書中敍述，亦有更多啟發。

先生既撰此書，歷年續撰有與此一時期相關之論文多篇，後結集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單元中。讀本書者，宜並讀該書以爲扶翼。凡欲研究近代學術之流變與夫當代學風之淵源者，皆可於此二書取資焉。

本書在民國五十四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依原版影印發行臺初版，至七十九年十月，二十餘年間，版凡十刷。是其書風行數十年，而未嘗重排。今即以原版爲底本整理，盡量核對引文，改正若干誤植文字；部分引文爲先生所節引者，不復改動。又酌增若干引號，或以標引文之起訖，或鉤出特定語詞，要皆所以顯豁文意，以便讀者閱讀。原書所標之重點符號與書眉提綱，悉保留原貌。引文則換排楷體鉛字，以清眉目。原書目次但有章名，無分目，今依內文細目增入，俾便檢索。附表原無斷句，今亦加入標點。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惟恐難免錯漏，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何澤恆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民國二十年秋，余始任教國立北京大學，爲諸生講近三百年學術史，因撮記要指備誦覽。迄今五載，粗成首尾。

竊謂近代學者每分漢宋疆域，不知宋學，則亦不能知漢學，更無以平漢宋之是非，故先之以引論，略述兩宋學術概要。又以宋學重經世明道，其極必推之於議政，故繼之以東林。明清之際，諸家治學，尚多東林遺緒。梨洲嗣軌陽明，船山接迹橫渠，亭林於心性不喜深談，習齋則兼斥宋明，然皆有聞於宋明之緒論者也。不忘種姓，有志經世，皆確乎成其爲故國之遺老，與乾嘉之學，精氣夐絕焉。

抑余治諸家書，猶多餘憾。亭林最堅卓，顧其辭薦也，則曰：「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二甥既爲清顯宦，弟子潘次耕，親兄備受慘毒，亦俯首爲清臣。梨洲晚節多可議。晚村獨持夷夏之辨不變，然余讀其遺訓手迹，縷縷數百言，皆棺衾附身事耳，獨曰：「子孫雖貴顯，不許於家中演戲」，則無怪後人之入翰苑也。船山於諸家中最晦，其子則以時文名。習齋力唱經世

幹濟，恕谷乃爲游幕。徐狷石所謂「遺民不世襲」，而諸老治學之風乃不得不變。繼之以潛邱、西河，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考據學也。復繼之以穆堂、謝山，此國亡不復後之所謂義理學也。彼其所以與晚明諸遺老異者，豈不在朝廷哉！豈不在朝廷之刀鋸鼎鑊、富貴利達哉！

乾隆御製書程頤論經筵劄子後有云：「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乎？使爲人君者，但深居高處，自修其德，惟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已不過問。幸而所用若韓、范，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設不幸而所用若王、呂，天下豈有不亂者！此不可也。且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夫不爲相則爲師，得君行道，以天下爲己任，此宋明學者幟志也。今曰「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尤大不可」，無怪乾嘉學術一趨訓詁考訂，以古書爲消遣神明之林囿矣。於此而趨風氣，趁時局，則治漢學者必以詆宋學爲門面，而戴東原氏爲其魁傑。起而糾謬繩偏，則有章實齋，顧曰：「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然爲之君者既不許其以天下治亂爲己任，充實齋論學之所至，亦適至於游幕教讀而止，烏足以上媲王介甫，程叔子之萬一耶！

嘉道之際，在上之壓力已衰，而在下之衰運亦見。漢學家正統如阮伯元、焦里堂、凌次仲皆途窮將變之候也。起而變之者，始於議政事，繼以論風俗，終於思人才，極於正學術，則龔定庵、曾滌生、陳蘭甫其選也。然而皆無以大變乎其舊，則亦無以挽世運於復隆。南海康氏起，大

擊疾呼，學術有不暇正，人才有不暇論，風俗有不暇辨，一切務以變法改制爲救亡，而託附之於保皇。是復欲以天下治亂爲己任，而又不能使其君深居高處而不過問，則徒爲兩敗之道也。

嘗試論之。中華之受制於異族，有三期焉：一曰五胡元魏，再曰遼金元，三則滿清。當元嘉之末運，一時名流勝望，相繼南遷，其留而在北者，猶守舊轍，務經學，上承兩漢之遺，皆南士清玄之所鄙吐而不道者。然而胡姓之貴，受其薰陶，緜綴不絕，卒成周隋之治，下開唐基，此一期也。遼金用漢人，僅保所掠而已。元人挾其武彊，最鄙漢化爲不足尊，其治無可言。時則中華之文運幾輟，然譬如嚴冬雪虐，枝葉雖辭，根荄無傷也。故明人之學，猶足繼宋而起。滿清最狡險，入室操戈，深知中華學術深淺而自以利害爲之擇，從我者尊，逆我者賤，治學者皆不敢以天下治亂爲心，而相率逃於故紙叢碎中，其爲人高下深淺不一，而皆足以壞學術、毀風俗而賊人才。故以玄燁、胤禛、弘曆踞其上，則幸而差安，以顒琰、旻寧、奕詝、載淳、載湉爲之主，則終不免於大亂。而說者猶謂滿族入關，卒爲我所同化，政權雖移，中華之文運依然，誠淺之乎其爲論也。

今日者，清社雖屋，厲階未去，言政則一以西國爲準繩，不問其與我國情政俗相洽否也。扞格而難通，則激而主「全盤西化」，以盡變故常爲快。至於風俗之流失，人心之陷溺，官方士習

之日汙日下，則以爲自古而固然，不以厝懷。言學則仍守故紙叢碎爲博實。苟有唱風教，崇師化，辨心術，覈人才，不忘我故以求通之人倫政事，持論稍稍近宋明，則側目卻步，指爲非類，其不詆訶而揶揄之，爲賢矣！

斯編初講，正值「九一八事變」驟起。五載以來，身處故都，不啻邊塞，大難目擊，別有會心。司馬氏表六國事，曰：「近己則俗變相類」，是書所論，可謂近己矣。豈敢進退前人，自適己意？亦將以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求以合之當世，備一家之言。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蓋有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不必盡當於著作之先例者。知我罪我，所不敢問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九日自序於北平之未學齋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　出版說明

本書原係錢賓四先生彙集其六十年來之散篇論文，有關討論中國歷代學術思想之部分，而未收入其他專書之內者。原書分爲三編，共八單元：上編（一）、（二），自上古迄先秦；中編（三）、（四），自秦、漢迄五代；下編（五）至（八），自宋迄清。每單元皆分册刊行。其首册於民國六十五年六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初版，逮最後第八册之初版，已至六十九年三月；前後歷時四年。而自六十七年春，先生患眼疾，雙目失明不能識字，幸是書已大體編就，所收論文亦多經修訂。全書版行，下迄先生之辭世，又歷十載。其間陸續搜得不少舊文，先生亦擬分別增編入本書相關各册中。又是書初編，先生原擬將有關討論民國以來諸篇彙爲續集，以中道病作而輟，故初版乃至清末第八册而止。今謹遵先生遺命，將後得之各篇論文，按其時代、內容，增編入原書之各册中。並另將民國以來諸篇整編爲（九）、（一〇）兩單元。有關民國孫、蔣二公諸文，多涉當前之思想文化者，先生晚年已收集數篇，意欲收入本書。今又續得若干篇。以其爲數頗多，因特作爲第（一〇）單元，與其論近代國運與思想文化諸篇並編。凡新增各篇，於各册目

錄中加＊號註明；最後兩單元則以全屬新編，不另標註。此諸篇悉搜得於先生身後，未經先生重讀修訂，故內容一仍其舊。

原第一册以春秋爲斷，共收文七篇。其中四篇所主要討論者爲周公，對此下中國學術思想文化傳統，有莫大之影響。並討論及於詩、書、易三經，揭示幾許極重大之問題。首兩篇討論中國上古之農業經濟情況。末一篇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討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觀念。此篇原稿分上下兩篇，分撰於四十五、四十六年，初版目錄合爲一篇；今依原稿，仍分上下。新增唐虞禪讓說釋疑、鯀的異聞、論秦以前的封建制度三篇，總爲十一篇。

原第二册初版於六十六年二月，收論文二十篇，上起孔子，下迄秦代，於儒、道、墨、名四家思想，其內容之異同出入，其年代之先後遞變，均有精確之分析、詳密之考訂。對於古今聚訟之問題，一一以獨特之見解，與以圓通之論定。尤其如易傳與小戴禮記諸篇之融會儒、道，大學、中庸兩篇中未經闡發之新義，墨辯諸篇與惠施、公孫龍之間之派別分歧，莫不深入淺出，獨闢奇境。並於哲學思想以外，引申及於社會史及文學史。分別讀之，各樹一義；會合而觀，對於先秦百家，匯成一體；誠爲治該時代之學術思想者所不可不讀者。其中惠施歷物、惠學鉤沉、公孫龍子新解、公孫龍七說、辯者言、名墨訾應辨六篇，原皆屬先生惠施公孫龍專書中之篇章。此

書抗戰前曾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在臺未再梓行，坊間已未易得見，故先生抽出此六篇，重加增訂，收入本册。今全集既將此書重排付梓，則此六篇之文自應還歸原書。目錄中則保留六篇篇目，俾讀者仍可考見原書單行之面貌。今再補入孟子學大義述、與繆彥威論戰國秦漢間新儒家（附繆鉞與錢賓四先生書）、關於中庸新義之再申辯、中庸之明與誠、思室讀書記、再論大學格物義、大學格物新義、古史辨第四册序、評譚著墨經易解（附答譚戒甫先生書）、與顧頡剛童書業論墨子姓氏辨書、道家思想與西方安那其主義、斯多噶派與中庸、伊壁鳩魯與莊子等十三篇；共收文三十三篇（含存目之六篇）。

原第三册初版於六十六年七月，上起兩漢，下迄南北朝，凡得文十二篇。先生論學，有關兩漢經學者，重要部分，已收入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一書中。有關魏晉之際之思想轉變，一部分收入莊老通辨，一部分收入中國思想史諸書中。有關史學方面者，一部分收入中國史學名著中。本册所收，堪相參證。本册重要部分，一在論本時代之文學，以建安新文學爲其轉捩點，溯源窮流，而以昭明文選爲其主要之題材。一在論東漢以下之門第，舉凡當時門第在政治社會上，在學術思想上，在詩文藝術上，在有關中國文化傳統之種種關係上，莫不有所闡述，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爲考論此一時代之歷史實況者所不可不知。其他如根據陸賈新語，推求秦漢之際之學術；根

據稀見材料，編爲葛洪年譜，以揭破神仙家言之傳說。要之隨篇陳義，語不虛發，新見絡繹，深值讀者之尋究。今增入評日人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漢代之散文、魏晉文學、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東漢以下宗教思想之復活、由老莊思想到佛教、佛教之傳入與道佛之爭、大乘佛法與竺道生、佛教之中國化、佛學傳入對中國思想界之影響、縱論南北朝隋唐的儒學等十二篇；總爲二十四篇。中國學術思想之分期一篇，本係綜論性論文，惟以其與下數篇同爲先生民國三十四、五年間在昆明一系列討論中國思想之著作，論旨相屬，不宜割裂，因一併收入本編，亦以保留先生當年貫串論述之原貌。

原第四冊初版於六十七年一月，專關隋唐之部，共收論文十六篇。中國全部學術思想史，隋唐爲其蜂腰階段。兩漢後，儒學衰微，莊、老代興，而佛學東來，遞興日盛。迄於隋唐，幸有天台、禪、華嚴之佛學中國化，而禪之一宗，更爲特出。本冊討論王通、韓愈之部共得四篇，其他四分之三，全屬禪宗部分，主要尤在剖辨六祖慧能與神會之異同，其次乃屬禪宗與此下理學之關係。各篇並以考據方法來陳述思想，即是以歷史演變來闡發思想史承先啟後之關鍵所在。語必有證，實事求是，不尚空論，而義皆特出；讀此一編，乃可上溯魏、晉，下究宋、明，明白得全部中國學術思想轉變之大關捩處。今增入略述有關六祖壇經之眞僞問題、再論關於壇經眞僞問題、

唐宋時代的中國文化、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宗四篇；總爲二十篇。又黑格爾辯證法大意、黑格爾思想之根本錯誤兩篇本係先生抗戰時期研讀黑格爾書所爲札記，茲亦附錄於黑格爾辯證法與中國禪宗一文之後，俾參證焉。

原第五冊初版於六十七年七月，共收文十四篇，專屬兩宋。北宋諸儒，其議論識見、精神意氣，有跨漢唐而上追先秦之概。本書既加抉發，尤於釋氏中剔出契嵩鐔津一集，尤見夏蓮秋菊，其品質相異，有隨其氣候水土而不爽如是者。本冊舉濂溪、康節，南北相提並論，尤可探學風轉移之消息。於二程異同、程朱與孔孟異同，抉發尤精細，衡論尤持平。治兩宋學者，於此冊幸勿易視之。今又補入論宋代相權、論慶曆熙寧之兩次變政、王荊公的哲學思想、明道溫公對新法（含論明道與新法、論荊公溫公理財見解之異同兩篇）、論關於荊公傳說之聞鵑辨姦兩案、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等六篇；合計二十篇。

原第六冊初版於六十七年十一月，專關宋代以後之學術，含有元一代，以迄明初，共收文七篇。其黃東發、王深寧、吳草廬三家學述，敍朱學之流衍，可見元初學術思想之大概。先生既撰朱子新學案，本擬續撰此下述朱諸篇，集爲「研朱餘瀋」一書。此三篇原即其中之部分。後以成書已多，爲便觀省，遂將「研朱」諸篇幷入本集，不另成書。此外，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正、

續篇，舉諸家詩文，以證明初從龍諸臣，或心存韃庭，或意蔑新朝，怯於進而勇於退，殊未見其揭揚夷夏之辨以爲民族革命之號召。先生由文論史，抉隱發微，道前賢所未嘗道，爲治吾國史者所不可不知。他如金元統治下之新道教，述當時道教之新趨，以明古今之變。理學與藝術一文，則發明學術思想與藝術之相互關係，專舉繪畫一事，元代四大家亦在其內，故附此編，可爲研治吾國藝術史者啟一新途。此單元未有新增，一仍其舊。

原第七册初版於六十八年七月，共收文十七篇，以討論有明一代之理學思想爲主，尤以陽明一派爲中心。特於王龍谿、羅念菴兩人平日交往言論異同，詳加闡申，以見浙中、江右王門之歧趨所在。記公安三袁論學一篇，從其學術思想之基本處發論，則其文學上成就之利弊得失、高下淺深，亦可言外得之。讀劉蕺山集所收材料，多爲梨洲遺棄不錄者，從此可深窺梨洲所爲學案之偏失處。朱子學流衍韓國考一文，詳論李退溪、李栗谷、宋尤菴、韓南塘四人。宋尤菴以前皆在明代，惟韓南塘已及清初，可見宋、明理學成就影響遠及韓國以至日本之一斑。今增編入陳白沙先生五百三十四年誕辰紀念會講詞、晚明學術、王門之講會、現代對退溪學之再認識四篇；合共二十一篇。

原第八册初版於六十九年三月，收文二十六篇，皆屬有清一代。先生於民國二十六年早有中

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此册各稿，多在其後。前書所重偏在學術，以乾、嘉經學爲中心；此册所重在思想，極多爲前書所未及者。最後康長素、章太炎所取材料，多涉及民國時代，有意考論民國以來八十年之學術思想者，窮源溯本，此兩人更爲不可忽。而中國四千年來學術思想傳統演變之所及，承先啟後，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誠爲有志於此者所當研玩。其中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一篇，經先生修訂，易名爲略說乾嘉清儒思想。今復增入述清初諸儒之學、余君英時方以智晚節考序、王船山學說、跋車雙亭刊呂子評語、記呂晚村詩集中涉及黃梨洲語、跋黃汝成日知錄集釋、讀鄭獻甫補學軒散文集、朱鼎甫學述、略記清代研究竹書紀年諸家、漢學與宋學、四庫提要與漢宋門戶等十一篇。又增收夏定域「讀錢賓四先生康熙丙午本方輿紀要跋」後語，附列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之後。先生於抗戰期間，曾編撰清儒學案一書，其原稿不幸於勝利後沉沒長江中，但存序目一篇；詳情見本册先生原序。清儒學案後跋爲先生所補寫者，述其因緣。摘鈔一篇，則爲柳詒徵先生當年在四川所摘錄，記入其日記中者。今學案一書已佚，其可供讀者想像其彷佛者，除原序目一篇外，又幸得此篇。吉光片羽，彌可珍寶，故與後跋同補入爲清儒學案序目之附錄。本册收文共三十七篇。

今新編第（九）單元，得二十五篇（另附錄兩篇）；第（一〇）單元，得三十三篇（另附錄

兩篇）。前者較重在文化思想，後者較關政治國運，然義皆相貫，要爲考鏡當今學術思想、人物風氣所當參證者。

原版八冊，共收文一一九篇，今增入凡五十三篇（不含附錄七篇），合計一七三篇（首單元多分一篇）。連新編兩單元，合增一一一篇，全書總爲二三一篇（不含附錄十五篇），都兩百萬言。分爲六冊，其內容分配如下：

第一冊：論叢（一）、（二）。

第二冊：論叢（三）、（四）。

第三冊：論叢（五）、（六）。

第四冊：論叢（七）。

第五冊：論叢（八）。

第六冊：論叢（九）、（一〇）。

其原收各篇，悉據東大圖書公司臺初版爲底本。此次重排，除改正原版若干誤植之錯字，並對原書之標點符號進行整理，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若干引號，以顯豁文意，方便讀者閱讀。新

增諸篇亦依同一版式排入。整理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各單元之整理人名單如下：

論叢（一）：李訓詳先生。
論叢（二）：張蓓蓓女士。
論叢（三）：張蓓蓓女士。
論叢（四）：辛意雲先生。
論叢（五）：王仁祥先生。
論叢（六）：李訓詳先生。
論叢（七）：蕭公彥先生。
論叢（八）：王仁祥先生。
論叢（九）：何澤恆先生。
論叢（一〇）：何澤恆先生。

最後第六册之末並附錄本書六册十單元總目，俾便檢索。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國思想史　出版說明

民國三十九年之冬，錢賓四先生自香港赴臺北，時張曉峯先生編纂現代國民基本知識叢書，特約先生撰寫兩種，即本書及宋明理學概述是也。先生返港後，每於夜間燈下，先寫此書，於四十年八月完稿，翌年四十一年十一月由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

本書自春秋之中、晚，下迄現代，分立四十四目，揭出中國歷代主要之思想家及其思想之要點，綱宗犄立，全部中國思想史之主要節目，已在其內。蓋先生著作中與本書可互相闡發者，無慮十數種，既限於篇幅，未能盡其全貌，故但作扼要之提點，以待學者自爲更進一步之研尋。

民國六十六年春，先生重校是書，略作增添改定，交由臺灣學生書局於是年四月重排印行。六十九年學生書局再版，又對原版有所校正。今重排此書，即以學生再版本爲底本整理，主要爲改正若干誤植文字，並加入私名號、書名號等。原書引文未附出處，則盡量查出核對，並予注出，以便讀者檢索。最後孫中山一篇，先生曾以中山思想之新綜析爲題，於民國四十年九月十六日發表於自由中國第五卷第六期，篇首多出一段文字，今據該文補入。其整理工作雖力求愼重，

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王仁祥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西方思想，大體可分三系：一爲宗教。二爲科學。三爲哲學。此三系思想，均以探討眞理爲目標。所謂眞理，則可有兩種看法：一認眞理爲超越而外在，絕對而自存。一認眞理即內在於人生，而僅爲人生中之普遍與共同的。此二看法，各有是處。天地萬物，本先人類而有。天地萬物有天地萬物之理，其時尙無人類，則謂此等眞理超越外在，獨立自存，自無可議。迨既有人類之後，便有內在於人生界之眞理，絡續發現。此僅指其在人生界有普遍性，共同性，決非亦超越人生而外在。然此二項眞理，亦非全相隔絕，抑且互有關涉。人生本從宇宙界來，本在天地萬物中，故人生眞理中必處處涵有宇宙眞理，亦必處處被限制於宇宙眞理中而不能違反與逃避。然就

人生論人生，則人生本身。亦必有其內在之眞理。此二項眞理之分別，本極明顯。然人類思想往往從此分別上發生種種偏差與歧誤。

宗教家認爲有一萬善之上帝，創造天地萬物以及人類。遂認爲人生界種種眞理，皆由上帝而來。故宗教眞理乃爲超越而外在者。科學家不認有此上帝，然抹殺人類與萬物之大區別，以爲天地萬物之理已包括盡人生之理，因此，於天地萬物自然眞理之外不再認有人生眞理之存在。則科學眞理亦爲超越而外在者。宇宙界若無人類，此上帝之理，萬物自然之理，依然存在。則此項眞理，根本不因人類之有無而有無，人生之變動而變動。由此觀念而產生一種向外覓理之態度。宗教與科學所探究之眞理雖不同，此一向外尋覓之態度，則爲兩者之所同。

西方哲學派別尤繁，然或則導源於宗教，或則依傍於科學。我們暫可歸納之爲兩大幹：一主理性。一主經驗。若主理性，試問理性何自來？必謂其屬諸先天。又問理性與人類之關係，則謂理性乃絕對而自存。此卽其淵源宗教之證。其主經驗者，都認經驗由個人與外界天地萬物之接觸因應而來，則經驗所得卽天地萬物外在自然之理。此則不得不依傍科學。然則西方哲學，大體亦向外覓理，其在態度上，仍與宗教、科學一致。

中國思想，有與西方態度極相異處，乃在其不主離開人生界而向外覓理，而認眞理卽內在於

人生界之本身，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共同者而言。此可謂之向內覓理。因此對超越外在之理頗多忽略。不僅宗教、科學不發達。即哲學亦然。若以西方哲學繩律中國思想，縱謂中國並未有純正哲學，亦非苛論。

然眞理確有此兩面，一屬自然，一屬人文。前者須超越人生，向外覓之，後者須卽就人生本身，向內覓之。並當求其界限，明審其交互之相通流，乃始得眞理之大全。

如論宗教，固有一至善創世之上帝否？據科學言，似此非眞理。然宗教信仰，實於人生界有作用，有貢獻。故宗教眞理，縱謂於自然界非眞理，而於人生界則不得謂其全非眞理。換言之，宗教所信仰者縱非眞理。而宗教信仰之本身，則確有眞理寓乎其中。宗教所信仰屬宇宙界，屬超越外在，而宗教信仰之本身，則屬人生界，係普遍內在共同內在之一種人文心理。此種心理之有用而不可毀棄，本身卽成爲人生界一眞理，可不因科學界所發現之自然眞理而推翻。

再言科學，其所發現者固屬眞理，然不屬人生。原子彈可以大量殺人，此乃自然眞理。然人文眞理中並無應該大量殺人之理。不得因科學界發明原子彈，遂認爲殺人須大量殺，而奉之爲人生眞理之新發現，此理甚顯。可見科學發現儘是眞理，而非卽人生眞理。至少科學眞理包括不盡人生眞理，則無可疑難。

然則人類既不能無條件信仰宗教所建立之「體」，亦不能無條件運使科學所發現之「用」。故宗教、科學皆有眞理，而不得謂其各得眞理之全。

依次再言哲學。西方哲學，本意應譯「愛智」。然理智僅占人類心知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則僅由理智所獲得之人生眞理，亦屬人生眞理之一部分而非其全體可知。中國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之最重要點，則在仁智兼盡。智屬哲學範圍，仁則不屬於哲學範圍。因智是理智，而仁則屬於情感。儘可有主張以情感爲重之哲學，而情感本身則不成爲哲學。然情感縱非哲學，卻不得謂非人生。毋寧謂其在人生界之重要，乃更甚於理智。人生眞理應向人生求，不應向哲學求。則西方哲學之屬於純理智純思辨者，仍不能得眞理之全可知。即綜合西方宗教、科學、哲學三系思想之大全，而仍不能得人類所欲探求之眞理之全亦可知。

我們必明得此上所述，纔可回頭來認識中國思想對人類探究眞理之獨特貢獻與其價值之應有分際。中國思想乃主就人生內在之普遍共同部分之眞理而推擴融通及於宇宙界自然界。故中國思想不能形成爲宗教。若謂中國有宗教，此可謂之「人文教」。因其信仰中心仍在人文界，而不在宇宙界。人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此乃中國人文教之信仰中心。由此推擴融通到宇宙界，則盡性可以知天，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可以盡物性而贊天地之化育。盡物性贊化育，須有事於格物窮

理，此已侵入科學範圍。中國非無科學，然中國人之「格物窮理」，則仍主依隨於人文中心之基點而出發，仍回復到人文中心所蘄嚮爲歸宿。雖不明白否認有一絕對超越人生而外在之自然眞理，然就人文眞理言，則必求此自然眞理之與人文眞理相會通相合一，而始奉之爲眞理。故在西方，宗教與科學，爲超越人生而自在之兩對壘，在中國，則爲緊貼人生而添上之兩翅翼。在中國思想中，常抱天人交通、天人合一之觀念。而此宗教之「天」與科學之「天」，在中國思想中亦可交流、可合一，而未見其有嚴格之劃分與衝突。

中國人之探究人生內在眞理，乃卽就人生全體而如實以求。故情感、理智，自始卽平等重視。毋寧於人情更重視。故人情、物理、天心，在中國思想中，常求能一以貫之，成爲三位之一體。西方則以宗教識天心，科學研物理，哲學則仍側重在天心、物理上而忽略了人情。如是則成爲以個人面對外界，卽面對宇宙之局面。其視人羣亦如天地萬物然。毋寧謂是識得天，識得物，乃始識得人。中國思想則其視人也特重，毋寧謂是識得人乃始可以識得天、識得物。在西方觀點，其對此外界，見仁見智，或爲宗教的，或爲科學的。其轉入哲學，則常爲一種個人主義之二元論，其癥結卽在此。中國思想，則認爲天地中有萬物，萬物中有人類，人類中有我。由我而言，我不啻爲人類之中心，人類不啻爲天地萬物之中心。而我之與人羣與物與天，則尋本而言，

渾然一體，既非相對，亦非絕對。最大者在最外圍，最小者占最中心。天地雖大，中心在我。然此決非個人主義。個人主義乃由分離個人與天、物、人羣相對立而產生。然亦決非抹殺個人，因每一個人，皆各自成爲天、物、人羣之中心。個人乃包裹於天、物、人羣之中，而爲其運轉之樞紐。中心雖小，卻能運轉得此大全體。再深入一層言之，則所謂中心者，實不能成一體，因其不能無四圍而單有一中心之獨立存在。故就體言，四圍是實，中心是虛。就用言，四圍運轉，中心可以依然靜定。中心運轉，四圍必隨之而全體運轉。此爲中國思想之大道觀。此所謂「道」，亦可說是中國人之宗教觀，亦可說是中國人之自然科學觀，亦卽中國人之人生哲學。

中國古代思想中有較近似於西方之宗教者如墨子。天志要人愛，人不該不愛。天志要人兼愛，要人愛無差等，人便該兼愛，便該無分別無差等底愛。宇宙中究有此天，天究有此志否，此屬理智問題。須向外尋覓，向外探討。在中國思想界反對墨子，則直截從人情上反對。人旣不是天，人心亦究不是天志，強要把天志來壓迫人心，人心不堪。我那能把別人父親眞當作自己父親看？宇宙中縱有此理，其奈人心之實無此情何？而且人情所求，亦實在須得一人間之愛。天之愛人，一律平等無差別相。爲子者須得父愛，爲妻者須得夫愛，若全沒有了這些，而僅得一天愛，天愛僅可謂是一種理之愛，而非人情之愛，將仍爲人情所不堪。故中國人雖亦崇敬墨子之人格，

而到底不能接受墨子之理論與教誨。

中國古代思想中有較近似於西方之科學自然觀者，如莊老道家。科學眞理中無愛，自然現象中亦無愛。莊老言人生亦然。「魚相忘於江湖」，「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魚類固無情乎？天地固不仁乎？此仍屬理智問題，仍須向外尋索，向外研討。但究竟人類相處，該不該如魚之相忘，如天地之不仁，此則屬諸人類之本身問題，毋寧更屬於人類本身所自有之情感問題。中國人反對莊老，亦直截從人情上反對，謂其「知有天不知有人」。人便須有情。仁，人心也。人心有仁，便不必深論天心之仁與不仁。仁者愛人。我便該無失其本心。

依照中國人的思想態度，似乎太平易，太簡單，便走不上西方哲學路子。西方哲學界總是要講一個理，而此理還是該向外尋索，向外研討。西方哲學界如不全依宗教、科學的路走，則必另走上一條名辨邏輯之路，由名辨邏輯的客觀條例、客觀律令來探求眞理。然觀念本從實際人生而有，名字亦從實際人生而起。而西方哲學界，則必教人先把此觀念與名字從實際人生中抽離而獨立，爲之規定名義，確立界說。於是再從此許多有確定名義與界說之觀念中曲折錯綜地引生出一套理論。結果這一套理論，卻遠離了實際人生而獨立自在，如是始成爲哲學。中國古代思想中也有近似此一派者，則如名家惠施。此種由名辨邏輯所得之眞理，其可靠性究如何？依然仍得由名

辨邏輯向外尋索。而中國思想界，則依然只直截從人心之平易處，即人情之實感處，來反對此派之言辨，謂其「足以服人之口，不足以服人之心」。西方哲學界偏重此種名辨邏輯者，則若謂你的口說既無法辨了，你心上便不該不服。這正因西方哲學乃純理智純思辨的，哲學對象超越而外在，爲純客觀的，無感情的。而因此中國思想遂亦終不能有像西方般的純正哲學精神。

有些處，中國思想很近似於西方哲學中之理性主義。但有些處，又很近似於西方哲學中之經驗主義。在西方哲學上，此兩派自成一對立。但在中國則無此對立。有些處，中國思想很近於西方哲學中之唯心論，但也有些處又很近似於唯物論。在西方，唯心、唯物，又成一對立，在中國則仍無此對立。有些處，中國思想很近似於西方哲學中之個人主義。但有些處又很近似於集體主義與社會主義。在西方，此兩派仍然有一對立，但在中國則仍然無此對立。故以西方哲學之規範來繩律中國，衡量中國，則中國思想實似太簡單太平易，還未發展成熟，不能剖析精微。在中國不像有嚴格純正的哲學家與哲學思想。但儘可說中國無哲學，中國又何至於無思想呢？在人類思想中，可以有如西方般的哲學思想，卻不能說西方哲學思想乃人類思想之唯一準繩，與唯一規矩！

有人說，中國思想無條理，無系統，無組織。其實只要眞成爲一種思想，便不會無條理，無

系統，無組織。又有人說，中國思想無進展，無變化。此無異於說在中國，則只有某一時期人能思想，此外各時期的中國人，便不再能有思想，此亦屬武斷。若果中國人能繼續有思想，便在其思想體系上不會無進展，不會無變化。又有人說中國思想定於一尊，無派別，無分歧。其實思想本身決然會生派別與分歧。即使定於一尊，但定於一尊之後，仍會有派別分歧。

若說中國思想，太平易，太簡單，則試問如何在此平易簡單之中，又能有條理，有組織，有系統，有進展，有變化，有派別，有分歧呢？只要它眞能有條理，有組織，有系統，有進展變化，有派別分歧，則此種思想還是不平易，不簡單。

我們該從中國思想之本身立場來求認識中國思想之內容，來求中國思想本身所自有之條理組織系統，進展變化，與其派別之分歧。此始成爲中國的思想史。我們不能說西方思想已獲得了宇宙人生眞理之大全，同樣不能說中國思想對此宇宙人生之眞理則全無所獲；亦不能說中國思想對宇宙人生眞理之所獲，已全部包括在西方思想之所獲之中。如是始可確定中國思想史在世界人類思想史中之地位與價值。

今天的世界問題，最主要者，還是一思想問題。在西方，宗教與科學，唯心與唯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處處矛盾，處處衝突。但在中國思想史裏，則並不見有此

種矛盾與衝突之存在。今天的中國人，不認自己有思想，勉強要外面接受一思想，來在自己內部製造衝突。於是有所謂新舊思想之衝突。然試問今天的中國，果能眞實認識瞭解中國之舊思想者又有幾人？今天的中國思想界，又果何嘗有所謂新舊之衝突？所謂衝突者，其實只是接受了西方思想一外貌。接受了西方思想外貌上所最易顯見之一衝突性，而自求衝突。於是認爲非衝突卽是無思想，於是有「不革命卽是反革命」之口號。頹波所趨，遂有今天中共之所謂「搞通思想」。其實彼輩所謂搞通思想者，骨子裏卽爲反對思想。彼輩誤認衝突矛盾爲思想之本質。果如是，則思想搞通，卽成不通。故革命完成之後，勢必繼之以清算。思想眞搞通了，卽成爲無思想，於是將重造衝突，重求搞通。如是則搞通復搞通，清算復清算。永遠是一個搞不通與算不清的不了之局，而民生憔悴亦將永無寧日。此無他，一則認爲人生眞理超越人生而外在，再則認爲思想本身不能無衝突，無矛盾。遂以此超越人生以外的衝突與矛盾之眞理觀來強安之於實際人生中，來創造出實際人生中之衝突矛盾，以求符於其所謂之眞理。若專就西方思想史之演變言，則亦未嘗無一些客觀事實可資爲證成。但若回就中國思想史看，則殊不見得此種思想之現實性與必然性。故我認爲研究中國思想史，不僅對於中國今天的思想界可得一反省，一啓示。實於近代西方思想之衝突矛盾獲不得解決處，可有一番意外之貢獻與調和。至於我言信否，則請先平心靜氣地讀完了

我這一部中國思想史後再討論！

中華民國四十年八月一日

中國思想通俗講話　出版說明

思想不能脫離羣眾，而羣眾所同則必遠有承襲。

中國傳統思想乃孕藏於廣大羣眾之行爲中，孕藏於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及社會習俗中。本書拈出目前社會習用之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由淺入深，闡述此諸觀念與名詞之內在涵義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藉以描述出中國傳統思想之大輪廓。

是書原爲民國四十三年夏，錢先生在臺北，應蔣經國先生之邀在青潭青年救國團所作系列講演。每週一次，凡四次，共分「道理」、「性命」、「德行」、「氣運」四題，初名「中國思想裏幾個普泛論題」。四十四年三月結集，以本書名自印於香港。六十八年，原擬重印此書，因特撰補篇一文，共分八題，其後因故未付印。七十六年應臺北動象雜誌索稿，又整理歷年隨筆劄記十二條附後，合成補篇，付該雜誌發表。逮七十九元月，臺北東大圖書公司重版，乃將補篇增入。此次重排，即據東大增訂版爲底本，除改正若干原版誤植文字外，並加入私名號、書名號等。排校錯誤疏漏之處，敬希讀者不吝教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思想必然是公共的，尤其是所謂時代思想，或某學派的思想等，其爲多數人的共同思想，更屬顯然。凡屬大思想出現，必然是吸收了大多數人思想而形成，又必散播到大多數人心中去，成爲大多數人的思想，而始完成其使命。此少數之思想家，正所謂先知先覺，先得衆心之所同然。然後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以彼少數思想家之心靈，發掘出多數心靈之內蘊，使其顯豁呈露，而闢出一多數心靈之新境界。某一時代思想或學派思想，其影響力最大者，卽其吸收多數人之思想者愈深，而其散播成爲多數人思想者愈廣，因此遂成其爲大思想。

若思想脫離了大衆，僅憑一二人憂憂獨造，縱或深思密慮，窮搜冥索，或於書本文字上闡述陳說，或於語言辯論上別創新解，或就個人會悟提出獨見，或從偏僻感觸引伸孤詣，只要是脫離

了羣眾，既非從大多數人心裏出發，又不能透進大多數人心裏安頓，此等思想，則僅是少數人賣弄聰明，炫耀智慧，雖未嘗不苦思力探，標新懸奇，獲得少數聰明智慧、喜賣弄、愛炫耀者之學步效顰，但其與大多數人心靈，則渺無交涉。則此等思想，仍必歸宿到書本上，言語上，流行於個別偏僻處，在思想史上決掀不起大波瀾，決闢不出新天地。

余居常喜誦中庸，尤愛玩誦其如下所說：「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竊謂惟德性乃大眾之所同，人人具此性，人人涵此德，問者卽當問之此，學者亦當學於此。只有在大眾德性之共同處，始有大學問。只有學問到人人德性之愈普遍處，始是愈廣大。老子曰：「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亦只有在愈廣大處，才見得愈精微。若所見粗疏，則據於一隅，不能盡廣大之量。不能盡廣大之量，則彼此之間不能無異同。於是則敵論競起，互相角立，僅足以相爭，而不足以相勝。大則如吳、晉爭霸，小則如滕、薛爭長。各有所見，亦各有所蔽，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其病在於不能致廣大。若求致廣大，則必盡精微。惟有精微之極，始是廣大之由。誠使大多數人心靈同歸一致，盡以為是，此必無多言說，無多疑辨，無多創論，無多孤見。當知能如此說，雖若粗疏，而實盡精微之能事。凡求於言說中樹孤見，於疑辨中闢新論，貌若精微，而實則粗疏。

南宋陸復齋所謂「留心傳注飜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卽對此等離開廣大心靈，拘泥文字言說，而刻意求精微者施針砭。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乃始爲高明。此高明乃得學問之極於精微來，而此學問之所以極於精微，則從體悟到廣大德性之玄同中來。故眞高明者，必轉近於廣大之德性，更易爲廣大心靈所瞭解，所接受，而後此高明之思想，遂易領導羣衆於實踐，故曰「極高明而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爲中庸之道，此乃本於廣大德性內在之所同趣，所以得成其爲高明之極。而此則必其人之學問，到達於極精微處，而始可得之。決非弄聰明，炫智慧，好爲孤明獨見者所能。

然則學問卽學於此羣衆，問於此羣衆，而羣衆所同，則遠有承襲，自古已然。故必溫於故而可以知新，非離於古而始可以開新。不離於羣衆，斯不離於往古，此之謂敦厚。敦厚故不炫孤知而崇於禮，禮卽大羣之習俗公行，自往古一脈相傳而積襲以至於今。雖有變，而不失其常。雖有歧，而不失其通。惟此乃廣大心靈之所同喩而共悅，亦廣大德性之所同趣而共安。易大傳則曰：「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禮以卑爲用，所謂卑之毋甚高論，使爲易行。若論高則與世俗相違，人人驚竦，認爲高論。然論高而難行，難行則與衆何涉。與衆無涉則決非敦厚之道。若使人騖於知而不相敦厚，則風薄而世衰，社會大衆共受其苦，然則又何貴而有此大知識，有此大思

想？故天之崇，非以其隔絕於萬物，乃以其包涵有萬物。聖知之崇，亦非以其隔絕羣衆，乃以其卽學問於羣衆，以其包涵有羣衆之廣大德性而又得其共同之精微。故中庸之崇禮，乃崇於羣衆，崇於習俗，崇於往行，乃以高明而崇於卑暗者。

羣衆乃指夫婦之愚，若不知有所謂思想，不知有所謂理論，不知有所謂疑辨，不知有所謂發明。然羣衆雖卑，飲食男女，蹈常襲故，而共成其俗，共定於禮。禮由羣衆來，由羣衆之蹈常襲故來，由羣衆之德性之所好所安來。聖知特達，不當忽視於此。聖知特達，則必尊於德性，致其廣大，以此爲學問，於此獲精微，乃以躋於高明，而終不違於中庸，此之謂溫故，此之謂崇禮。故得日新其知，而終以成其敦厚。故曰：「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又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聖人雖有大知，而羣衆亦可以前知。此所謂前知，乃前於聖人之知而卽已知。羣衆非眞有知，特羣衆有誠，其誠出於天，本於性，故聖人出於羣衆中，此卽自誠而明，屬天道。聖人尊羣之德性，致極於羣之廣大，而學問焉，而造於精微，成於高明。高明之極，而仍不離於中庸，仍不違於夫婦之愚。而聖人之知，則可以通天心，達天德，而還以成其天，此之謂由明誠，

屬人道。大哉此道，此則所謂中庸之道。

惟其中國傳統，特重此中庸之道，故中國傳統思想，亦為一種中庸思想。此種思想，則必尊德性，致極於人性之廣大共通面，溫故而崇禮。明儒王陽明所倡「知行合一」之學，殆為眞得中國傳統思想之精義。此亦可謂之中庸之學。中庸之學，造端乎夫婦，而察乎天地。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極其所至，既知天，又知人。聰明睿知，而又寬裕溫柔。何以故？道不離人，亦學不離人。

竊嘗本此意，研尋中國傳統思想，知其必「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考諸三王則治史。徵諸庶民，則潛求博求之社會之禮俗，羣眾之風習。本諸身，則躬行體驗，切問近思。乃知中國傳統思想，不當專從書本文字語言辯論求，乃當於行為中求。中國傳統思想乃包藏孕蘊於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廣大羣眾之行為中，包藏孕蘊於往古相沿之歷史傳統，社會習俗之陳陳相因中。此行為而成為廣大羣眾之行為，而成為歷史社會悠久因襲之行為，則惟以其本於天性，通於天德，故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故可以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聖人固非生而知之，乃好古敏求以得之。聖人無常師，三人行，則必有吾師。大羣眾之中庸，即聖人之師。大羣眾之

思想，即成爲聖人之思想。惟大羣衆不自知，而聖人則學問於大羣衆而知之。亦惟此乃成爲大知識，亦惟此乃成爲大思想。

去暑在臺北，曾作爲系統講演凡四次，初名「中國思想裏幾個普泛論題」。原意在拈出目前中國社會人人習用普遍流行的幾許觀念與名詞，由此上溯全部中國思想史。由淺入深，即憑衆所共知共喻，闡述此諸觀念諸名詞之內在涵義，及其流變沿革，並及其相互會通之點，而藉以描述出中國傳統思想一大輪廓。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誠使一時代，一學派之思想，果能確然有其所樹立，犂然有當於當時之人心，沛然流行而莫之能禦，則雖其人與言而既往矣，而其精神意氣之精微，殆必有深入於後世之人心，長留於天壤間，而終不可以昧滅者。以人事冗雜，越秋至於冬杪，始獲少閒暇。乃就當時講演錄音，重加整理，粗有潤色，易以今名爲中國思想通俗講話，集成一册，先刊以問世。

然我不知，我此書所講，其果能有所窺於人羣德性之大同之深在者有幾？其果能有所當於廣大人羣之所共喻而共悅者又有幾？其自所學問之途轍，果能由以達於精微之境，而稍可以冀於高明之萬一者又有幾？此皆我個人學力所限，不敢自知。然我終不敢違越於往古聖人敦厚崇禮之教，終不敢鄙蔑於往古聖人所示溫故學問之功，雖曰未逮，亦我私志日常之所勉。

此四次講演之所及，則仍限於抽象理論之闡發。至於具體落實，更就歷史社會種種實象，作更進一層之發揮與證明，以求盡竭乎吾胸中所欲說，則當俟生活有閒，精力有賸，別舉論題，繼此闡釋，續撰第二第三編，以足成吾意。此册則先以呈請於當世通人君子之教正。

舊曆甲午歲盡前兩日錢穆自序於九龍嘉林邊道新亞研究所

學籥　出版說明

近人論學，好尊西方，因美其名曰「科學方法」，一若中國古人爲學無門徑方法可尋。錢賓四先生乃輯其過去所撰有關開示學者以治學之門徑與方法者，凡六篇（篇目見初版序目），彙爲一册，名曰學籥，於民國四十七年自印於香港。是書上起孔子，以次朱子，下迄近代諸儒，並皆有所論列。又自民國五十年十月起，下迄五十二年十月，前後兩年，先生爲香港新亞研究所諸生絡續講演，專就治學門徑方法隨講命題，無次序，無系統，或屬泛論，或係偏指，如「歷史與地理」一講，驟視若與治學門徑方法無關，其實皆可觸類旁通，爲治學綱領所繫。復有專申論語者，則因論語乃人人必讀書，又爲必應精讀書，果能讀通一部論語，則其他亦更無不易讀之書也。先生意欲彙此諸篇爲乙集，俾可與原編甲集合觀；而其事未果。其中若干篇章，遂分別收入後編之孔子與論語及中國學術通義二書中。學籥原編中本論語論孔學一文，以性質相近，亦移入孔子與論語。而本書之續編，因亦中輟。

今全集重刊此書，乃秉先生原意，除本論語論孔學一篇外，保留原來五篇，並增入相關文稿

七篇。讀此一編，古人爲學門徑方法，大體可見。先生所論，與時賢有合有違，蓋所從入之門徑異，所運用之方法異，所造詣之境界自不相同。凡先生所述，若不盡符今世之繩尺，然欲稍窺中國古人境界，則終爲不可忽也。

本書原收五篇仍據初版，並與增篇一律加入私名號、書名號等，以便讀者閱讀。凡新增各篇，目次中添注＊號，不復分甲、乙集云。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本書凡收文六篇。其第五篇「近百年來諸儒論讀書」成於民國二十四年，時北平各大學學生方發起一讀書運動，來徵文，原題名近百年來之讀書運動。舊稿散失，數年前由友人自臺北鈔寄，茲易今名。其餘諸篇，皆成於旅港以後，民國四十四、五年間。其第四篇「朱子與校勘學」，三十七年始作於江南大學，未經刊布，稿亦遺逸。今所收，則旅港後新作也。自念少孤失學，

年十八，即抗顏爲人師。蟄居窮鄉，日夜與學校諸童同其起居食息。常以晨昏，私竊古人陳編。既無師友指點，亦不知所謂爲學之門徑與方法。冥索逾十載，始稍稍知古人學術源流，並其淺深高下是非得失。然僅以存之胸懷間，亦未敢輕有所論述也。嗣後稍有撰著，而終不敢輕談門徑方法。良以人之爲學，才性既不同，機緣復互異，從入之道，難可一致。自審所窺有限，豈宜妄有主張，轉滋貽誤。頃年踰六十，少壯所志，十不償一；精力就衰，殆不能更有所深涉。而廁身師席，亦垂五十寒暑矣。平生微尚，所拳拳服膺，自以謂是者，舉以告人，義亦宜然。古人云：「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觀於海者難爲水。」「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本書前兩篇述孔學之大體，第三、四篇述朱子讀書法。尼山、考亭，學之山海。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管窺蠡測，所不敢辭。第五篇時近俗類，堪資借鏡。末篇「學術與心術」乃當身感觸，私所抱負，亦以附焉。儻有好學之士，取而爲法，亦爲學入門之一途也。因名之曰「學籥」云爾。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六月五日錢穆自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中國學術通義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四年春，錢賓四先生將其自大陸來港、臺以還，近三十年中所撰有關之論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特性所在之論文，彙集而成本書。諸篇或述四部之大要，或論學術與師道，或論學問之系統，總屬通論性質，足資讀者進修之借鏡。是書共收文十二篇，於六十四年九月由臺北學生書局初版。七十一年一月三版，又增入中國學術特性、我對於中國文化的展望兩篇，共爲十四篇。

此次重排，以增訂三版爲底本，改正原版若干誤植文字，並對原書之標點符號進行整理，主要加入私名號及書名號，以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蕭公彥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欲考較一國家一民族之文化，上層首當注意其「學術」，下層則當注意其「風俗」。學術爲文化導先路。苟非有學術領導，則文化將無向往。非停滯不前，則迷惑失途。風俗爲文化奠深基。苟非能形成爲風俗，則文化理想，僅如空中樓閣，終將煙銷而雲散。

中國文化傳統，緜亘數千年，乃由吾中華民族所獨自創建，自有其獨特性之存在。卽就中國社會風俗言，雖數千年來歷時遞變，然亦有其前後相承，一貫不斷之獨特性。卽以當前可目睹者言，全球社會，各地風俗，可謂無一相似。風俗然，學術亦然。中國學術，顯亦有其獨特性。苟不然，此社會風俗之獨特性，又由何來。惟風俗易曉，學術難明。其間分別，如是而已。中國與外族文化之接觸，最先爲印度佛教之東來。佛教雖爲一宗教，而其所內涵之學術意義亦特豐。佛教之中國化，則胥由中國學術傳統中所賦有之獨特性之功。南北朝、隋、唐高僧，多兼通內外學，遂使中國學術逐漸滲入於佛教信仰中，而佛教之在中國，乃亦隨之而變。

近代中國，與歐西文化接觸，雙方文化傳統各不同，因此上而學術，下而風俗，雙方亦各不

同。近代國人，乃有「國學」一名詞之興起。或疑學術當具世界共同性，何可獨立於世界共同性學術之外，而別標「國學」一名詞。不知同屬人類，斯必具人類之共同性，然亦何害於各人有各人之個性。即就西方言，不論文學、史學、哲學，英、美、法、德諸邦，縱在同一文化系統之下，亦復有其在學術上各自內涵之獨特性之存在。更何論中國與西歐，其相互間，在學術上之不能無相異，事更宜然，理無足怪。

今國人一切以信奉西方爲歸，羣遵西方學術成規，返治中國傳統舊存諸學，精神宗旨既各異趣，道途格局亦不一致。必求以西方作繩律，則中國舊學，乃若不見有是處。抑且欲瞭解中國舊學，亦當從中國舊學本所具有之精神宗旨道途格局尋求瞭解，否則將貌似神非，并亦一無所知。既所不知，又何從而有正確之批判。

或又謂時代變，斯學術亦當隨而變，此固是矣。不僅西方學術，遠自希臘，迄於現代，固已時時有變。即中國學術亦然。自西周以迄先秦，下經兩漢，循至於近代，亦何嘗不隨時有變。如人之自嬰孩而成年而壯而老，豈不亦隨時有變。然而各有生命，各有個性。我不能變而爲彼，彼亦不能變而爲我，此則終有其不可變者。故人貴求自立，謂他人父，而血統終不屬，此亦無奈之何者。

今人又競言復興文化，又必申言其決非復古，斯亦是矣。然復興究與改造有不同。新中國之新文化則仍當從舊中國舊文化中翻新，此始得謂之是復興。若必待徹底毀滅了舊中國舊文化，赤地新建，異軍特起，此又烏得謂之中國與中國文化之復興。故欲復興國家，復興文化，首當復興學術。而新學術則仍當從舊學術中翻新復興。此始爲中國學術文化將來光明一坦途。

推此言之，如欲創造中國新文學，仍當先求瞭解中國舊文學，期能從舊文學中翻新復興，而後乃有合理的中國新文學之產生。若一意模倣抄襲西方文學，決心捨我而從之，此非中國文學之復興，乃屬中國文學之革命，其事易知，不煩深辨。而且以中國人使用中國文字描寫中國社會人生，亦決不能卽成爲西方文學。邯鄲學步，非驢非馬，其此之謂矣。

今若謂中國舊文學已死去，則中國社會人生依然存在，中國文字亦依然使用，只把這「的、那、嗎」換去了「之、乎、者、也」，何得云中國文學已死。若僅謂近代中國人已不能讀中國古書，故說中國舊文學已死去，則正貴有志創造新文學者，能從中國古書詩經、楚辭、文選乃及唐宋以下各家詩、文、詞、曲、說部中，熟玩深思，取精用宏，獨具機杼，使其推陳而出新，乃庶有當於文學復興或中國新文學之稱。否則只是西方文學之侵入與替代，斷非中國文學之復興與創造。抑且卽在今日，能讀詩經、楚辭、文選古籍者，亦尚有人。又烏得謂舊文學已全死去。縱謂

其非社會大眾所知，則豈陽春白雪，亦當不得預於歌唱之林，乃惟下里巴人方得爲音樂之正宗？試問西方，亦豈如是。

要之，中國學術之必有其獨特性，亦如中國傳統文化之有其獨特性，兩者相關，不可分割。非瞭解中國學術之獨特性，即亦將無以瞭解中國文化之獨特性。惟從另一面言之，亦可謂不明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即無以明中國學術之獨特性。今姑舉其最大者言之，中國文化之獨特性，偏重在人文精神一面，中國學術亦然。近人率多認文、史、哲諸科謂是屬於人文方面，其實中國學術之有關此諸科者，其內涵精神亦復有其獨特處。中國傳統，重視其人所爲之學，而更重視爲此學之人。中國傳統，每認爲學屬於人，而非人屬於學。故人之爲學，必能以人爲主而學爲從。當以人爲學之中心，而不以學爲人之中心。故中國學術乃亦尚通不尚專。既貴其學之能專，尤更貴其人之能通。故學問所尚，在能完成人人之德性，而不尚爲學術分門類，使人人獲有其部分之智識。苟其僅見學，不見人，人隱於學，而不能以學顯人，斯即非中國傳統之所貴。

中國自古亦即有所謂專家疇人之學，如天文、曆法、算數、醫藥之類，此皆近代所謂屬於自然科學方面者，此等諸學，每易使人隱於學，而不能以學顯人。故中國古人傳統，每若對此等諸學較近忽視。實非忽視，乃求矯人之專一於此等諸學，各不相通，而易起其他之流弊。即如孔門

「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何莫不然。一若此諸藝皆獨立在人之外，人乃從而學之，此則學爲主而人爲從，乃爲孔子所深戒。故孔子告子夏則曰：「汝爲君子儒，毋爲小人儒。」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若僅知玉帛鐘鼓謂是禮樂之所在，此卽謂之「小人儒」。求能超乎玉帛鐘鼓，而知禮樂之中主要在有人，復有人之心之存在，斯乃爲眞知禮樂者，如是而後始得謂之「君子儒」。故孔子教人學六藝，乃必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與「道」不同。苟徒知「游於藝」以爲學，將使人沒於藝，而終必背於道。近代科學發明中有原子彈，然原子彈若果不能召致世界和平，則亦藝而非道。故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乃在其重人尤過於重學，重內尤過於重外，重道尤過於重藝。能由此思之，亦不難窺見中國傳統學術之甚深獨特性所在矣。

本書取名中國學術通義，亦可簡稱國學通義，乃彙集避赤氛來港、臺近三十年中所爲雜文之有關討論中國傳統學術之獨特性所在者。首篇曰四部概論。中國學術自魏、晉以下，向分經、史、子、集四部。分而論之，合而觀之，四部學之大要，約略可見。次爲中國儒學與文化傳統。儒學尤爲中國學術之中心。四部之學，莫不以儒爲主。亦可謂儒學卽是中國文化精神之中心。明於古今儒學之流變，卽知中國學術文化古今之變，與夫其爲變之所在矣。第三篇曰朱子學術述評。

朱子為孔子以後儒學之集大成者。其於四部之學皆有關涉。又自魏晉以下，儒、釋、道三家之相爭，乃由朱子而融會歸一。此下八百年，述朱反朱，亦莫不以朱子為中心。明乎朱子之學，則先秦以下中國學術關鍵，胥莫外於此矣。本書中惟此稿，成在民國三十四年對日抗戰期間，距今適三十年。篇中見解，幸有改進。取材一承舊稿，而闡述微有增易。今不知此所彙集，謬誤又幾何？恐年老更無長進，歉悚何似。又次曰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史學。昔人謂「六經皆史」，欲治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主要即在其歷史，昧忽其歷史實迹，則一切皆落於虛談。尤其中國史學，乃更易見我所謂中國學術之獨特性所在。近日國人不治史，不明往昔，而好作譏彈，此皆如無的放矣。又或以西方人眼光治中國史，仍將渺不得國史眞相。下有附篇，同明一意。又其次曰中國文化傳統中之文學。清儒章實齋有言，「後世集部，即古代子部之流變」，此論殊寓深義。若如所言，則中國古代有經、子，後世衍出史部與文集，本末一貫。四部之學，可以歸納而為二。章氏之為文史通義，即此意也。近代又謂中國以前舊文學皆已死去，不知中國各代文學中皆寓有各代之人生。謂舊文學已死去，即不啻若謂吾中華民族自今以前之舊人生舊文化皆已死去。則當前吾國人，將盡如行屍走肉。提倡新文學，乃欲為當前國人借魂起屍，其為狂妄，實莫甚焉。

讀者試綜合上列諸篇，而會通觀之，庶可知中國學術，實自有其獨特性，而非可以專憑西方

成見以爲評隲。亦非可以一依西方成規以資研窮。治國學則必先尋究窮治國學之方法與途徑。下附泛論學術與師道，及有關學問之系統等諸篇，皆近通論性質，可資讀者有志進修之借鏡。學術明而後文化明，學術復興而後文化可復興。區區之意，竊在於此。其或語有不擇，見迕當世，知我罪我，所不敢計。是爲序。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上元節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一。

現代中國學術論衡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於民國六十四年編撰中國學術通義，就經、子、史、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又繼之而為是書，依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全書計十二目，都二十六篇。

中國重和合會通，西方重分別獨立，一切人生及學術，無不皆然。遠自漢書藝文志，下及清代四庫全書，讀其目錄，中國學術舊傳統大體可知。近代國人一慕西化，大學分院分系，乃及社會學人論學，門類風格，煥然一新。即如宗教、科學、哲學諸名稱，皆譯自西方，為中國所本無。既無此名辭，亦無此觀念，又何能成此學術？今國人乃以新觀念批舊學術，遂見其無一而當。本書則即就近代國人所承認之學術新門類及其新觀念，還就舊傳統，指出其本屬相通及互有得失處。既具體條舉諸例，並諸條加以詳細發揮。使讀此書者，一則可以明瞭中西雙方學術思想史之有相異處；再則可以由學術舊傳統，迎合時代新潮流，而創開一新學術之門戶，以待後人之繼續邁進。

本書撰就於民國七十二年冬，翌年十二月由東大圖書公司初版。此次重排，即以此為底本，

除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增入若干引號，以便讀者閱讀外，內容一仍其舊。整理排校如有疏誤，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邵世光小姐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文化異，斯學術亦異。中國重「和合」，西方重「分別」。民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務為專家，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大相違異。循至返讀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大，不可不加以討論。

晚清之末，中國有兩大學人，一康有為，一章炳麟。其時已西化東漸，而兩人成學皆在國內，未出國門一步。故其學皆承舊傳統。康氏主今文經學，章氏則主古文經學。而世風已變，兩人雖同治經學，其崇儒尊孔之意實不純，皆欲旁通釋氏以為變。康氏著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並自號長素，其意已欲凌駕孔子。其為大同書，雖據小戴禮記禮運篇「大同」一語為號召，

但其書內容多採釋氏。惟康氏早已致力實際政治，謀求變法維新，故其宏揚釋氏者並不顯。章氏以爲文排滿下獄，在獄中讀釋氏書，卽一意尊釋，而排滿之意則無變。自號太炎，乃尊顧炎武之不仕清廷，而亦顯有凌駕顧氏之意。此下著書，皆崇釋抑儒，孔子地位遠在釋迦之下。如其著國故論衡，一切中國舊傳統只以「國故」二字括淨。「論衡」則僅主批評，不加闡申。故曰：「中國有一王充，乃可無恥。」其鄙斥傳統之意，則更昭之矣。惟其書文字艱拗，故其風亦不揚。

章氏去日本，從學者甚眾，然皆務專門，尠通學。惟黃侃一人，最爲章氏門人所敬，則以其猶守通學舊軌。康氏門人少，惟梁啓超任公一人，早年曾去湘，故亦受湘學影響，知尊湘鄉曾氏。先創新民叢報，後改爲國風報。創刊辭中大意謂，國風相異，英法皆然，中國亦當然。其識卓矣。後爲歐洲戰役史論，敍述當時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來源，提綱挈領，要言不煩。如任公，實當爲一史學巨擘。惜其一遵師旨從事變法維新之政治活動，未能專心爲學，遂亦未臻於大成。

及第一次歐洲戰役既畢，任公遊歐歸來，草爲歐遊心影錄一書。大意謂，歐洲文化流弊已顯，中國文化再當宣揚。其見解已遠超其師康有爲遊歐歸來所草十三國遊記之上，而亦與太炎大不同。惜任公爲學，未精未純，又不壽，年未六十卽辭世，此誠大可惋悼矣。

與梁任公同在北平講學者有王國維靜安。先治西學，提倡紅樓夢。新文學運動受其影響甚大。然靜安終以專治國故，名震一世。當時競治殷墟龜甲文，而國維教學者，應先通許氏說文爲基礎。可謂當矣。惜靜安亦不壽，先任公而卒，亦大堪惋悼。

胡適之早年遊學美國，歸而任教於北京大學，時任公、靜安亦同在北平。適之以後生晚學，新歸國，即克與任公、靜安鼎足並峙。抑且其名乃漸超任公、靜安而上之。蓋自道咸以來，內憂外患，紛起迭乘，國人思變心切，舊學日遭懷疑，羣盼西化，能資拯救。任公以舊學加入新思想，雖承其師康氏，而所學實有變。適之則逕依西學來講國故，大體則有採於太炎之國故論衡。惟適之不尊釋。其主西化，亦不尊耶。而其譏評國故，則激昂有更超太炎之上者。獨靜安於時局政事遠離，而曾爲宣統師，乃至以留辮投湖自盡。故三人中，適之乃獨爲一時想望所歸。而新文化運動乃竟掩脅塵囂，無與抗衡。風氣之變，亦誠有難言者。

舊學宏博，既需會通，又求切合時宜，其事不易。尋瑕索疵，漫肆批評，則不難。適之又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可以脫離舊學大傳統，不經勤學，即成專家。誰不願踴躍以赴。其門弟子顧頡剛，承康氏「託古改制」義，唱爲疑古，著古史辨一書，尤不脛而走，馳譽海內外，與適之齊名。同時有馮友蘭芝生，繼適之中國哲學史首冊之後，續爲中國哲學史一書，書中多採任公諸人

批駁胡氏意，其書亦與適之書同負盛名。對日抗戰時，余與芝生同在湘之南嶽，以新撰新理學手稿示余，囑參加意見。余告以君書批評朱子，不當專限「理氣」一問題。朱子論「心性」，亦當注意。又其論「鬼神」，與西方宗教科學均有關，似亦宜涉及。芝生依余意，增鬼神一篇。並告余，朱子論心性，無甚深意，故不再及。並在西南聯大作講演，謂彼治哲學，乃爲神學。余治史學，則爲鬼學。專家學者，率置其專學以外於不論，否則必加輕鄙，惟重己學有如此。於是文學、史學、哲學，及考古發掘龜甲文等各項專門之學，一時風起雲湧，實可謂皆自新文化運動啟之。

但適之提倡新文化運動，其意不在提倡專門，凡屬中國舊學，逐一加以批評，無一人一書足敬佩。亦曾提倡崔東壁，然亦僅撰文半篇，未遑詳闡。適之晚年在臺灣出席夏威夷召開之世界哲學會議，會中請中、日、印三國學人各介紹其本國之哲學。日、印兩國出席人，皆分別介紹。獨適之宣講杜威哲學，於中國方面一字不提。則適之所主持之新文化運動，實爲批評中國舊文化，爲新文化運動作準備。當時有唱「全盤西化」之說者。而適之僅提倡「賽先生」科學與「德先生」民主兩項。於宗教則避而不談，又主哲學關門。適之有「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一語。其所假設者，似僅爲打倒孔家店，中國舊文化要不得。一意廣泛批評，即其小心求證矣。至「民主」、「科學」兩項，究當作何具體之開創與設施，則初未之及。亦別有人較適之更作大膽假設者，如

線裝書扔毛厠，廢止漢字，改爲羅馬字拼音等。又如陳獨秀之主張共產主義。適之對此諸端，則並無明白之反對。要之，重在除舊，至於如何布新，則實未深及。

不幸而日本東侵，又繼之毛政權上臺，政府播遷來臺，而一切情勢皆大變。在大陸，已無學術可言。臺灣惟科學、民主兩項仍在提倡。而中國舊文化、舊傳統、舊學術，則已掃地而盡。治學則務爲專家，惟求西化。中國古書，僅以新式眼光偶作參考繙閱之用，再不求融通體會，亦無再批評之必要。則民初以來之新文化運動，亦可謂已告一段落。

繼此當有一大問題出現。試問此五千年摶成之一中華大民族，此下當何由而維繫於不壞？若謂民族當由國家來維繫，此國家則又從何而建立？若謂此一國家不建立於民族精神，而惟建立於民主自由。所謂「民」，則僅是一國家之公民，政府在上，民在下，無民族精神可言，則試問西方國家之建立其亦然乎？抑否乎？此一問題宜當先究。

又所謂分門別類之專家學，是否當盡棄五千年來民族傳統之一切學問於不顧？如有人謂，非先通康德，即無以知朱子。但朱子之爲學途徑與其主要理想，又何嘗從先知康德來。必先西方，乃有中國，全盤西化已成時代之風氣，其他則尙何言。

早於治朱子必先通康德之說之前，已有人主張不通西洋史即無以治中國史。於是「帝王專制」

與「封建社會」之兩語，乃成爲中國史之主要綱領。又如謂非取法西方文學，卽無以建立中國之新文學。於是男女戀愛、武力打鬭，乃爲現代中國新文學必所共有之兩項目。以此而言，一切學術，除舊則除中國，開新則開西方。有西方，無中國，今日國人之所謂現代化，亦如是而止矣。

余曾著中國學術通義一書，就經、史、子、集四部，求其會通和合。今繼前書續撰此編，一遵當前各門新學術，分門別類，加以研討。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主「通」不主「別」。求爲一專家，不如求爲一「通人」。比較異同，乃可批評得失。否則惟分新舊，惟分中西，惟中爲舊，惟西爲新，惟破舊趨新之當務，則竊恐其言有不如是之易者。

此編姑分宗教、哲學、科學、心理學、史學、考古學、教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藝術、音樂爲十二目。其名稱或中國所舊有，或傳譯而新增。粗就余所略窺於舊籍者，以見中西新舊有其異，亦有其同，仍可會通求之。區區之意，則待國人賢達之衡定。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冬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之外雙溪時年八十有九

周公　出版說明

民國十五年錢賓四先生在無錫第三師範任教時，自習日文，偶見日人林泰輔所著周公與其時代一書，考述周公及其時代之相關史實；以爲其所辨訂雖時有未臻完密之處，然要當爲研究周公之一專門著作；遂於課餘之暇，摘譯之而成本書。

林著原分三編：第一編爲周公之事蹟，第二編爲周公之學術及思想，第三編爲周公與周官儀禮周易爻辭之比較。先生以爲其第一編對周公之事蹟排比明備，尤爲學人所需，因爲摘譯成本書之前三章：即第一章周公之家系及性行，第二章周公之活動時代，第三章周公之晚年。又摘譯原書第二編，成爲本書最後第四章周公學術思想之概觀。

本書於民國二十年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收入商務國學小叢書。至民國五十六年七月，臺北商務印書館據原版影印，爲臺一版，改收該館人人文庫之中。

今編全集，乃以原版爲底本，對原書之版式略作改良。其引文與正文改用不同字體，標點符號則移入行中，使版面較爲清晰，以便讀者。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

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蕭公彥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弁言

中國之有孔子，其影響之大且深，夫人而知之。然孔子之學術思想，亦本於中國固有之民族性，構成於歷史的自然之發展，決非無因而致者。孔子晚年，有「久矣！不復夢見周公」之歎，則其壯年以來之於周公，其思慕之忱爲何如？孟子云「周公、仲尼之道」，後世亦每以周、孔並稱，非無故也。

抑周公當周室草創之初，輔佐武王、成王成就大業，雖非身承王統，以視孔子之栖栖遑遑，席不暇暖，遭時不利，終身於窮廬者，其隱顯通塞之間，固已殊矣。孔子之於周公，既夢寐不忘，其間豈無精神脈絡相通之點！然自其時代觀之，兩聖之相去五百餘年，文運之昇降，政治之

盛衰，人情風俗之變遷推移，有不可同日而語矣。故以孔子以後之思想，用以說明周公，必有所不可通者。欲究周公之眞相，不可不根柢於周初之材料，乃可以考其境遇，繹其學術，而求其思想。若以後世紛紛附會之說，悉以歸之周公，雖或可以描出一理想的人物，然亦必不得爲周公之眞也。

意殷末周初，實產出春秋、戰國時代之文化的淵源之涵養期也。決非枯澹寂寞，而鬱勃有興國之氣象焉。周公者，又其時代思想之最好的代表人也。苟能於周公其人，博考詳察，則於探中國古代文化之淵源，與夫孔子學術之由來，皆思過半矣。

近人或謂中國歷史，自春秋、戰國以後，始有可考；其前之文化，率不過後人之假托；此又速斷之論也。觀於春秋、戰國之時，繁文縟禮，已臻其極。終而爲紛亂之世，戰鬥攻伐，惟日不足，而學術文采，照耀百世。諸子競出，不可勝數。是豈突然而起者！其必有所淵源於數百年之前矣。殷末周初，實涵育其淵源之時也。苟明社會進化之以漸不以驟，則其理亦非難見。（以上節譯林氏原序大意）

日人林泰輔著周公與其時代一書，將關於周公及其時代之材料散見各書者，爲之掇拾，求其一貫之事實。以詩、書爲主，參以其他古籍，以考周公之行事，又繹其學術思想；更取周官、儀

禮及周易爻辭，古來所稱周公之著作者，一一詳爲比論，以辨其果出周公與否。書分三編：第一編爲周公之事蹟，第二編爲周公之學術及思想，第三編爲周公與周官儀禮周易爻辭之比較。雖其辨訂時有未臻完密之嫌，未可遽爲定論，亦專門的研究周公之一巨著也。其第一編周公事蹟，排比明備，尤爲學人所需。課徒之暇，因爲摘譯，以付梓人。間有異同之見，不復羼及。至於譯筆之疏，草促之譏，所不敢辭也。

秦漢史　出版說明

民國十九年，錢賓四先生因顧頡剛先生之薦，由蘇州赴北平，始任教於燕京大學，時年三十六歲。次年民二十，轉至北京大學。在北大第一年，先開「中國上古史」、「秦漢史」及「近三百年學術史」。皆自編講義。越年，秦漢史寫至王莽，近三百年學術史寫至李紱。第二年改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第三年之後復授「中國通史」，率自編撰講綱教材，備極勤瘁。數年之間，書稿山積，秦漢史則未再續完。爾後戰亂流離，並原稿亦遺失。直至民國四十五年，始重獲北大油印舊講義，稍加校正，四十六年梓行於香港。

是書爲先生壯年力作，新見迭出，議論暢達，體裁尤有可觀。上起秦之一統，下迄新莽覆亡，共分七章。諸所敍論，於學術、政治及社會經濟三者兼及並重。學術方面，於秦漢博士官制度承變、家言與官學之代興、秦焚書與夫漢表彰五經之內蘊，皆有深入闡析，言人所不能言。而尤於新莽代漢而起之思想依據特多創發。政治方面，於封建與郡縣制度之曲折遞變、朝廷對匈奴之態度變化、漢武重農輕商之經濟政策，皆有精密探討。而其論政治始終從經濟民生與下層社會

實況著眼，尤有巨眼深識。學術、政治、社會三者會通而觀，明通變，知是非，實爲本書最著精神處。學者讀此一編，當可於治史方法得大啟悟。

本書自四十六年四月初版後未再改版，七十四年一月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第四版。今即以此版爲底本，詳加校勘，重新付排。初版所據原稿本爲北大油印講義，訛誤難免，今悉查對各書原文改正。原版版式較緊湊，今則改從寬舒，以便閱讀。又全書新加書名號、私名號，並補列若干重要出處。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之處，料將不免，敬希讀者指正。

本書由張蓓蓓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民國二十年秋，余膺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講座，開始撰寫講義兩種。一爲近三百年學術史，一爲秦漢史。越一年，秦漢史寫至王莽，近三百年學術史寫至李穆堂，皆未完編。自後乃專力撰

寫學術史。二十二年秋，又開始講通史，計劃爲通史編講義。而秦漢史一稿，遂竟擱置，未獲續成。二十六年，奔亡湘濵，秦漢史講義舊稿亦未携帶，蓋視同敝帚，不屑以自珍矣。

三十八年，再度奔亡來香港。越年冬，去臺北，北大舊同學張君基瑞來謁。談次，袖出秦漢史油印講義一册，曰：此書於流離中常置行篋，迄今且二十年，吾師殆已忘棄。願爲題數字，聊作紀念。因率題數行歸之。

四十年冬，重去臺北。越年春，清華舊同學陶君元珍來謁。談次，復及此稿，曰：昔在清華研究院，聽吾師講秦漢史，油印講義，尙留行篋中。此稿已越二十年，吾師曷不刊而布之，以惠學者？余曰：此稿未終編。即西漢一代，亦尙多重要節目，須續寫東漢時再牽連補及。且此稿歷二十年，始終未再加整理，當時編寫匆促，殆不足復存。陶君曰：不然。師此稿，實多創見。國史大綱論述秦漢，有語焉不詳，不如此稿之暢竭者。復多絕未提及者。此二十年來，雖不斷有關於秦漢史之著述問世，然師此稿所創見，實多並世學人所未及。且師此稿，其行文體裁，亦屬別創，堪爲後來寫新史者作參考。著述行世，各有影響，何必一一求如精金美玉，絕無瑕疵，乃可刊布乎？越日，陶君持油印講義來，曰：以此相贈。師返港，可即付梓人也。乃余膺奇禍，幸得不死。秋返港，即創始屬草宋明理學概述。此稿插書架，未暇理會。友人某君見之，曰：暫借一

讀，不日可歸。事隔有年，渾忘借者何人。遍詢相知，皆曰未借。則此稿雖在人世，固已杳如黃鶴，一去不復返矣。

四十五年夏，重去臺北，偶與北大舊同學數人談此事。或曰：張君基瑞有此稿，當囑其送來。越日，張君果携來。赫然見舊題，乃頓憶前事。余笑曰：余於此稿，初不自珍惜。自陶君一本失去，乃若人面桃花，倍滋眷念。今重獲此本，眞是自由天壤間惟一孤本矣。此亦二十五年前一番心血所注也。子當以相贈，吾歸，必亟刊行之。張君曰：此固某等之所望也。然此本流竄相隨，越二十年，師付印後，盼仍保此原本見歸。余諾之。然爲張君此一語，彌感於陶君有歉然。抑陶君所贈本，乃由清華油印，尚在此本之後，或於此本文字有異同，今亦漫不記省，無可再校核矣。

秋返港，乃始開卷細讀，恍如晤對二十餘年前故人，縱談秦漢間事。雖不能一一盡如我意，要之此君所言，如出我肺腑間，眞所謂相視莫逆，心悅而解，其爲快何如耶！因遂校其譌文，稍稍補申其語氣未足，而一仍其內容舊貫，以付梓人焉。

排字既竟，因備述付印經過。而復有一事，必鄭重告讀吾書者。蓋此書僅是一講義，備便講述。學者就吾所講，退而循誦馬、班兩史，庶有窺乎秦漢兩代史迹之大概。即有精治馬、班原

史，涉獵吾書，亦足供討論鑽研之一助。若讀者嬾窺舊史，謂治吾書即是讀秦漢史，此則吾罪滋甚，決非余刊行此稿之用意也。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錢穆自識於香港九龍鑽石山㢝廬。

國史大綱　出版說明

民國二十二年秋，錢賓四先生在北京大學開授中國通史課程。其前此課由校方分延北平史學斷代專家凡十餘人，輪流作專題講演；至是改而公推先生一人獨任講授。當時爲配合每週四小時課程之安排，其講授務求本諸客觀史實，對歷代之文治武功、制度經濟，皆能提綱挈領，兼羅並包，而尤要則著眼於全部國史之上下相關處，求其成一大體。第二年並就每講編一綱要；又別就所講須深入討論之問題，自二十四史、三通等古籍，選錄原文，纂爲參考材料，俾聽者自加參研。綱要編至東漢止，自嫌太簡，遂未續編。而參考材料亦下迄唐五代而止，由北京大學講義部印行，專供北大學生之用。

二十六年七月，蘆溝橋事變，先生避難南下，轉香港，至湖南，隨北大加入當時與清華、南開合組之長沙臨時大學。二十七年初，學校遷昆明，命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而文學院則轉遷蒙自，先生隨往任教。

先生在北大講授通史，先後凡四年；後在西南聯大，續講兩年。每年所講內容皆有所增損，

然其大宗旨則始終不變。其在聯大，同事陳夢家教授嘗兩度力勸先生，宜應時代之迫切需要，即爲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俾可使全國青年受益。先生納其議，遂決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此本書撰著之最先因緣也。

二十七年秋，聯大文學院由蒙自遷返昆明，先生以昆明煩囂，不宜著述，故除半週任課外，其餘半週則卜居宜良。因友人之介，得獨自借居宜良縣長座落城外西山岩泉下寺之別墅，不接人事，專意撰著。先生自在北大講授通史，每堂先一日必寫錄所需史料，累積得五六厚册；至流遷南嶽、蒙自，又續有添寫。此則先生在宜良山中撰寫史綱所憑之惟一祖本也。

先生之撰是書，其先就北大所編綱要，自魏晉以下續編之。及初稿既成，復嫌其東漢以前舊稿文例詳略未盡相協，因又重加改寫。依先生自記，自二十七年五月十日，至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先後凡十三月而書成。全書計凡八編，四十六章，約五十餘萬言。稿既成，以其時昆明屢遭空襲，急欲付印，乃於二十八年暑假赴香港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商務雖已遷港，惟仍須交回上海舊廠付排。先生昔就讀常州府中學堂之業師呂思勉先生，時任上海光華大學教授；先生因拜託呂先生代作最後一校。呂先生既校讀是書，特盛讚其中論南北經濟一節，又謂：「書中敍魏晉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調，其間演變，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此書所論誠千載隻眼也。」

然是書之印行，復遇曲折。蓋當時規定，書籍出版須先經中央某處審查；上海遂將書稿送重慶審查。批示謂需改「洪楊之亂」爲「太平天國」；章中多條亦須重加改定後，呈請再審。稍後先生始知其事，乃作答云：「孫中山先生以得聞洪楊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親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滿清政府，創建中華民國，始是一項正式的民族革命。至於洪楊起事，尊耶穌爲天兄，洪秀全自居爲天弟，創建政府稱爲太平天國；又所至焚燬孔子廟；此斷與民族革命不同。前後兩事絕不當相提並論。凡本書指示需改定語，可由審查處逕加改定。原著作人當保存原稿，俟抗戰事定，再公之國人，以待國人之公評。」審查處得先生函，乃改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亦因之延遲半年，故其初版面世，則已至二十九年之六月矣。

是書卷首有引論一篇，凡兩萬言，揭櫫全書之精神宗旨與撰著方法。先生於稿成後，先披載之報端，一時議者鬨然。及其書出，學者交相稱譽，羣推爲中國通史之最佳著作；而議者遂寢。然是書出版後，僅最先一批數百本得經海運河內，轉運後方。此後海運即斷，不得再送。於是改在重慶以國難版發行。當時有人購得滬初版攜返北平，知者乃有輾轉借來整書傳鈔者。其對學界以至一般社會影響之深遠，亦於此可見一斑。

本書因用大學教科書體例寫成，不得不力求簡要，故以綱目體出之，僅舉大綱，刪其瑣節。

正文為綱要，而輔以低格注文或行中夾注，為相關之論證與補充說明，務求要言不煩，綱舉目張。內容於學術思想、政治制度、社會風氣、國際形勢，兼有顧及；惟但求其通為一體，明其治亂盛衰之所由，闡其一貫相承之為統，以指陳吾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至其人物之詳、事業之備，則待教者、學者之自加參考與引伸。而所以呈現之者，則祛門戶之私見，在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探取其發展動態之所在。如戰國則重在學術思想，秦漢則重在政治制度，三國、魏、晉則重在社會經濟之類，其闡述之著眼點即在發明各時期之如何為變。蓋謂「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也。要皆不尚空論，一一歸本於史實。其主要宗旨，在以有限之篇幅，扼要之敍述，一則「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眞相，明白示人，為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再則「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為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蓋欲藉歷史知識之培養，以為國人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鑑。以其符合時代需求，所以風行海內外數十年，歷久而彌新，其意義與價值始終不稍減也。

本書自民國二十九年六月滬初版以還，版行無數。本會亦未能盡搜，所得而知者，計有三十二年八月成都蓉一版、三十三年一月重慶一版、三十六年五月滬一版、三十七年八月滬五版、四

十一年九月臺一版、四十四年港特版、四十九年臺七版、六十三年九月臺修訂一版、八十年四月臺修訂十七版等。六十三年修訂時曾改訂第一編第一章考古部分；同時由王恢教授代繪助讀地圖，增入凡二十八幅。

先生生前嘗謂本書當與其中國文化史導論合讀，庶可對我國歷史之全體有更深入之認識，但惜其文化史未如史綱之爲社會所注意，常以爲憾。民國八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決定出版先生全集，編委會因提前整理此兩種，並於八十二年先交臺北商務印書館，據此最新整理者改版印行修訂二版。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亦同時重印此兩書之新修訂本，以爲先生百年誕辰之紀念。

又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臺北東昇文化事業公司印行中國通史參考材料一書，即先生在北大通史課所編發學生之參讀材料。先生以原編材料未完，且其後屢有增改，而其要義亦已寫入國史大綱之中，因不主再將初編材料重印。故今編全集，乃承先生遺命，不再收入此編。

本書之整理，乃以民國六十三年臺北商務修訂本爲底本，參考其前各本，正其綱目、注文之錯紊；原書引文起訖多無標示，今悉予補入引號；其引文亦儘量複查校覈。各版除雙行夾注用小字外，其餘字體一例無別；今則綱目別排較大字體，務求眉目清楚，更便讀者閱讀。本書內容繁富，關涉甚廣，整理工作雖力求慎重，惟錯誤疏漏，料將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何澤恆先生、張蓓蓓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引論

一

中國爲世界上歷史最完備之國家，舉其特點有三。一者「悠久」。從黃帝傳說以來約得四千六百餘年。從古竹書紀年載夏以來，約得三千七百餘年。夏四七二，殷四九六，周武王至幽王二五七，自此以下至民國紀元二六八一。二者「無間斷」。自周共和行政以下，明白有年可稽。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七五二。自魯隱公元年以下，明白有月日可詳。春秋編年從此始，下至民國紀元二六三三。魯哀公卒，左傳終，中間六十五年史文稍殘缺。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資治通鑑託始，至民國紀元凡二三一四年。三者「詳密」。此指史書體裁言。要別有三：一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可看四庫書目史部之分類。又中國史所包地域最廣大，所含民族分子最複雜，因此益形成其繁富。若一民族文化之評價，與其歷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則我華夏文化，於並世固當首屈一指。

然中國最近，乃爲其國民最缺乏國史智識之國家。何言之？「歷史智識」與「歷史材料」不同。我民族國家已往全部之活動，是爲歷史。其經記載流傳以迄於今者，只可謂是歷史的材料，而非吾儕今日所需歷史的智識。材料累積而愈多，智識則與時以俱新。歷史智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智識，貴能鑒古而知今。至於歷史材料，則爲前人所記錄，前人不知後事，故其所記，未必一一有當於後人之所欲知。然後人欲求歷史智識，必從前人所傳史料中覓取。若蔑棄前人史料而空談史識，則所謂「史」者非史，而所謂「識」者無識，生乎今而臆古，無當於「鑒於古而知今」之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刀藥？僅爲一種凴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爲，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凡對於已往歷史抱一種革命的蔑視者，此皆一切眞正進步之勁敵也。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眞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眞實之改進。故所貴於歷史智識者，又不僅於鑒古而知今，乃將爲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也。

且人類常情，必先「認識」乃生「情感」。人最親者父母，其次兄弟、夫婦乃至朋友。凡其所愛，必其所知。人惟爲其所愛而奮鬬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

求人之敬事上帝，必先使知有上帝之存在，不啻當面覿體焉，又必使熟知上帝之所以爲上帝者，而後其敬事上帝之心油然而生。人之於國家民族亦然。惟人事上帝本乎信仰，愛國家民族則由乎知識，此其異耳。人之父母，不必爲世界最崇高之人物；人之所愛，不必爲世界最美之典型，而無害其爲父母，爲所愛者。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爲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爲其民族眞奮鬪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今國人方蔑棄其本國已往之歷史，以爲無足重視；既已對其民族已往文化，懵無所知，而猶空呼愛國。此其爲愛，僅當於一種商業之愛，如農人之愛其牛。彼僅知彼之身家地位有所賴於是，彼豈復於其國家有逾此以往之深愛乎！凡今之斷脰決胸而不顧，以效死於前敵者，彼則尚於其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有其一段眞誠之深愛；彼固以爲我神州華裔之生存食息於天壤之間，實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眞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眞實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歷史智識，其要在此。

二

略論中國近世史學，可分三派述之。一曰傳統派，亦可謂「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謂「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可謂「考訂派」。「傳統派」主於記誦，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亦間為校勘輯補。此派乃承前清中葉以來西洋勢力未入中國時之舊規模者也。其次曰「革新派」，則起於清之季世，為有志功業、急於革新之士所提倡。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於歷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於缺乏系統，無意義，乃純為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寧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諳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於世，亦將有益於己。至「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為有意義，能具系統，能努力使史學與當身現實相綰合，能求把握

全史，能時時注意及於自己民族國家已往文化成績之評價。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論意見，多能不脛而走，風靡全國。今國人對於國史稍有觀感，皆出數十年中此派史學之賜。雖然，「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甚者，對於二、三千年來積存之歷史材料，亦以革新現實之態度對付之，幾若謂此汗牛充棟者，曾無一顧盼之價值矣。因此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於史實，往往一無所知。彼之所謂系統，不啻爲空中之樓閣。彼治史之意義，轉成無意義。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綰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眞切沉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僞造智識者，智識既不眞，事功亦有限。今我國人乃惟乞靈於此派史學之口吻，以獲得對於國史之認識，故今日國人對於國史，乃最爲無識也。

三

所謂「革新派」之史學，亦隨時遞變。約言之，亦可分爲三期。其先當前淸末葉。當時，有

志功業之士所渴欲改革者，厥在「政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政體之歷史也。」彼輩謂：「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譜。」彼輩於一切史實，皆以「專制黑暗」一語抹殺。彼輩對當前病證，一切歸罪於二千年來之專制。然自專制政體一旦推翻，則此等議論，亦功成身退，爲明日之黃花矣。繼「政治革命」而起者，有「文化革命」。彼輩之目光，漸從「政治」轉移而及「學術思想」，於是其對國史之論鋒，亦轉集於「學術思想」之一途。故彼輩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停滯無進步，而一切事態，因亦相隨停滯不進。」彼輩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孔學所掩脅。」或則謂：「二千年來思想，皆爲老學所痲醉。」故或則以當前病態歸罪孔子，或則歸罪於老子。或謂：「二千年來思想界，莫不與專制政體相協應。」或則謂：「此二千年來之思想，相當於歐洲史之所謂『中古時期』。」要之如一丘之貉，非現代之所需。」或則謂：「思想限制於文字，欲一掃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思想之沉痼積痗，莫如並廢文字，創爲羅馬拼音，庶乎有瘳。」然待此等宣傳成功，則此等見識，亦將爲良弓之藏。繼「文化革命」而起者，有「經濟革命」。彼輩謂：「無論『政治』與『學術』，其後面常爲『社會形態』所規定。故欲切實革新政治機構、學術內容，其先應從事於『社會經濟形態』之改造。」彼輩對於當前事態之意見，影響及於論史，則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一『封

建時期』也。二千年來之政治，二千年來之學術，莫不與此二千年來之社會經濟形態，所謂『封建時期』者相協應。」正惟經濟改革未有成功，故此輩議論，猶足以動國人之視聽。有治史者旁睨而噓曰：「國史浩如煙海，我知就我力之所及，爲博洽諦當之記誦而已，爲精細綿密之考訂而已，何事此放言高論爲！」雖然，國人之所求於國史略有知，乃非此枝節煩瑣之考訂，亦非此繁重龐雜之記誦，特欲於國家民族已往歷史文化有大體之瞭解，以相應於其當身現實之所需知也。有告之者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也。」則彼固已爲共和政體下之自由民矣，無怪其掉頭而不肯顧。或告之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孔子、老子中古時期思想所支配下之歷史也。」則彼固已呼吸於二十世紀新空氣之仙囿，於孔、老之爲人與其所言，固久已鄙薄而弗覩，闇留而無知，何願更爲陳死人辨此宿案，亦無怪其奮步而不肯留。或告之曰：「我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封建社會之歷史耳，雖至今猶然，一切病痛盡在是矣。」於是有志於當身現實之革新，而求知國史已往之大體者，莫不動色稱道，雖牽鼻而從，有勿悔矣。然竟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爲無國史智識之民族也。

四

前一時代所積存之歷史材料，既無當於後一時期所需要之歷史智識，故歷史遂不斷隨時代之遷移而變動改寫。就前有諸史言之，尙書爲最初之史書，然書缺有間，此見其時中國文化尙未到達需要編年史之程度。其次有春秋，爲最初之編年史。又其次有左傳，以網羅詳備言，爲編年史之進步。然其時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祭祀乃常事，常事可以不書，兵戎非常事，故左傳所載，乃以列國之會盟與戰爭爲主，後人譏之爲「相斫書」焉。又其次爲史記，乃爲以人物爲中心之新史，徵其時人物個性之活動，已漸漸擺脫古代封建、宗法社會之團體性而嶄然露頭角也。又其次爲漢書，爲斷代作史之開始，此乃全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其政權已臻穩固後之新需要。自此遂形成中國列代之所謂「正史」，繼此而復生「通史」之新要求。於是而有杜佑通典，此爲「政書」之創作，爲以制度爲骨幹之新史，非政體沿革到達相當程度，不能有此。又繼而有通鑑，爲編年之新通史。又次而有各史紀事本末，爲以事件爲中心之新史之再現。然如袁氏通鑑紀事本末，取材只限於通鑑，則貌變而實未變也。於是而有鄭樵通志之所謂二十略，其歷史眼光，乃超

出於政治人物、人事、年月之外。其他如方志，如家譜，如學案，形形色色，乘一時代之新需要而創造新體裁者，不勝縷舉。要之自尙書下逮通志，此皆有志於全史整面之敍述。今觀其相互間體裁之不同，與夫內容之差別，可知中國舊史，固不斷在改寫之中矣。

自南宋以來，又七百年，乃獨無繼續改寫之新史書出現。此因元、淸兩代皆以異族入主，不願國人之治史。明廁其間，光輝乍闢，翳霾復興，遂亦不能有所修造。今則爲中國有史以來未有的變動劇烈之時代，其需要新史之創寫尤亟。而適承七百年來史學衰微之末運，因此國人對於國史之認識，乃愈昏昧無準則。前述記誦、考訂、宣傳諸派，乃亦無一能發願爲國史撰一新本者，則甚矣史學之不振也。

今日所需要之國史新本，將爲自尙書以來下至通志一類之一種新通史。此新通史應簡單而扼要，而又必具備兩條件：一者必能將我國家民族已往文化演進之眞相，明白示人，爲一般有志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文化、思想種種演變者所必要之智識；二者應能於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中國種種複雜難解之問題，爲一般有志革新現實者所必備之參考。前者在積極的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爲全部歷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消極的指出國家民族最近病痛之證候，爲改進當前之方案所本。此種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務，尤在將國史眞態，傳播於國人之前，使

曉然了解於我先民對於國家民族所已盡之責任，而油然與其慨想，奮發愛惜保護之摯意也。

此種通史，無疑的將以記誦、考訂派之工夫，而達宣傳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將從積存的歷史材料中出頭，將於極艱苦之準備下，呈露其極平易之面相。將以專家畢生盡氣之精力所萃，而為國人月日瀏覽之所能通貫。則編造國史新本之工作，其為難於勝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見矣。

五

「一部二十四史，從何說起？」今將為國史寫一簡單扼要而有系統之新本，首必感有此苦。其將效記誦、考訂派之所為乎？則必泛濫而無歸。其將效宣傳革新派之所為乎？又必空洞而無物。凡近代革新派所注意者有三事：首則曰政治制度，次則曰學術思想，又次則曰社會經濟。此三者，「社會經濟」為其最下層之基礎，「政治制度」為其最上層之結頂，而「學術思想」則為其中層之幹柱。大體言之，歷史事態，要不出此三者之外。今將輕重先後，分主客取捨於其間乎？抑兼羅並包，平等而同視之乎？

曰，姑捨此。能近取譬，試設一淺喻。今人若為一運動家作一年譜或小傳，則必與為一音樂

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遠異矣。即為一網球家作小傳或年譜，則又必與為一足球家所作者，其取材詳略存滅迥別矣。何以故？以音樂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與運動家不同故；以網球家之個性與環境與事業之發展，又與足球家不同故；一人如此，一民族、一國家亦然。寫國史者，必確切曉瞭其國家民族文化發展「個性」之所在，而後能把握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而寫出其特殊之「精神」與「面相」。然反言之，亦惟於其特殊之環境與事業中，乃可識其個性之特殊點。如此則循環反覆，欲認識一國家、一民族特殊個性之所在，乃並不如認識一網球家或足球家之單純而簡易。要之必於其自身內部求其精神、面相之特殊個性，則一也。

何以知網球家之個性？以其忽然投入於網球家之環境，而從事於網球之活動故。其他一切飲食、起居、嗜好、信仰，可以無所異於人。若為網球家作年譜，而鈔襲某音樂家已成年譜之材料與局套，則某年音樂大會，其人既無預；某年歌曲比賽，其人又不列。其人者，乃可於音樂史上絕無一面。不僅了不異人，抑且有不如無。不知其人之活動與事業乃在網球不在音樂。網球家之生命，不能於音樂史之過程中求取。乃不幸今日之治國史者，竟蹈此弊。

以言政治，求一屢爭不捨、僅而後得之代表民意機關，如英倫之「大憲章」與「國會」之創

興而無有也。又求一轟轟烈烈，明白痛快，如法國「人權大革命」之爆發，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專制黑暗之歷史」矣。以言思想，求一如「文藝復興運動」以來，各國學者蓬勃四起，各爲其國家民族創造其特有新興之文學而無有也。又求一如馬丁路德，明揭「信仰自由」之旗幟，以與羅馬教皇力抗，軒然興起全歐「宗教革命」之巨波，而更無有也。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束縛於一家思想之下」矣。以言經濟，求一如噶馬、如哥倫布鑿空海外，發現新殖民地之偉跡而渺不可得；求如今日歐、美社會之光怪陸離，窮富極華之景象，而更不可得。則無怪於謂：「自秦以來二千年，皆沉眠於封建社會之下，長夜漫漫，永無旦日」矣。凡最近數十年來有志革新之士，莫不謳歌歐、美，力求步趨，其心神之所嚮往在是，其耳目之所聞覩亦在是。迷於彼而忘其我，拘於貌而忽其情。反觀祖國，凡彼之所盛自張揚而誇道者，我乃一無有。於是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乃若一冬蟄之蟲，生氣未絕，活動全失。彼方目眵神炫於網球場中四圍之采聲，乃不知別有一管弦競奏、歌聲洋溢之境也則宜。故曰：治國史之第一任務，在能於國家民族之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

六

凡治史有兩端：一曰求其「異」，二曰求其「同」。何謂求其異？凡某一時代之狀態，有與其先、後時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劃分一時代之「特性」。從兩「狀態」之相異，即兩個「特性」之啣接，而劃分爲兩時代。從兩時代之劃分，而看出歷史之「變」。從「變」之傾向，而看出其整個文化之動態。從其動態之暢遂與夭閼，而衡論其文化之爲進退。此一法也。何謂求其同？從各不同之時代狀態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啣接、相連貫而成一整面，此爲全史之動態。以各段之「變」，形成一全程之「動」。即以一整體之「動」，而顯出各分部之「變」。於諸異中見一同，即於一同中出諸異。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爲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爲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此謂求其同。此又一法也。

故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夸大之私，亦不必先抱一門戶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學術思想」，例如戰國先秦。我即著眼於當時之學術思想而

看其如何爲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政治制度」，例如秦漢。我即著眼於當時之政治制度而看其如何爲變。若某一時代之變動在「社會經濟」，例如三國魏晉。我即著眼於當時之社會經濟而看其如何爲變。「變」之所在，即歷史精神之所在，亦即民族文化評價之所繫。而所謂「變」者，即某種事態在前一時期所未有，而在後一時期中突然出現。此有明白事證，與人共見，而我不能一絲一毫容私於其間。故曰：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也。革新派言史，每曰「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云云，是無異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無變，即不啻謂中國自秦以來二千年歷史無精神、民族無文化也。其然，豈其然？

七

今於國史，若細心籀其動態，則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於「和平」中得進展是也。歐洲史每常於「鬬爭」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劃界線的時期，常在驚心動魄之震盪中產生。若以此意態來看中國史，則中國常如昏騰騰地沒有長進。中國史上，亦有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鬬爭，不幸此等常爲紛亂犧牲，而非有意義的劃界線之進步。秦末劉、項之亂，

可謂例外。明祖崛起，掃除胡塵，光復故土，亦可謂一個上進的轉變。其他如漢末黃巾，乃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全是混亂破壞，只見倒退，無上進。近人治史，頗推洪、楊。夫洪、楊爲近世中國民族革命之先鋒，此固然矣。然洪、楊十餘年擾亂，除與國家社會以莫大之創傷外，成就何在？建設何在？此中國史上大規模從社會下層掀起的鬪爭，常不爲民族文化進展之一好例也。然中國史非無進展，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若空洞設譬，中國史如一首詩，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令人不可劃分。所以詩代表中國文學之最美部分，而劇曲之在中國，不佔地位。西洋則以作劇爲文學家之聖境。即以人物作證，蘇格拉底死於一杯毒藥，耶穌死於十字架，孔子則夢奠於兩楹之間，晨起扶杖消遙，詠歌自輓。三位民族聖人之死去，其景象不同如此，正足反映民族精神之全部。再以前舉音樂家與網球家之例喻之，西洋史正如幾幕精采的硬地網球賽，中國史則直是一片琴韻悠揚也。

八

姑試略言中國史之進展。就政治上言之，秦、漢大一統政府之創建，已爲國史闢一奇蹟。近人好以羅馬帝國與漢代相擬，然二者立國基本精神已不同。羅馬乃以一中心而伸展其勢力於四圍。歐、亞、非三洲之疆土，特爲一中心強力所征服而被統治。僅此中心，尚復有貴族、平民之別。一旦此中心上層貴族漸趨腐化，蠻族侵入，如以利刃刺其心窩，而帝國全部，即告瓦解。此羅馬立國形態也。秦、漢統一政府，並不以一中心地點之勢力，征服四圍，實乃由四圍之優秀力量，共同參加，以造成一中央。且此四圍，亦更無階級之分。所謂優秀力量者，乃常從社會整體中，自由透露，活潑轉換。因此其建國工作，在中央之締構，而非四圍之征服。羅馬如於一室中懸巨燈，光耀四壁；秦、漢則室之四周，遍懸諸燈，交射互映；故羅馬碎其巨燈，全室即暗，秦、漢則燈不俱壞光不全絕。因此羅馬民族震鑠於一時，而中國文化則輝映於千古。我中國此種立國規模，乃經我先民數百年慘澹經營，艱難締構，僅而得之。以近世科學發達，交通便利，美人立國，乃與我差似。如英、法諸邦，則領土雖廣，惟以武力貫徹，猶惴惴懼不終日。此皆羅馬之遺式，非中國之成規也。

談者好以專制政體爲中國政治詬病，不知中國自秦以來，立國規模，廣土衆民，乃非一姓一家之力所能專制。故秦始皇始一海內，而李斯、蒙恬之屬，皆以游士擅政，秦之子弟宗戚，一無

預焉。漢初若稍稍欲返古貴族分割宰制之遺意，然卒無奈潮流之趨勢何！故公孫弘以布衣爲相封侯，遂破以軍功封侯拜相之成例，而變相之貴族擅權制，終以告歇。博士弟子，補郎、補吏，爲入仕正軌，而世襲任蔭之恩亦替。自此以往，入仕得官，遂有一公開客觀之標準。「王室」與「政府」逐步分離，「民眾」與「政府」則逐步接近。政權逐步解放，而國家疆域亦逐步擴大，社會文化亦逐步普及。總觀國史，政制演進，約得三級：由封建而躋統一，一也。（此在秦、漢完成之。）由宗室、外戚、軍人所組之政府，漸變而爲士人政府，二也。（此自西漢中葉以下，迄於東漢完成之。）由士族門第再變而爲科舉競選，三也。（此在隋、唐兩代完成之。）惟其如此，「考試」與「銓選」，遂爲維持中國歷代政府綱紀之兩大骨幹。全國政事付之官吏，而官吏之選拔與任用，則一惟禮部之考試與吏部之銓選是問。此二者，皆有客觀之法規，爲公開的準繩，有皇帝（王室代表。）所不能搖，宰相（政府首領。）所不能動者。若於此等政制後面推尋其意義，此即禮運所謂「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之旨。就全國民眾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復於此種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再就其服務成績，而定官職之崇卑與大小。此正戰國晚周諸子所極論深覬，而秦、漢以下政制，即向此演進。特以國史進程，每於和平中得伸展，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國歷來政制，惟有專制黑暗，不悟政制後面，別自有一種理性精神爲之指導也。

談者又疑中國政制無民權，無憲法。然民權亦各自有其所以表達之方式與機構，能遵循此種

方式而保全其機構，此即立國之大憲大法，不必泥以求也。中國自秦以來，既爲一廣土眾民之大邦，如歐西近代所行民選代議士制度，乃爲吾先民所弗能操縱。然誠使國家能歷年舉行考試，平均選拔各地優秀平民，使得有參政之機會；又立一客觀的服務成績規程，以爲官位進退之準則，則下情上達，本非無路。晚清革命派，以民權憲法爲推翻滿清政府之一種宣傳，固有效矣。若遂認此爲中國歷史眞相，謂自秦以來，中國惟有專制黑暗，若謂「民無權，國無法」者已二千年之久，則顯爲不情不實之談。民國以來，所謂民選代議之新制度，終以不切國情，一時未能切實推行。而歷古相傳「考試」與「銓選」之制度，爲維持政府紀綱之兩大骨幹者，乃亦隨專制黑暗之惡名而俱滅。於是一切官場之腐敗混亂，胥乘而起，至今爲厲。此不明國史眞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所應食之惡果也。

中國政制所由表達民權之方式與機構，既與近代歐人所演出者不同。故欲爭取民權，而保育長養之，亦復自有其道。何者？彼我立國規模既別，演進淵源又不同。甲族甲國之所宜，推之乙族乙國而見窒礙者，其例實夥。凡於中國而輕言民眾革命，往往發動既難，收拾亦不易，所得不如其所期，而破壞遠過於建設。所以國史常於和平中得進展，而於變亂中見倒退者，此由中國立國規模所限，亦正我先民所貽政制，以求適合於我國情，而爲今日吾人所應深切認識之一事。若

復不明國史眞相，妄肆破壞，輕言改革，則又必有其所應食之惡果在矣。

九

其次請言學術思想。談者率好以中國秦以後學術，擬之歐洲之「中古時期」。然其間有難相比並者。歐洲中古時期之思想，以「宗教」爲主腦，而中國學術界，則早脫宗教之羈絆。姑以史學言，古者學術統於王官，而史官尤握古代學術之全權。「史」者，乃宗廟職司之一員，故宗教、貴族、學術三者，常相合而不相離。孔子始以平民作新史而成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皆政治社會實事，不語怪力亂神，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自有孔子，而史學乃始與宗教、貴族二者脫離。然西漢司馬氏尙謂：「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以倡優畜之。」此非憤辭，乃實語。漢代太史屬於太常，則爲宗廟職司之一員。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與太史，同爲太常屬下之六令丞。太樂之下，自有倡優。宗廟祭祠，太史與倡優同有其供奉之職。則史學仍統於皇帝、宗廟、鬼神之下。然司馬氏不以此自限，發憤爲史記，自負以續孔子之春秋；即對當朝帝王卿相種種政制事態，質實而書，無所掩飾。司馬氏不以得罪。

及東漢班氏，以非史官，爲史下獄，然尋得釋，所草懸爲國史。自此以往，中國史學，已完全由皇帝、宗廟下脫出，而爲民間自由製作之一業焉。

且王官之學，流而爲百家，於是「史官」之外，復有「博士」。此二官者，同爲當時政治組織下專掌學術之官吏。「史官」爲古代王官學之傳統，而「博士官」則爲後世新興百家學之代表。博士亦屬太常，是學術仍統於宗廟也。然太史僅與星曆卜祝爲伍，而博士得預聞朝政，出席廷議而見諮詢，則社會新興百家學，已駕古代王官學而上之矣。然自秦以來，占夢、求仙之術，皆得爲博士，猶在帝王所好。及漢武聽董仲舒議，罷黜百家，專立五經博士，於是博士性質，大見澄清；乃始於方技神怪旁門雜流中解放，而純化爲專治歷史與政治之學者，所謂「通經致用」，即是會通古代歷史知識，在現實政治下應用。又同時兼負國家教育之責。而博士弟子，遂爲入仕惟一正途。於是學術不僅從「宗教」勢力下脫離，並復於「政治」勢力下獨立。自此以往，學術地位，常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復常盡其指導政治之責任。而政治亦早與宗教分離，故當時中國人所希冀者，乃爲地上之王國，而非空中之天國也。孔子成春秋，前耶穌降生四百八十年。馬遷爲史記，亦前耶穌降生一百年。其時中國政治社會，正向一合理的方向進行，人生之倫理教育，即其「宗教」，無所仰於渺茫之靈界；而羅馬則於貴族與軍人之對外侵略與對內奢縱下覆滅。耶教之推行，正因當

時歐人無力建造合理之新國家，地上之幸福既渺不可望，乃折而歸嚮上帝。故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特承續當時政治組織之空隙而起，同時又替代一部分（或可說大部分。）政治之任務。若必以中國史相擬，惟三國魏晉之際，統一政府覆亡，社會紛亂，佛教輸入，差為近之。然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之理論，仍沿兩漢而來。當時帝王卿相，誠心皈依佛教者，非無其人；要之，僧人與佛經，特為人生一旁趣，始終未能篡奪中國傳統政治社會之人生倫理教育而與為代興。隋唐統一政府復建，其精神淵源，明為孔子、董仲舒一脈相傳之文治思想，而佛教在政治上，則無其指導之地位。西洋所謂「國家建築於宗教之上」之觀感，在中國則絕無其事。繼隋唐統一之盛運而起者，有禪宗思想之盛行。禪宗教理，與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態度路徑，正有相似處。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長期間慘酷的普遍相互屠殺，而中國則無之者，以中國佛教仍保其原來一種超世間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攬政治、經濟種種俗世權利於一身，因此由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牽連發生世態之擾動也。中國佛教雖盛極一時，而猶始終保全其原來超世間的本色者，則因中國政治社會一切世事，雖有漢末以及五胡之一段擾亂，而根本精神依然存在。東晉南北朝以迄隋唐，仍從此源頭上演進，與西洋之自羅馬帝國解紐以後，政治社會即陷入黑暗狀態者不同也。何以西洋自羅馬帝國覆亡，即陷入一黑暗時期之慘運，而中國漢亡以後幸不然？

則以羅馬建國，本與漢代精神不同。羅馬乃以貴族與軍人之向外征服立國，及貴族、軍人腐敗墮落，則其建國精神已根本不存在。北方蠻族，在先既受不到羅馬文化之薰陶，及其踏破羅馬以後，所得者乃歷史上一個羅馬帝國軀殼之虛影，至於如何創建新國家之新精神，則須在其自身另自產生。要之，北方蠻族之與羅馬帝國，乃屬兩個生命，前者已老死，後者未長成，故中間有此一段黑暗。至於漢代統一政府之創興，並非以一族一系之武力征服四圍而起，乃由當時全中國之文化演進所醞釀、所締構而成此境界。換言之，秦、漢統一，乃晚周先秦平民學術思想盛興後，伸展於現實所應有之現象；並不如西洋史上希臘文化已衰，羅馬民族崛起，仍是兩個生命，不相銜接也。漢代之覆亡，特一時王室與上層政府之腐敗；而所由締構此政府、推戴此王室之整個民族與文化，則仍自有其生命與力量。故漢末變亂，特如江上風起，水面波興，而此滔滔江流，不爲廢絕。且當時五胡諸蠻族，中國延之入內地者，自始即與以中國傳統文化之薰陶，故彼輩雖乘機騷動，而彼輩固已同飲此文化之洪流，以澆溉其生機，而浸潤其生命。彼輩之紛起迭興，其事乃僅等於中國社會內部自身之一種波動。惟所缺者，在其於中國文化洪流中，究竟澆溉未透、浸潤未深而已。然隋唐統一盛運，仍襲北朝漢化之復興而起。如此言之，則淵源於晚周先秦，遞衍至於秦漢、隋唐，此一脈相沿之學術思想，不能與羅馬覆亡後西洋史上之所謂「中古時期」之教

會思想相比，斷斷然矣。

北宋學術之興起，一面承禪宗對於佛教教理之革新，一面又承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上世族門第之破壞，實爲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學術思想自由活潑之一種新氣象也。若以此派學術與西洋中古時期之教會相比，更爲不倫。元明以下，雖懸程朱經說爲取士功令，然不得即目程朱爲當時之宗教。明代極多遵陸王而反抗程朱者，清代尤盛以訓詁考據而批駁程朱者。社會學術思想之自由，並未爲政治所嚴格束縛，宗教則更不論矣。

若謂中國學術，尙未演進達於西洋現代科學之階段，故以與西洋中古時期相比論；此亦不然。中國文化演進，別有其自身之途轍，其政治組織乃受一種相應於中國之天然地理環境的學術思想之指導，而早走上和平的大一統之境界。此種和平的大一統，使中國民族得繼續爲合理的文化生活之遞嬗。因此空中天國之宗教思想，在中國乃不感需要。亦正惟如此，中國政制常偏重於中央之凝合，而不重於四圍之吞併，其精神亦常偏於和平，而不重於富強；常偏於已有之完整，而略於未有之侵獲；對外則曰「昭文德以來之」，對內則曰「不患寡而患不均」。故其爲學，常重於人事之協調，而不重於物力之利用。故西洋近代科學，正如西洋中古時期之宗教，同樣無在中國自己產生之機緣。中國在已往政治失其統一，社會秩序崩潰，人民精神無可寄託之際，既可

接受外來之「宗教」，如魏、晉以下，迄隋、唐初期。中國在今日列強紛爭，專仗富強以圖存之時代，何嘗不可接受外來之「科學」？惟科學植根應有一最低限度之條件，即政治稍上軌道，社會稍有秩序，人心稍得安寧是也。此與宗教輸入之條件恰相反。而我國自晚清以來，政治驟失常軌，社會秩序，人民心理，長在極度搖兀不安之動盪中。此時雖謀科學之發達，而科學乃無發達餘地。論者又倒果爲因，謂科學不發達，則政治、社會終無出路。又輕以中國自來之文化演進，妄比之於西洋之中古時期，乃謂非連根剷除中國以往學術思想之舊傳統，即無以萌現代科學之新芽。彼乃自居爲「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之健者，而不悟史實並不如是。此又不明國史眞相，肆意破壞，輕言改革，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也。

一〇

請再言社會組織。近人率好言中國爲「封建社會」，不知其意何居？以政制言，中國自秦以下，即爲中央統一之局，其下郡、縣相遞轄，更無世襲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學術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學術流於民間，既不爲貴族世家所獨擅，又不爲宗教寺廟所專有。平民社會

傳播學術之機會，既易且廣，而學業即爲從政之階梯，白衣卿相，自秦以來即爾。既無特殊之貴族階級，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經濟情況而論，中國雖稱以農立國，然工商業之發展，戰國、秦、漢以來，已有可觀。惟在上者不斷加以節制，不使有甚貧、甚富之判。又政府既獎勵學術，重用士人，西漢之季，遂有「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之語。於是前漢貨殖、游俠中人，後漢多走入儒林、獨行傳中去。所以家庭溫飽，即從師問學，而一登仕宦，則束身禮義之中。厚積爲富，其勢不長，然亦非有世襲之貴人也。井田制既廢，民間田畝得自由賣買，於是而有兼併。然即如前漢封君，亦僅於衣租食稅而止。其封邑與封戶之統治，仍由國家特派官吏。以國家法律而論，封君之與封戶，實同爲國家之公民。後世如佃戶欠租，田主亦惟送官法辦，則佃戶之賣田納租於田主，亦一種經濟契約之關係，不得目田主爲貴族、爲封君，目佃戶爲農奴、爲私屬。土地既非采邑，即難以「封建」相擬。然若謂中國乃資本主義之社會，則又未是。以中國傳統政治觀念，即不許資本勢力之成長也。

西洋史家有謂其歷史演變，乃自「封建貴族」之社會，轉而爲「工商資本」之社會者。治中國史者，以爲中國社會必居於此二之一，既不爲「工商資本」之社會，是必爲「貴族封建」之社會無疑。此猶論政制者，謂國體有君主與民主，政體有專制與立憲。此特往時西國學者，自本其

已往歷史演變言之。吾人反治國史，見中國有君主，無立憲，以謂是必「君主專制」無疑。不知人類政制，固有可以出於此類之外者。即如近來德、意、俄諸國，即非此等分類可包。然則中國已往政制，儘可有君主，無立憲，而非專制。中國已往社會，亦儘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適屨，謂人類歷史演變，萬逃不出西洋學者此等分類之外？不知此等分類，在彼亦僅爲一時流行之說而已。國人懶於尋國史之眞，勇於據他人之說，別有存心藉爲宣傳，可以勿論；若因而信之，謂國史眞相在是，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仍自有其應食之惡果在矣。

二

然則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其進步何在？曰：亦在於經濟地域之逐次擴大，文化傳播之逐次普及，與夫政治機會之逐次平等而已。其進程之遲速不論，而其朝此方向演進，則明白無可疑者。若謂其無淸楚界線可指，此即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得進展，實與我先民立國規模相副相稱，亦即我民族文化特徵所在也。

嘗謂世界羣族，其文化演進，主要者不越兩型：一者環地中海之四周，自埃及、巴比侖、愛

琴、波斯、希臘、羅馬以漸次波及於歐羅巴之全部，此西方之一型也。一者沿黃河兩岸，以達於海濱，我華夏民族，自虞、夏、商、周以來，漸次展擴以及於長江、遼河、珠江諸流域，並及於朝鮮、日本、蒙古、西域、青海、西藏、安南、暹邏諸境，此東方之一型也。此二型者，其先限於地勢，東西各不相聞接。西方之一型，於破碎中爲分立，爲並存，故常務於「力」的鬪爭，而競爲四圍之鬪。東方之一型，於整塊中爲團聚，爲相協，故常務於「情」的融和，而專爲中心之翕。一則務於國強爲併包，一則務於謀安爲緜延。故西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在轉換，而東方型文化之進展，其特色則在擴大。轉換者，如後浪之覆前浪，波瀾層疊，後一波湧架於前一波之上，而前一波即歸消失。西洋史之演進，自埃及、巴比侖、波斯以逮希臘、羅馬，翻翻滾滾，其吞噬捲滅於洪濤駭浪、波瀾層疊之下者，已不知其幾國幾族矣。擴大者，如大山聚，羣峯奔湊，蜿蜒繚繞，此一帶山脈包裹於又一帶山脈之外，層層圍拱，層層簇聚，而諸峯映帶，共爲一體。故中國史之演進，不僅自兩漢而隋、唐，而宋、明，一脈相沿，繩繩不絕；即環我族而處者，或與我相融和而同化，如遼、金、蒙古、滿洲、西藏、新疆諸族；亦有接受我文化，與我終古相依，如梁甫之與泰山然，則朝鮮、日本、安南之類是也。（朝鮮、安南久屬中國而猶得自存，此尤明受中國文化之賜。）將西洋史逐層分析，則見其莫非一種「力」的支撐，亦莫非一種「力」的轉換。此力代彼力而起，而社會遂爲變

形。其文化進展之層次明析者在此，其使人常有一種強力之感覺者亦在此。東方與西方，有絕然不同之態：西方於同一世界中，常有各國並立；東方則每每有即以一國當一世界之感。故西方常求其力之向外為鬪爭；而東方則惟求其力之於內部自消融，因此每一種力量之存在，常不使其僵化以與他種力量相衝突，而相率投入於更大之同情圈中，卒於溶解消散而不見其存在。我所謂國史於和平中見進展者在此。故西方史常表見為「力量」，而東方史則常表見為「情感」。西方史之頓挫，在其某種力量之解體；其發皇，則在某一種新力量之產生。中國史之隆汚升降，則常在其維繫國家社會內部的情感之麻木與覺醒。此等情感一旦陷於麻木，則國家社會內部失所維繫，而大混亂隨之。中國史上之大混亂，亦與西方史上之「革命」不同。西方史上之革命，多為一種新力量與舊力量之衝突。革命成功，即新力量登臺，社會亦隨之入一新階段。中國史上之混亂，則如江河決隄，洪水泛濫。泛濫愈廣，力量愈薄，有破壞，無長進。必待復歸故槽，然後再有流力。中國社會，自秦以下，大體即向「力」的解消之途演進。迄於近世，社會各方平流緩進，流量日大，而流速日減。以治西史之眼光衡之，常覺我民族之嘽緩無力者在此。然我民族國家精神命脈所繫，固不在一種力之向外衝擊，而在一種情之內在融和也。蓋西方制為列國爭存之局，東方常抱天下一統之想。自東、西兩方相接觸，彼之所務於力之為爭存者，正可繼續益厲；而我之

所斬於情之爲融和者，至是乃不得不卷而藏之，而追隨於彼我角力爭勝之場；此已爲東方之不得不見遜於西方者矣。抑我之所以爲國家社會內部一統情感之融和者，方其時，又適值痲痺墮退之際，自淸中葉乾、嘉以來，川、楚、兩粵大亂迭起，洪流四泛之象已成，中國社會本苦無力，又繼之以追隨西方角力爭勝之勢，既不足以對外，乃轉鋒而內向。終於「情」的融和，常此痲木，「力」的長成，遙遙無期。不斷決隄放壩，使水流不斷泛濫，洪水遍於中國，而國人仍復有沉酣於憑藉某力推翻某力之好夢者。此又不明國史眞相，應食惡果之一至可痛心之例也。

一二

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有其生力焉，亦有其病態焉。生力者，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病態者，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人類歷史之演進，常如曲線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線以前向。若以兩民族兩國家之歷史相比並觀，則常見此時或彼升而我降，他時或彼降而我升。祇橫切一點論之，萬難得其眞相。今日治國史者，適見我之驟落，並值彼之突進，意迷神惑，以爲我有必落，彼有必進，並以一時之進落爲彼、我全部歷

史之評價，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惟求盡廢故常，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不知所變者我，能變者亦我，變而成者依然爲我。譬之病人，染病者爲我，耐病者亦我，脫病而復起者仍我也。一切可變，而「我」不可變。若已無我，誰爲變者？變而非我，亦何希於變？必有生力，乃可去病。病有其起因，而非生力之謂。若醫者謂：「君病之起，起於君之有生，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此爲何等醫耶！諱疾拒醫固不當，亦未有因人之病而從頭絕其生命以爲醫者。故治史者，必明生力，明病態。生力自古以長存，病態隨時而忽起。今日之中國，顯爲有病，病且殆矣，萬不容諱。然猶有所希冀者，其人雖病，尙有內部自身生力可以爲抗。若如今人論史，一切好歸罪古人，不啻謂今日之病，已原於其人受氣墮地之日，非自頂至踵脫胎換骨不可。則此乃僅婉言之，直捷而道，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凡此皆指「生原」爲「病原」之妄說也。

「生原」者，見於全部潛在之本力，而「病原」則發於一時外感之事變。故求一民族國家歷史之生原者，貴能探其本而攬其全；而論當前之病態者，則必辨於近而審其變。國史綿歷，既四、五千年於茲，其病象之見於各時期者，推原尋因，不能全同。有沾染稍久者，亦有僅起於當前者。要而言之，國史自隋唐以來，科舉制既興，士族門第之地位消融漸盡，而社會走上平鋪散漫之境，此中國晚近世一大變也。逆溯中國當前病象，推之最遠，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

究生力必窮之最先，診病況必詳之最後。西人論史，盛誇其文明光昌，而淵源所自，必遠本之於希臘、羅馬。國人捧心效顰，方務於自譴責，而亦一一歸罪古人，斷獄於唐虞三代之上，貌是而神非，甚矣其不知學也。

中唐以來之社會，既成一平鋪散漫之社會，而其政治，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故一「王室」高高在上，而「社會」與「政府」之間，堂陛益遠，常易招致「王室」與「政府」之驕縱與專擅，一也。社會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然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二也。政府與民間之所賴以溝通者，曰惟「科舉」，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則從事於投選者，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三也。此三者，厥為中唐以來中國政治、社會走入一新境後所易犯之病徵。宋儒講學，即針對此病態而發。然而宋之為病，尚不止於此。宋人不能自解救，而招致蒙古之入主，一切政制，為急劇之退轉，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明祖崛起草澤，懲元政廢弛，罷宰相，尊君權，不知善為藥療，而轉益其病。清人入關，盜憎主人，箝束猜防，無所不用其極，仍襲明制而加厲。故中國政制之廢宰相，統「政府」於「王室」之下，眞不免為獨夫專制之黑暗所籠罩者，其事乃起於明而完成於清，則相沿亦已六百年之久。明儒尚承兩宋遺緒，王室專制於上，而士大夫抗爭彌縫於下，君臣常若水火，

而世途猶賴有所匡繫。故明之亡而民間之學術氣節，尚足照耀光輝於前古。清人又嚴加摧抑，宋、明七百年士人書院民間自由講學之風遂熸。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上之爲訓詁、考據，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下之爲八股、小楷，惟利祿是趨。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貫之橋樑遂腐斷，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中國之幸免於亂者，亦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之力。此稍讀康、雍、乾三朝史略，可以知之。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而姑以博一時之安寧。此乃斲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逮滿族統治之力既衰，而中國政治、社會之百病，遂全部暴露。論者每謂自嘉、道以來，東西勢力相接觸，東方乃相形見絀；此似是而未盡之說也。縱使嘉、道以往，長得閉關自守，海道之局不開，滿洲之治權，仍必顛覆，中國仍必大亂，其病先已深中於自身之內部，而外邪乘之，其病象遂益錯出。因使庸醫操峻劑，更奏迭前，茫昧而雜投，以互期於一逞，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

一三

晚清之季，談者率自稱我民族國家曰「睡獅」，曰「病夫」，此又不知別白之說也。夫「

睡」與「病」不同。睡者精力未虧，蹶然興起，猶可及人；病者不然。晚清之季則病也，非睡也。且其病又入膏肓，非輕易所能拔除。異族統治垂三百年，其對我國家、社會、文化生機之束縛與損害，固已甚矣。然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王室」爲其客觀之最高機關，歷史沿襲既久，則驟變爲難。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政府無宰相，「王室」久握獨裁之權，則激變又難。清廷不能不去，王室不能復建，逼使中國不得不爲一激劇之變動，以試驗一無準備、無基礎之新政體，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較漸變之路，此爲晚清革命之難局，一矣。日本明治維新在此點較中國多獲便宜。天皇一統，於日本歷史及民眾觀念上，並無十分劇變，得漸次引上憲政軌轍。中國政制之劇變，雖幸得冒險渡過，然所嘗苦痛實深。洪憲之稱帝，宣統之復辟，幾許曲折，消損中國前進之精力與元氣者，良不少也。

且滿清政府，自咸、同以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各省督、撫，擅權自專，中央無力駕馭，漸成分裂割據之局。又處五洲棣通新形勢之下，政府雖腐敗，猶得憑藉其地位，借外債，買軍火，練新兵，整理交通，加強管轄。遂使腐敗之政權，黑暗之勢力，既得外力之助，又因外患之顧忌，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革命勢力之起，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以順利其進行。革命之結果，僅爲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於是民國以來，武人弄權，地方割據，日轉增長。內亂層見疊出，斲喪社會之元氣，障阻國家之前進，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爲之呼應。此猶人身變病，未先驅解，早服補劑，病根纏綿不去，生機奄息不復。此又爲民國以來締構

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二矣。

尤難者，不在武人割據之不可剷滅，而在政治中心勢力之不易產生。滿清末葉，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革命以還，所揭櫫號召者，曰「民主共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新中國建設之大業，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獨裁王室既倒，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制下抬頭，八股小楷之素養，升官發財之習氣，淘汰未淨。而革命黨人，則只挾外來「平等」、「自由」、「民權」諸新名詞，一旦於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乃如洪爐之點雪，名號猶是，實質遽化。其名猶曰政黨民權，其實則為結黨爭權。一時中層智識分子，無新無舊，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此輩於前清末葉，既力阻開新之運，又於民國初年，加倍搗亂之功。此蓋滿清長期部族統治之智識階級，日愚日腐，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然此特一時病態，不得謂此乃代表我民族國家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若果如是，則中國文化亦萬不能綿歷此數千年之久，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此又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三也。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佔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遞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移之於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制、誘脅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污、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說諉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於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得擬也。

凡此皆輓近中國之病，而尤莫病於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爲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爲。跳踉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爲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徒於外面爲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爲尤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於謀安；果於爲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復羼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藥不對病，乃又爲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

一四

雖然，無傷也。病則深矣重矣，抑病之漸起，遠者在百年、數百年之間，病之劇發，近者在數年、數十年之內。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則遠在四、五千年以上。生機之軋塞鬱勃，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而果也，近者以敵國外患之深侵，而國內漸臻於統一。以一年半

之艱苦抗戰，而國人遂漸知「自力更生」之爲何事。蓋今日者，數十年乃至數百年社會之積病，與夫數千年來民族文化之潛力，乃同時展開於我國人之眼前。値此創鉅痛深之際，國人試一繙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澹創建之史跡，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必有淵然而思，憬然而悟，愀然而悲，奮然而起者。要之我國家民族之復興，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此則吾言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茫茫員輿，芸芸眾生，我不知其已歷幾何世矣！抑有始終未躋於摶成「民族」之境者；有雖摶成為一民族，而未達創建「國家」之域者；有雖摶成一民族，創建一國家，而俯仰已成陳跡，徒供後世史家爲鈎稽憑弔之資者；則何歟？曰：惟視其「文化」。民族之摶成，國家之創建，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故民族與國家者，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舉世民族、國家之形形色色，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如影隨形，莫能違者。人類苟負有某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則必摶成一民族焉，創建一國家焉，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若其所負文化演進之使命既中輟，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故非國家、民族不永命之可慮，而其民族、國家所由產生之「文化」之息絕爲可悲。世未有其民族文化尚燦爛光輝，而遽喪其國家者；亦未有其民族文化已衰息斷絕，而其國家之生命猶得長存者。環顧斯世，我民族命運之悠久，我

國家規模之偉大，可謂絕出寡儔，獨步於古今矣。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眞憑實據也。以數千年民族、國家悠久偉大之憑藉，至於今而始言建國焉，又必以抗戰而始可言建國焉，此何故？曰：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文化之墮落故。以我國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墮落，而猶可以言抗戰，猶可以言建國，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一民族文化之傳統，皆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數十世、數百世血液所澆灌，精肉所培壅，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結此民族文化之果，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若不然，自古可以無亡國滅種之禍，而倖生之族，偷存之國，將充塞於天壤間也。我國人不自承其爲不肖，不自承其爲墮落，而謂我先民文化所貽，固不足以爭存於斯世。是既疑我先民久爲倖生、偷存，而我當前之所爲抗戰與建國者，是不啻仍將效法我先民繼爲此倖生而偷存也。非然者，我民族國家之前途，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我所謂必於我先民國史略有知者，即謂此。是則我言仍可懸國門，百世以俟而不惑也。

一五

雖然，我之此書，抑不足以任此。昔有宋司馬光，以名世傑出之才，當神宗、王安石銳意變

法之際，獨愀然以爲未當，退而著史，既獲劉、范諸君子相從扶翼，又得政府之資助，晏居洛陽，設局從事，先後垂二十年而書成，以爲可以「資治」，故名曰資治通鑑。其書衣被沾溉於後世，至今不能廢。稍知從事於國史者，必漁獵焉。自孔子、史公而下，以通史建大業，推司馬氏，豈不偉歟！今去司馬氏又千年，史料之累積，又十、百倍於司馬氏之時，而世局之紛紜錯綜，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又加之以人不悅學，士方蔑古，競言「革新」者，謂可以絕無資於鑑往知古之勞；而治史者亦務爲割裂穿鑿，以逃世笑。竊不自揆，避地來滇南，深慚偸生無補國難，獨奮私臆，竊教課之餘暇，閉居一室，妄自落筆，歷時一載，成此區區五十萬字。又復敝帚燕石，妄自珍惜，謂散亡之無日，保藏之難周，朝脫稿，暮付印。欲於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跡，幸有當於其萬分之一二。以視往者司馬氏之鄭重其事，古今人度量相越，豈不足以愧殺人耶！抑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爲割裂穿鑿之業者，必將執吾書之瑕疵，以苛其指摘，嚴其申斥，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薄通業者之燄，而爲國史前途之罪人。抑思之又思之，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繼自今，國運方新，天相我華，國史必有重光之一日，以爲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託命。則必有司馬氏其人者出，又必有劉、范諸君子者扶翼

之，又必有賢有力者奬成之。而此書雖無當，終亦必有憫其意，悲其遇，知人論世，恕其力之所不逮，許其心之所欲赴。有開必先，若使此書得爲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擁篲而前驅，其爲榮又何如耶！因不辭誚笑而卒布之，並申述其著作之大意焉。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錢穆屬稿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書成自記

民國二十二年秋，余始於國立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講席。是課每週四小時，一年而畢。自念講通史，非委悉周備之難，而簡要明當之尤難也。若求委悉周備，則二十五史、十通以及充棟塞屋者，其書具在，學者昕夕從事焉，斯委悉周備矣，然非一週四小時、一年之功所能赴也。欲求簡要明當，則於繁重之國史，先必有所取捨。又必先有一系統之觀點，以爲其取捨之標準。必先立一「體」，乃能有所取裁。凡所裁之寬狹長短，一視與其「體」之相副相稱以爲度。然而言何容易？此固古人所謂專門名家之業也。否則左右采獲，牽引拼湊，可以至於無窮。於其牽引拼湊之中，而調和斟酌焉，以求其分量篇幅之略相當，此僅似於一種狹義之類書，非史業也。大

抵余於此課，以兩小時爲一講，以一講畢一題，一年凡四十餘講。共畢四十餘題。欲求於此四十餘題中，敍述我先民國史大體，約略明備，則每講之標題，爲尤所盡心焉。

越一年，（二十二年秋至二十三年夏。）學者苦於聽受，羣要余爲講義。余曰：通史大業，殊不敢輕率爲之。無已，姑約余所講爲綱要，聊備諸生筆記之一助，可也。自是每一講，必編一綱要，僅具倫脊，悉削游辭，取便總攬。然又恐諸生久習於此，則事近策括，以謂治史可以空腹也。乃別選一參考材料以副之。凡與余所講綱要相牽涉者，採摘前史陳文或昔人考訂論著爲參考，以便學者之自相闡證。綱要編至東漢，自嫌太簡，遂未繼續。並謂講堂大義，學者自可筆記，乃獨發參考材料。

如是者一年，（二十三年秋至二十四年夏。）覺參考材料，雜碎零亂，無綱要以貫通之，則如散錢無串，學者得此，華離斑爛，若可喜而未必可用也。遂又改計，另編國史讀本，供學者課堂外之閱讀。並詔諸生，治通史必責有「系統」，然系統必本諸「事實」。見仁見智，系統可以相異，而大本大原，事實終歸一致。不先通曉事實，驟求系統，如無錢而握空串，亦復失其爲串之意。大學課重，即如司馬氏通鑑，學者已苦不能終卷，而中學教課，風氣所趨，亦競爲條貫，不詳實事。至大學治通史，更不能反而專講一件件的事實。如是則學者所得惟系統、條貫，而無史實。卒之所謂系統、條貫者，皆空談，皆私見。空談私見可以萬異，而歷史事實只有一眞。因再約通鑑（及續通鑑、明通鑑諸書。）提

要鈎玄，編爲讀本，以補學者進治通史之預備工夫。如是者又一年，（二十四年秋至二十五年夏。）自秦迄明，讀本凡得百萬字。凡讀本所取裁，一以與課堂講述相副相應爲主，其詳略輕重之間，視袁氏紀事本末諸書，有大相逕庭者。以謂學者於課堂外先治此書，不僅可藥高心空腹之病，並可由此啟途，進窺史籍之原本也。

又越年，又嫌學者於本國文字素養太淺，讀本雖簡要，然皆摘錄史籍原文，學者驟覩，如入異國，轉不如其讀西書之怡悅相熟。其於文義眞際，已難領憭，至於史籍中人名、地名、官名、典章制度、文物故實，種種茫然，更屬所苦。乃擬就讀本中擇其凡爲史籍專名及義有旁及者，一一加以注釋。然注釋之事多涉考訂，又求與學者領憭之學力相應，其事乃大不易。課繁力絀，卒未有成。如是則已四越年矣。（二十二年秋至二十六年夏。）

二十六年秋，盧溝橋倭難猝發，學校南遷，余藏平日講通史筆記底稿數册於衣箱內，挾以俱行。取道香港，轉長沙，至南嶽。又隨校遷滇，路出廣西，借道越南，至昆明。文學院暫設蒙自，至是輾轉流徙，稍得停蹤，則二十七年之四月也。自念萬里逃生，無所靖獻，復爲諸生講國史，倍增感慨。學校於播遷流離之餘，圖書無多，諸生聽余講述，頗有興發，而苦於課外無書可讀，僅憑口耳，爲憾滋深。因復有意重續前三年之綱要，聊助課堂講述之需。是年五月間，乃自

魏晉以下，絡續起稿，諸生有志者相與傳鈔。秋後，學校又遷回昆明，余以是稿未畢，滯留蒙自，冀得清閑，可以構思。而九月間空襲之警報頻來，所居與航空學校隔垣，每晨抱此稿出曠野，逾午乃返，大以爲苦。乃又轉地至宜良，居城外西山岩泉下寺，續竟我業。而學校開課之期已至。昆明塵囂居隘，不得已，乃往來兩地間。每週課畢，得來山中三日，籀繹其未竟之緒。既乏參考書籍，又僕僕道塗，不能有四天以上之寧定。余嘗致書友人，謂：「此書雖垂成，而非意所愜。何者？細針密縷，既苦書籍之未備，大刀闊斧，又恨精神之不屬。」蓋此書屬稿中之實況也。逮魏晉以下全稿粗具，還讀三年前東漢以前舊稿，又嫌體例、文氣、詳略之間，均有不類，乃重復改爲。直至今年之六月，而全稿始竣，則先後亦十有三閱月矣。

然此書雖草略，其所以爲此書之意，則頗有當爲國人告者，因別爲引論一篇。辭繁不殺，讀者哀其意可也。至於引論所希，此書未必足副，讀者當分別觀之。此書一本所攜筆記，綴集而成，而筆記隨時摘錄，頗多疏忽。大率未注出處，忘記篇卷。此書因一律削之，不更標舉；偶載來歷，轉成例外。其時賢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獲，亦不備詳，義取一律，非敢掠美。書成倉促，相知惟湯君錫予，時時讀其一、二篇，有所商討。平生撰述，每不敢輕易發布。自問以迂愚之姿，而抱孤往之見，不如久久藏之，自待其意見之定。雖不足有所淑世，亦自寬其神明之內

疚。至於此書，獨有不然。若自祕藏，雖待之十年終不能定。而暴寇肆虐，空襲相隨，又時時有焚如之慮，因率爾刊布。讀此書者，無論大端小節，凡此書疏漏謬誤處，若蒙貽書相告，一字之與百章，皆吾師也。敢不虛衷拜嘉，謹誠心以禱祝之。

民國二十八年六月十二日錢穆記於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中國文化史導論　出版說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繼國史大綱之後，專就通史中有關文化史一項所作之導論。嘗謂讀者當就兩書合讀，庶可對我國歷史之整全體有較深一層之認識。

本書係先生第一部討論中國文化史而同時兼論中西文化異同問題有系統之著作。自言此後四十六年，「對中西文化問題之商榷討論，大體論點並無越出本書所提主要綱宗之外」。

書分十章，原著於民國三十二、三年間。其中大部分曾在思想與時代雜誌刊載。先生初嘗有意撰寫一部較翔實之文化史，而終以戰爭期間，相關參考書籍難於搜羅，又乏此心情際遇，遂僅成此扼要之編。書稿既成，數年之間，攜諸行篋，常恐散失。迄三十七年夏，始交上海正中書局付梓。是年七月滬本初版行世。然其時大局動盪，未能流傳。四十年三月，臺北正中書局再版印行，而流傳依然未廣。以是本書自初版以還，數十年間，知者蓋鮮。先生晚歲，每以此爲憾。乃於七十六年，以九十三高齡，再重讀全書，稍加修潤，擬重版流傳。七十九年夏，書未梓行，而先生則已溘然謝世矣。

民國八十年，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決定在臺出版先生全集，編委會遂提前整理本書與國史大綱兩種；八十二年並交由臺北商務印書館據之印行最新修訂本。翌年，北京商務印書館亦同時重印此兩書之新版，以爲先生百年誕辰紀念。五十年來先生之心願，終獲達成。

又民國三十年先生在重慶中央訓練團有講演稿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原收載國史新論中，先生自言該文原爲本書之總綱領。今秉先生意，將此文移入本書十篇之後，以求完整。

本書已將正中舊版重新整理，改正原版若干誤植文字，分段則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則酌加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胡美琦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弁言

「文明」、「文化」兩辭，皆自西方迻譯而來。此二語應有別，而國人每多混用。大體文

明、文化，皆指人類羣體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傳播與接受，文化則必由其羣體內部精神累積而產生。即如近代一切工業機械，全由歐美人發明，此正表顯了近代歐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機械，一經發明，便到處可以使用。輪船、火車、電燈、電線、汽車、飛機之類，豈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說歐美近代的工業文明已傳播到各地，或說各地均已接受了歐美人近代的工業文明，卻不能說近代歐美文化，已在各地傳播或接受。當知產生此項機械者是文化，應用此項機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產出文明來，文明卻不一定能產出文化來。由歐美近代的科學精神，而產出種種新機械、新工業。但歐美以外人，採用此項新機械、新工業的，並非能與歐美人同具此項科學精神。再舉一例言。電影是物質的，可以很快流傳，電影中的劇情之編製，演員之表出，則有關於藝術與文學之愛好，此乃一種經由文化陶冶的內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風情。從科學機械的使用方面說，電影可以成為世界所共同；從文學藝術的趣味方面說，電影終還是各地有區別。這便是「文化」與「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人類文化，由源頭處看，大別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農耕文

化，三、商業文化。游牧文化發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帶，農耕文化發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業文化發源在濱海地帶以及近海之島嶼。三種自然環境，決定了三種生活方式；三種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種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兩類。游牧、商業文化爲一類，農耕文化爲又一類。

游牧、商業起於「內不足」，內不足則需向外尋求，因此而爲流動的、進取的。農耕可以自給，無事外求，並必繼續一地，反復不捨，因此而爲靜定的、保守的。草原與濱海地帶，其所憑以爲資生之地者不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內部之有阻害，於是而遂有強烈之「戰勝與克服欲」。其所憑以爲戰勝與克服之資者，亦不能單恃其自身，於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最先工具爲馬，海濱民族之最先工具爲船，非此即無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獲生存。故草原、海濱民族其對外自先即具敵意，即其對自然亦然。此種民族，其內心深處，無論其爲世界觀或人生觀，皆有一種強烈之「對立感」。其對自然則爲「天」「人」對立，對人類則爲「敵」「我」對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學心理上之必然理論則爲「內」「外」對立。於是而尙自由、爭獨立，此乃與其戰勝克服之要求相呼應。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爲「征伐的」、「侵略的」。農業生活所依賴，曰氣候、曰雨澤、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類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爲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類之信任與忍耐以爲順應，乃無所用其戰勝與克服。故農耕文化之最內感曰「天

人相應」、「物我一體」，曰「順」曰「和」。其自勉則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種文化之特性常見爲「和平的」。

游牧、商業民族向外爭取，隨其流動的戰勝克服之生事而俱來者曰「空間擴展」，曰「無限向前」。農耕民族與其耕地相連繫，膠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孫世代墳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間之擴張，惟望時間之緜延。絕不想人生有無限向前之一境，而認爲當體具足，循環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則曰「天長地久，福祿永終」。

游牧、商業民族，又常具有鮮明之「財富觀」。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級數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則刺激逐步增強。故財富有二特徵，一則愈多愈易多，二則愈多愈不足。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商業民族之財富觀則更益增強。財富轉爲珠寶，可以深藏。以數字計，則轉成符號。由物質的轉成精神的，因此其企業心理更爲積極。農人則惟重生產；生產有定期，有定量，一畝之地年收有定額，則少新鮮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絕，則不願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業常感滿足而實不富有。合此兩點，故游牧、商業文化，常爲富強的，而農業文化則爲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強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強。以不富強遇不安足，則雖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類文化乃得永遠動盪而前進。

文化必有刺激，猶如人身必賴滋養。人身非滋養則不能生長，文化非刺激則不能持續而發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個性而異。向前動進的文化，必以向前動進爲刺激；戰勝克服的文化，必以戰勝克服爲刺激；富強的文化，必以富強爲刺激。然動進復動進，克服復克服，富強益富強，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種等比級數的加速爲進行，如是則易達一極限。動進之極限，即爲此種文化發展之頂點。古代游牧民族，其興驟，其崩速。近代之商業文化，雖其貌相若與古代之游牧文化大異，而內裏精神實出一致，因此此種文化常感搖兀而不安。

「安、足、靜、定」者之大敵，即爲「富、強、動、進」。古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常爲游牧民族。近代農耕民族之大敵，則爲商業民族。然人類生活終當以「農業」爲主，人類文化，亦終必以「和平」爲本。故古代人類眞誠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農耕區域。而將來文化大趨，亦仍必以各自給足的和平爲目的。

農業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別，又有新農、舊農之別。何謂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倫等皆小型農國，其內部發展易達飽和點，其外面又不易捍禦強暴，因此古代小型農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獨中國爲古代惟一的大型農國，因此其文化發展，獨得緜延迄於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猶存，堪爲舉世農業文化、和平文化發展最有成績之惟一標準。然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幸得捍

禦游牧文化之侵凌而發展不輟。今日則新的商業文化繼起，其特徵乃爲有新科學、新工業之裝備，因此中國雖以大型農國對之，不免相形見絀。於是安足者陷於不安足，而文化生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然此非農耕文化不足與商業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農業國家，而亦與新科學、新工業相配合，而又爲一大型農國，則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領導當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國家是賴。

今日具此資格之國家，有美國，有蘇聯，與中國而三。美、蘇皆以大型農國而又有新科學、新機械之裝配，然其傳統文化則未必爲農業的。換言之，即未必爲和平的。中國則爲舉世惟一的農耕和平文化最優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則爲新科學、新機械之裝備與輔助。然則中國之改進，使其變爲一嶄新的大型農國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實不僅爲中國一國之幸，抑於全世界人類文化前程以及舉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絕大之貢獻。

然中國改進，其事亦不易。使中國人回頭認識其已往文化之眞相，必然爲絕要一項目。中國文化問題，近年來，已不僅爲中國人所熱烈討論之問題，抑且爲全世界關心人類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問題，實爲一極當深究之歷史問題。中國文化，表現在中國已往全部歷史過程中，除卻歷史，無從談文化。我們應從全部歷史之客觀方面來指陳中國文化之眞相。

首先：應該明白文化之複雜性，不要單獨著眼在枝節上，應放寬胸懷，通視其大體。

第二：則應明白文化之完整性，人類羣體生活之複多性，必能調和成一整體，始有向前之生機。如砌七巧板，板片並不多，但一片移動，片片都得移，否則搭不成樣子。中西文化各有體系，舉大端而言，從物質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體生活如社會、政治組織，以及內心生活如文學、藝術、宗教信仰、哲學思維，犖犖大者，屈指可數。然相互間則是息息相通，牽一髮，動全身；一部門變異，其他部門亦必變異。我們必從其複雜的各方面，瞭解其背後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發展性。文化儼如一生命，他將向前伸舒，不斷成長。橫切一時期來衡量某一文化之意義與價值，其事恰如單提一部門來衡量全體，同樣不可靠。我們應在歷史進程之全時期中，求其體段，尋其態勢，看他如何配搭組織，再看他如何動進向前，庶乎對於整個文化精神有較客觀、較平允之估計與認識。

本書十篇，根據上述意見而下筆，這是民國三十年間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與時代雜誌中刊載。當時因在後方，書籍不湊手，僅作一種空洞意見之敍述。此數年來，本想寫一較翔實的文化史，但一則無此心情，二則無此際遇，而此稿攜行篋中東西奔跑，又復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無當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許多人的笑罵，但還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一二可供平心討論之

點，因此也終於大膽地付印了。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錢穆在無錫江南大學。

中國歷史精神　出版說明

民國四十年春，錢賓四先生在臺北應國防部高級軍官組特約講演，前後共七次，每次兩小時；分別講述史學精神和史學方法、中國歷史上的政治、經濟、國防、教育、地理與人物、道德精神七題。錄音整理後，由先生修潤以成本書。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其間治亂興替，波譎雲詭，常令治史者望洋興歎，有無從下手之憾；而初讀史者，亦每苦於重點之難以把握，以故望而卻步。先生在本書中，以其淵博之史學涵養、敏銳之剖析能力，解此難題，俾讀者得窺中國歷史文化之堂奧。藉由本書深入淺出之敍述，讀者可在短期間內獲得較完整之歷史概念，更有助於深入瞭解五千年來歷史精神之所在，從而認清此一代中國人所背負之歷史使命及應當努力之方向。

民國四十一年七月，本書由印尼耶加達天聲日報印行，爲該報叢書第一種。後以臺、港兩地行銷未廣，讀者覓購不便，先生乃於四十三年一月就原書字句略加删潤，並於第四講增入一節，交由國民出版社在臺出版。

五十二年夏，先生應臺北國防研究院之邀，講演兩次，成稿兩篇：一、中國文化與中國人；二、從中西歷史看盛衰興亡。五十三年，先生復將本書略加修潤，並增附該兩篇講辭，在香港再版印行。五十四年又在臺北再版。六十五年十二月，本書改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在臺出版。

今編全集，又得先生早年舊稿中華民族歷史精神及晚明諸儒之學術及其精神兩文，以其作意與本書相近，因增附於書後。增稿在目錄中加注＊號，以資識別。

本書之整理，以東大修訂本爲底本，改正若干誤植文字，版式與分段並另作調整。標點符號之整理，主要在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以便利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胡美琦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國史新論　出版說明

任何一國家當動盪變進之時，其已往歷史莫不在冥冥中發生無限力量。此乃人類歷史本身無可避免之大例，否則歷史將不成爲一種學問，而人類亦根本無歷史性之演進可言。中國近百年來，正面臨前古未有之變局，而不幸在此期間，國人對已往歷史之認識，特爲貧乏而模糊。錢賓四先生常望能就新時代之需要，探討舊歷史之眞相，故寢饋史籍數十寒暑，求在發明古史實情，期能對當前國內一切問題，有一本源之追溯與較切情實之考查。本書即係以分別、專門、變化三種眼光治史之所得者。由當前社會思潮之反省出發，縱論古今，而標識其演變之大勢所在，足資有志於知人論世、會通國史者之參考。

是書初編於民國四十年，集論文中國社會演變、中國傳統政治、中國智識分子、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五篇，先後於香港、臺灣兩地自印出版。七十年二月，改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印行。七十七年，先生重編本書，增入再論中國社會演變、略論中國社會主義、中國歷史上的傳統政治、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中國歷史上的傳

統教育、中國教育制度與教育思想、中國歷史人物、中國歷史上之名將九篇，合爲十四篇。七十八年三月，仍由東大圖書公司重排爲增訂初版。

今全集整理是書，乃以修訂本爲底本，復增入中國歷史上社會的時代劃分一篇；初編所收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先生嘗自謂該文爲其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之總提綱，今承其意移附該書之末。目錄中，新增之文例加「*」號。此次整理，加入私名號及書名號；原書誤植文字，亦隨文校改。整理排校雖力求慎重，然疏漏錯誤之處，料將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李訓詳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一國家當動盪變進之時，其已往歷史，在冥冥中必會發生無限力量，誘導著它的前程，規範著它的旁趨；此乃人類歷史本身無可避免之大例。否則歷史將不成爲一種學問，而人類亦根本不

會有歷史性之演進。中國近百年來，可謂走上前古未有最富動盪變進性的階段。但不幸在此期間，國人對已往歷史之認識，特別貧乏，特別模糊。作者竊不自揆，常望能就新時代之需要，探討舊歷史之眞相，期能對當前國內一切問題，有一本源的追溯，與較切情實之考查。寢饋史籍，數十寒暑，發意著新史三部：一通史，就一般政治社會史實作大體之敍述。一文化史，推廣及於歷史人生之多方面作綜合性之觀察。一思想史，此乃指導歷史前進最後最主要的動力。第一部分先成國史大綱一種，第二部分續成中國文化史導論一種，第三部分於四五年前，曾在昆明繼續公開作四十次之講演，而未整理成稿。其他尙有政學私言一種，亦於第一、第二兩部分有所發揮。積年所有雜文及專書，亦均就此三部分集中心力，就題闡述。要之，根據已往史實，平心作客觀之尋求，決不願爲一時某一運動、某一勢力之方便而歪曲事實，遷就當前。如是學術始可以獨立，而智識始有眞實之價值與效用。

頃來蒿目時艱，受友好敦促，擬繼續撰寫國史新論一種。大體所見，仍與前成各種無多違異。惟旨求通俗，義取綜合，限於篇幅，語焉不詳。其爲前數種所已經闡發者，能避則避，能略則略。讀者儻能就此新撰，進窺前構，庶可益明其立論之根據。總之，求在發明古史眞相；其於國人現代思潮有合有離，非所計及。

診病必須查詢病源，建屋必先踏看基地。中國以往四千年歷史，必爲判斷近百年中國病態之最要資料，與建設將來新中國唯一不可背棄之最實基礎。此層必先求國人之首肯，然後可以進讀吾書，而無不著痛癢之責難，與別具用心之猜測。至於語語有本，事事著實，以史籍浩瀚，囊括匪易，尚祈讀者恕其疏失，匡其未逮。循此而往，中國歷史必有重見光明之一日，而國運重新，亦將於此乎賴。特於刊布之先，再揭其宗旨綱要如此。

本書暫收論文五篇，第一篇中國社會演變，第二篇中國傳統政治，兩文成於民國三十九年。第三篇中國智識分子，成於民國四十年。第四篇中國歷史上之考試制度，乃是年冬在臺北國民政府考試院之講演稿。第五篇中國文化傳統之演進乃民國三十年冬在戰時陪都重慶之講演稿，爲拙著中國文化史導論之總提綱，一並附綴於此。前三篇曾刊載民主評論，並單印爲中國問題叢刊；第四篇曾刊載於考試院考詮月刊之創刊號。茲彙編單行，特向民評社及考試院誌謝。

錢穆於民國三十九年十月誌於九龍新亞書院

再版序

余在民國四十年，曾收論文五篇，彙爲國史新論一書，先後在港、臺兩地付印，迄今已二十餘年矣。偶檢新舊存稿，未編入其他各書，而體裁與此編相近，可以加入者，重爲編目，仍以國史新論爲名，再以付梓。

本書各篇，有以分別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專門眼光治史所得，有以變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論題，必分古今先後時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變。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則本之於當前社會之思潮。

余幼孤失學，本不知所以治史。增知識，開見解，首賴報章雜誌。適當「新文化運動」驟起，如言自秦以下爲帝皇專制政治，爲封建社會等；余每循此求之往籍，而頗見其不然。故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亦可謂爲余治史之發蹤指示者，則皆當前維新派之意見。

余自在北京大學任「中國通史」一課程，連續七年之久，貫古今，融諸端，自謂於國史大體

粗有所窺，寫成國史大綱一書。凡余論史，則皆出國史大綱之後。其以變化眼光治史成書者，如中國文化史導論，分別上古、先秦、兩漢、隋、唐、宋、元、明、清各時代，而指陳其各有演變之所在。其以專門眼光治史成書者，如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雖亦分時代，分項目，而專以政治爲範圍。其以分別眼光治史成書者，如中國歷史精神及此書等。雖屬分篇散論，自謂亦多會通合一之處，而無扞格牴牾之病。

凡余治史，率本此三途。國史浩瀚，余初未敢以一人之力薈萃組織，成一巨編。然數十年來，自幸尚能不懈於學問，而所得終亦未見有先後大相違背處，故每以自恕。或所窺測，尚亦有當於國史之大體；而非余之淺陋愚昧所敢輕犯眾意，以作狂妄之挑剔。

竊意國史具在，二十五史、十通之類，雖固浩瀚難窮，亦復一翻即得。余生斯世，豈敢輕視當世人之意見。然史籍詳備，我古昔先民之鄭重其事，吾儕亦不當忽視。余之治史，本非有意於治史，乃求以證實當前大眾之意見而已。讀余書者，若能效區區之所爲，遇當前意見所趨，涉及古人，亦一一究諸舊籍；遇與當前意見不合處，非爲欲迴護古人，乃庶於當前意見有所獻替。則誠所私幸。固非謂余之淺陋愚昧爲必有當於古人之眞相也。

中華民國六十六年雙十國慶錢穆識，時年八十有三。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早年即有意撰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則以謂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要目，欲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應忽略中國傳統政治；再則謂一切政治制度必得自根自生，無生命之政治，無配合之制度，決然無法成長。易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此非徒事模仿蹈襲外國制度所可得而幾者。民國二十一年秋，先生在北京大學開授「中國政治制度史」一課，每堂課前必寫錄講授大綱及參考材料。惜以時局動盪，私人生活不得安定，故終未編撰成書，而惟散見其要旨於國史大綱之中。

民國四十一年春，先生在臺北應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主委何應欽先生之邀，演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一題。講期只五次，每次限兩小時；故但拈漢、唐、宋、明、清五代之政治制度，略舉大綱。本擬就講稿再事增補，不幸四月中因意外腦部受傷；養病期間，僅能就紀錄稿之走失原講義旨處稍加校正，未有精力再作潤飾。

本書於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在香港初版。嗣後總政治部請先生撰寫一部研究中國歷代政治制

度之教材，截稿期限甚迫；先生乃就前稿加以修改，尤如唐代之兩稅制、明代之賦稅制度等，均有新資料補充；復於四十四年八月在香港印行，爲本書之修訂版。六十六年六月，以港版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在臺發行。

又本會整理先生遺稿，發現民國五十五年先生有答讀者來書討論張江陵一文；今編全集，特附本書之末。新增文稿在目錄中例加「*」號，以資識別。

本書之整理，以修訂本爲底本，版式與分段，皆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原版誤植文字，亦隨文改正。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本書由吳展良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我很早以前，就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一則我認爲政治乃文化體系中一要目。尤其如中國，其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更其是儒家的抱負，一向著重修齊治平。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絕不該忽略中國傳統政治。辛亥前後，由於革命宣傳，把秦以後政治傳統，用「專制黑暗」四字一筆抹殺。因於對傳統政治之忽視，而加深了對傳統文化之誤解。我們若要平心客觀地來檢討中國文化，自該檢討傳統政治。這是我想寫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一因。

再則我認爲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縱使有些可以從國外移來，也必然先與其本國傳統，有一番融和媾通，纔能眞實發生相當的作用。否則無生命的政治，無配合的制度，決然無法長成。換言之，制度必須與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後，人人言變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視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會隨制度而轉變。因此只想把外國現成制度，模倣鈔襲。甚至不惜摧殘人事來遷就制度。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舊傳統、舊文化。我們試問：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與此一民族之文化傳統有關聯，而只經幾個人的提倡，便可安裝

得上呢？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絕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歷史經驗論，任何一制度，絕不能有利而無弊。任何一制度，亦絕不能歷久而不變。歷史上一切已往制度俱如是，當前的現實制度，也何嘗不如是？我們若不著重本身人事，專求模倣別人制度，結果別人制度勢必追隨他們的人事而變，我們也還得追隨而變，那是何等的愚蠢。其實中國歷史上已往一切制度傳統，只要已經沿襲到一百兩百年的，也何嘗不與當時人事相配合。又何嘗是專出於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專制黑暗」四字來抹殺？這是我想寫一部中國政治制度史之第二因。

但由於國家大局之動盪，私人生活之不安定，而自己想寫的，感到比這一部書更重要的也還有，因此此書終於沒有寫。

民國四十一年三四月間，承何敬之先生要我在戰略顧問委員會講演「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但講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兩小時；又爲旅途匆促，以及其他條件，並不能對歷史上傳統制度詳細陳述，精密發揮，只擇漢、唐、宋、明、清五代略舉大綱。本來想再就講演紀錄把在講演時未及提到的，略事增補；不幸講演完成，我即負傷養病。在此期間，沒有精力對此講稿再事改進。只得就原紀錄稿有與原講義旨走失處稍稍校正，而其他不再潤飾了。將來若償宿願，能寫出一部較詳備的「中國政治制度史」，則屬至幸。而此書得以搶先呈教於讀者之前，亦可稍自欣慰，並

在此致謝何先生之美意。若無何先生這一番督命，連此小書，也不會有倉促完成之望的。

中華民國四十一年八月錢穆在臺中

中國歷史研究法　出版說明

民國五十年，錢賓四先生在香港應孟氏基金會邀請，作一系列講演。當時基金會所定總題爲「歷史研究法」。先生以爲當先決定研究歷史之意義，方可就此意義以言研究方法，故研究歷史，尤應注意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乃在其總題下，一本此義，就通史、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學術史、歷史人物、歷史地理、文化史共八部分，分次講演。先由學生葉君記錄講辭，先生再加整理潤飾而成本書。先生謂此書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此下三十年，其有關史學諸著作，大體意見悉本於此；實可謂先生近三十年來史學見解之本源所在，亦可謂乃其對中國史學大綱要義之一番簡要敍述。

是書五十年十二月由孟氏教育基金委員會在香港初版，以後未再重刊。五十八年五月在臺第一次出版。其後因絕版多年，至七十六年，先生遂再加董理重印。對原書內文略有增潤，並附入早年所作略論治史方法、歷史教育幾點流行的誤解兩文於後。七十七年一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今編全集，又將與本書作意相近之先生早年論文如何研究中國史、歷史與教育、中國今日所需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中國歷史教學、歷史教學與心智修養、中國史學之特點等六篇移入。新增各篇，目錄中加＊號注明，以資識別。

本書以七十七年東大增編本爲底本，調整其分段及引文版式，改正原書錯字，整理標點符號，主要爲加入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加引號，以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蕭公彥先生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近人治學，都知注重材料與方法。但做學問，當知先應有一番意義。意義不同，則所採用之材料與其運用材料之方法，亦將隨而不同。即如歷史，材料無窮，若使治史者沒有先決定一番意義，專一注重在方法上，專用一套方法來駕馭此無窮之材料，將使歷史研究漫無止境，而亦更無

意義可言。黃茅白葦，一望皆是，雖是材料不同，而實使人不免有陳陳相因之感。

此書乃彙集八次講演而成。在民國五十年，香港孟氏教育基金會，邀我去作講演。「歷史研究法」之大總題，乃由此一機構所決定。我則在此講題下，先決定一研究歷史之意義，然後再從此一意義來講研究方法。故我此書，實可另賦一名曰「中國歷史文化大義」。研究歷史，所最應注意者，乃爲在此歷史背後所蘊藏而完成之文化。「歷史」乃其外表，「文化」則是其內容。

本此主要意義而分本講演爲八題。最先是講「如何研究通史」，最後是講「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實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則最好應以文化爲其主要之內容。其間更分政治、社會、經濟、學術、人物與地理之六分題；每一分題，各有其主要內容，而以文化爲其共通對象與共通骨幹。每一分題，在其共通對象文化大體系之下，各自地位不同，分量不同，其所應著重之材料與其研究方法亦隨而不同。讀者勿忘我此八番講演之主要意義所在，自將可見我此所講，語語有本源來處，亦語語有歸宿去處。

此一講演集，先由我一學生葉龍君記錄講辭，再由我整理潤飾。民國五十年底，曾在香港出版。惟初版後未再付印。此版乃是在臺之第一版，內容一如初版，只在不關緊要之文字上稍有些

少之改動。因初版並未有序，此版特爲增入，以稔讀者。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四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中國史學發微　出版說明

本書少部分爲錢賓四先生較早之著作，大部分爲其晚年所發表有關史學之精要綱領。史籍浩繁，尤如中國二十五史乃及三通、九通，數說無窮；本書則屬提綱挈領、探本窮源之作，所爲極簡要而玄通。讀者即係初學，可以由此得其門戶；中人可以得其道路；老成可以得其歸極。要之，可以人人有得，隨所造詣，各有會通。

是書初編於民國七十六年，共收文十四篇。七十八年三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其第三篇史學導言，原爲五十九年先生應臺南成功大學羅雲平校長之邀，分別在元月六、八、十二、十四日爲該校所作四次公開講演之講辭。事後由錢夫人胡美琦女士根據錄音帶逐字逐句寫出，再經先生删潤。是年三月間在臺北中央日報分期刊載，五月中央日報社出版單行本。是書既已收入本書，故今全集不再重出爲一書。又第十一篇莊子薪盡火傳釋義，先生生前已移入舊著莊老通辨中。今編全集，亦不再重收此篇。則本書共得文十三篇。

此次整理，係以初版本爲底本，校改原書若干誤植文字，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爲加入私名

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以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賀廣如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一

中國學業相傳，向分經、史、子、集四部。經學最早，但實惟有詩、書兩部。詩三百迄今猶存。書則惟商、周兩代少數幾篇政治文件，或最先當起於盤庚以後。至唐、虞、夏代，如堯典、禹貢之類，皆出戰國後人撰寫，非孔子前所有。至於禮，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則禮非成書，故稱「執禮」，與詩、書不同。儀禮僅屬士禮，乃孔子以下人所造。周官更屬後起，當在戰國之晚世，或當在虞夏書之後。樂則無專書記載。即孔子時，鄭、衛之聲，已非古樂。孔子在齊聞韶，韶樂乃自陳達齊，但亦決非傳自舜代。惟在孔子時，已屬南方之樂之稍古僅

存者。至孟子時，古樂、今樂已顯相分別。易雖古代相傳，但孔子時亦僅為一卜筮之書。易傳則當出秦始皇時代，已雜采儒、道兩家義成書。孔子前雖有詩、書，亦不稱之為「經」。蓋古代學術尚未流通，惟政府最高層始掌有之。故孔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學術傳於社會下層，其事始於孔子。戰國諸子著書，墨家最先有經。漢代諸儒以孔門相傳有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學，遂誤稱「六經」。而實是詩、書、儀禮、周易及孔子春秋，只五書，尚缺一樂經。漢武帝乃立五經博士。後代經學惟五經有傳記注疏，此外不再有增。則雖有經學之名，而其學術相傳，則惟傳述，無創作，與史、子、集三部有不同。

先秦諸子相傳為九流十家，最先起者為孔門儒家。孔子為中國自古相傳私人講學之始，前後門弟子共七十七人，後世譌稱七十二人。然姓字見於論語者，不達半數。論語乃孔門師弟子相聚講論語言之記載。然其書相傳，至孟子後，始正式編纂為上下二十篇。故在孟子書中，亦尚不見論語一書名。墨翟繼孔子而起，但墨家先有成書。如今傳墨子及墨經，其書皆出論語為書行世前。其他各家成書，則全出儒、墨後。但獨有小說一家，則其成書當尚有在孔子之前者。

九流各成一家之言，以其門弟子相聚相傳，如同屬一家，故稱「家言」。家族之「家」，指血統言。諸子成「家」，乃指其所講貫之道統言。獨小說家則不然，因小說家所彙集之諸書，尚

遠起在孔子儒家講學之前。古代有史官，由周天子分派於列國諸侯間，世襲其位。又有正史、稗史之別。「正史」居諸侯之國都，「稗史」則散居國都外城鄉閭。其有關稗史所記載之文字，散見於今傳左傳諸書中者，尚不少。余已在他篇論及，此不詳。戰國小說家言，則即由其時之稗史來。

如是則在子學中，豈不即包涵有史學？其實不止於此，即如縱橫家言，豈非即戰國時代有關當前國際事件一種互相分派之爭論與抗議？其實尚不止此，即如孔子為儒家開山，但「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則孔子之意，乃欲上承周公。後儒則又自周公上推堯、舜、禹、湯、文、武之唐、虞、三代。墨翟繼孔子起，自為家言，則曰：「非大禹之道，不足以為墨。」是墨家於唐、虞、三代中，獨取夏禹一人為法。道家繼儒、墨而起，乃更上推黃帝，而唐、虞、三代皆在其下。但又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創為農家言。其次如陰陽家，則庖犧氏、神農氏、黃帝、堯、舜以至三代，凡中國史歷古相傳諸帝王，皆在網羅取法之中。而秦之統一，則其君自稱始皇帝，是亦上承雜家呂不韋春秋十二紀來。則凡先秦諸子學，實可謂乃無一而非源自史學。

此後漢代史學繼起，其太史官司馬談討論六家要旨，而私意所宗，則更在道家。其子司馬遷

繼之，乃益尊儒家，故既為孔子世家，又作孔子弟子列傳與孟荀列傳，於諸子中最為特出。其自序則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是史遷之為史，亦求上承諸子立言成家。則子、史之學，自古人視之，其間實無大分別。此後二十五史以及三通諸書，乃亦如諸子，各成家言。尤可以宋代之歐陽修為之例。如此中國之子學與史學，豈不貌分而神合，可離而可通乎？

再次言及集部。集部有駢、散之分。最先駢體肇始於屈原之離騷。詩、騷並言，則離騷亦可謂乃上自經來。太史公以屈原與賈生並傳，賈誼治安策乃漢初一名奏議，則離騷豈不亦可通於子與史？其下乃有三國時代之建安文學，乃始由西漢自離騷轉為駢體辭賦，又轉入散文中來。如曹操之奏議詔令，皆可納入文學之集部。諸葛亮出師表，亦入集部。實則此等文字，皆亦子亦史。又如晉宋時代之陶潛，其所為詩辭傳記，如歸去來辭，如桃花源記諸文，皆即其一人之史，亦即其一家之言，豈不史與子與集之三部，實可涌而為一乎？

唐代韓昌黎唱為古文，乃始正式由駢變而為散。其自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也。」則其言亦子亦史。一人之集，至少乃為其一人之自傳，亦即當歸入一民族一國家之文化道統中。故集部興起，乃為四部之最後。其實古代之經，如詩、書，尤其如古詩三百首，豈不亦如後代文學一

集部？亦可謂集部即是子，但較單純而已。而其當可列入史部，則更不待論。是則中國四部之學，其實約略言之，只是子、史之兩部分。孔子作春秋，又與其門弟子所言合成一論語。春秋經而即史，而論語是子，但亦可稱爲一集部。是則孔子一身已兼有了四部之學，故後人尊之爲「至聖先師」。

此下於四部之學最有完整成就者，當推北宋時代之歐陽修。其生平著述，可謂經、史、子、集四部皆備。如其爲新五代史，乃史部之正宗。又兼修新唐書，亦入二十五史中。而其於經學，皆有成書。其於詩經方面姑不論。其於易經，疑易傳非孔子之作，此乃自孔子以來，一千年後始發其議。歐陽子自謂再歷一千年又有第二人，兩千年可得第三人，三人爲眾，則此一人所疑，二千年後，即當成爲眾人之所疑矣。此其運思持論，何等高明而廣大，悠久而深沈。可見由一人之學而成爲家學，由一家之學而成爲千古之羣學，即道統所存，即於歐陽修一人之身，亦已明白曝露無疑矣。

又歐陽修之文，上承韓愈。而其闢佛，則成爲本論。以一人之所疑、所反對，化而爲全國之政教，此即由集爲子一明證。故由歐陽一人，而中國四部之學之可得達成於一家，亦即明白可證矣。

余此書專爲史學發微。苟其人不通四部之學，不能通古今之變而成其一家之言，又何得成爲一史家。上之如漢代之司馬遷，後之如宋代之歐陽修，皆可爲明證。惟孔子則尤其爲至聖先師，爲一切中國學人之最高楷模。此則治中國學術，皆當以此爲法。此非空言，乃實際標準之所在，則尤貴學者之能深思而明辨之。心知其意斯可矣，又何貴於繁言與空論。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一月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序　二

西方人重空間觀，但缺時間觀。古希臘人即有幾何學，作航海測量之用，但幾何學非以測時間。中國古人，則立標測日影，即知重時間。又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雄鷄司晨，亦以測時間爲重。

阿刺伯人有天方夜譚，其間有「能言鳥」一故事。三兄弟同求能言鳥，兩兄已失踪，其弟繼續追求。一術士告之，循山路上行，路旁有呼聲，勿回顧，則能言鳥易得。其弟乃塞耳上山。路旁叢石聳立，呼喝不已，愈上則石愈多，聲愈大。其弟因已塞兩耳，幸能終不回顧。竟得能言鳥

所在，取之以歸。路旁石皆起立重得爲人。蓋皆來尋能言鳥者，聞聲回顧，遂化成石。此亦如人讀史，過重以往，乃隨前人過去，亦如失敗，無以向前。歷史乃前人一切以往故事，可稱已均屬失敗。回讀史籍，亦如人重蹈覆轍，自陷深淵，重歸失敗。能言鳥故事即此意。古希臘濱海而居，非出國渡海，遠向他邦，即無以經商，亦即無以爲生。阿剌伯人居沙漠中，非渡越此沙漠，生命亦無前途。故此兩種人，多主向前，不重回顧。歷史故事皆屬以往，非彼輩所當流連。

耶穌則猶太人，其創始宗教，乃謂人生從天堂降謫，死後將重返天堂，俾得安居。愷撒事愷撒管，歷史則屬人間事，全屬愷撒，爲上帝所不管。信奉宗教，自不留心歷史。

西方文化會合此輕視歷史之三大淵源，遂無史學可言。

中國人則謂：「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前人隨時過失，後人即當警戒。並且前世以往亦並非無成功之處，亦可資後人以承襲與模仿。歷史教人向前，即因其能知過善改，亦因其能善所承襲。西漢人言：「自古無不亡之國。」其時則中國歷史已歷兩千年以上，伏羲、神農、黃帝以迄唐、虞、夏、商、周，以至秦漢，一部兩千年以上之歷史，豈不告人以人類已往，歷史有得有失，有成有敗，使人知所警惕，有過能改。則過而常存，去而復來，乃得依然向前。人生遂能發出前所未有之聰明與措施，而改善其將來。如此則歷史所記乃人道，實亦即天道。人類智識貴在

此不斷過程中，求獲將來之新得。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如人一日三餐，有排泄，但亦有存留。惟其所存留已非故物，因謂之「化」。化則非屬過去，故曰所存者「神」。莊周言：「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爲神奇，其所惡者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神奇復化爲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是則歷史非盡屬過去，乃成一種神化作用。西方人輕視歷史，則過去盡成臭腐，如希臘，如羅馬，乃至如近代之英法，不久亦當全成爲臭腐。而中國則上下五千年通爲一體，盡成神奇。此豈西方之所有。人文學中之史學，其功用乃如是。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必經以往過失，始得繼續生存。孔子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過去與將來，即屬人生之兩端。當前現在，則是其中。歷史可貴處，即在其屬於過去之一端。不斷過失，實亦爲不斷存在之前因。即在此過失中，求一不斷之嚮往。儻盡放棄其一切過去於不顧，則此端既不存在，亦即無其他一端可言。既無過去，亦即無將來，更又何從尋得一向前之生路？中國人言「死生」「存亡」，此即兩端。不死又何有生？不亡亦何有存？

中國人又言「道」字。道即一條路，向前一步，則失去了其走過之一步。其實就其不斷向前言，則一步過去，亦即是一步完成，但當求前途之所止。而人生無窮，則其前途亦無止。故步步向前，非只是步步過去，實亦是步步完成。人類歷史正如此。司馬遷引詩以讚孔子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此見人類遠大成功之一境，亦即無可至、不能止之一境。而「景行行之」之逐一步驟，則亦盡在逐步向前之途上。即過失，亦進步，同時亦即是完成。此則中國人之歷史觀。

余嘗謂人生即歷史。人生之最要過程在能知過勿憚改。歷史亦然。孔子時時夢見周公，但其老年則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周公在孔子當時，實已成爲一過去人物，亦可謂一失敗人物。儻周公不過去、不失敗，則周室亦不東遷。故孔子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則孔子已知周公當年之道不復可行於孔子之時矣。孔子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亦如周禮能言，而魯不足徵。其言不足徵，即猶言過去之亡失。但亡失者乃其事，非其道。又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杞、宋不足徵，即夏、殷兩代已在過失中。魯不足徵，即周公與西周亦盡在過失中。其或繼周者，有繼周而起，此即「自古無不亡之國」之先聲。歷史在過去中，乃指其事，非言其道。而人生則貴在有將來。但非有過去，又何得有將來？是則歷史即人生，但可謂乃指其前一半之已過已失言，非指後一半常存常在之將來言。而將來之可知，則即在過去中。雖可知而不可知，雖不可知而仍可知。此則讀史而明其道乃可知。故人道即天道。

當前之中國，或可謂孔子已先知之。所以孔子往日之所言，至今仍有可用。以今日世界之情況言，亦可謂早在孔子之預見中。然而孔子之在今，豈不亦已成爲一過去人物？孔子之所言，迄今已兩千年，早已過去，又豈得一一有用？是則貴在傳孔子之道者，斟酌而善行之。果尚求爲東周，則盡人而明知其非矣。但此孔家店，則仍然不得打倒。此則當前之中國人，又誰歟能深識其意旨之所在？

知過去乃知將來，知亡失乃知存在。西方人不肯認有過，又不喜言亡失，故不愛言歷史。其所言之歷史，則盡屬成功一方面，如言希臘史、羅馬史，以迄於最近之英法史，當前之美蘇史，莫不皆然。使人僅見有當前之形成，而不見有以往之過失。則試問個人人生又焉得僅有生存，而無死亡？西方之耶穌教言人死仍有靈魂上天堂，則正是此義。

中國人貴能知過，又貴能改過，故其言歷史亦常在言人生之過失處。知得人生已往之過失，則亦易知當前及將來之所得完成。西方人則僅知此一端，不知彼一端。如羅馬人，僅言己是，不言希臘人之過失處。現世英法人亦僅言己是，而亦不言以往羅馬人之過失處。即如當前之美蘇，亦僅能各言己是，而不能言英法已成過去之一切前非。但美蘇自己不遠將來，亦將自陷於過失中。故西方乃終不能有其如中國般之史學，乃使其人生常陷於過失中，而不能自拔。

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僅生七十二年，但至七十始能從心所欲，而不見有過失。則其前七十年，豈不亦常在過失中？故孔子「學不厭」，即學求其少過。但中國亦僅有孔子一人爲至聖先師，則其他人亦盡不如孔子，斯其畢生多過可知。學史功夫即在知過。孔子作春秋，試問春秋兩百四十年，又誰一人能在無過中？孔子稱：「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然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則雖管仲，又焉能無過？故歷史多過，學史在求少過，直待天下太平，始爲至善可止。則試問何日能達？故孔子之門人言：孔子之死，亦僅孔子之休息，尚待後學繼起，續加努力。西方人只認各有長處，並日在進步中，此乃西方人之歷史觀。今日國人慕之，不論是非，不問過失，惟知求變求新，日趨進步。即如原子彈發明，亦是一進步，並是一大進步。但不僅不問進步之所止，亦不問進步之當前實況究如何。此爲中西雙方民生精神之不同，此即其既往歷史，亦宜無可相同矣。

中國人言「鑒古知今」，西方人則貴開闢創造，求變求新。即當前之美蘇，又當變，又當新。但新又如何？則非當前之所知矣。

又西方人重多數，故其歷史亦惟重多數。而在中國則惟少數人能入史，能爲歷史人物。西方人既不重歷史人物，乃有無歷史人物，但只惟變惟新而已。故西方人論新舊，中國人則重褒貶。

又少褒而多貶，即新亦可貶。又孔子前人言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但孔子則並此而不言，乃惟言一「學」字。過往歷史，即在其所學中。而西方人則曰：「吾愛吾師，吾尤愛眞理。」師則可在歷史中，而眞理則多在歷史外。故西方不重有史學。此一大要端，亦誠不可不深論。

今日國人好罵中國史，謂其全屬過失，毫無進步。以另一觀點另一角度言，此亦庶或有當。西方人因貴多數，多人所是即爲是，多人所得即爲得。時刻在求得中，此正當前西方民主社會乃有此，誠亦當前一史實。中國則重己重少數，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又曰：「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但孔子作春秋，當爲中國史學之開山，則宜其難爲今日國人之崇慕西化者言之。

今日國人讀中國史，亦必稍知中國之傳統文化爲如何。希讀吾書者，其亦深思之。今試再易辭言之，中國人惟知愛重歷史，故能蔓延擴張，以有今日。西方人只爲不愛重歷史，乃日趨分裂，亦直達於今。今日國人惟西方之是信是崇，乃亦分爲兩國，一崇美，一崇蘇。明證當前，豈不與人以共鑒。儻使我當前之國人，仍能回頭一讀中國史，則此下宜分宜合，亦自當知所從事矣。余既爲中國史學發微一書作序，意有未盡，再草此篇。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二月錢穆識於素書樓時年九十三歲

讀史隨劄　出版說明

民國二十八夏至二十九年夏，錢賓四先生自昆明返蘇州，隱名奉母者一年。爰日之暇，撰成史記地名考一書。書既成，乃辭母重返後方，應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之聘。翌年春，太夫人病逝，先生不獲回籍奔喪。哀痛之餘，乃將其書齋由「未學齋」易名爲「思親彊學室」，以爲紀念。隨後以「思親彊學室讀書記」爲題作讀史劄記若干篇。先生原擬將此類著述撦綴爲一集，嗣以國事鯨疏無已，轉徙南北，前後文稿散在各處，未易搜求，故迄未成編。晚年定居臺北，猶時時以此爲念。嘗手訂一擬收目錄，並改題其書名曰「讀史隨劄」。但依然以搜羅不全，未能付梓。延宕既久，値他書印行，轉有將原擬篇章編入其他著作者。

今先生既歸道山，本會整理先生遺稿，謹據其原訂篇目，盡力搜集，共得三十五篇。其中唐人服食修煉、唐人飲茶兩篇，當爲未成文稿。記唐文人干謁之風、記唐代文人之潤筆兩篇，已先編入中國文學論叢，今自該書抽出，移編本書。又甲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二册（四）隋唐五代之部，有讀王通中說一文，自第一頁篇首「文中子王通」起，至第七頁「可證通之必有其人

矣」止，論王通其人一大段，本亦爲隨劄原編中之一篇，題爲「王通」。今以此篇已經擴充增寫，仍保留在甲編論叢之中，不再收載於此書。

先生此類文稿，仍有搜求未盡者，然得此一編，已屬不易。今謹以先生生前所定之名命編，雖不足以謂完成先生未了之願，儻亦聊堪告慰其在天之靈於萬一乎？先生未留書序，今以民國三十年所作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序權爲代序。本書既編成於先生身後，因略述其始末，以告讀者。

本書各篇，多就原稿整理；其有先發表於雜誌期刊者，皆注明於各篇篇後。整理工作雖力求愼重，然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錢行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中國史學名著　出版說明

本書乃錢賓四先生於民國五十九年爲臺北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所開「中國史學名著」課程之全年講堂實錄。每講舉出歷代有關史學之代表著作一二種，標爲講題，詳細講述，凡二十餘講，旨在指引學生研究史學之門徑。

中國史學已有數千年歷史，在全世界中起源最早。先生嘗言治史學須在全部學術大體中求瞭解；須從三千年之史學演變中求知何爲史學；更應知如何從汗牛充棟之歷史材料中，尋出中國歷史之靈魂。故課堂宣講，語多誠勸，並於各講中時申讀書爲學方法，以啟迪後學。

全書由學生戴景賢隨堂錄音寫出，再由先生刪潤而成。民國六十二年二月，交臺北三民書局出版。三民書局將該書編入三民文庫，以四十開小字本印行。先生以其閱讀費神，頗不愜意。三民曾允再版時改爲二十五開標準本。民國六十九年，其時先生雙目已不能見字，仍以此書之改排爲念，特囑夫人胡美琦女士將全書誦讀一過，並作通體之增刪修潤，以備改排之用。惟三民遲遲未來取稿。此書至先生逝世時，仍未能改排新版。

今整編全集，即以增修遺稿爲底本。各篇皆加以分節，版式與分段皆重新處理。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指正。

本書由王仁祥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我在民國五十八至五十九、五十九至六十這兩年間，曾爲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開設「中國史學名著」一課程。第一年由聽講者隨堂筆記，意欲彙集各本成一講義，乃其事甚難。一則所記詳略互異，並有共同所缺，欲爲補入，亦復追憶無從。第二年仍開此課，戴生景賢來旁聽，携一錄音機，堂下照收錄寫出，由我刪潤，遂成此稿。故此稿乃一年之講堂實錄。每堂必標一講題，然亦有前講未畢，後講補述，此稿皆一仍其舊。亦有前後所講重複，並有一意反覆申

明，辭繁不殺，此稿均不刪削。亦多題外發揮，語多誡勸，此稿皆保留原語。雖非著述之體，然亦使讀者誦其辭，如相與謦欬於一堂之上。最先本有「通論讀書爲學方法」一堂，戴生未加錄音，今亦不爲補入。然各講時申此意，讀者可自參之。

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孫中山先生誕辰後一日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史記地名考　出版說明

夫治史者，固當先把握史實之大綱要領，次則進求其精神之所在與夫價值之評判；而古史之考據，要亦爲必不可忽之節目。蓋歷史之意義價值，必建基於史實之認知；而史實之認知，則時有賴於考據以確定其眞相。故於古事，或考其人，或考其年，或考其地，皆所以求史事眞相之確立。錢賓四先生畢生寢饋史籍，於史學之各方面，並有著述。其國史大綱、中國文化史導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之類，所以揭其大綱要領者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精神、國史新論、中國史學發微之類，所以抉其精神意義者也。至深入古史考據之詳，最著者有先秦諸子繫年，考諸子年世以至列國世系，極多創闢，爲史遷六國年表正訛補闕，增改詳定不下一二百處，戰國史事至是大體可說；其次於古地之考述，則有本書及古史地理論叢兩種。

先生之注意考地，遠始民國十一年，最早考楚辭地名。其後四、五年間，則專意撰述先秦諸子繫年。書既成，即有意續爲「戰國地名考」。但以時局轉變，流徙西南，因應時需，遂著爲國史大綱。史綱既成，先生歸蘇州探母。時山東齊魯大學流亡成都，顧頡剛先生任該校國學研究所

主任，邀先生往教。先生慨允，惟欲先請假一年，留蘇奉母。顧先生許之，然請其主編齊魯學報，並在上海接洽首期出版事宜，而薪水則可照發。先生以謂此一年中，當另有撰述以報。於是就原擬考述之戰國地名擴大其範圍，通考史記地名，遂有本書之作。始業於二十八年夏，卜居蘇州婁門之耦園，杜門變姓名，以半日自修英文，餘半日至夜半則專意撰著本書。先生自謂：一則當時無錫鄉居尙幸存古史地理書籍二三十種，可取以爲參考之資；再則幽居廢園，亦猶前年宜良山中之撰史綱，可終年閉戶，不接人事，故得在一年之間而完成此書也。

其時淪陷區僞政府已成立，二十九年夏，先生遂辭親去重慶而至成都。行前將本書稿交上海開明書店，以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名義出版；當時未及爲之作序例。先生在成都六年，其間曾就記憶所及改定本書數十處。勝利返滬，此書早已排版，乃將携回之改定資料交付開明書店挖改重排。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先生隻身流遷香港，倉卒間未能携帶已排就之淸樣，又不克索取原稿。到港後，久不見是書印出，幾度輾轉向大陸乞取而杳無回音。逮五十五年春，乃有香港某書肆用開明版付印，並減去作者姓名，改稱由「某書肆集體編纂」。不知是書所考，多有先生一人獨得之發明，絕不可能出於眾手。且其始先生未作序例以明其編纂之體例，則讀者不易明其作意，而其書之應用亦將爲之減折。於是先生於五十五年四月另撰序文，載諸卷前；並由孫鼎宸先

生代編地名總目一卷、索引一卷，附諸書後；更交香港龍門書店於五十七年九月重印出版。此書幸能流傳海外，作者終能親見其流傳，又能於事隔二十六年之後增足其前所未成之序例，實爲亂世學者之幸事。至與該書肆交涉以取回是書版權，則余秉權先生之力也。然先生在成都所改定處，印版是否已遷改，則因事隔多年，無由核對矣。

是書體裁別出，辭簡義盡。篇幅雖不甚大，而史記全書逐一地名已考訂無遺。其所取材，盡在於三家注。如韓世家一地名，其地實在魏，則移之入魏地名考中。先錄三家原注，再以今地名附之，略道其所以即止。或一家注得之，餘兩家失之；或兩家注得之，其餘一家失之；皆不繁論。自來爲春秋地名考、戰國地名考者，書已多有，未有如本書之簡淨者。而其於地名異同分合之安排，乃至如漢侯邑四卷中，地名屢與他篇重出，爲例獨異於其餘各篇之類，皆別具深意，蓋期讀者觸類旁通，以爲治史多方面探索之啟發。讀者若以本書之易檢易查，而但目之爲一部地名檢索書，則無異於買櫝還珠矣。

本書原版雖屬鉛排，然其形式則仿舊籍，除出處及附加說明加入圓括號外，全書文字悉無斷句標點。其引錄史文各條，已分別標列序碼；然各條接排，合成一大段。三家注部分，則分段另起，各家之前亦各標書名，但亦接排不分列。最後案語部分，又再分段另起。今重加整理，版式

大體仍保留原版史文、注文、案語三系之分立；而史文、注文則改爲逐條分列；案語改排楷體，圓括號內之出處或補充說明則改排較小字體。務使層次分明，方便閱讀。全書並增入新式標點符號。凡本書立爲條目者，無論其地範圍之廣狹，則概加私名號。

原書於史文、注文皆例注出處篇目。惟以力求簡淨，故於史文、注文之出處，遇數條同出一篇者，但標注於最後一條之下。此其蒙後而省之例也。其史文僅得一條，或多條同出一篇，而注文亦出同篇者，則但注於史文之下，注文不復再列。此則其承前而省之例也。如卷二十八「武州」條：（原書並無標點，下同。）

①單于穿塞，入武州塞。

②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韓長孺傳）

【集解】徐廣曰：「在雁門。」

【索隱】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

以其史文兩條與注文兩條並同出韓長孺傳，故但標於史文後一條下，而注文則承前而省也。

然原版最後付印，未再經先生校定，故漏列出處、誤列出處之條目，亦所在多有。今於全書各條，重加覆覈，悉予補正。又原書所引史記及三家注原文，多與武英殿本相同，與他本則偶有

相異。故今以乾隆武英殿刊本爲據，校其文字，其誤植處悉加改正。案語所引書文，亦儘量查對校核。至引文有節引者，又往往省略關連詞語；以其無傷文意，故一仍其舊，而以引號標之，明其起訖。

又原書於三家注文，往往有綴合兩條或多條以爲說，而已分別明注其出處者，如卷十三「霍」字條：

【正義】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彘縣也。」（管蔡世家）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魏世家）鄭玄注周禮云：「霍山在彘，本春秋時霍伯國地。」（管蔡世家）

讀者見此，自知此條所引「後漢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兩句，乃自魏世家注移入。但亦有未加注明者，如卷十「嶧陽、鄒嶧山、騶嶧山」條：

【索隱】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魯穆公改作「鄒」。今魯國騶縣是也。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勒之銘。」

此條漏列出處，且驟讀之，亦易以爲本只是一條。今加整理爲：

【索隱】騶縣之嶧山。騶縣本邾國，（封禪書）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陳杞世家）魯穆公改作「鄒」。（封禪書）今魯國騶縣是也。（陳杞世家）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

所勒之銘。」（封禪書）

則知此條實由兩篇之注文綴合而成。又如卷十五「藺、北藺、藺陽」條：

【正義】藺近離石，在石州。地理志屬西河郡。

原書亦漏列出處，亦易誤認爲同一條之文。今則補入爲：

【正義】藺近離石，（周本紀）在石州。（樗里子傳）地理志屬西河郡。（趙世家）

則知正義此文，實源出三處，而合而爲說。

至三家注出處，有與其前所繫史文不相應者。如卷十四「岸門」條：

【正義】括地志云：「岸門在許州長社縣西北二十八里，（案：魏、韓兩世家注作「十八里」。）今名西武亭。」（秦本紀）

本條前繫史文共四條，其屬秦本紀者惟「惠文十一，敗韓岸門」一條。讀者若翻檢秦本紀此條，則不見有正義此文。蓋此文實繫在秦本紀上文「秦孝公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之下。以其同在秦本紀之中，本書遂從簡省耳。

再如同卷「潁陽」條：

【正義】括地志云：「潁陽故城在陳州南頓縣西北。」

此條原書漏列出處。檢所引史文三處，皆不見有正義此條。實則此仍出絳侯世家，惟所引史文爲「攻潁陽、緱氏」，而正義此文則繫在後文「賜與潁陽侯共食鍾離」之下。故今但沿例於正義引文下補入其出處篇名。

又如卷二十八「玉門」條，史文共舉三處，皆出大宛傳，故但注明在第三條下。所引三家注文，亦並出此篇，故不復再注。其中正義一條：

【正義】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

又：「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所引括地志前兩句實繫在史文第一條「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門」下。「又」下一句則在大宛傳上文「注引鹽澤」下，而不在所引三條史文之任一條下。以其同在大宛傳中，故不再另注。此亦上文所謂承前而省之例也。故讀者遇注文與史文不相應處，則當於所注篇中他處尋檢。茲特加說明，免滋誤會。

上舉三例，如「岸門」、如「玉門」，所引正義實並已明其出處；「潁陽」所引正義，雖漏出處，然所引史文則有絳侯世家一條；皆可謂有線索可供追尋者。至如卷十五「樂成」條：

【索隱】韋昭云：「河間縣。」

此條史文但有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孝文分趙爲河間國，都樂成」一條，而索隱此文則不在其下。原書未注出處，讀者或易誤以爲亦出年表；即查年表未能檢得，亦不易有所聯想。實則此乃孝武本紀「樂成侯上書言欒大」之注文。今補注其出處，讀者庶可省尋檢之勞。

其他與本書相關之宗旨體例，已詳先生自序者，不復贅。謹就本編點校整理工作略加補充說明，俾讀者應用較得方便。整理工作雖力求愼重，然以事涉專門，牽連亦廣，錯誤疏漏，料將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何澤恆先生負責。江敏華小姐、洪素年小姐協助覆核史記原文。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余之有意治古史地理，始於民國十一年秋，在厦門集美，讀船山遺書楚辭通釋，至抽思之篇：「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船山注：「時屈原居漢北。」余譾陋，知屈原之南遷沅湘而已，顧不知其居漢北也，而文證明白如此，興趣驟開，遂知留意。翌年秋，始撰先秦諸子繫年，於屈

原行迹多所考訂，並旁及春秋、戰國時之地理。十九年冬，在北平燕京大學，始成周初地理考。後續撰古三苗疆域考、黃帝故事地望考、西周戎禍考諸篇。二十三年又撰楚辭地名考。又別有短篇散作，有關古史地名者，茲不詳列。凡此諸篇，中多創闢非常可怪之論，前人絕未道及。如謂太王居豳，字本作「邠」，在山西汾水流域，不在陜西鳳翔。如言屈子沉湘，字同「襄」，乃漢水之別稱，非入洞庭之湘水。三苗之居，左彭蠡，右洞庭，彭蠡、洞庭皆在大江之北而不在江南。一時頗引起讀者之疑辨。余於古代地理所以敢出此奇論，乃據三大原則互相會通而得：

一曰地名原始。其先地名亦皆有意義可釋，乃通名，非專名，爾雅釋山、釋水諸篇可證。如「大山宮小山，霍」，凡四圍大山環拱中央一小山，皆可得「霍」稱。民國二十年春，余登北平之妙峯山，觀其形勢，即大山宮小山之霍也。此山雖不依古稱「霍」，而取名妙峯，然此山之所以得北方廣大居民之崇祠，亦猶古人尊霍爲岳之遺意也。凡稱「洞庭」，皆指地下水脈潛通。江蘇太湖有洞庭，傳說其水脈與湖南洞庭相通，因此亦名洞庭。此種傳說，雖不可信，然亦有甚深遠之來源。蓋古人凡遇澤水乾涸，水下地面冒出，若相隔絕，各成一澤。水盛時，則浩瀚一片，露出水面之陸地，又皆隱沒不見。乃謂此乃地下水脈之潛通，而名之曰「洞庭」。是「洞庭」有通義，初不專指一水。又如「彭蠡」，乃水流湍急，成漩渦，故稱「大螺」。彭蠡即大螺也。大江

之水倒灌入鄱陽，水急稱彭蠡。黃河在龍門之下，爲蒲坂、蒲津、雷首、壺山諸險所束，亦水急成大螺旋，故亦稱彭蠡。是「彭蠡」有通義，亦不專指一水。凡屬異地而同名者，因地名本屬通義，可以名此，亦可以名彼也。

二曰地名遷徙，必有先後，決非異地同時可以各得此名不謀而合也。地名遷徙之背後，蓋有民族遷徙之蹤跡可資推說。一民族初至一新地，就其故居之舊名，擇其相近似而移以名其僑居之新土，故異地有同名也。余幼年居江蘇無錫南延祥鄉之蕩口，其地多華姓聚族而居，其祖先乃由隣近東亭分支來此。故此兩鎭頗多地名相同。蕩口有楊樹港，東亭亦有之。港之兩端有賣魚橋、賣雞橋，東亭亦有之。即小可以喻大。自西周下至春秋，如晉、如郢、如秦，此諸都邑皆多遷徙，而都邑之名亦隨之而遷。近代西方帝國殖民，亦多以其舊居名新邦。春秋、戰國時代，華夏諸族活動範圍，頗少南達今湖南江西洞庭、彭蠡之紀載。余考洞庭、彭蠡之名，最先起於大河兩岸，漸及大江以北，後乃移其名而被於大江之南也。

三曰地名沿革，大概腹地衝要，文物殷盛，人事多變之區，每有新名迭起，舊名被掩，則地名之改革爲多；而邊荒窮陬，人文未啟，故事流傳，遞相因襲。如楚人南遷，屈原沉湘之故事亦隨而南遷，湘水之名，始起於今湖南之洞庭流域，此後遂少變改。而大江以北之水地名湘者，反

多湮沒不彰。洞庭之與彭蠡亦然。今人一提及此諸名，即若自始已在大江之南。至於江北以及中原，苟非博考遺文，悉心搜求，誰復知其早有洞庭、湘水、彭蠡之名之先在乎？故考地名沿革，先起者反多晦滅，後人移用者反多保留，並歷久而益顯，此又一通例也。

余治古史地名，大率本此三通例。所獲結論，驟視之，若怪誕不經，好事鑿空，然既有古代典籍文字可證，而據此以推闡史迹，又皆通明無礙，遠勝舊說。故敢毅然翻積見，標新得。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平心比觀，當知余言之非苟然也。

又嘗謂治古史，有四要項當分別尋求：一曰氏族，二曰地理，三曰人物，四曰年代。春秋以下，人物漸盛，年代亦始可以細求。自西周逆溯而上，歷夏商、唐虞，乃至邃古，人物皆無可詳說，年代亦渺茫難稽，提前或移後數十年乃至數百年，於史事若可無影響。或謂夏代歷年四百三十二，或謂夏代歷年四百七十二，一本劉歆之三統曆，一本竹書紀年之遺文，此四十年之相差，將何據以確定其是非？縱或能有所定，於討論夏代史迹，亦無何裨補。蓋綜夏代三、四百年間，本無許多人物事變可資詳說也。故治古史，愈溯而上，乃惟有氏族、地理兩要項。考地所得，可資以解說當時各氏族之活動區域及其往來轉徙之迹，與夫各族間離合消長之情勢，則已可為古史描出一粗略之輪廓。余之所為，僅如蠶叢開山，篳路藍縷，荆棘滿途，距竟全功尚遠。亦

以余之治史宗旨初不在是，偶以興趣所湊，運其餘力，時作時輟，如是而已。

民國二十六年秋，抗戰軍興，北平淪陷，流亡轉徙，迄於二十八年之夏，國史大綱成稿，余復隻身轉輾自昆明返滬上，獲覲慈親於蘇州，而無力奉親遐地；不得已，乃卜居蘇州耦園。園荒已久，寂無居人。余之遷入，外間絕無知者。乃杜門變姓名，以愛日之餘暇，發意草創爲史記地名考。竊念前人治古史地理，或專考禹貢，或徧考春秋、戰國地名，下至漢書地理志，何啻數十百家。史記一書，上始軒轅，下迄天漢，集古史之大成，而考地者於此獨闕。余無錫鄉居，幸猶存古史地理書二、三十種。遂取以來，昕夕握管，越一年而成書。其時淪陷區僞政府已成立，余恐蹤跡洩露，遂辭親脫身去重慶而至成都。翌年春，慈親見背，不克在旁，成爲余終天之大恨。而余之此書，留稿後方，亦未及爲之作序例，稍自發明當時著作之緣起，及其編纂之大意。蓋距今又復二十有六年矣。

抑余之爲此書，乃頗與先成諸篇取徑有不同。凡先成者，皆屬地在荒遠，事出傳說，非有詳確之記載，故余所考覈，多翻案文章，實非考地之常軌也。春秋以下，人事益密，史籍燦備，凡一地名之沿革，前爲何邑，後爲何都，皆有文獻足徵。又有相關史事，可憑稽索。其爲仕宦所至，軍旅所經，師儒講習之所萃，商旅貿遷之所聚，莫不可以參伍錯綜以確定其地望之所在。蓋

地名之難可確指者，至是已十無二三。故余之爲此書，自春秋以下諸地名，幾乎多承舊貫，創論實尠。惟遇數說相歧，折衷取捨，亦必有據，非同鑿空立說，此乃從來考地之成軌。或有讀者，於我先成諸篇，愛其新奇，而薄此平實，則余之此書，正亦所以糾此流弊，而稍贖前愆也。（下略）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四月本書作者錢穆識於九龍沙田和風台寓廬

古史地理論叢　出版說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考論古代歷史地理長短論文之彙集。先生之考地，最先考楚辭地名，遠在民國十一年，尙在其始撰先秦諸子繫年前一年。及繫年成書，續爲此業，成周初地理考，時爲民國十九年。此後續有撰述。最後一種爲史記地名考，則完成在二十九年。嗣後以國事日非，先生治學別有關注，於此一領域遂未再有專著。民國七十年，先生年八十七，乃將史記地名考以外各文彙編爲本書；翌年七月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

書中各篇論題不一，然約而言之，其主要意義有二：一則從古代歷史上之異地同名來探究古代各部族遷徙之迹，從而論究中國各地經濟、政治、人文進化先後之序，爲治中國古代史者提出一至關重要應加注意之一節目。二爲泛論中國歷史上南北兩地域經濟、政治、人文演進之古今變遷，指示出若干大綱領，亦爲治中國人文地理所當注意者。要之爲治歷史必通地理提示出許多顯明之事例。內容有極專門處，亦有極普通處，則待學者細讀詳參。

本書原編分甲、乙兩部。甲部收文三篇，乙部十九篇，合二十二篇。甲部三篇，分別發表於

燕京學報、清華學報；乙部各篇，則多發表於禹貢半月刊。其中若干篇章內容，有重見於先生其他論著者。如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輿紀要一篇，原已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八單元有清之部，後以文末復有添改，因復重編入本書中。又如禹貢山水雜說、蒼梧九疑零陵地望考、說邢、說滇與昆明等篇，亦有與史記地名考相關條目重出者。若此之類，以彼此稍有詳略異同，今悉予保留，以保持全書之完整。又有饒宗頤「魏策吳起論三苗之居辨誤」附跋、神農與黃帝、戰國時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說、略記古代江淮河汴水道交通等四篇，皆初編時所未及搜得者，今為增入。其第一篇編入為甲部古三苗疆域考之附錄，後三篇則編入乙部。全書合共二十五篇。新增各篇在目錄中加＊號注明，以資識別。

今茲整理，以初版本為底本，校改原書若干誤植文字，並整理標點符號，主要為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增入若干引號，以明引文之起訖，期能較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王仁祥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憶余在民國十一年之秋，任教於廈門集美學校，始讀船山遺書，於其辨屈原沉湘乃在漢水，不在洞庭，而深有契悟，乃草小文一篇刊載報端。越四五年，撰述先秦諸子繫年，詳申其義。因念古代民族遷徙，以舊居之名名其新邑，此爲古史每多異地同名最好一說明。先秦諸子繫年既成書，乃續爲周初地理考、古三苗疆域考諸篇，則已在民國二十年之後。而其時則國事日非，羣言厖雜，意所欲陳，紛起疊乘，考治古史地名之業，遂棄置不復理。至民國二十八年秋，余自昆明返蘇州，迎母奉養，杜門不出，寫成史記地名考一書。是爲余治古史地理最後一著作。上距討論楚辭地名，則先後亦達十二年之久。此後再不復爲。年逾八十，雙目失明，不能見字，但念舊稿雖非時代所需，而要爲治古史者一大綱目；余之所論，雖引端於船山，而凡所發現，則實爲古今所未及，遽爾散棄，亦誠可惜。遂將舊存諸篇彙集付印。亦有成稿後絡續增加材料多達數十節，囑及門何君澤恆斟酌編入篇中，而余則已無可細爲裁奪矣。有關此等材料，搜羅難盡，凡所論列，亦容有誤；但得者最少當占十七八，失者最多不過十二三；則惟待後人續治此業者之再爲訂

正矣。遙計初治此業，距今已逾六十年。此亦當時心力所注，撫卷豈勝愴然。

民國七十一年春三月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錢穆

文化學大義　出版說明

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錢賓四先生第一次由香港來臺北，在省立師範學院作連續四次八小時之講演，講詞整理成此文化學大義一書。此爲先生繼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後，又一次對文化學作系統性之討論。先生自言此番講演之用心所在，乃基於數十年來對世界整個局勢之觀察與認識，認爲當前無論中國問題，乃至世界問題，無不由文化問題產生，故無不需由文化問題來解決。又言「文化學」一門，此後必將爲學術思想中一主要科目。此下四十年，先生先後完成有關中西文化比較之文章近百篇。此類文稿，今已分別收入相關各書中。讀者讀本書，如能與先生其他各文互參，庶可對其作意有更深之認識。

本書於民國四十一年，由臺北正中書局出版。初版本除四次講演稿外，並附先生近作世界文化之新生、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及人類新文化與新科學三文，以其大旨與講稿相同，故附刊於後。

初版梓行之後，先生續有增潤。民國七十六年，曾擬重排新版，加添意旨相近之六文。其中

中國文化與人權思想一文，乃民國七十年中國人權協會之邀稿；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一文，乃民國七十二年先生赴香港參加中文大學成立二十周年慶典之講辭；其餘四文皆爲民國七十六年之近作。增編既定，先生並即寫成再版序一文。後因故未能即時付排。今編爲全集，即以七十六年先生整編之書稿爲底本。惟初版附錄之孔子與世界文化新生一文，因已於六十三年另收入孔子與論語一書中，本書不再重載。凡新添各篇，目次中例加「*」號，又援全集編例，加添私名號、書名號、引號，並增添分節、分段之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

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再版序

五十餘年前，中國對日抗戰時，歐洲第二次英、法、德、意之戰亦隨之繼起。其時中國雲南

昆明西南聯大有好幾位教授，多曾留學美歐，創辦一雜誌，名戰國策。討論世界將來局勢，以中國戰國時代爲例。分全世界爲兩大勢力圈，一美國，一蘇俄。美國如戰國時代東方之齊，蘇俄如戰國時代西方之秦。此下天下歸於一，或齊或秦，爲該雜誌討論一中心。

其實蘇俄在當時歐戰中，亦歸附英、法一面，國力尚薄弱，不如後來之受人重視。而戰國策雜誌編纂諸公，已預料此下當爲一美、蘇對抗之局面。此亦不得謂非能於世界大局演變有先見，有預瞻。此後五十年，國際局勢展演，乃果如當時戰國策諸公所預料。

但在最近，乃有美、蘇兩邦裁減核子武器之和談，而全世界之緊張局勢亦因之大爲鬆弛。此下世界局勢將可望不會有核子戰爭之危險。而且尚不止此，即帝國主義之長期爭衡亦終將衰歇。歐洲英、法兩國之帝國主義已顯告停止可不論。即如美國，自其對韓對越，更如其自對日抗戰後之對菲律賓，及其最近對東歐波斯灣之伊朗言，亦可爲美國不能繼續英、法以往帝國主義舊軌轍一明證。美國不能繼續歐洲之帝國主義既如此，而蘇維埃則既就最近美、蘇商談防止核子武器發展之一事爲例，亦可知其同亦不能再繼續履行發展其以前之帝國主義，亦已大勢可睹。不煩再加深究。

帝國主義既告衰退，此下世界，國際局勢必將隨之一新。將來之和平展望已大增，此不得不

謂乃出人意料外之世界一大變局，一大進步，亦不待多疑矣。

然則觀於當前美、蘇之核武和談，此下世界之國際和平，當與以前帝國爭霸之局面大相異。此一演變，已屬明顯，不至再蹈前轍，殆可無疑。小衝突、小紛爭，固亦驟難停止，驟難斷絕。要之，與以前之帝國爭衡有大不同，此則已可判定。

今再言資本主義，其與帝國主義原本如一鳥之兩翼，乃同時而並起，亦互助以相成。帝國主義既衰退，資本主義亦無法單獨緜延，常此伸張。如今之日本，雖爲世界首富之國，然其勢不可久。此下如何演變，固難詳說。而大勢所趨，亦可逆料。此下世界，既無帝國主義之爭強，亦不能有資本主義之爭富。然則此下之所謂和平共存，其大勢又如何？

此亦無法作事先具體之描述，而大體局勢，則宜可約略推想。以今世界論，五大洲諸民族，文化先進，一爲歐洲，一爲中國。前述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皆源自歐洲，而中國傳統則無之。此下歐洲型漸告衰退，則與之相代而繼起者，宜將爲中國型，此亦可姑作先展，略爲預定。

竊謂當前世局，歐洲型亦早有轉向中國型之趨勢。就美國言，如彼中近有人提倡三世同居之新家庭制。每一家庭，上有祖父母，下有孫兒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齊家而達於治國、平天下，三世同居之新家庭制，即已有此把握之先兆。美國人果能推行此制，自

當感其可安可樂，又何艱難困苦之有。則當前美國人之中國化，豈不已躍然在望，亦可指而覩矣。

又如最近之歐洲人，有提倡全歐洲組織成一聯合國之提議，由當前之共同商業聯盟，一進而爲此下全體政局之憲法聯盟，此亦非難能之事。全歐洲最近共三十餘國，儻成一聯邦，尙短於美國之五十一州，豈不易舉可能。然而全歐洲儻果能合成一聯邦，則豈不如中國之由戰國統一而爲秦漢，一切大變動亦可無煩深言矣。

由上言之，故由近代時局一變而成一新世界，其實仍是一舊世界。其事非不可能，其大變乃在由外轉內，由分轉合，由個人轉而爲大羣，其機捩只在各自內心之一轉念間，而其變即可達。不煩有哲學，亦不煩有科學。不煩有宗教，亦更不煩有法律，而社會之一切變動，則各人內心一轉念間已定，而一切所願所望則盡在是矣。此眞指顧間事，更可不待再作艱深之研討。

余之創爲此「文化學大義」一書，乃在三十七年前，余初次來臺灣，經八小時之講演而寫成。迄今還念此三十七年世界大勢一切變動，難可覼縷。今日之臺灣，可謂已與當時即三十七年前大不同。而世界之變，則更有其大者。但以今日三十七年後之讀者，來讀吾此書，豈不亦如即日面談，何堪想及此三十七年長時期中一切變動之詳。然則迄今以下，更三十七年，世界之變，

又當如何？但異地有變，異時有變，人之一心則只在此方寸間。舉世十幾兆人之心，大體亦約略相同，儼如一心。上下三四千年間，古今人心亦如此。余之根據把捉，即在此心。故可以暢言天下事，暢言數十年百年間事，而仍如在吾胸之方寸間。中國文化之所以可大可久者正在此，而又何足詫異之有。

以今日之大勢言，則舉世人之此心，爲外面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剝奪侵佔以去，已不知其幾何世矣！然而天賦此心，乃人之常新，自然日新而不絕。今日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方將日告衰歇，而此心則依然如故。人不能自見己心，而此心之在外，則猶鏡可鑑。吾中華五千年相傳之文化傳統即不啻如一鏡。讀者試反忖之己心，外覘世變，則必有其體悟之所在矣。余誠不勝其深企之。此書再版，乃爲此序，又不勝其再三重複而申言之如此。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先總統誕辰紀念日，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三。

民族與文化　出版說明

民國四十八年九月，錢賓四先生爲臺北國防研究院講「民族與文化」一課程，本書即匯集當時講義與講演辭兩部分而成。

「民族」與「文化」兩名詞，乃近代國人所傳譯之西方語，但在中國上古實早已有之。「民族」乃中國所謂之「血統」，「文化」乃中國所謂之「道統」。由此民族創造此文化，但非此文化亦無由完成此民族。中國人主張文化之意義與價值更高於民族，其中涵義弘深，深值國人重加研討。

本書於民國四十九年六月，由臺北聯合出版中心出版。民國五十一年在香港再版。民國七十八年，先生重讀此書，曾加增修，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再版發行。

今全集整理，即依東大增修本爲底本，新加書名號、私名號、引號，講辭部分則增添分段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去年冬，國防研究院約我講「民族與文化」這一課程。我雖自審不勝任，終於勉強答應了。今年三四月間，國防研究院開來該課程之綱要，要我限時先寫一講義。我正在百忙中，不能竟體寫下，只得分章分行寫，寫了幾章幾行，可以隨時停下，捉些閒暇，可以隨時再往下寫。講義寫完，但我的授課時間展後了，直到九月間，始匆匆趕去上堂。一連三天十堂課，我事先和臨時，又都沒有好好準備，又因已寫了一篇講義，上堂時，想不要依著講義逐章逐行講去，便隨口隨心，只照講義上所提要點另作生發。講完後，又承國防研究院把我十堂所講紀錄下來寄我看。但隔離我上堂時間又已兩個月，我當時所講，追憶不真，只能就紀錄稿隨文修正，刪去一些太蕪蔓處，便成此篇講演辭。我既慚對此課程不勝任，又恨不能作好準備，希望讀者能把我講義和此講演辭一併看，庶乎我心下所想要講的，比較能更顯露些。至於其間疎陋失當處，則更盼望讀者能賜我以指正。

中華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錢穆謹識於九龍鑽石山寓廬

中華文化十二講　出版說明

民國五十六年，錢賓四先生初來臺灣定居，曾在各軍事基地作有關中國文化問題之講演，本書即彙集當時十二講之講辭而成。先生以爲中國文化有其特殊之成就，有其特殊之意義與價值，縱使一時受人輕蔑鄙視，但就人類生命全體之前途言，中國文化宜有其再現光輝與發揚之一日。先生一生崇敬國家民族之傳統文化，幾同宗教信仰，其對中國文化頌讚容有過分處，對西方文化批評容有偏激處：要之，讀此書庶可見中國文化影響之悠久偉大，實有超乎一般想像之上者。

本書於民國五十七年十月由空軍總政戰部出版，交臺北三民書局經銷。七十四年，再版時，先生曾作小幅修訂。今全集版整理，即以修訂本爲底本。新加書名號、私名號、引號，以及分段與引文之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我去年八月曾在空軍松山基地作過一次講演，題爲「反攻復國前途的展望」。十月來臺定居。十一月又赴空軍各基地作巡廻講演凡八次，以中國文化爲中心分講八題。空軍總部政治作戰部整理各次錄音，送我校改，集爲一書。並增附我在三軍聯合參謀大學，海、陸、空三軍官校分講三題及陸軍第二集團軍官團一講，取名中華文化十二講。

講述文化，必從兩方面入手。一則文化千頭萬緒，必從其各方面各部門分別探究，而認識其相互匯通，以合成一大體系。二則文化非一成不變，必從其歷史演進中分別探究其隨時因革損益，以見其全體系之進向與其利弊得失長短輕重之所在。我在對日抗戰時期曾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即從以上兩點着眼。

避共居港，初次來臺，曾在師範大學及陸總政戰部作過兩番連續性講演，均記錄成書，一爲文化學大義，一爲中國歷史精神。嗣又在國防研究院講「民族與文化」，亦將講演記錄成書。此次空軍講演，乃我對中國文化作有系統講演之第四次。每次所講內容，均從某一角度，偏重在某

一方面發揮。雖可相通互足，而其着眼與側重點則並不全同。讀我此十二講者，倘能再看我以前之各集，庶於我所闡說有一更完備之瞭解。

我此次徧歷空軍各基地，獲與各地官長士兵接觸，參觀其各項設備與活動，深信我空軍健兒精神飽滿，志氣壯旺，退足以保安全，進足以勝任反攻復國之大命。並使我更益深信我中華傳統文化精義，實無背於時代潮流，而仍有其更高更大之啟示。即以我所目覩之空軍生活而言，亦可有不少之例證。

我常愛讀唐以下各派禪宗祖師與宋明理學諸儒之語錄，尤其關於心性修養方面，認爲此乃我中華文化傳統精要所在。此次歷經空軍各地，雖屬匆促，卻覺空軍生活實有堪與禪宗理學之所揭示相證發者。從前禪宗及理學家修心養性，有一共通主要之點，厥爲「空諸所有，繫心一處」。理學家說「敬」說「靜」，敬即教人隨時隨地心主一處。靜則教人心主於一，更不爲其他外物所動。理學家所反對於禪宗者，禪宗祖師只求繫心一處，而不復求此心之「用」。故理學家謂之「有體而無用」。心繫一處是爲體，此心落於空虛則無用。故又謂其「彌近理而大亂眞」。今我所覩空軍生活，其實亦是要繫心一處，然而卻是繫在一眞實有大用處。試問駕駛飛機，升空臨敵，在個人則是一死生關頭，在國家民族文化傳統則是一存亡絕續關頭，豈止軍事上之或勝或敗而

已。若非心在一處，焉能勝任而愉快。

我觀空軍各休憩室，均稱待命室。一當命下，即有緊急之動作隨之，其間不容以瞬。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生實各有一大責任、大使命。若我們知得有此大命在身，自然會無朝無夕、無作無息，而此心常主在此。常動即是常靜，常靜即是常動。動靜一致，使此生命永恆圓滿，無虧欠，無間斷，此乃人生最高境界，亦即人生最高理想。

空軍某一軍官告我說：「每一基地，地勤空勤，各有分職，而莫不緊密相關，聯成一體。若一人一職疏失，即可影響到全體之各部。」我又參觀某一基地，其士兵終日夜坐暗室中監視雷達，稍有蹤影，即徧告各地。其所任職務，極單純，又極嚴肅。若論其部隊之本身生活，則可謂乾枯之至。然其在全軍中之任務，則實是機動之至。空軍後方如前線，平時如戰時，故能使其全部隊，人人具有緊密聯成一體之警覺。使人人各自繫心一處，而其各別繫心之處則相互會合，融成一體而後可以完成全體空軍之一大使命。

我又參觀空軍駕機升空之種種衣裝設備。在其一身，自頂至踵，幾成一機器人。其機上座位四週，則完全是一機器世界。人則在此機器世界中全仗一心指揮運使。科學愈進步，機械愈發展，在此愈益唯物之環境中，乃愈見心靈活動之重要。物則依心爲主，心則與物爲體。宋儒「萬

物一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格言，在空軍生活中，豈不更易具體指陳其內涵意義之眞實性。

我因此次到空軍各基地，遂更親切悟到中國禪宗與宋明理學家所發揮之「心性修養」，實非僅在深山寺廟與私人書齋中一番閒談論、閒工夫。即使現代最機械、最緊張的鬥爭場合中，依然同樣需此訓練，合此教義。空軍如此，海軍、陸軍事可例推。軍隊如此，工商實業界亦可例推。軍事與經濟如此，政治、教育乃及其他一切文化要項，同樣亦可例推。要言之，中國歷史上唐、宋、元、明四代禪宗理學家所言心性修養工夫，既可通之現代最機械最緊張之空軍生活，豈有不能通之其他職務乃及一應日常人生之理。我中華文化傳統中所言之心性修養，更當上溯之於先秦儒、道兩家，而更主要者則爲孔孟教義，此誠我中華文化主要精義所在。只要我們每一人從其各自崗位上，能善加體會，善加推擴，上達至於全民族、全人類之文化大體系上，而心知其意，則凡我中華先民先哲之所啟示，其在人類心性精微處，在人類生活廣大處，早已提綱挈領，抉發出其大義，揭露出其要旨，爲我們奠下了一基礎，指示了一大道。

莫要說我們今天該是一民主社會了，其實民主社會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論與大方向。莫要說我們今天該是一科學時代了，其實科學時代亦仍需要此一套人生之大理論與大方向。而要走

上此大方向，實現此大理論，則有待於我國人各自有其一番心性修養。惟此最爲我中華文化傳統對全世界全人類文化前途有其大貢獻之處。我此十二番講演所特別著眼注重之點，亦正在此一角度上。因此在本書出版之前，即本我此次演講時親所悟得，略加闡說。以備關心文化復興一大任務者，繼此作爲共同進一步之研究。

我此講演集之得以問世，首當對空總政戰部之邀約，及其錄音整理成爲初稿，以及其代爲出版諸事，敬致我衷誠之謝意。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錢穆識於臺北金山街寓廬

中國文化精神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年春，國防部集海、陸、空三軍軍官爲「莒光班」，輪番受訓，錢賓四先生受邀講「中國文化精神」一課，前後十三次，彙成此書。此爲先生繼中國文化十二講一書後，對當前軍人所作系統的文化講演之第二集。

先生自言，凡其所講，無不自其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皆是從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而得。讀者讀此書，若能與先生全集中其他文化講演集合讀，庶可對我國傳統文化精神有廣面及深度之認識。

本書於民國六十年七月在臺出版，六十二年交三民書局總經銷。今整編爲全集，即以初版爲底本，另在第四、第五、第十三篇講稿下，增附先生當年所寫之講演大綱。全書又添加書名號、私名號、引號，並重作分段及版式之整理，以方便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余遷居來臺，即曾在空軍各基地作過一番巡迴演講，又增以在三軍參謀大學、海、陸、空軍官校之演講，共成中國文化十二講。此爲余對當前軍人作有系統的文化演講之第一集。今年海、陸、空三軍之軍官集合爲莒光班，輪番受訓，余應蕭政之教育長之邀約，隨班講「中國文化精神」一課程，前後十三次，彙印成册，此爲余對當前軍人作有系統的文化演講之第二集。

聞鼙鼓而思將帥。今者國難當頭，保護國家，捍衛文化，惟我軍人擔當了莫大的責任。惟能對國家民族傳統的文化有信心，始能對保護捍衛當前的莫大責任有勇氣。余對中國傳統文化之深博偉大，所知甚淺。然自問愛國熱忱，則自幼年迄於今茲，從未後人。凡我所講，無不自我對國家民族之一腔熱忱中來。

我之生年，在前清光緒乙未，即馬關條約臺灣割讓日本之年。我之一生，即常在此外患紛乘，國難深重之困境中。民國元年，我即在鄉村小學教書。我之稍有知識，稍能讀書，則莫非因國難之鼓勵，受國難之指導。我之演講，則皆是從我一生在不斷的國難之鼓勵與指導下困心衡慮

而得。

我敬願以此一腔熱忱，以此稍許困心衡慮之所得，貢獻於當前負保護國家捍衛文化之大任的軍人們。並願仍鼓餘勇，以追隨於我可敬愛之軍人之後，同爲當前國難善盡我所能追隨之貢獻。

中華民國開國六十年七月　錢穆

湖上閒思錄　出版說明

民國三十七年春，錢賓四先生任教於無錫江南大學，時值政局晦昧，光明難睹，又復胃病初愈，體況欠佳，遂於課餘之暇，常徜徉湖山勝處，故時有閒思遐想。適友人謝幼偉先生爲上海申報副刊學津邀稿，先生乃以湖上閒思隨筆應之。前後經時約四月，積成此三十篇文字。惟不久學津即告停刊，僅前五篇曾經發布。先生擬彙爲一編，取名「湖上閒思錄」，未及付梓，而時局已遽變。翌年，先生倉皇南下，此稿未及攜出。民國四十七年冬，始由大陸學生將之郵寄至港。先生歷經亂離，於十年後獲重睹舊作，欣喜無限，乃於四十八年秋，將全稿交香港人生雜誌絡續刊布。四十九年五月，由人生出版社結集正式出版。

先生在本書再跋中有言：「歷史限於事實，可以專就本己眞相即明；而文化則寓有價值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爲余對自己學問有意開新之發端。」本書則爲先生繼中國文化史導論後，探討中西文化比較之另一有系統著作。

民國六十九年，由三民書局在臺北再版發行。今全集版整理，即以臺版爲底本，新加入書名

號、私名號、引號，另作引文之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我這一本湖上閒思錄，是今年春天因着一位友人的一番慫慂而觸機開頭寫起的，經過了約莫四個月的時間，積成這三十篇文字，把它彙集成册。我的生活，其實也算不得是閒散，但總是在太湖的近邊，時時見到閒雲野鷗、風帆浪濤，總還是有一些閒時光的。我的那些思想，則總是在那些閒時光中透逗，在那些閒時光中醞釀。而且我之所思，實在也與世無補。我並不是說我對於當前這些實際的人生，漠不關心，不想幫忙。但總覺得我自己無此智慧，無此精力，來把捉住這些當前的實際人生之內裏的癥結，而試加以一種批導或斡旋。因此也只能這般躲在一旁，像無事

人模樣，來思考那些不關痛癢不着筋節的閒思慮。我也並不說我的那些閒思，便在此三十篇中告一段落。只因爲我的閒思，總算是在此三四個月的閒時光中閒閒地產生，實際則只還是閒閒地記錄寫出。而我想，讀我書的人或許只想在三四日或三四鐘點中匆匆讀完。若我把這些稿子久藏不出，積壓得多了，我又怕更引起讀者的忙迫，要在幾天或幾個鐘點的短時間裏，匆忙地一口氣來讀我的太多的閒思錄。忙讀是領略不到閒思的情味的。因此先把此三十篇發表了，也好減輕讀者們忙讀的壓迫。將來若使我續有閒思的機會，好絡續的寫出，再彙成續集三集，也讓讀者們好分集的閒閒地來讀。

我這一本閒思錄，並不曾想如我們古代的先秦諸子們，儒、墨、道、法，各成一家言，來誘世導俗。也並不曾想如我們宋明的理學先生們，程、朱、陸、王，各各想承繼或發明一個道統，來繼絕學而開來者。我也並不曾想如西方歐洲的哲學家們，有系統、有組織、嚴格地、精密地，把思想凝練在一條線上，依照邏輯的推演，祈望發現一個客觀的眞理，啟示宇宙人生之奇祕。我實在只是些閒思，惟其只是些閒思，在我寫第一篇的時候，我並沒有預先安排如何寫第二篇。在我寫第二篇的時候，也並沒有設法照顧或廻護到第一篇。在我只是得着一些閒，便斷斷續續地思而寫，這是些無所爲的，一任其自然的，前不顧後，後不顧前。而且在我開始寫這閒思錄之前，

慫慂我的那位友人，他早已給我一限制，不希望我長篇累牘地寫，字數上他希望我不超出二三千字的篇幅。我開始既如此寫，以後也便照樣寫。而且我覺得，篇幅有了限制，也好省得我轉成忙迫。心下預定了只寫這些字，因而不致失卻我開始寫時的閒情。寫了二三千字，我便戛然而止，我也並不曾想一定要把我當時的一番閒思像模像樣地造成一理論。有時上面多寫了些，下面便少說些；有時上面少說了些，下面便多寫些。而且我每一篇在寫的時候，也沒有預定題目，有時想到較複雜較深邃的，也只在此三四千字中交卷。有時想到較簡單較平淺的，也在此三四千字中交卷。寫完了，隨便拈篇中一兩字作爲題目裝成一牌子安上。有些是上一篇未說完的，又在下一篇乘便補出。有些是上一篇已說到的，又在下一篇重複說及。有些是某一篇只當是某一篇之一隅舉例，有些則兩篇之間又好像有些衝突不一致，有些是尙多言外之意，也懶得再申說。篇目的前後，全照動筆的次序，沒有再編排過。中間有一兩篇是宿稿，因爲文言白話的體裁關係，而把來略略地改寫的。然而這些總還是我一人之所見，而且近在四個月中間寫出，應該是仍還有一個體系的。這些則只有讓讀者們自己去認取。我只請求讀者們在臨讀時，也先把自己的心情放閒些，則一切自易諒解，一切自易原恕。

慫慂我的那位友人，使我觸機開頭寫這一本閒思錄的是謝幼偉先生。他爲申報館的副刊學津

討稿，我的稿開始了，但申報的學津停刊了。我引起了興頭，終於有此一册小書。讓我乘便在此感謝謝先生的一番慫慂。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夏錢穆識於無錫榮巷

跋

本書乃民國三十七年春間所寫。其時余任教江蘇無錫江南大學，課務輕閒，胃病新愈，體況未佳，又值時局晦昧，光明難覩。時時徜徉湖山勝處，或晨出晚歸，或半日在外。即暫獲閒隙，亦常徘徊田塍魚塘之間。盡拋書册，惟求親接自然，俛仰逍遙以自遣。心胸積滯，逐一滌盪，空所存抱，乃時有閒思遐想，如游絲輕漾，微葉偶飄，來入庭際，亦足賞玩。乃於夜燈坐對，隨筆抒寫，初不自意遂成卷帙。嗣亦擱置，不復再續。越一年，倉皇南行，此稿亦未携帶。今冬重入吾眼，則已轉瞬十年矣！再自披覽，即篇題亦都忘卻，更不論內容所涉。循誦而下，恍如讀他人書，乃深幸此人談吐，與其平日素所蓄藏，無大懸別，此亦大可欣喜之一境也。惟閒冗相異，儼如隔世。卻念生平，有此一段暇晷，堪作回憶，彌自珍惜。刊而布之，亦聊以存當時心影之一斑

焉。

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冬至錢穆再識於九龍之鑽石山寓廬。

再跋

余自對日抗戰期間，在雲南宜良寫成國史大綱一書以後，自念全部中國史中之大綱大節，已在書中揭舉。循此詳求，事在讀者。或有謬誤，亦待讀者指出，再作思考。余之興趣，遂從歷史逐漸轉移到文化問題上。

余之研治國史，本由民初「新文化運動」對國史多加詬詈，略有匡正。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庶於世風稍盡補偏救弊之功。但自世界第二次大戰開始，確信歐西文化亦多病痛，國家民族前途，斷不當一意慕效，無所批評抉擇，則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危險何堪設想。又歷史限於事實，可以專就本己，眞相即明。而文化則寓有價値觀，必雙方比較，乃知得失。余在成都始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此爲余對自己學問有意開新之發端。

及抗戰勝利，頗謂國事未定，變端莫測，因決意不返平津，亦不滯京滬，惟冀覓一靜僻處，

俾得潛心，以漸待時局之安定。乃重返昆明，初不料其學風囂張，乃有大出意料之外者。又在成都患胃病，迄是不愈，乃又決意歸家鄉，風土飲膳，庶於余病體有助。適江南大學新創，遂留任教。而國事益動盪，日夜讀莊子一書，為作纂箋。聊可於湖山勝境，遊神澹泊，自求寧靜。又以其間寫此湖上閒思錄一部。及避來香港，將之付印，距今亦三十年以上矣。

此三十年中，對文化問題又續有撰述。兩年來，雙目失明，不能見字。報章書籍，皆已疏隔。惟尚能捉筆寫稿。方撰「中西文化比較觀」，不謂積稿已盈二十篇以上。大體皆雜憶平日心中存想，以不翻書，不引據材料為原則。忽一日，三民書局主人來索余湖上閒思錄，將以再付剞劂。因由內人誦讀一過，余逐篇聽之。初不意余方今所撰，正多舊來見解，並有前所發得，而今已漫忘者。自慚學問未有進步，而國事世風，每下愈況。回憶當年太湖邊一段心境，亦已有黃鶴一去不復返之狀。撫今追昔，感慨何似。

因念國史大綱一書，亦已在數年前重有改訂，創為新版。今此稿又繼之。敝帚自珍，際此時代劇變中，不知國人讀之，亦尚謂此泥上鴻爪，復有一加顧視之意義與價值否？再為此跋，亦聊記往年飛鴻踏此雪泥之概況而已，他復何言。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七日錢穆自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六

人生十論　出版說明

本書為錢賓四先生民國三十八年至香港以後，所撰討論人生問題文稿之結集。其論人生，大旨皆從中國舊傳統、舊觀念闡發，但亦未見其與現時代新潮流、新趨勢有所違背。主要不在稱述古人，乃在求古今之會通和合。讀者淺求之，可得當前個人立身處世之要；深求之，則可由此進窺古籍，知得中國人所講一套道理，仍未與現代局勢有大相反、大隔離處。無論做人、為學，此書皆可啟其端緒，為一切近之入門書。讀此一編，宜可於日常生活有所裨益。

本書於民國四十四年五月，由香港人生出版社初版。七十一年七月，先生親將全書文字略作修訂，並增添六十七年在香港大學所講「人生三步驟」，及六十九年六月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講「中國人生哲學」四講，交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再版發行。今全集整理，即以此增訂版為底本，又新增相類之文人之三品類、身生活與心生活、人學與心學、談談人生凡四篇。全書通加私名號、書名號、引號，並重作分段處理，以利閱讀。凡此次新增各篇，目次中添注「*」號。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或許是我個人的性之所近吧！我從小識字讀書，便愛看關於人生教訓那一類話。猶憶十五歲那年，在中學校，有一天，禮拜六下午四時，照例上音樂課。先生彈着琴，學生立着唱。我旁坐一位同學，私自携着一册小書，放坐位上。我隨手取來翻看，卻不禁發生了甚大的興趣。偸看不耐煩，也沒有告訴那位同學，拿了那本書，索性偸偸離開了教室，獨自找一僻處，直看到深夜，要歸宿舍了，纔把那書送回那同學。這是一本曾文正公的家訓。可憐我當時枉爲了一中學生，連書名也根本不知道。當夜一宿無話，明天是禮拜日，一清早，我便跑出校門，逕自去大街，到一家舊書舖，正在開卸門板，我從門板縫側身溜進去，見着店主人忙問：「有曾文正公家訓嗎？」那書舖主人答道：「有。」我驚異地十分感到滿意。他又說家訓連着家書，有好幾册，不能分開

賣。那書舖主人打量我一番，說：「你小小年紀，要看那樣的正經書，眞好呀！」我聽他說，又像感到了一種不可名狀的喜悅和光榮。他在書堆上檢出了一部，比我昨夜所看，書品大，墨字亮，我更感高興。他要價不過幾角錢。我把書價照給了。他問：「你是學生嗎？」我答：「是。」「那個學校呢？」我也說了。他說：「你一淸早從你學校來此地，想來還沒有喫東西。」他留我在他店舖早餐，我欣然留下了。他和我談了許多話，說：下次要什麼書，儘來他舖子，可以借閱，如要買，決不欺我年幼索高價。以後我常常去，他這一本那一本的書給我介紹，成爲我一位極信任的課外讀書指導員。他並說：「你只愛，便拿去。一時沒有錢，不要緊，我記在賬上，你慢慢地還。」轉瞬暑假了，他說：「欠款儘不妨，待明春開學你來時再說吧！」如是我因那一部曾文正公家訓，結識了一位書舖老闆，兩年之內，買了他許多廉價的書。

似乎隔了十年，我在一鄉村小學中教書，而且自以爲已讀了不少書。有一天，那是四月初夏之傍晚，獨自拿着一本東漢書，在北廊閒誦，忽然想起曾文正公的家書家訓來，那是十年來時時指導我讀書和做人的一部書。我想，曾文正教人要有恒，他教人讀書須從頭到尾讀，不要隨意翻閱，也不要半途中止。我自問，除卻讀小說，從沒有一部書從頭通體讀的。我一時自慚，想依照曾文正訓誡，痛改我舊習。我那時便立下決心，即從手裏那一本東漢書起，直往下看到完，再補

看上幾冊。全部東漢書看完了，再看別一部。以後幾十冊幾百卷的大書，我總耐着心，一字字，一卷卷，從頭看。此後我稍能讀書有智識，至少這一天的決心，在我是有很大影響的。

又憶有一天，我和學校一位同事說：「不好了，我快病倒了。」那同事卻說：「你常讀論語，這時正好用得着。」我一時茫然，問道：「我病了，論語何用呀？」那同事說：「論語上不說嗎？『子之所愼，齊、戰、疾。』你快病，不該大意疏忽，也不該過分害怕，正是用得着那『愼』字。」我一時聽了他話，眼前一亮，纔覺得論語那一條下字之精，教人之切。我想，我讀論語，把這一條忽略了，臨有用時不會用，好不愧殺人？於是我纔更懂得曾文正家訓教人「切己體察，虛心涵泳」那些話。我經那位同事這一番指點，我自覺讀書從此長進了不少。

我常愛把此故事告訴給別人。有一天，和另一位朋友談起了此事。他說：「論語眞是部好書，你最愛論語中那一章？」這一問，又把我楞住了。我平常讀論語，總是平着散着讀，有好多處是忽略了，卻沒有感到最愛好的是那一章。我只有說：「我沒有感到你這問題上，請你告訴我，你最愛的是那一章呢？」他朗聲地誦道：「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我最愛誦的是這一章」，他說。我聽了，又是心中豁然一朗，我從此讀書，自覺又長進了一境界。

凡屬那些有關人生教訓的話，我總感到親切有味，時時盤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歲以前讀書，大半從此爲入門。以後讀書漸多，但總不忘那些事。待到中學大學去教書，許多學生問我讀書法，我總勸他們且看像曾文正公家訓和論語那一類書，卻感得許多青年學生的反應，和我甚不同。有些人，聽到孔子和曾國藩，似乎便掃興了。有些，偶爾去翻家訓和論語，也不見有興趣，好像一些也沒有入頭處。在當時，大家不喜歡聽教訓，卻喜歡談哲學思想。這我也懂得，不僅各人性情有不同，而且時代風氣也不同。對我幼年時有所啟悟的，此刻別人不一定也能同樣有啟悟。換言之，教訓我而使我獲益的，不一定同樣可用來教訓人。

因此，我自己總喜歡在書本中尋找對我有教訓的，但我卻不敢輕易把自己受益的來教訓人。我自己想，我從這一門裏跑進學問的，卻不輕易把這一門隨便來直告人，固然是我才學有不足。而教訓人生，實在也不是件輕鬆容易的事。

「問我何所有，山中惟白雲。只堪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山中白雲，如何堪持以相贈呢？但我如此讀書，不僅自己有時覺得受了益，有時也覺得書中所說，似乎在我有一番特別眞切的瞭解。我又想，我若遇見的是一位年輕人，若他先不受些許教訓，又如何便教他運用思想呢？因此我總想把我對書所瞭解的告訴人，那是莊子所謂的「與古爲徒」。其言：「古之有也，非吾有

也。」這在莊子也認爲雖直不爲病。但有時，別人又會說我頑固和守舊。我不怕別人說我那些話，但我如此這般告訴人，別人不接受，究於人何益呢？既是於人無益，則必然是我所說之不中。縱我積習難返，卻使我終不敢輕易隨便說。

十年前，我回故鄉無錫，任教於一所私家新辦的江南大學。那時，在我直覺中，總覺中國社會一時不易得安定，人生動盪，思想無出路。我立意不願再跑進北平、南京、上海那些人文薈萃，大規模的大學校裏去教書，我自己想我不勝任。我只想在太湖邊上躲避上十年八年，立意要編著一部「國史新編」，內容分十大類，大體仿鄭樵通志，而門類分別，則自出心裁，想專意在史料的編排整理上，做一番貢獻。當時約集了幾位學生，都是新從大學畢業的，指點他們幫我做剪貼抄寫的工作。我把心專用在這上，反而覺得心閒無事，好像心情十分地輕鬆。太湖有雲濤峯巒之勝，又富港汊村塢之幽。我時時閒着，信步所之，或扁舟盪漾，俯仰瞻眺，微及昆蟲草木，大至宇宙人生，閒情遐想，時時泛現上心頭。逸興所至，時亦隨心抒寫，積一年，獲稿八九萬字，偶題曰「湖上閒思錄」。我用意並不想教訓人，更無意於自成一家，組織出一套人生或宇宙的哲學系統來。眞只是偶爾覫見，信手拈來之閒思。不幸又是時局劇變，消息日惡，我把一些約

集來的學生都遺散了，「國史新編」束之高閣，「閒思錄」也中輟了。又回到與古爲徒的老路，寫了一本莊子纂箋，便匆匆從上海來香港。

這一次的出行，卻想從此不再寫文章。若有一噉飯地，可安住，放下心，仔細再讀十年書。待時局稍定，那時或許學問有一些長進，再寫一冊兩冊書，算把這人生交代了。因此一切舊稿筆記之類，全都不帶在身邊，決心想捨棄舊業，另做一新人。而那本「湖上閒思錄」，因此也同樣沒有携帶着。

那知一來香港，種種的人事和心情，還是使我不斷寫文章。起先寫得很少，偶爾一月兩月，迫不得已，寫上幾百字，幾千字。到後來，到底破戒了。如此的生活，如此的心情，怕會愈寫愈不成樣子。小書以及演講錄不算，但所寫雜文，已逾三十餘萬言。去年忽已六十，未能免俗，想把那些雜文可搜集的，都搜集了，出一冊「南來文存」吧！但終於沒有眞付印。

這一小册，則是文存中幾篇寫來專有關於人生問題的，因王貫之兄屢次敦促，把來編成一小册，姑名之曰「人生十論」，其實則只是十篇雜湊稿。貫之又要我寫一篇自序，我一提筆便回憶我的「湖上閒思錄」，又回想到我幼年時心情，拉雜的寫一些。我只想告訴人，我自己學問的入

門。至於這十篇小文，用意決不在教訓人，也不是精心結撰想寫哲學，又不是心情悠閒陶寫自己的胸襟。只是在不安定的生活境況下，一些一知半解的臨時小雜湊而已。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五月錢穆識於九龍嘉林邊道之新亞書院第二院

政學私言　出版說明

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末期，日寇囂張，時局阢隉，後方人心惶擾不安，時錢賓四先生正值久病初癒，靜養期間，握筆遣悶，遂撰論時政文共七篇，皆爲針對戰後國家未來應走之途徑而作者，並曾先後刊布於東方雜誌。旋以商務印書館擬印單行本，先生遂以此七篇編爲上卷；又將其前所撰發表於思想與時代月刊之八文編爲下卷，以其與上卷性質相類，可相互證發也。本書主旨在從中國固有歷史文化傳統立場，爲建立未來新中國之理想作設計藍圖，其範圍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法律、教育等各方面。惟先生自以時政爲生平所疏，而所言又有違崇重西化之時尙，故特將本書定名爲「政學私言」。

本書在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抗戰勝利初期，出版於重慶。八年抗戰雖勝利結束，而不幸我國政局社會則並未因之而得漸進安定。國家內部動亂繼起，新中國之建立遂成泡影。此下經歷近五十年長時期之動盪分裂，今國家之統一已漸有望，未來新中國之建立與復興，本書所言必將有其貢獻。

本書於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復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在臺北再版，收入該館人人文庫。其後先生嘗重讀此書，就原書有所增修改訂。惟以是書未再重排，因亦未能據之改版。今整編全集，即以經先生修訂者爲底本；又增收先生同時期所寫變更省區制度私議、中國之前途、建國信望三文，是皆與原書各篇宗旨相符而可相參證者。凡新添各篇，目次中例加注「*」號。又全書通加私名號、書名號、引號，並增添分節分段之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客歲，胃痛時劇，經春歷冬，每發愈厲。醫囑入院檢驗，謝事靜攝。値寇氛囂張，獨山淪陷。後方惶擾，訛言日興。牀褥無聊，惟對報紙；或有朋徒相訪，言思所涉，鬱結百端。開歲小

痊，頗能興起，時尚僅飲湯液，一日七餐，每歷兩時，即復進食。一餐之前後，例作小憩。其間偶得數十分鐘閒，握筆排悶，隔越旬日，亦成篇幅。春盡花落，病乃向已。檢點成稿，凡獲七章。其所論刊，皆涉時政，此爲平生所疎，又不隸黨籍，闇於實事。洛陽少年，見譏絳灌，老不知休，更可慙恥。抑時論所尚，必有典據，或尊英美，或師馬列，蜾蠃之祝，惟曰肖我。其有回就國情，則以黨義爲限斷，區區所論，三俱無當，諡曰「私言」，亦識其實。風林之下，難覓靜枝，急湍所瀉，無遇止水，率本所學，吐其胸臆，邦有君子，當不憫笑。蒙東方雜誌社代爲刊載，又承王君雲五允作單本印行，用廣流傳，私衷感激，未可名狀。別有爲思想與時代撰文數篇，此乃三年前舊作，附諸下卷，取相證發，要之爲一家之私言云爾。

民國三十四年六月錢穆識。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七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成立一學術講座，定名「錢賓四先生學術講座」，每年邀請中外傑出學人一位蒞港講學，以廣切磋啟導之益。先生爲新亞書院創辦人兼首任校長，講座既以先生之名爲紀念，第一次講座因即敦請先生任之。是年十月，先生遂自臺北赴港，以三週時間作連續六次之公開講演，集講稿成此一書。時先生已高齡八十六矣，蓋亦難得之盛事也。

此書仍繼續早年中國文化史導論之精神，主旨在通過中國歷史，經由中西比較，求對中國之民族性有更明白之認識，並能對中國民族所展演之文化有更深切之體認與珍重。書名定爲「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先生自謂「此實余近三十年嚮學一總題」。六講之中，二至四講，分別講中國人之性格、行爲、思想，易言之，即從人生之三方面切入以論中國人。第五講則講中國人之文化結構，指明中國文化之特殊趣向。末講則深望於中國之新「士」，能在歷史舊傳統上加入時代新精神，以開創國家民族之新機。情深意厚，信可使聽者、讀者皆有以振起。

是書民國六十八年八月由香港中文大學邀請出版，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刊行。今值整理先生著作編爲全集，爰依例增入書名號、私名號及重點引號，以利閱讀。整理有未盡善之處，敬希讀者指正。

本書之整理，由洪素年小姐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一

民國六十六年之夏，金耀基院長自香港來臺，訪余於士林外雙溪素書樓寓廬。是爲余兩人初次之相識。耀基告余，擬爲新亞創辦一「學術文化講座」，即以余名名之。邀余作首次講座之講演。謂此講座，當每年舉辦一次，廣邀中外學人，集多方意見；庶可資號召，提興趣，漸成風氣，鼓舞研討。或亦有當於當年新亞建校之宗旨。儻余贊同，彼返港後擬即設法籌募款項，作爲基金。俟有成績，再以相告。此事創始雖微，積久或可得巨效。耀基言辭懇切，余漫允之。不數

月，耀基來信，籌款已有頭緒，決於翌年秋正式舉辦。乃余於六十七年初春，忽嬰眼疾，逐時加深，不能見字，即報紙上大標題亦模糊不能辨。然念耀基誠摯之意，初亦謂尚有十月之隔，或可臨時小愈。耀基亦堅請，告余：臨時如不能親自出席，亦當由余任首講，邀人代讀一論文即可。余終亦無以拒之。卒於是年十月赴港，以一月之期，分作六次講演。僅就余平日積存胸中之素念，稍分層次，略抒梗概。事後乃根據當場錄音，粗加整理，再交耀基由校方付印，即今出版之此稿是也。余每念：初辦新亞時，赤手空拳，曾無絲毫之憑藉；乃蒙校內外各方共襄艱難，使新亞獲有今日之成就。今耀基創始此一偉大之構想，而余竟亦以盲眼空腹，謬膺其最先之第一講，正與余往年之始創新亞同其輕率。幸耀基不怠不倦，此稿問世，耀基已續聘英國李約瑟教授來爲此講座之第二講。此下逐年規劃，按期有人來賡續此講座，焉知不蔚成巨觀，乃與新亞同躋於日新又新，而有其無量之前途。耀基又來書，囑余於此稿付印前加爲一序。余除自陳其內心之慚疚外，特於耀基對此一事之擘劃經營，深思密慮，有其無窮之盼望焉。爰又不辭而序之。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二日錢穆序，時年八十有五。寫此稿時，寫第二字即不識上面第一字。不文之處，幸讀者諒之。

序二

中國人及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至今舉世莫與倫比。司馬遷史記始五帝本紀之黃帝，約略推計，已逾四千六百年。若據周易繫辭傳，黃帝前有神農、庖犧，當亦五六百年。更不計莊子所言燧人氏、有巢氏等。中國人在此亞洲東部一塊土地上，自狹小漸躋廣大，自寡少漸蘩眾多，縣延五六千年；可稱創建了一代表性的民族國家，一線相承。其間縱有不斷變化，要之，能自成一天下，自有一傳統，屹立常在，堪謂舉世人類一奇蹟。

除東亞外，尚有西歐，異軍特起。論其歷史文化，乃與東亞中國差堪匹敵。乃雙方接觸少，各自發展，不相關涉。直到最近五百年來，西歐勢力逐步震撼了全世界，而東亞亦受其影響。

中國人及中國，雖自古獨立成長，在其自所占有之天下中，自生自育。然其人富敏感性，虛衷好學。凡所遭遇，莫不以其誠摯之同情心，和平之同化力，力求變異為同，化敵為友。史證明顯，不煩縷述。遠自明末利瑪竇東來，中國學人與其交往，如徐光啟等，即亦深受浸染。惟惜明、清易代，此風不繼。直到清乾隆末，其時中國社會正值盛極而衰，久安思變。而西歐勢力則

日益強大，威鋒迫人。魏源默深著海國圖志，及代賀長齡纂經世文編，一面注意國外形勢，一面注意國內政治變革；正可透露出清代嘉、道以下知識分子學術思想轉入新途，以求因應之一新趨嚮。

而不久洪秀全、楊秀淸崛起，憑藉耶教，煽動愚民。洪秀全自稱「天弟」，奉耶穌爲「天兄」，創建太平天國；所至焚燬孔廟，盛唱女權，與辦新科舉，政治、文化兼求革命。後人雖稱之爲開此下民族革命之先河，其實洪、楊以專崇西化、打倒中國傳統爲其起腳點，於是激起了曾國藩、胡林翼、江忠源、羅澤南一輩舊式知識分子之義憤，起而反抗。湘軍之眞精神、眞動機，實爲保衛民族文化，抵禦西化侵入。而滿清政權，遂亦得苟延其殘喘。

眞正之民族革命則端自辛亥始。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首曰「民族主義」，遠溯文化傳統，直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此與洪秀全之天兄、天弟之號召，既絕相違異；亦與一輩專以中山先生比擬之於美國華盛頓者，仍有逕庭。華盛頓美國革命乃「爭民主自由」，而孫中山先生之辛亥革命乃「尊民族傳統」。故在革命前，以排除滿淸爲目標；革命後，則以「五族共和」爲幟志。此非甚深體會於吾中華民族歷史文化大傳統之精義所在者，莫能知。而中山先生「知難行易」之一套哲學，尤當爲國人所深細體悟。否則亦將不能上承中山先生

之遺志。

中華民國創建以來已近七十年，而國步杌隉，違離初志益遠。幾於今不如昔，人有同感。一方面固是牽於外患，而另一方面實多發自內亂。不僅對外維艱，實亦對內無方。竊謂今日我中國人自救之道，實應新、舊知識兼採並用，相輔相成，始得有濟。一面在順應世界新潮流，廣收新世界知識以資對付；一面亦當於自己歷史文化傳統使中國之成其爲中國之根本基礎，及其特有個性，反身求之，有一番自我之認識。然後能因病求藥，對症下方。印度人當求印度人之如何自救，阿剌伯人當求阿剌伯人之如何自救，即在西歐英、法、德、意、比、荷、西、葡，乃及其他諸邦，若求各有改進，亦各有其自我傳統，即各有其對治良方。甚至如美國移民四百年，立國二百年，自有其天地，自有其環境，已遠與其祖國英倫相異；然而其文化傳統，立國精神，亦尚不能不認其淵源之自來。若果自我迷失，豈有不得其體乃能見其病，而有海外異方可資救治之理？

民初以來之「新文化運動」，誤認爲我自己固有舊傳統與海外新潮流一若水火之不相容，冰炭之不共存；非破除一分舊，即開不出一分新。一面高倡「打倒孔家店」，一面又叫「全盤西化」。提倡西化，爲求自救。果使西化與自我敵體對立，則用藥即以自殺，復何良醫足云？

自新文化運動中轉出共產運動，至其尊奉馬、恩、列、史，則與洪、楊之尊天父、天兄何

異？惟宗教尚屬世界性，尊奉馬、列則顯屬西化。至其得操政權以來，亦已三十年；摧殘破壞可謂已不遺餘力。而中國人之舊傳統、舊習慣、舊性情、舊風俗，依然尚存；當感破除之不易。及今則國將不國，人將無生，尚何「共產」之可期？

余幼孤失學，弱冠即依鄉鎮小學教讀爲生。然於當時新文化運動，一字、一句、一言、一辭，亦曾悉心以求。乃反而尋之古籍，始知主張新文化運動者，實於自己舊文化認識不眞。如當時競謂中國乃一「封建社會」，然秦以下中國既非封建，即夏、商、周三代史籍可考者，亦與西方中古時期之封建社會迥不相侔。又當時競謂中國自秦以下乃一「君主專制政體」，然遍考之二十五史、三通諸書，中國自秦以下，最少亦當稱其爲是「君主立憲」，決非「君主專制」，否則一切典章制度均將無可解釋。又當時人競慕西方史上之「文藝復興」，實則西方之所謂文藝復興，亦僅以歷史回顧來代替了其宗教嚮往。今日國人方競以好古守舊自詈。中國文化中亦並無一普遍歷久之共同宗教，而今日之崇尚西化，則已儼成一宗教。所謂期求文藝復興，亦只期求西化而止，復何所謂「復興」？迷失了自己，而求復興，則中國古籍一番舊知識顯不可棄。此特舉其犖犖大者。要之，中國人與西方人各自走了一段歷史路程，難可一一相比。故欲從西方史來認識中國人，則必將面目全非，而亦更無性情、精神之可言。

余於抗戰前期，即寫了一部國史大綱，用意即在從歷史求國人對自我之認識。其後越兩年，又繼續寫了一部中國文化史導論，即求從政治史轉向文化史，來求國人能對自我作更深一層之認識。自避共禍，逃亡香港，又在臺北有文化學大義一講演集。繼此後有文化與教育、民族與文化、中華文化十二講、中國文化精神，及中國文化叢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諸書之編集。最近又有歷史文化叢談一書。自有文化史導論以來，迄今亦閱三十餘年矣，然求對中國文化能有一深切之認識與夫一概括之敍述，其事實不易；亦惟盡心力以求之而已。至其賡續對史學方面有所撰述，此不再詳。

去年冬，曾應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去作講演六次，根據錄音寫成此集。講法又略有不同，而大意則一仍舊貫。所根據盡皆舊材料、舊知識，然於國人回頭認識自我，求對我中國之舊傳統、舊精神稍有瞭解；或於此下尋求開新自救之道有所助益。則誠生平懇切以求之一大希望所在。知我罪我，斯在讀者。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錢穆於外雙溪素書樓

文化與教育　出版說明

對日抗戰時期，錢賓四先生隨北大遷往後方，曾在昆明、成都絡續寫有多篇討論時事之文，刊載兩地報章雜誌。民國三十一年，重慶國民出版社彙集先生此等文字為一書出版。書分上下兩卷，有關文化問題者為上卷，討論教育問題者為下卷，牽涉政風治術者附焉。共二十篇，取名「文化與教育」。當時物力維艱，誠所謂「國難版」，紙張、印刷皆劣，字跡模糊，難於閱讀，亦難保存。先生來臺定居後，有友人以此國難本相贈，並促先生再以付印。民國六十四年歲末，先生遂將此書通體重讀，稍作文字修正，交臺北三民書局於翌年二月出版。時距此書初版已隔三十四年。

今整編全集，即以三民版為底本。原書中政治家與政治風度一文，民國三十四年時另收入政學私言一書；又變更省區制度私議一文，亦與政治相關，亦應改入該書。今將此兩文一併自本書抽出不錄。餘稿十八篇外，復增內容相近者二十四篇，成此新編，共四十二篇，仍依作者原意，有關文化問題者二十篇作為上卷，討論教育問題者二十二篇作為下卷。新添二十四文，上卷六篇

皆先生在民國三十六年前所作；下卷十八篇，最早有民國九年所寫，最遲為民國七十六年所作，前後相隔六十七年，讀者藉此可窺先生在不同時期中對教育問題之看法。其中理想的大學教育一文，原載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一文，原載歷史與文化論叢；今並自原書抽出，移入本書。所添各文，目次中例加「*」號。此次整理，加入私名號及書名號，重點加引號；原書誤植文字，亦隨文校改；版式及段落皆重加整理。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然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昔李塨嘗言：「萊陽沈迅上封事，曰：『中國嚼筆吮豪之一日，即外夷秣馬厲兵之一日。卒之盜賊蠭起，大命遂傾。天乃以二帝三王相傳之天下，授之塞外。』吾每讀其語，未嘗不為之慚且痛。」郭嵩燾亦云：「自宋以來，盡人能文章，善議論。無論為君子小人，與其有知無知，皆

能用其一隅之見，校論短長，攻剖是非。末流之世，恨無知道之君子，正其議而息其辨。覆轍相尋，終以不悟。」穆髫齡受書，於晚明知愛亭林；於晚清知愛湘鄉。修學致用，竊仰慕焉。而深味夫李、郭二氏之言，未嘗敢輕援筆論當世事。國難以來，逃死後方，遂稍稍破此戒。譬如候蟲之鳴，感於氣變，不能自已。而人亦多嬲以言者。積三四年，薄有篇帙，茲彙其有關文化問題者爲上卷，其討論學術趨向者附之。關於教育問題者爲下卷，其牽及政風治術者附之。都凡二十篇，聊存一時之意見。而李、郭之言，固常自往來於余之胸中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錢穆識於思親彊學之室。

歷史與文化論叢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五年，國防部總政戰部爲提高部隊官兵素質，擬編印系列優良讀物，供幹部閱讀，求出版錢賓四先生著作。先生慨允所請，許其選擇若干論文結集付梓。政戰部乃彙集先生舊稿，凡五十二篇，分編成兩小册：一名歷史與時代，收文二十七篇；一名從認識自己到回歸自己，收文二十五篇。兩書同於是年七月出版，當時僅供軍中內部閱讀，並未對外發行。

六十八年，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懇請將兩書再版，公開發行，以廣流傳。先生遂將兩書重加整編，删去十二篇，存四十篇；另添十八篇，合五十八篇，併爲一書，內分四編，重排付印。自謂民國三十八年避難到港轉臺以還，踰三十年，凡有撰寫，率以「歷史」與「文化」兩者爲主題，故命其書曰「歷史與文化論叢」。

今編全集，重加董理，既知本書與他書重見之文共八篇，又有五篇準其性質宜移入他書中；此十三篇均不再重收。另新增與本書內容相類者九篇。總凡五十四篇，仍依原書分爲四編。茲將新編更動概況略述如下：

第一編：原爲十篇，新編爲八篇。

移出四篇：

文化三階層：已見文化學大義。

世界文化之新生：同上。

人類新文化之展望：同上。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已見中國歷史精神。

新增二篇：

中國文化特質

從歷史文化看時事筆答錄

第二編：原爲十一篇，新編爲十篇。

移出三篇：

中國史學之特點：改入中國歷史研究法。

現世界的三種社會：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中一個世界三個社會爲同一文。

近代西方在宗教科學哲學上之三大啓示：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中中國儒家思想對世界

人類新文化所應有的貢獻爲同一文。

新增二篇：

人生三階層

生活行爲與事業

第三編：原爲二十三篇，新編爲二十二篇。

移出五篇：

存在決定意識：改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十册。

如何研究中國史：改入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歷史教學：同上。

無限與具足：已見湖上閒思錄。

一所理想的中文大學：改入文化與教育。

新增四篇：

文化新生與雲南

中國共產黨與萬里長城

論當前國人之憂患意識
漫談改革社會風氣

第四編：原爲十四篇，新編仍爲十四篇。

移出一篇：

物與心：經作者改寫，已收入人生十論。

新增一篇：

敬告中華民國的青年們

六十八年本書出版時，先生曾自撰數語爲介，曰：

本書於民族歷史文化，從各方面加以敍述，庶使讀者於吾民族之已往歷史與其固有文化，易於獲得其認識，爲此下吾民族自救自拔之張本。方今吾國人方竭意求變求新，然一切變必有其不變者爲之基礎，一切新亦必有其舊爲之根源。本書專著眼在此下求變求新之基礎根源上有所指陳，使讀者易有啓悟，易有奮發，固非如已陳之芻狗，或如楚人獻璞，苟善爲破解，其中容有美玉之存藏也。

作者本人之說明，允爲本書最適當之簡介。

此次整理，全書加添私名號、書名號，又加重點引號，以利讀者閱讀；目錄中新增各文例加「*」號，以資識別。整理排校，雖力求慎重，然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余在對日抗戰時期，於民國二十八年，在雲南宜良岩泉下寺、上寺寫成國史大綱一書，又於民國三十年在四川成都賴家園續寫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自民國三十八年避禍來港，轉臺北，迄已踰三十年矣，凡有撰寫，亦率以「歷史」與「文化」兩題目爲主。前年應兩團體之約，纂集舊稿，編爲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及此集，分別由兩團體付印。因皆不向外推銷，余復於兩書篇目上各有增删，重加復印，以廣流傳。

竊謂民族之形成，胥賴其有歷史與文化之兩項。無歷史，則無世界新潮流，斯乃吾民族處境之變。貴能不忘本我，乃可善爲因應。因應在我，豈能去其我以求因應？我之不存，又誰爲其

因應者？亦何貴有一切之因應？自念畢生努力，亦惟期國人之迷途知返，認識自我，乃始有力可用，有途可循；則惟歷史與文化兩者，不當棄置而不問。而此兩者盡在過去，宜可述，不可作。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亦此志此義也。讀者其勿以古老陳言、斷爛朝報視之，則誠余之私幸矣。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六月錢穆識於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五。

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四年，郵政總局為協助員工進修，編印郵光叢書。錢賓四先生應邀將散篇論文二十一篇彙為一書，付與出版，為郵光叢書第二輯之一；並擇其中一篇「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取為書名。當時郵政總局印行叢書，只供內部員工閱讀，不對外發行。六十六年，先生重新整理本書，增稿十篇，刪去人生之兩面一篇，另收於靈魂與心一書中，共得三十篇、交由臺北東大圖書書局重版，以廣流傳。

本書討論當前世界局勢之演變，及中國文化在此變動中因應區處之道，所涉方面甚廣，論題或大或小，或專或通，每題各申一義；然會合觀之，則彼此相通，不啻全書成一大論題，義趣通貫。其中若干篇雖因時立論，觸事而發，自今讀之，亦無過時之感。蓋先生對中國文化實抱堅定之信念，弘通之認識，故隨機觸發，皆成勝義，自有源泉混混不擇地而出之致。

原書中有六篇，或與他書重見，或改入他書，計為：

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已見歷史與文化論叢。

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原題中國傳統文化之潛力，先生晚年有意編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今遵遺命改入該書第九編。

中國今日所需要的新史學與新史學家：改入中國歷史研究法。

理想的大學教育：改入文化與教育。

中國文化體系中之藝術：已見中國文化叢談。

中國平劇之文學意味：改入中國文學論叢。

今全集新編，上述六篇不再重收。另增附內容相類之零稿，計十篇：

大局展望

人類登陸月球與歷史前瞻

一個中國人讀索忍尼辛哈佛講辭

對日抗戰之一些回憶與感想

漫談老子在美國

略論歐洲文化前途

知心與知道

質與量

今年我的最後一課

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

合舊有共三十四篇。先生生前曾囑，收集散篇論文，儘量以類相從，歸入舊編，不添新書；本書增附部分，蓋謹遵此意而爲之。

此次整理，乃以東大圖書公司初版爲底本，校改原書若干誤植文字；整理標點符號，主要爲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及重點加引號，以利讀者閱讀。目錄中新增之文例加「*」號，以資識別，整理排校，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本書彙集作者散篇論文共二十題二十一篇，擇取其中一篇題名「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作爲

本書之書名。其中最早兩篇，一在民國三十一年，一在民國三十五年，距今已及三十年前後。此外起民國四十年，距今亦踰二十年以上。今天的世界，不斷在變動。五年一小變，十年一大變，二、三十年前的文字，目前讀來已如明日黃花。但其大趨勢依然沒有變。亦可說當前世界此一大變，已開始，未終了。回讀二、三十年前舊文，有些話到今正可說依然有徵驗。何況文化大統有其變，更有其常。二、三十年的距離，恰如一瞬。惟個人學養，二、三十年未能有大進步，茲應郵政總局之請，彙集此二十題二十一篇文字。而統合觀之，則甚感慚怍而已。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一。

本書再版，又增稿十篇，遂成今目。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穆又識。

中國文化叢談　出版說明

民國五十八年，臺北三民書局編印三民文庫，邀稿於錢賓四先生。先生乃彙集其二十年來在港九、星馬、臺灣各地有關中國文化問題之講演，共二十六篇，編爲一書，定名爲「中國文化叢談」，交與出版。其中惟知識青年從軍先例一篇獨早，乃對日抗戰時在成都所講，亦附收在內。初版分裝爲上下册，上册十一篇，下册十五篇。

原書中有九篇，先後曾因故重複收入他書，計爲：

從東西歷史看盛衰興亡：已見中國歷史精神。

中國文化與中國人：同上。

中國歷史上的經濟：同上。

人類文化之展望：已見歷史與文化論叢。

談中國文化復興運動：同上。

中國歷史人物：已見國史新論。

文化與生活：已見世界局勢與中國文化。

中國人之宇宙信仰及其人生修養：同上。

中國文化與科學：同上；爲該書同題之第一篇。

今全集新編本，此九篇不再重收。原書上下兩册所餘十七篇，合爲新編本之第一編；另將內容相類之文稿增入爲二、三、四編。

第二編有關人生與文化之雜文，乃先生自民國二十三年至七十六年間所撰，共十二篇。

第三編則爲先生自民國四十一年至四十七年所寫元旦國慶祝辭，共十篇；讀此可略知當年流亡海外知識分子之心聲。

第四編爲歷史人物講話，共六篇。先生早年即有意用白話文撰寫歷史人物介紹，俾普及社會，供大眾閱讀，以時局動盪，未暇捉筆。民國三十九年初次訪臺，應某機構之請，遂寫此一系列白話歷史人物。絡續交由政工通訊發表。今僅搜得其中三篇，而當年政工通訊早已佚缺，遍尋難得，故亦無法確知遺佚篇數。幸在先生遺稿中，又得原稿三篇。今即將此六篇合爲本書之第四編。

新編本四編，總凡四十五篇。先生生前遺囑，收集散篇論文，儘量以類相從，歸入舊編，不

添新書；本書增附部分，蓋謹遵此意而爲之。此次整理，全書加添私名號、書名號、整理分段，重點加引號，以方便讀者閱讀。目錄中新增各文，例加「＊」號，整理排校，雖力求愼重，然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本集所收，係本人二十年來有關中國文化問題之講演共二十六篇或則在港九星馬，或則在臺灣各地。其中惟「知識青年從軍先例」一篇，乃對日抗戰時在成都所講，茲亦附收在內。各篇不分年代先後，略就其內容，又分爲上下兩編。上編主就中國歷史指出中國文化之演進及當前文化復興運動之主要途徑所在。下編分述中國文化之各方面，如宗教信仰，道德修養，農村生活，社會經濟設計以及科學藝術法律諸端，並及海外移民等，而以「中國民族之克難精神」及「人人必讀書」兩篇爲殿。凡本人對於中國文化之看法，大體輪廓略具。其他已發表之文字，有

中國文化史導論
文化學大義
民族與文化
中華文化十二講

四種，讀者可取參考。其他尚有未盡收編成書者，此後當再絡續彙集出版。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八月中旬錢穆識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中國文學論叢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自幼酷嗜文學，至老興趣不衰，惟著述大業，多集中於學術思想與史學方面；專門討究文學之論著，則僅此一書。此書之結集，源起於香港人生雜誌社王道先生之敦促；當時先生已積有數年來有關中國文學之講演稿及筆記凡十六篇，遂題名中國文學講演集，民國五十二年交由香港人生雜誌社出版。民國七十二年，重編此書，又增加十四篇，共成三十篇，改名中國文學論叢，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書出以後，先生又陸續對其中若干篇文字復加修潤。

本書上起古詩三百首，下及近代新文學，有考訂，有批評；各篇陳義不同，先後詳略之間，亦非有嚴密之排列，皆隨意抒寫，非一氣貫注；惟會通讀之，則中國文學之演進及中國文學之特性，與各時代各體各家之高下得失，有舊規繩，有新標準。細味其言，自可窺其作意。要之，古典文學可為民族文化精神之最佳顯影，現代文學亦不能脫離民族文化精神而獨立，則為先生念念不已於言者。

今整編全集，即以先生就東大版所作之增潤為底本。其最初收入之記唐文人干謁之風及記唐

代文人之潤筆兩筆記，已遵先生遺命歸入乙編讀史隨劄中。另又覓得先生早年所作漁夫、屈原考證及文風與世運三文，與本書宗旨相符，亦一併增入本書。

本書目次，改名中國文學論叢時所增添之十四篇，篇目上加注「◎」號；此次全集版新添之三篇，則援例加注「＊」，以資識別。又加私名號、書名號、引號及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王嫚玲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貫之屢次要把我幾篇有關中國文學的講演記錄彙印一單本，我都婉言拒絕了。一因我這幾次講演並不是同時繼續的。多是隔着一年兩年，應人邀請，偶爾拈一題，講過即擱置了，其間並沒有一貫的計劃和結構。二則聽衆對象不同，記錄人亦不同，因此所講所記，精粗詳略各不同。其

中有兩篇是我捨棄原記錄稿而逕自另寫的。有幾篇我只就記錄稿刪削，並未多加潤色。亦有記者把我所講遺漏了一節，我也懶得整段添進去。而且講演究和著作不同，有許多意見，我自知非精密發揮，不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誤解。我曾在新亞講過兩年「中國文學史」，比較有系統，但我在冗忙中，並未能把學生課堂筆記隨時整理改定。我又想把平日意見挑選幾個重要題目，分別寫成專文，先後已寫了讀詩經、讀文選，及略論唐代古文運動等諸篇，但也是隔着一兩年偶興到，又得閒，才寫一篇，終非一氣呵成。又不知究須到何時才能把我心中所想寫的都絡續寫出。因念貫之厚意不可卻，而那些講演稿，雖是一鱗片爪，儘多罅漏，也終還有值得一讀處；所以終於重把來再看一遍，又在文字上小有刪潤，集爲此編。偶有幾篇小筆記，亦是臨時遇索稿者，信手拈筆爲之，更不成體段；而尚幸其未散落，仍在手邊，姑附於後，聊充篇幅。此等講演和筆記，大部分是在到香港後這十幾年中所成，很少一兩篇，成於未到香港以前。我在此更不注明年月。原記錄人姓名能記憶者，有孫鼎宸、黃伯飛、葉龍、楊遠、陳志誠，記此誌謝。

我更應感謝貫之屢次催索之誠意，沒有他這般催索，此書不會在此刻出版。

壬寅歲暮，錢穆識於九龍之沙田。

再序

余之此書，初次付印，在民國五十一年之春。乃彙集此前數年來在各地有關中國文學之講演稿及少許筆記而成。書名中國文學講演集，所收凡十六篇。此下又續有撰述，今再加進，編爲一書，改名爲中國文學論叢。所加入者，共十四篇，再以付印。前後相距，則已逾二十年之久矣。

自念幼嗜文學，得一詩文，往往手鈔口誦，往復爛熟而不已。然民國初興，「新文學運動」驟起，詆毀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甚囂塵上，成爲一時之風氣。而余所宿嗜，乃爲一世鄙斥反抗之對象。余雖酷嗜不衰，然亦僅自怡悅，閉戶自珍，未能有所樹立，有所表達，以與世相抗衡。但亦僅以如此，乃能粗涉四庫，稍通經史；凡余之於中國古人略有所知，中國古籍略有所窺，則亦惟以自幼一片愛好文學之心情，爲其入門之階梯，如是而已。

今年已老，雙目模糊，書籍文字，久不入眼。前所誦記，遺忘亦盡。學無成就，亦惟往年愛好之一番回憶而已。重編此書，慚汗何極。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夏時年八十九錢穆自誌於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理學六家詩鈔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年，錢賓四先生撰就朱子新學案五大册，凡百數十萬言。撰著期間，嘗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爲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政權，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先生心情不安，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以自遣。於是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嗣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以成本書。先生自謂：「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中，愛誦之詩尙不少，惟以此六家爲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理學諸儒篤敬爲人，闡明正學，而世之議者，或疑其人多乏文學情味；先生之編錄是書，殆亦有意糾改世俗之偏見。又讀其人詩作，可見其人生活之一斑，亦可藉探其人思想學問之微，以補各家年譜、文集之不足，則斯編亦可謂已開示學者進窺理學一新門徑。先生之選輯六家詩，每家皆踰百首，自民國六十年冬，以迄翌年春竣事。又越年，六十二年秋始付印。先生親任校字既竟，乃獲見高子未刊稿鈔本六册，又增選二十六題三十首，爲景逸未刊詩鈔。六十三年元月由臺灣中華書局初版。

今以原版爲底本，邵、朱、陳、王四家並據四部叢刊本覆校；其中陳白沙自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以下十餘首，先生原依四庫全書本補鈔，今亦據四庫本校對。最後兩家，景逸詩鈔據四庫全書高子遺書本，桴亭詩鈔則據陸桴亭先生遺書本。先生於每家前，又各撰別傳一篇。今除校改若干誤植文字外，悉增標私名號、書名號及引號等，以便讀者閱讀。疏漏之處，尚祈讀者指正。

本書由錢行先生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宋儒金履祥輯有濂洛風雅一編，上自濂溪、康節、橫渠、二程，下迄宋末，凡近五十人。采其辭、賦、箴、銘、誡、贊、誄、祭、詩、歌、樂府諸體四百數十首，分爲六卷。唐良瑞爲之序，有曰：「味其詩而泝其志，誦其詞而尋其學；言有教，篇有感。」余之斯鈔，略近其意，而體裁不同。專鈔詩篇，他皆不及。又僅於宋、明、清三代取康節、晦菴、白沙、陽明、景逸、桴亭六家，每家鈔踰百首。讀者進而窺其全集，又進而旁及諸家，庶知理學宗旨，本在陶鑄性情，抉揚

風雅，固不如一般所疑，其言則勃窣理窟，其人則木強枯槁，拘謹狹隘，以不近人情相譏，是爲不知理學之眞。

理學者，所以學爲人。爲人之道，端在平常日用之間。而平常日用，則必以胸懷灑落、情意恬淡爲能事。惟其能此，始可體道悟眞，日臻精微。而要其極，亦必以日常人生之灑落恬淡爲歸宿。至於治平勳業，垂世著作，立功立言，斯則際會不同，才性有異，亦可謂是理學之餘事，不當專憑以作一概之衡量。

斯鈔一以顯示作者之日常人生爲主。所鈔六家，固皆一代之魁傑，理學之宗師，外論其時代，內窺其性情，既已各別不同，其論學宗旨，亦復相殊互異。然觀其平常日用間之胸懷意境，灑落恬淡，則大體相若。可證此乃理學家之共同嚮往與其共同躬修之所在。其所鈔之第二標準，則爲諸家之論學語。以此論詩，若所不宜，然亦見理學詩之一種特殊面貌，可備詩中之一格。至於格律聲色，爲一般論詩者所重，斯鈔轉不經意。然即以詩言，此六家在宋、明、清三代詩人中，亦可列上選而無媿。

康節詩最爲創新，誠可謂之是理學詩。白沙有意追摹。然兩人一居城市，一隱海濱。康節於物理、史迹，研窮廣泛，著述亦豐，數學尤其絕業；而白沙則一片空明，除刻意吟詩外，其他似

少厝意。然明代理學家，每以白沙、陽明並稱。可見理學重在人生日用。而人生日用之所重，則在其情懷境界。白沙乃以一詩人而高踞理學上座，可窺此中消息矣。

晦翁詩澹雅淳古，上規選體。跨越宋、唐，卓然不倫。以詩人標準言之，晦翁亦爲巨擘。陽明早年溺意辭章，其詩亦詩人之詩也。兩家原集皆以年代編次。茲所鈔遠遊篇，乃晦翁十九歲所作；寫眞一絕，距其易簀僅一月；首尾宛然。其詩集不啻其年譜，惟亦間有參差。如第十卷諸詩，與「樂府」同帙，皆編在九卷寫眞一絕之後，知乃隨後絡續所收。又如追和陸子壽一詩，應在兩人鉛山再晤時，而編入鵝湖初會之年。斯鈔只仍原集次序，未能一一加以辨正。陽明詩分編標題，最爲明白。讀者能將兩家年譜與詩集並讀，則各詩中之時地與其本事，皆可一一考索。今亦未能逐篇詮註，以待讀者之自尋。又兩家思想學問之與年俱進，有一詩之微，旁見側出，可以補年譜、文集之不足者。如陽明江西詩太極巖「始信心非明鏡臺」之句，足與其天泉橋「四句教」相闡發，此則脫口而出，不易得之文集、語錄中也。

景逸不多作詩，其遺書亦尠流傳，故斯編特多加鈔錄。其論學在朱、王之間。中年以後，杜門隱淪，跡近邵、陳。然其詩率眞清淡，乃亦與邵、陳之絢爛縱肆有別。三家原集，皆以詩體分，不以年代編，此鈔亦一一仍之。

六家中惟桴亭遭遇特酷。生值易世，堅貞不仕。生事窮窘，茹苦更深。故其詩多幽憂沉痛之辭。然其近於入屈者，亦終自歸於陶。其心情之灑落恬淡，亦與前五家無殊致。桴亭詩編年可與年譜並讀，一如朱、王。斯編亦摘錄特多，以見明遺民在當時生活之一斑。

讀者得斯鈔，可供進窺理學一新門徑。若擺棄理學觀點，純以詩求，詩以言志，亦可以眞得風雅之遺響。果能忘其爲詩，一吟一詠，直向自己性情日用中反身默會，則誠如程伊川言：「未讀論語前是此一人，讀論語後將會另是一人，此始爲善讀論語。」斯鈔竊亦有意於此，以待讀者之善求。

靈魂與心　出版說明

西方思想中，「靈魂」一觀念顯佔重要地位。靈魂與肉體對立，引申而爲感官與理性對立、精神與物質對立，由此產生西方哲學中之二元觀。中國人非不言魂魄鬼神，唯其曰神曰魂，皆與西方意想不同。中國人極重心靈生活，然其所偏重實在「心」而不在飄渺之「靈魂」。故孔孟以還儒家思想即以心性論爲特長，而中國哲學亦自然形成直指人心一元論的人生觀與宇宙觀。西方人言靈魂不朽，因寄意於上帝與天堂；中國人之不朽，則只在人世間，只在古往今來心與心之交感上。

本書集錢賓四先生論靈魂與心與鬼神與魂魄與宗教與葬祭與生命之十二篇文字而成。最早之一文，爲民國三十一年先生初喪母時所作論古代對於鬼魂及葬祭之觀念；最晚之文，則皆作於民國六十四年總統蔣公逝世後數月之間，包括再論靈魂與心之屬，凡五篇。先生雖自謙諸文未必能「於此宇宙人生之奇祕有所解答」，而其深心所在，則仍不外揭揚中國古哲之高情曠識，尤望中國獨特之思想文化能有以補益於今日「上帝迷失」之世界。

此書初版在民國六十五年二月，由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版行。今整理先生全集，爰依新例加入書名號、私名號及重點引號，並查對全部古籍引文，改正原有誤植文字。又遺稿中有一稿未題篇名，先生自言作於靈魂與心一文之後而續有所闡申，今亦增附本書之末以爲「附錄」。

本書之整理，由江敏華小姐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

余生鄉村間，聚族而居。一村當近百家，皆同姓同族。婚喪喜慶，必相會合，而喪葬尤嚴重，老幼畢集。歲時祭祀祠堂墳墓，爲人生一大場合。長老傳述祖先故事，又有各家非常奇怪之事，夏夜乘涼，冬晨曝陽，述說弗衰。遂若鬼世界與人世界，緊密相繫，不可相割。及長，稍窺書籍，乃知古先聖哲遺言舊訓，若與我童年所聞，絕非一事。中心滋疑，懷不能釋。

年事益長，見聞益廣，又知西方宗教、哲學、科學，其論宇宙人生，皆與我夙所存想不同。

人生有此一大問題，乃知非我淺陋愚昧所能解決。語之人，資爲談助，可以歷時移辰不倦不休，然亦不能引人對此作深切之研究。余既不信教，亦不通科學、哲學，則亦惟有安於其淺陋愚昧而止。

偶亦返於自幼所讀舊籍，於中國古先聖哲遺言舊訓，時覺咀嚼不盡，其味無窮。其於解決此宇宙人生大問題，是否確當，余不敢言。然於余之淺陋愚昧，奉以終生，時加尋繹，乃若有一軌途，可以使余矻矻孳孳而不倦。偶有感觸，於此問題，乃亦時有撰述。非敢謂於此宇宙人生之奇祕有所解答，實亦聊抒余心之所存想而止。

最近又偶有所感，隨筆抒寫，忽得五篇，而余年亦已八十有一矣。因回檢舊稿所存，最先當起於民國三十一年，余年四十八，有一題，題名論古代對於鬼魂及葬祭之觀念。其時余新喪母，又道途遠隔，未能親奉葬祭之禮，乃涉筆偶及於此，距今已三十四年矣。此下遞有撰述，彙而存之。雖各篇所見，容有不同，而大體則一貫相承。雖措辭容有重複，然要之可以各自成篇。一依其舊，亦見余個人對此問題歷年存想累積之眞相。亦有自己學問稍有長進，於舊時見解略有改定，然對此大問題之大觀點，則三十四年實無大改進。淺陋愚昧，則亦惟此而止矣。

今彙刊此編，而名其書曰靈魂與心，是亦編中一篇名，成稿於民國三十四年，距今亦適三十

年矣。因編中所論，皆與靈魂與心有關。人有靈魂與否，至今不可知。然人各有心，則各自反躬撫膺而可知。孔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讀斯編者，各就所知，是亦可以相悅而解，固不必相尋於荒漠無何有之鄉也。是為序。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春植樹節後三日錢穆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一。

雙溪獨語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一年秋至翌年夏，錢賓四先生爲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講授「中國思想史」課程，就課堂所講內容，撰寫成文。曾絡續刊載於該校文藝復興月刊。因授課於臺北外雙溪素書樓，而所言又多爲時人所少言者，故特名之曰「雙溪獨語」。全書三十篇，凡八十四節；篇、節並無分目。

本書所述，不蹈畦徑，別立機杼，首自衣、食、住、行，以至夫婦婚姻，五常五倫，人品雅俗，乃至三教異同，性理情欲；再進而就思想文化之專門觀念作深入之闡發，如道德與知識、進與止、常與變、久與速、內與外、爭與讓、群與己、職與權、工作與娛樂、儲蓄與消費、隱藏與顯露、少數與多數、文與質、偏與中等，皆竭其兩端，致廣大而盡精微。或引經據典，或能近取譬，而眞知灼見，溥博淵泉，不擇地而出，誠可具見先生爐火純青之功力焉。

是書於民國七十年元月由臺灣學生書局初版；七十二年三月校正初版若干誤字，發行再版。今整編爲全集，即以再版本爲底本，新加入書名號、私名號、引號；至原書所引重要古籍，則提

出另排，以期版式淸朗，方便讀者閱讀。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邵世光小姐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民國六十一年秋迄於翌年六十二年夏之一學年，余爲陽明山華岡文化學院歷史系碩士博士班研究生授課，就其講堂所講撰寫成文，共得三十篇，絡續刊載於學院所編之文藝復興月刊，而名之曰「雙溪獨語」；因諸生皆來余寓素書樓受課，樓對外雙溪。余告諸生：「凡余所講，雖亦引經據典，述而不作，了無新義，然諸生驟聞之，或將疑其與平日所受課不同；即在報章雜誌及其他學人新著作中，亦少及此等話；不啻若爲余今日一人之獨語。然苟留在心頭，他日多涉古籍，當亦知非余一人之獨語也。然歟！非歟！則待諸生自定之。」稿既成，擬續有改訂。乃余此下方

忙於彙集舊作，編爲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書，前後共八册；未及完編，而余雙目忽失明，不能見字。而此稿藏篋笥前後已達七載，再不能復有改定。棄之可惜，姑以付印。聊述其成書之緣起與經過焉。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下旬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五。

晚學盲言　出版說明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有若干教授曾創辦一雜誌，名爲「戰國策」。彼等認爲當時世界之大勢，正猶中國之先秦戰國，列強相爭，終則成東齊、西秦兩帝；最終則盡歸於秦之兼併一統。蓋即謂當前一美一蘇，而將來之演變，世界必歸統一，惟歸美抑蘇未能遽定耳。同時錢賓四先生則反對此說，曾在民國三十一年撰戰後新世界一文，指出此下世界，應由合而分，決非由分而合之局；前此爲歐洲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所兼併支配之各民族各國家，均將在戰後獲得解放，重歸自由；故特爲二次大戰定名爲「解放戰爭」。已而大戰結束，而戰後新興國家如雨後新筍，不斷產生，果證先生先見之明，洵獨卓而不誣。經此戰役，先生乃愈知西方文化確有其病痛，而吾傳統文化亦自有其特長。其所爲論著，在此之前，多在我國固有學術範圍內，並不牽涉西洋；而自此時期所作中國文化史導論一書以後，乃往往觸及中西文化之比較。亦可謂先生後半生精力，實集中在探討此一問題。晚歲雙目失明，仍就此時時思索，有意作爲中西文化比較一書，分別就文化思想之各方面比論中西異同所在。以目不見字，撰述心得遂備極艱困。然八九年

間，亦積得九十篇文稿，題曰「晚學盲言」，蓋先生晚年最後之著述也。

全書都分三部：上篇宇宙天地自然之部，凡十五篇；中篇政治社會人文之部，凡三十篇；下篇德性行爲修養之部，凡四十五篇。觀其立目，若整體與部分、抽象與具體；群與孤、簡與繁；生與死、情與欲之類，多執其兩端而竭其底蘊；此一意態已顯見於前著之湖上閒思錄及雙溪獨語。要之，雖篇各一義，而相貫相承，宗旨則一；其宗旨則爲討論中西雙方文化傳統之異同。自文化體系言，主要本於「和合」與「分別」作比較；自學術思想方面，則以「通」與「專」二字爲其著眼點。至於申詳吾國傳統文化中「一天人，合內外」(或曰「通天人，合內外」)之精義，尤三致意焉。凡吾中華民族遞傳五千年廣土眾民達於十億以上人口，迄今一線相承，日廣日大，前途無限之所以然，悉已於各篇中分別闡詳。此皆有憑有據，非屬空言。凡吾國人平心讀之，亦可以明吾祖先之苦心孤詣，有未可輕蔑而忘棄者；是則讀此書，宜亦可於世道人心有所啓示。

本書編成於民國七十五年秋，先生高齡九十二歲；交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於翌年八月初版。其所徵引古籍故事，惟賴記憶，偶有疏略；且全書篇幅頗大，凡逾七十萬言，排校工作繁重，不免頗有訛誤；今悉加校正，一般不另出注說明。又依全集例，加入私名號、書名號、引號等；引述古籍，則儘量提行別出。引文多經覆核，然亦有顯爲先生所節錄以及約引其義，或略增數字以

完文意者；在不傷文義之前提下，皆不再改動。目次中有一題之下，分列數篇者（如㈠、㈡之類），殆先生就同一題目分撰成文，未必一時所作。另有一題之中，又細分小節（如一、二之類），而在目次中並未列出者，則多因本文篇幅過長，故予分節以清眉目；與前類之分篇性質有不同。今仍存原式，並略加說明，俾便參詳。排校工作雖力求慎重，惟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何澤恆先生、張蓓蓓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余八十生辰，即撰述八十憶雙親一文，嗣又續撰師友雜憶一書，畢生往事常在心頭者，幾若無遺。八十三、四歲，雙目忽病，不能見字，不能讀書，不能閱報，惟賴早晚聽電視新聞，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辨認人之面貌，稠人廣坐，酬應爲難，遂謝絕人事，長日杜門。幸尚能握筆寫字，偶有思索，隨興抒寫。一則不能引據古典書文；二則寫下一字即不識上一字，遇有誤筆，不

能改正。每撰一文，或囑內人搜尋舊籍，引述成語。稿成，則由內人誦讀，余從旁聽，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乃獲定稿。費日費時。大率初下筆，一小時得千字已甚多；及改定，一小時改千字亦不易；內人爲此稿所費精力亦幾相等。余九十一生辰屢犯病，大懼此稿不得終迄。內人告余：「未讀稿已無多」，心乃大定。直迄於余九十二生辰後又百日，而全書稿乃定。

此稿共分三大部：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政治社會人文之部，三、德性行爲修養之部。大率皆久存於心，偶爾觸發，漫無條理，又語多重複。儻能精心結撰，或當更多闡申，或宜更多刪節，此則非盲目老年之所能從事矣。惟余之爲此書，亦不啻余之晚學，爰題名爲「晚學盲言」。又本書雖共分九十題，一言蔽之，則僅爲比較中西文化異同。或深或淺，或粗或細，隨筆所書，得失難定，幸讀者有以正之。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秋先總統蔣公百年誕辰紀念前十日錢穆自識於臺北市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九十有二

新亞遺鐸　出版說明

民國三十八年，時局阢隉，錢賓四先生避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為香港第一所招集流亡人士之大專院校。本書主要以新亞書院出版之生活周刊（後改生活雙周刊，又改生活月刊）為資料來源，匯集先生主校政十七年中對學生之各種講演以及其他相關資料而成書。讀此一書，可使讀者瞭解當年海外流亡人士辦學之艱辛，並可體認先生在流亡期間為擔負傳承中國文化之責任，勉力教育中國青年之堅毅不移之志趣。

是書於民國七十八年始彙集資料整理完成，交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而先生離開新亞書院已二十三年矣。是年適逢新亞書院創校四十周年，亦一深具意義之巧合。最早所集資料中尚有先生當年為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講演之十八篇文稿，尋以卷帙過鉅，初版付梓時已先抽出；此一系列文稿，今另收入全集第五十二冊講堂遺錄中。

此次整理，即以東大初版為底本。惟該書中有二十三篇文稿，先生生前另已分別收入其他專書中；今將此等篇章自本書中抽出不錄，僅在目次中保留篇目，並在其上加注「△」號，題下注

明另收何書中，俾便讀者覆案。又有七文，雖亦分別收入他書，本書仍保留全文，以便考索。此等篇章則題上不另加注號，僅在題下注明重見書名，藉資識別。整編時除將原版誤植文字隨文校改外，主要尤在標點符號之整理，全書加添私名號、書名號、重點引號及調整版式。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疏漏錯誤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序

民國五十六年，我們遷臺定居。有人談起讀到新亞生活周刊上賓四的一篇講演，很受感動，希望將該刊講辭文稿彙集成專書。那時賓四專心在寫朱子新學案一書，無暇及此。數年後，又有人重提舊話。其時賓四朱子新學案已出版，正著手整理以前舊稿，彙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回憶往事，深感在新亞十七年，每次對學生談話，都是他當時的眞情流露，値得珍惜。遂命我爲他先收集資料，準備整理完舊稿再作考慮。未料不久後，賓四雙目卽不能見字，自此身體多病，一

切工作費時費力，新亞生活周刊的資料一放十年，無暇顧及。

去年，賓四在養病中，無以消遣，於是又想到新亞生活周刊，命我順序逐篇唸給他聽。原以爲現成稿子彙集成書是件輕鬆簡單的事，不料這本集子，每篇都牽起太多回憶，工作進行頗不順暢。加以一場大病，賓四腦力迅退，這本文稿的編集，竟拖了一年多才得勉強付印，眞是始料所未及。

賓四爲此集定名爲「新亞遺鐸」。在我們共同整理文稿的過程中，他曾多次有感而發地說，離開新亞已二十五年，再來回首從前，那是何等情緒啊！又屢說，待此稿整理完，他將要爲新亞遺鐸寫篇長序，略敍別後情懷。我一直期待讀他這篇將寫的長序，不幸他年老復元不易，待全稿編定，他已無力爲文。不得已，命我於此書付印時代寫一序。

我與新亞淵源也不淺。民國三十八年夏，我離開厦門大學避禍來港。三十九年秋，轉入新亞，就讀一年。四十年離港來臺，隔年轉入臺北師大。四十三年師大畢業後，又曾回新亞一短時期。四十五年初，與賓四成婚。五十四年賓四辭職離新亞，五十六年秋我夫婦離港來臺定居。我與新亞前後相關也已十五年。我曾目睹艱苦奮鬥中的新亞，生命充滿朝氣。也曾目睹她快速轉變時期，解除了經濟困阨，而逐漸步入人事紛擾。更目睹她加入中文大學後陷於興奮迷惘，個人功

利勝過了整體道義，創校理想日益模糊。往事久已塵封，因整理此集而又如走馬燈般湧入腦海，不勝感慨。

賓四在新亞生活雙周刊一卷一期發刊詞上說：

這一份新亞生活雙周刊便想把新亞生活之各部門各方面盡量彙集披露出來……這是我們新亞將來的一部歷史……將來要瞭解新亞如何生長、如何成熟、如何發展，以及新亞生活中究竟包藏了些甚麼？所謂「新亞精神」，究竟具體表現了些甚麼？便要憑這份刊物來審看來推尋。

又在雙周刊四卷一期本刊進入第四年一文中說：

這一份刊物，我們創辦時的用意不外兩點：一是逐期報告學校師生們生活的實況，一是預備作將來校史之一份重要參考材料用。

周刊創辦的宗旨雖如上述，然而我把賓四主持校政十五年來的資料，從頭一頁頁仔細翻看，禁不住為它記載的不夠翔實而感嘆。最難釋懷的，莫過於賓四辭職時相關資料的欠缺。舉其最簡單具體一事說，賓四的辭職講演，當時竟無人記錄。

民國五十三年（一九六四）七月十一日，新亞舉行第十三屆畢業典禮，賓四在主持典禮的同時，對全校師生作了他正式離職的公開講演。回想那一段忙碌混亂的日子，我至今仍淸晰的記得，典禮的前一晚，時間已過午夜十二點，賓四在忙完雜務後對我說，他現在要靜下心來好好準備他主持校政十五年來最後的一次講演。於是在沙田和風臺五號，我們舊居的長廊上，他啣著煙斗，獨自在廊上散步，爲他第二天的告別辭打腹稿，直過兩點才上床休息。我又聽他在床上翻來覆去，直到天亮。第二天早上，我陪他去新亞，他在忍受了無數委屈，又經過長期內心掙扎，卻能如此平和的講話，沒有帶一絲火氣，而又句句充滿情感，令我幾次禁不住淚水奪眶而出，這眞是令我終生難忘的一場講演。

當晚校長室蘇明璇先生來電話，也說起他的感受。不料兩天後蘇先生再來電話，激動地報告，學校竟無人記錄賓四的告別講演。這眞是件不該有的缺失。歷年來，每逢新亞舉行開學或畢業典禮，照例有人負責記錄師長的講話。何況這次是新亞創辦人的告別講演，意義更不同。這一疏失，實在令人有些費解。典禮後十一日，賓四在蘇先生多次催促下，終於補寫了一篇講辭，登在新亞生活雙周刊七卷六期上。事過情遷，再要捕捉當時的心情，有如水中撈月了。我每回想到此事，總覺遺憾。

此集文稿編定後，在賓四雜稿中，意外尋出民國四十九（一九六〇）年賓四在美獲耶魯大學頒贈名譽學位雅禮協會舉行祝賀公宴時之講辭一篇，及其辭新亞校長職復雅禮羅維德先生函一草稿。另又在其記事本中獲知當年有上董事會辭職書一封，特電新亞書院院務主任張端友校友於檔案中查出寄來。其中兩函有關當年賓四辭職事，有此三文補入本集，正可稍補缺失。

此集所收只限於賓四在新亞校刊、新亞生活雙周刊、新亞月刊上所刊載之文稿，按出版秩序先後排列，並在目錄上註明各篇原刊幾卷幾期，以便讀者查尋。如該文已另收入賓四之其他著作，也附加註明。民國五十六年我們由港遷臺時，葉龍校友贈其手抄賓四海外講稿兩本，孫鼎丞先生贈賓四剪稿數十篇。惟此項文稿大都爲記錄人自行發表者，僅擇其中與新亞歷史有關數文，特爲補入，並在目錄上及文末註明其原發表處。另新亞生活曾刊有我的敬悼青瑤師一文，該文所述有關新亞藝術系之創設，今亦附入本書。又新亞生活周刊有記載學校活動之文稿數篇，以其有助讀者對當年新亞之認識，今亦附入。以上凡非賓四本人之文稿，皆不排列在目錄順序上，並註明爲「附」稿，以示區別。又該刊原有賓四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講稿十八篇，今已取出收入講堂遺錄一書中。

這本文集拖了多年終於付印了，今年恰逢新亞創校四十周年慶，特將賓四之祝辭與新亞簡史

兩文，一併收入此集中。意外的巧合，亦別具意義。賓四囑此書趕在九月二十八日校慶日前出版，以爲他的賀禮。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　錢胡美琦寫於臺北外雙溪之素書樓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　出版說明

民國六十三年，錢賓四先生年八十，追念親恩，成八十憶雙親一書，民國七十一年，年八十八，又成師友雜憶一書。是書歷數平生師友風誼，不啻爲數十年學風世道一縮影，亦即是先生之自傳矣。垂老而作，追想爲難，起筆於民國六十六年冬，完稿於七十一年之雙十國慶，前後歷時五年。後以兩書性質相近，合爲一編，題名「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於民國七十二年交由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先生曾自綴數言簡介此書曰：

余之一生，老而無成。常念自幼在家，經父母之培養；出門在外，得師友之扶翼；迄今已八十八年。余之爲余，則胥父母、師友之賜。孟子曰：「知人論世」，余之爲人不足知，然此八十八年來，正值吾國家民族多難多亂之世。家庭變，學校變，社會一切無不相與變。學術思想，人物風氣，無不變。追憶往昔，雖屢經劇變，而終不能忘者，是即余一人眞生命之所在也。年八十，遂爲憶雙親一書；數年後，又續爲師友雜憶一書。此册乃合刊此兩書，共爲一編。讀者庶亦由此一角度，有以窺此八十八年來國家、社會、家庭、風

氣、人物、思想、學術一切之變，而豈余之一身一家瑣屑之所萃而已乎！善論世者，其終將有獲於斯書。

讀者於探究先生平生事迹之餘，試以此意讀此書，亦必收獲匪淺也。

先生作師友雜憶時，雙目已失明不見字，凡所載錄，全憑老年記憶所及。其時海峽兩岸礙於客觀情勢，通訊不便，遇有疑慮，無從查詢。故所記若干細節，或與事實不免稍有出入，近年來兩岸已相通傳，部分內容有疑義處，雖相隔多年，尚有可以查詢求證者。於今整理全集，仍保留原書之完貌，不予改動；遇有先生誤憶之處，則另加附注說明。新加附注共二十六條，可供讀者參考。書末增附先生紀念親友之文十二篇，配合本書閱讀，可助理解，並增情味。

此次整編，以東大本爲底本，另作標點符號之整理。全書增添私名號、書名號以及重點引號，校改原書若干誤植文字，以便讀者閱讀。整理排校工作雖力求愼重，然疏漏錯誤之初，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

本書由胡美琦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前言（八十憶雙親）

余乃一孤兒，年十二，先父辭世，余尚童騃無知。越三十五年，先母又棄養，余時年四十七，隻身在成都，未能回籍親視殮葬。國難方殷，亦未訃告交游，缺弔祭禮，僅閉門嗓泣深夜嚎啕而止。年七十一，值雙親百齡冥壽，余是年已辭新亞校務，患目疾，住院施手術。不久，即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任教，時思撰文，略述梗概，竟未果。今歲余年八十，明年，又值雙親一百十齡之冥壽。因乘余之誕辰，覓機赴梨山，沿橫貫公路，自花蓮返臺北，途中滯留八日，住宿四處，草寫此文。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回念前塵，感愴萬端。自念我之生命，身體髮膚皆傳自父母，而今忽已耄老，精神衰退，志業無成。媿對當年雙親顧復教誨之恩，亦何以贖不肖之罪於萬一。往事種種，迄今猶留腦際。拉雜書之，庶我兄弟四人之子孫，淪陷大陸者，他年當能讀及，亦使稍知祖德之一二。亦以告並世之知余其人而不知余之生平來歷者。

序（師友雜憶）

余八十初度，撰憶雙親一文。讀者多勸余繼述生平經歷，以饗並世。余念自幼志學，老而無成，妄有自述，豈不靦顏。惟生平師友，自幼迄老，奬勸誘掖，使余猶幸能不虛度此生。此輩師友往事，常存心中，不能忘。今既相繼溘世，余苟不加追述，恐其姓名都歸澌滅，而余生命之重要部分，亦隨以淪失不彰，良可惜也。惟余所欲追憶者乃遠從七十年前開始。逃避赤禍來港臺，亦已有三十年之久。古人以三十年爲一世，以今思昔，皆已恍如隔世。而況憂患迭經，體況日衰，記憶銳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謂常在心中，但一臨下筆，即渺不可尋。有時忽現腦際，未即寫下，隨又忘之，苦搜冥索，終不復來。而又無人可問。如寫第一篇果育學校事，當前相識已無一人同歷其事者。第二篇寫常州府中學堂事，在臺有一人，在港復有一人，年皆長於余，皆垂垂九十矣。余所思，未必即彼所知。此皆前清時代之事。下逮民初，亦復如是。故凡余所述，皆屬一鱗片爪，而已費九牛二虎之力。但既到老不忘，則可確證其爲余生命中之重要部分，務求敍述眞實，亦屬余對生命之自惜。縱屬一鱗片爪，在余則彌自珍重。而余之生命，在此

時代，亦屬可有可無。增余一人不爲多，減余一人不爲少。惟此七十年來，世風時態，驟轉亟變。余所追憶亦可使前世風範猶有存留。讀此雜憶者，苟以研尋中國現代社會史之目光視之，亦未嘗不足添一客觀之旁證。有心世道之君子，其或有所考鏡。是則凡余之所雜憶，固不僅有關余一人之事而已。又余雙目已不能見字，信筆所至，寫成一字即不自睹，工拙更不可計。亦有心中極明白極淸楚之事，不敢放筆。若以白話文寫出，則更恐浪費紙張，浪費讀者之光陰。故下筆力求其簡，庶亦可告罪於萬一耳。知我罪我，是在讀者。

民國六十七年春錢穆自識於臺北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時年八十有四。此序先成，全稿起筆於民國六十六年多，於民國七十一年之雙十國慶停筆，前後歷五年。

講堂遺錄　出版説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講堂記錄稿，全書由三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爲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起，先生在昆明私立五華書院所作「中國思想史」一系列講演中最先六講（上古、孔子、孟子和其他儒家、墨子、道家、名家）之講稿。原稿爲五華書院創辦人于乃義先生所記錄，曾自三十六年一月五華月刊創刊號起，逐期刊載。據先生所著「五華書院文史研究班文史學科三年修養綱領」推知，先生在五華書院共作三十次有關「中國思想史」之講演。除上述六講外，尙知有第七講「陰陽家」（據五華月刊）、第八講「秦漢間之新儒家——易傳與中庸」、第九講「東漢以下宗教思想之復活」、第十講「魏晉玄學與南渡清談」、第十二講「大乘佛學——空宗」、第十三講「大乘佛學——相宗與性宗」（據孫鼎宸先生「錢賓四先生論著年表」）。惟此數講僅見題名，並無文稿。其實有關「中國學術思想史」方面之論題，先生早在北平各大學任教時，以及抗日戰爭時期流亡大後方任教各大學時，講課早已屢有涉及，並曾有多篇論文分別在報章雜誌發表。民國三十五年冬在五華書院開講「中國思想史」，講題與早期

論文名多雷同，或即據早期所寫論文講授。此等已發表之論文，先生晚年已將之重加整理，按時代先後分別收入其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各册中。讀者如有興趣，可參考是書。

第二部分爲先生流亡香港時期，應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之邀請，所講一系列「中國學術思想史」中三時段之講稿，計爲民國四十八年「明清學術思想」六講，五十年「秦漢學術思想」六講，五十一年「先秦學術思想」六講。此十八講因當年有人筆記交新亞書院雙周刊發表，故得留存。民國七十八年，先生整理新亞遺鐸一書，一則以其書卷帙已鉅，再則此項講演與新亞書院亦無直接關係，故而未予收錄。今整編全集，即將此十八講收入本書。

第三部分爲先生晚年定居臺灣後，於民國六十三年九月至翌年暑，爲中國文化學院研究生所開「經學大要」一年課程之講稿，共三十二講（其中缺有關「漢儒通經致用」一講）。先生當年開設此一課程，乃爲了卻其數十年之心願。蓋民國十九年，先生撰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在燕京學報發表。其前北平各大學本皆開設「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諸課，並主康有爲今文家言，是文一出，今文家言不能成立，此等課程遂多在是年秋後停開。此本爲一時現象，假以時日，學術界自可有一適當調整。不料時局動盪，繼以日本大舉侵華，國家存亡未卜，人心惶惶，再無人有心及此專門學術探討。經學一課停開，竟因循數十年未能恢復。先生引爲內疚，曾言其撰文主

旨，本爲看重經學，故特指出講經學不能專據今文家言，未料結果竟正相反。爲此耿耿在懷，屢思有所匡正，而皆不果。民國六十年，先生完成朱子新學案一書後，自知年老精力漸衰，急欲對此有所補救。自付寫經學史專著已不可能，宜應改變方式。思之再三，決定且寫一本簡要經學入門之作。計劃此書分兩步驟完成：第一步：先開一門經學課，上堂講授一年，將講稿寫出。第二步：再配合講稿內容，引據古人經學專著，加以評論，主要針對皮錫瑞經學歷史及經學通論兩書，以及由此旁及之其他相關經學專著。上堂講授，可儘量求其淺易，以照顧學生缺乏經學知識之背景；引述古人專著並加評論，則不宜過簡，應比照一般學術水準。兩者相輔互補，庶可引導學生對經學由淺入深得一整體瞭解。

先生於開課前，曾兩度赴書店親爲學生尋找參考資料。並重讀皮氏經學歷史、經學通論二書，爲講課作準備。民國六十三年秋，正式開課，每星期一次。課名定爲「經學大要」。開課前已預先指定專人負責錄音及整理講稿。原計劃每次講完，儘速寫出講稿，俟全年講畢，再進行第二步工作。不料因故講稿未能如期交出，僅最初數講曾送先生過目。民國六十七年，先生大病一場，病起雙目已不能見字，仍時以此稿爲念。七十六年，終得最初十一講，其中部分尚爲未整理之草稿；其餘二十餘講只見五十餘卷未寫出之原始錄音帶。時先生已九十三歲，且常在病中，賴

夫人整理草稿，逐篇唸出，且聽且改，僅能略作文句之修飾，已難從事內容之增刪。先生復時時催促儘速寫出錄音講辭。然至民國七十九年遷出素書樓時，僅能匆匆再寫出四講。至此上學期十五講已全部寫出。惟此四講未及從容修正，先生即溘然辭世矣。

民國八十年，擬議爲先生出版全集。編者先將數十卷錄音帶從頭聽過，深感整理困難，蓋因錄音時間已久，音質有損，前後秩序復有錯亂。當年學生筆記宜可作參考，亦遍求不得。幾經考慮，乃決定「經學大要」講稿僅收入第一學期之十五講，放棄第二學期十七講。

民國八十五年，全集甲、乙兩編已完成，丙篇各册稿亦大致整編完竣，僅餘最後新編「講堂遺錄」及「素書樓餘瀋」兩書文稿尚待整理。謀議久之，終覺「經學大要」一稿殘帙可惜。先生曾言：此稿不能照原定計劃完成，是一遺憾。惟三五十年之內，未必有人能寫出一部簡明經學史。先生向認中國之前途繫於學術之復興，欲復興學術，大學生不論唸何系，皆應對本國學術思想史有一通體之認識。此稿雖簡單，有志者讀此一書，自可尋向上去。則此稿之完成，或仍有相當之意義也。

八十五年冬，整理工作開始著手。編者先將數十卷錄音帶反覆聽過三遍，因錄音順序有誤，其中又有遺漏，必先對整體內容熟悉，否則不易寫下。凡遇人名書名以及引文，又需一一核對原

書。其中艱辛，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幾乎中輟者屢，終能勉力寫出，底於完成，庶亦可告慰先生在天之靈矣。

本稿遇錄音有遺漏處，均加注說明。有疑慮處，只刪不增，以免走失先生原意。

本書之整理工作，由胡美琦女士及何澤恆教授、張蓓蓓教授共同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素書樓餘瀋　出版說明

本書爲錢賓四先生全集正文之最後一册，主要以不易歸類之零篇或前此成書失收及新得之短文，彙編而成。全書共分序跋、雜文、書札、詩聯輯存、晚學拾零五部分。

第一部分序跋類。共四十三篇。最前兩文爲先生早年任教小學時之作，特具紀念性。蓋先生篤於友于，長兄聲一先生於民國十八年辭世後，爲表追思，曾編錢聲一先生紀念文集，當年曾寄送各圖書館收藏。先生辭世後，編者爲整理全集文稿，曾數赴上海、無錫、蘇州、北京訪尋，未有所獲。惟在無錫尋得民國九年縣立第四高等小學校校刊所載先生跋吾兄聲一詩選一短文，及在北京意外尋得民國九年先生紀念好友朱懷天先生，爲其整編遺稿時所寫之序文。一序一跋，皆見眞情，得之匪易，彌足珍貴。第三文爲民國三十年之作，其餘大都爲民國三十八年流亡海外後所作。其中與新亞書院有關之五篇序文，當年未刊載於新亞雙周刊，故整理新亞遺鐸一書時遺漏未收入，今且權入本書。先生所作各類序跋文當不止於此，惟收集不易。今全集出版在卽，且先彙編已尋得者，餘俟他日再補。

第二部分雜文類。此部分文稿不多，惟其中有三文乃爲先生生平最早在報章發表之文字，亦即先生在師友雜憶中所述及民國十年上海時事新報學燈副刊以大字排版刊出之意志自由與責任、因果、愛與欲三文，時先生尚任教小學。此三文亦於先生身後在北京覓得。又有未曾發表之白話歷史教科書稿，或亦作於民國十年前。先生生前提及，昔年曾有意以白話文寫一部「白話歷史教本」，藉作試驗。今所見稿，僅五課，或爲當年未完之編。另人生小品一文，亦爲未完稿，乃先生晚年病中遺與之筆。後兩稿於遺稿中檢得，棄之可惜，附收於此。

第三部分書札類。整理先生全集，本未計畫收集書函。蓋先生生前曾明白表示，個人學術生命中有價值之信函俱已遺失。惟自先生逝世後，編者絡續收到友人主動寄還先生信函，不得不重作考慮，改變計畫，增添書札一類。且所獲信函，有一部分亦可作先生生平之補充資料，主要在對其創辦新亞書院、辭卸新亞院長職，以及晚年撰寫朱子新學案之一番心路歷程，皆具參考價值。惟所收信函過多，不得不選載，所選大致以上述標準爲依據。既已選錄致海外友人函，則亦宜補入致大陸友人函，今僅取蘇州出版之錢穆先生紀念文集中所收先生早年致及門諸生函，以及家書各數通。大陸自文化大革命後，先生故家所存書籍文稿信函，已片紙無存。音訊中斷數十年，父子再取得聯繫，時先生雙目已不能見字，親筆家信極有限。寥寥數函，聊備一格而已。

第四部分詩聯輯存。先生嘗言，生平喜詩而不能作詩。年青時與長兄聲一先生及好友朱懷天先生同校任教，曾有一段爲時短暫之唱和生活。惟此期作品已杳無蹤影。此後先生輒於病中以吟詩解悶消憂，偶而隨興自作，興盡即止，極少發表，亦無意保存。民國五十四年，先生長子錢拙曾將先生留存家鄉部分文稿裝一紙盒試寄香港，僥倖重見天日。詩聯輯存部分所收閩南詩稿兩編，以及雜文類中白話歷史教科書五課，皆出乎此。又於遺稿中檢得先生辭去新亞書院院長職後，在香港及馬來亞養病遣懷之作，以及晚年在外雙溪消閒之作。最後附以「春聯輯存」一編。民國四十五年先生再組家庭後，每年新春必撰二或三對聯語應景，或大門、客堂兩聯；或大門、客堂、書房三聯；胥隨興戲筆，無意保存，更未記錄。友人抄錄寄贈，則亦何妨存之。惟最早數年之聯語已無從查詢。所存雖不全，亦可見先生生活之一面。

第五部分晚學拾零。先生去世前一二年，常長日無言，稍有精神，即俯案書寫，有時加題，有時無題，隨想隨記。曾言：自知所寫大體皆爲老話，惟此等念頭常盤旋於腦海中不能去，恐或有新意，年老易忘，姑且記下，容後再作考量。時先生已高年九十五，且常在病中，加以當時忙於搬遷居處，生活大受影響。此部分草稿，完全未及整理。今既彙編先生全集，特選部分收入本集，讀者庶可藉此以見一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士」，在其人生走到盡頭時，心中之所思所想。

本書之整理工作，由胡美琦女士負責。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ISBN 957-08-1409-8
35000
9 789570 814095